

张宁自己写自己

漫漫岁月，我从一个姑娘又成了一位妇人，也被媒体造就成了一位“社会写手”。长期以来，一些友人曾鉴于媒体的“折腾”，建议我“与其让别人写你，不如自己写自己”。一个人的经历，只有当事人体会最真切。某些特定人物的接触感受，对采访者来说，恐怕还是像创作，都是清晰地印在脑海中的。许多感慨都是人间许多不幸的人们在生活的方面，不加修饰，因为生活。回忆辛酸往事是很痛苦。灵感应的重复，重揭伤痕，常常眼目迷离，泪水涟涟。



张宁：自己写自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己写自己/张宁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63-1503-3

I. 自… II. 张… III. 张宁—自传 IV. K8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020 号

自己写自己

作者: 张 宁

责任编辑: 杨 葵

责任校对: 齐燕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8

印数: 100301—110400

版次: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ISBN 7-5063-1503-3/I·1491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摘编本书



1954年，张宁（左）与父母、哥哥和弟弟摄于南京。



张宁两岁时与保姆（左）、奶娘（右）合影。



张宁摄于1960年冬天，时年10岁，为入伍的第一年。



1961年冬，“金陵十二钗”中的八钗摄于学员队驻地外，左起第三是张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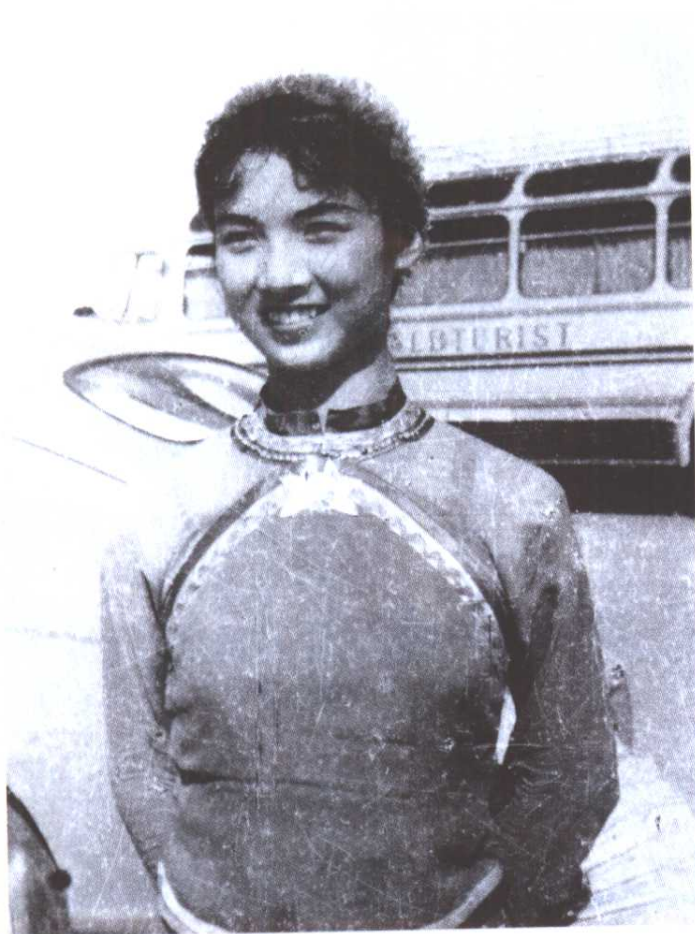
1961年初春，参加共青团活动，瞻仰雨花台烈士陵园，第二排右二黑衣者为张宁。



1964年学员队时期的张宁



1964年全军汇演时的张宁



1965年，张宁随团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5年出国前留影。



学员队队长董哨



《贝壳舞》剧照



1964年全军汇演之《贝壳舞》，中间领舞者为张宁。



1965年，张宁（中）在印尼向当地舞蹈演员（右）学习舞蹈。



1965年张宁随团出访，演出后印尼文化部官员上台祝贺。



1971年6月去北京前的张宁



1986年，张宁与晨儿摄于南京玄武湖畔。



1991年，张宁归国拜见师傅本振长老。

1996年，张宁与儿子佛欣归国探亲，摄于南京鼓楼公园。



1996年，张宁携儿子佛欣拜见本振长老，长老赐佛欣法名“妙善”。



1993年，张宁母亲去世，骨灰撒入长江。
1996年，携儿子在长江边祭亡母。

爱儿佛欣



1997年夏与
儿子佛欣摄于美国。



1996年夏，
张宁摄于美国家居。



张宁与林立衡（中）、张青霖（左）合影。



张宁与丈夫林赛圃、儿子佛欣的合家照

写在前面的

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在中国有过一段坎坷的人生经历。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媒体从未中断过对我以及我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的报道。漫漫岁月，我从一个姑娘变成一位妇人，也被媒体造就成了一位“社会名人”。

长期以来，一些友人曾鉴于媒体的“热络”，建议我“与其让别人写你，不如自己写自己”。一个人的亲历，只有当事人体会最贴切。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物的接触感受，对采访者来说，写出来的感觉，恐怕还像是创作。所以，定居美国后，不必再躬身生计时，安下心来，提笔写自己。

没有编纂酝酿，曾经走过的生命路，都清晰地印在脑海中。许多感慨，许多无奈，是人间许多不幸的人们普遍都有的。书中涉及到的方面，不加修饰，因为真实的东西就是生活。第一稿四十五万字。回忆辛酸往事是很痛苦的，切肤之痛是心灵感应的重复，重揭伤痕，让鲜血再流一次。经常眼泪不自主地流下来，有时干脆哭够了再写。

初稿出来后，一些朋友看完又提看法，说我写得“赤裸裸”，会引起一些人神经过敏什么的。第二稿三十五万字，海外出版，引起史学界注意，也拥有不少读者。第三稿减为三十万字，便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版了。

虽然几易其稿，我还是坚持了一个原则——原始的叙述。我认为，那段至今令世界感兴趣的“中国现代史上的谜”，以我的

亲历诉诸于世，只会对解读历史之谜有好处而绝无坏处。过去的事，不论谁对谁错，人们总希望知道真实的，苍天赋予人智慧，智慧是有尊严的，不可以亵渎。

林彪事件即“九·一三事件”，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的事，现在很多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当时还没有出生，或还是个几岁的孩子，对那段历史的政治生活气息，不但生疏，听起来还会觉得滑稽荒谬。但我这一代的同龄人，以及我们的上一代，回忆那个曾经生活其间的历史阶段，会有一股浓烈的辛辣滋味；现在，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迈向真正的世界强国地位，国强民富观念取代了过去种种“阿 Q”式的政治口号。共产党搞革命的初衷，本就是为了提高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素质，而我们那一代，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走了很大弯路。要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以前的事，对推动社会及自身的文明进步，也许不无砥砺作用。这也是我写此书的心愿之一。

我最终皈依了佛门。这个世界很丰富，充满诱惑和罪恶。我的人生体验：对坏的灵魂不要怕，对善、弱的灵魂不要欺；嫉恶如仇始于与人为善；做人不可丧失道德心和公道心；一个人生活得潇洒，更要生活得心安理得。

关于我的经历，流传的很多，这部书向关心我的读者做个交代。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石城“毛猴”	(3)
父 母	(4)
军区总医院的小常客	(5)
十岁当兵	(8)
“苗尖子”	(13)
政治培养	(16)
全军汇演和大歌舞	(18)
出访印度尼西亚	(21)
异国情	(29)
东欧观感	(41)

第二章 选美内幕

初选概况	(55)
副总长夫人两下江南	(58)
第一次被选进京	(61)
叶群忌，林立果迷	(68)
林立衡、林立果身分揭秘	(72)

蟒与异梦.....	(76)
林立果“偷”我第二次进京	(80)
检查身体	(86)
与林立果重逢	(88)
“首长俱乐部”	(90)
抗 命	(93)
“执行任务”充当样板	(97)

第三章 动乱年代的恋情

初 恋.....	(111)
许夫人做媒.....	(119)
与恋人分手.....	(123)
叶群迂回战术绕过许夫人.....	(132)
求援失败异梦再现.....	(139)
改行学医.....	(143)

第四章 在林家的日子里

初进毛家湾.....	(149)
林立果偷越“禁区”	(153)
夹缝里生活.....	(161)
见林彪.....	(168)
林彪接见总院院长靳来川.....	(172)

第五章 在北戴河的日子

九月七日.....	(181)
九月八日.....	(189)
九月九日.....	(205)
九月十日.....	(225)

九月十一日	(228)
九月十二日	(234)

第六章 政云突变

从北戴河押送回北京	(261)
中办副主任传达五十七号文件	(264)
自 杀	(267)
暂囚毛家湾	(274)

第七章 真实的一角

中央专案	(281)
双重身分的人	(287)
石破天惊	(295)

第八章 苦难的延续

毛远新选妃	(299)
劳改生活	(306)
打击“翻案势力”	(317)
中秋异梦	(322)
母亲来劳改农场	(325)
释 放	(334)

第九章 漫漫岁月多坎坷

燕子归旧巢	(341)
我的董哨老师	(350)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353)
与林立衡夫妇重逢	(355)
“太平天国”不太平	(360)

姜教授看相·····	(367)
痛失爱儿，皈依佛门·····	(374)
出家变出国·····	(390)

第一章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石城“毛猴”

父 母

军区总医院的小常客

十岁当兵

“苗尖子”

政治培养

全军汇演和大歌舞

出访印度尼西亚

异国情

东欧观感

石城“毛猴”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横渡长江攻陷国民党首都南京，我睡在妈妈肚子里随大军抵达俗称“石头城”的南京市，妈妈在国民党三军总医院生下了我。

我生下来浑身長满黑毛，医学上讲是“返祖”现象。那时人们文化知识低，说我是“怪胎”，一个女婴长得这么丑，确实不讨人喜欢。

爸爸和妈妈没有遗弃我，可也没有给我起大名，只依据外貌叫我“毛猴”，家里的警卫员、秘书、公务员、保姆都跟着这么叫。长到三岁，虽然浑身黑毛脱尽，变成白白胖胖的“人参娃娃”，大家还是照老习惯叫我“毛猴”，一直叫到我上小学。

在学校里，不能再叫“毛猴”，而因南京别称“宁城”，故依出生地起名叫张宁生，乍听像个男孩名字，毕竟还有个“宁”字有点女孩味道。

我家住在南京东郊，离中山门不到一华里，有个叫苜蓿园的村镇，曾是国民党时期的“模范镇”，镇上居住的都是“良民”。苜蓿园北面是中山陵；东面小红山上有蒋介石夫妇的住宅“美龄宫”；西面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妇陵园；苜蓿园在南面，与东西北的“帝王将相”为邻，也沾点风水宝地的光。

据说苜蓿园这块地方曾被中央考虑辟为高级首长疗养住宅区，但有些人觉得南京曾是国民党首都，社会上遗留的“渣滓”不少，不安全。放弃后，几经掂量，让给了大军南下以后第一批红军资格的伤残离休将军居住。这批人杀气重不怕邪，到老得个山清水秀的安乐窝：小别墅、警卫排、公务班、司机班、医疗组，外加小阿姨老保姆，比他们初时投奔革命的理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强了好多倍。

父 母

我爸爸张富华，一九二七年在家乡江西兴国县樟木山乡玩坑村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因为识几个字当上赤卫队队长，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那时他才十六岁。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打了几次仗，从士兵升为俱乐部主任。所谓的主任，权限只管几本书、一筐锣鼓铙钹，组织官兵们唱歌、写标语，宣传鼓舞士气，一有军事行动，挑起箩筐就走，俱乐部的全副家当都在这副箩筐里。

第三次“围剿”后，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玩坑村在深山里，是红军后勤囤积重地，村民十之九是红军家属，青壮年不走只有死路一条。爸爸走后，国民党部队进山，我奶奶被枪杀，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室）被卖——红军的妻室有点姿色的都被卖掉，六岁的小叔失踪。

4

一九三四年爸爸随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四方面军也称西路军，三过雪山，两过草地；煮皮带、煮鞋底、吃草根树皮；打前卫打狙击。大渡河以后，爸爸带一个连驻守大渡河以南六十里，百里防线，打后卫狙击，保障大部队顺利进军。最后打得只剩下三个人，只身负伤讨了六个月的饭到达延安，进“抗大”学习。

野战部队日日有风险，战争年代光棍儿多，爸爸自大妈去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娶。抗战时期他在胶东军区主力十三团当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替他点了鸳鸯谱，娶了胶东文登县侯家集出生的一九四〇年入伍的我妈妈。

说起这段婚姻，联想自己的婚恋史，真有点“代代相传”的色彩。听长辈们说，我妈妈在当地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美人，高挑个头，粉面桃花，弯眉大眼高鼻梁。她个性犟强刚烈，为逃避爷爷包办婚姻，十六岁离家投奔八路军，跟日本鬼子打“拉锯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有时今天进明天就跑。一次，妈妈

退漏掉了，她年龄小，困劲大，睡在麦田里，睁眼太阳晒到屁股，周围咿哩哇啦一片鬼子说话声，自己的部队夜里就撤走了。她命大，伏藏在麦垅里静等天黑爬逃出去，鬼子做梦也没想到麦田里睡着一个漂亮的八路妞。

自这次风险后，妈妈从野战部队调到机关。一天清晨女兵连出操，许世友与我爸爸正站在窗前，许世友问他：“你看上哪一个？”

爸爸手指我妈：“就要那匹大洋马！”

第二天组织出面找妈妈谈话，三言两语介绍了爸爸的情况，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妈妈背着自己的行军包进了爸爸的屋子，摆了一桌花生、红枣和一瓶土烧酒，两人结婚了。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她大十六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拚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

军区总医院的小常客

爸爸原本很结实的身体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被拖垮了，解放后短时期担任过华东荣军总校政委，全国十几个分校，每校几千荣军。他没两年就病倒了，患的是晚期肺气肿，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是绝症。一九五五年全军第一次授军衔，爸爸名列少将。中央规定少将以上的将军赴北京授衔，当时的少将名额“粥少僧多”，闹不平衡，爸爸因病主动让衔。一九五七年爸爸去世，总政治部再次追授他少将衔。

自我记事起，家里很少见到爸爸的身影，警卫员总是三天两头不见影子，妈妈也很少在家，家里成了公务员和保姆的天下，我幼小的心里以为爸爸和妈妈都上班。

妈妈每天早出晚归，一两天见不到她是常事。偶然见到爸爸回来，老躺在藤条榻榻米上，所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路，一向大嗓门说话的老保姆也安静得像个童养媳，不再高声呵斥，我不小心弄出点声音，她老远的就摇着双手示意我安静。所以，我对爸爸的爱中夹杂着更多的敬畏。

在我六岁那年，爸爸不再回家了。每到星期天一大早，妈妈领着我和八岁的哥哥和两个小弟弟去总医院看爸爸，我明白了爸爸以前不回家的日子原来是住在医院里。

高干病房样样俱全，像个小家，进门靠墙边支着一张行军床，那是妈妈和警卫员轮流值班守夜时用的。我在总院出生，丑毛猴变成了俊秀妞，医护人员都来抱我、亲我、逗弄我，爱护中透着怜惜。

第二年我七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学校是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小学，全国知名的高干小学。学校属住校制，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和九岁的哥哥总是不慌不忙优哉游哉地挎着书包，走向校园后半部分的幼稚园，从幼教老师那里接走四岁的大弟和两岁的小弟，我和哥哥一人领一个，牵着他们的手穿越熙熙攘攘的学生群和接孩子们的车队，走出小学大门往山坡上爬，越过山坡没多远就到家了。卫岗小学与小红山毗邻，离我家不远。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一星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放学的路上，以前还有警卫员或公务员接，后来没有了，都去照顾爸爸，我们一路上尽量磨蹭时间，摘桑果、野枣、野莓，找炮果（一种可以塞进竹管里打出去的小青果，孩子们用它当子弹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在林间小溪里摸小虾捉小鱼。我们下午四点放学，总要磨蹭到天傍黑才回到家，因为天一黑，保姆就不准我们出门了。星期天一早，我们就被接到爸爸那儿去，一整天守着病重的爸爸，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嬉闹，傍晚被警卫员带上车子载回学校。

病重的爸爸惦念四个幼小的儿女，为了我们的学习，在他明知无多的日子里，强忍着想念孩子的痛苦，熬过六天，每到第七天清晨，早早的就让医护人员架扶着站在临街的窗口，等着看我们第一眼。我们也习惯了车子一到总医院墙外，就抬头望向爸爸的窗口，不论刮风还是下雨，他一定会站在那里等我们。

爸爸临终的那一天，天上下起蒙蒙细雨，等我们赶到医院，爸爸已近弥留状态，硬撑着一口气等着他的儿女。病区走道上和病室里挤满了得到消息赶来的爸妈的老战友。伯伯、叔叔、阿姨们为我们让路，警卫员和公务员各抱着大弟和小弟，我和哥哥冲在前面，一串子人走进了房间。哭肿了眼的妈妈蹲跪在爸爸床头，已经懂事的哥哥泣不成声地扑向爸爸，我抽泣地挨着爸爸肩头，爸爸瞪大双眼看住我们，脸泛红光。人群一阵骚动，他嘴唇蠕蠕似想说话，妈妈将耳朵贴近他的嘴，爸爸留下遗言：“宁生长大学医，为人民治病；儿子上军校，扛枪保国。”说罢视线盯住长子连生（打大连时生的哥哥），小哥哥忙将耳朵贴近爸爸的嘴，他告诉儿子：“记住，爸爸是打土豪恶霸的。”小哥哥嚎啕大哭。

许世友对我爸爸说：“老张，放心去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孩子。”

爸爸走了，像睡觉一样安静，眼角流下一串晶莹的泪珠。去世那年，他四十五岁。

我永远忘不掉陪妈妈守灵的那一夜，我求妈妈揭开爸爸脸上那一块洁白的方帕，我渴望再看爸爸一眼。妈妈拗不过我，揭开方帕。爸爸的面容那么清秀，我的鼻梁、眼眉、嘴唇继承了他的遗传，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那张苍白清秀的脸。

以后我多次做梦，爸爸和我在一起，我不害怕，我知道那是我父亲，甚至钻进坟墓里拚全力想把棺材推出去让爸爸晒晒太阳。其实我平时很胆小，听了鬼故事晚上不敢出门。

爸爸是解放后华东军区第一位去世的高级干部。出殡那天仪式隆重，仪仗车和仪仗士兵护卫着灵车，送殡车队迤延十几里。墓地在城南雨花台毗邻的菊花台，是父亲生前一次狩猎时亲选的墓地，在项英（“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军长）墓上方一座山包上，地形正是“龙脊”正中，坐西向东，背后远眺长江，北方紫金山，南边方山，东方日出之地是自己的家，那里有他的儿女。山包下翠竹清池，山包上苍柏青松，遍地细碎晶莹的雨花石，棺木席地而放，外罩水泥厢房。一九五七年入葬，直到一九六四年移葬将军陵园，开启水泥壳，棺槨完好，板钉锃亮，抬动无响声，工兵连的连长说这是他移过棺木中最好的一具，那是当年军区专程从西南调来的上好楠木，这是父亲短短一生中得到的最后殊荣。至今，城南一些上岁数的老人还记得那次出殡，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十年后成为“红色王妃”的女子的父亲。

十岁当兵

爸爸的去世对刚具启蒙知识的我和哥哥打击很大，每到星期六放假，许多孩子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指着我们向早已知道情况的大人们介绍说：“他们的爸爸死了！”每到这时，我和哥哥牵着两个弟弟的手，低着头默默地从人群面前走过，我和哥哥眼里含着泪，不抬头，不让人看见，耳里涌进大人们的叹息：“好可怜的孩子！”

爸爸在世时，合妈妈两人工工资近五百元人民币，他去世后，只剩下妈妈八十元工资养四个孩子，国家按规定以“红军烈属”待遇每月给每个孩子二十元补助费，全家靠一百六十元维持生活，还是比一般工人农民好得多，但已远远比不上原来的生活水平。

公务员、警卫员、秘书和司机都撤走了，一切待遇都没有

了。有些人看中我家的两层楼别墅，找理由逼我们搬家，许世友司令员和唐亮政委出面讲了话，我们仍然享受父亲的部分待遇，住原房，不交房租水电费，因为我们已经交不起了。

爸爸在世时为人正派人缘好，我长大后懂得了许多道理，回忆一件往事更感到父亲崇高精神的可贵。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每天家院里总有人进来讨饭，工作人员说这些人可能是逃避土改的地富分子或是溃散流落异地不敢回乡的国民党官兵，不给他们饭吃。爸爸知道后批评他们：“刚解放不久，我们安居乐业了，还有很多百姓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就是国民党官兵、地主富农，他们也是人，是人就要给饭吃。”他规定每天准备一盆饭菜，专门给上门讨饭的人吃，并教育我和哥哥：“爸爸长征时讨过饭，没饭吃的人苦啊！你们要记住，长大了，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妈妈和哥哥常常跟我说起这件事，我也记得老保姆舍不得好菜给“花子”吃，偷食盆里的鱼肉被我撞见，老保姆还“警告”我不准告诉爸爸妈妈，我却立即去“二报”了，虽然我不太懂大人的事，但我很可怜那些破衣烂衫的“花子”。一些伯伯叔叔辈也常问我：“记得爸爸不？你爸爸可是好人。”我就连连点头，在我记忆里和自幼熏染的家教，我深信长辈们的口碑。

我和哥哥争气，憋足了劲处处要比别的小学生强，不让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哥哥不但学习成绩好，还成了全校“八一”小足球队队长、少先队中队长，聪明伶俐，是个“孩子王”；我也是全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我又被选进学校体操队，由江苏省体育学院的运动员担任教练。训练不久，发现我的腰腿柔软度极好，体型也很标准，发展潜质很大，因为年纪小，想让我多学习一年文化，再招收进体院搞体操专业，全校传开，便颇有点小名气。

一九六〇年初夏的一天，我这个年级三个班的几十名女生在

大操场上体育课，项目是女子足球。我们分成三组，穿着统一的苏式校裙（小学和苏联莫斯科红军小学结谊姐妹学校），在操场上奔逐。多数女生的家住在城里，受环境局限不擅奔跑，我住城外，与百姓小孩为伍，常跟他们上紫金山拾柴火、采蘑菇、摘木耳，练就一身爬山上树的好本领，又兼练体操，身手灵活，奔逐中显得比其他女孩子矫健。

操场有座检阅台，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位解放军叔叔和阿姨，由校长陪着，他们观望操场上的女孩子，不时地指指点点。

空中飞来一球正落向我站的位置，我使出哥哥教我的飞脚功夫，一抬腿笔直地踢向空中来球，又将球踢回空中，踢的瞬间，两腿立体大劈叉，旋即又恢复身体平衡，一般女孩子准得栽个大跟头。

这一球真是鬼使神差，它竟决定了我一生命运的起步。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立即向校长点了我的名，我当时又黑又瘦小，从外形上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下课了，全校有十几名男女学生被传到教导处，我是其中之一。

进了门，长条桌后面坐着那几位解放军，个个亮着眼打量我，其中一位问：“你十几岁啦？”

“九岁！”

一阵轻微的“哟”、“噢”声，夹杂着逗弄小孩子的那种嬉笑。一位上年纪的叔叔对众人说：“看看吧。”

一位阿姨上前问我：“会下腰踢腿吗？”她刚想做示范，我已快速做完她要求的动作，灵活得像只猴子，大人们全笑了。

阿姨拉住我的手面对面紧贴着，扳我的肩关节、上腰和中腰，再搬我的腿，语带惊讶地向其他人说：“这孩子韧带太好了！”随即抽出皮尺量我的四肢和上下身比例，边量边点头。

“你会跳舞吗？”阿姨问我。

“不会!”

“我教你几个动作，你跟着做，我只教两遍。”

后来我在训练中知道了这个阿姨当时跳的是安徽民间舞《花鼓灯》中的小组合。

她跳了两遍，我依样画葫芦地舞了一通，大人们哈哈大笑。我瞪大眼望着他们，我觉得自己没跳错，为什么笑我？后来我长大了，也去招收新学员，看着孩子们模仿大人舞姿，确实很可爱。忆起当年那一阵大笑，胸间仍是暖暖的。

一九六〇年的那次招生，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下的指示，鉴于全军艺术新血只靠一个军队艺术学院提供，远远供不上九大军区的要求：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沈阳军区前锋歌舞团、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成都军区前进歌舞团、武汉军区前哨歌舞团、福州军区战旗歌舞团、新疆军区歌舞团，以及各军兵种总部歌舞团。因此，总政指示各大军区及兵种歌舞团可以自行在本省市招收学员，培训毕业后享受艺术学院毕业生同等资历待遇，也就是艺术上的大专文凭。

这次招生，年龄规定在十二岁到十四岁，优秀者可以上下浮动一至两岁。我的名字上方打了两个“特”号，是特特优者。

招考的是三团联合招生组（总政、空政、南京军区），三团同时录取我，当总政和空政的招生员将我的情况作为特例，向本团领导请求要求破例录取时，前线歌舞团“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给学校下了入伍通知书。入伍通知书一下，人就是南京军区的了。

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照常上课，周六回家和百姓的小孩一起玩。没多久，妈妈对我说：“宁生，不要去跳舞，你爸爸要你学医，如果有人要到学校动员你，你可不能答应呀。”

“跳舞？妈妈，跳什么舞？”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每到周末，西康路 AB 大楼里的苏联专

家团就请党政军的高级首长和夫人们去跳舞，妈妈和许多阿姨都穿大花布料衣服，蓝眼大鼻子的老毛子还给妈妈送花，男的搂着女的腰转圈，我们小孩子把这种舞叫“抱着跳舞”，长大后知道这是“交际舞”也叫“交谊舞”。我以为是这种舞，便向妈妈摇摇头说：“我才不跳呢！”

妈妈看着我，没吭气。我住乡下，爸爸去世后，妈妈一要工作，二要负担沉重的家务，无暇也无心情领四个孩子进城去观摩舞台艺术，因此，那时的我，除了学校每星期一次的电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舞蹈，所以妈妈也无从回答我。

妈妈告诫我不要去跳舞是有原因的，歌舞团从校方得知我妈妈坚决反对我学舞蹈，搬出丈夫的遗言拒绝了歌舞团。歌舞团不气馁，打听出妈妈特别宠爱独生女，决意撇开家长，直接动员我，在孩子身上下功夫这一着果然被妈妈预料到。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学校组织一批学生到军人俱乐部露天剧场为一场演出献花，舞台上五彩缤纷的舞服和男女演员轻如飞燕的优美舞姿，看得我眼花缭乱心神荡漾，羡慕极了。中间休息十五分钟，一位军人叔叔专门领我上后台看女演员化妆。每张化妆台上放着各式各样漂亮的头饰花和晶亮亮的耳环首饰，一位阿姨换好装走进来，哇！好漂亮啊，活像一只大孔雀，正是去学校教我跳舞的那个阿姨，她跳孔雀舞领舞，名叫黄莉。当我目不转睛专注地欣赏黄莉阿姨时，叔叔弯下腰在我耳旁问：“你喜不喜欢？”

我连连点头。

“你也来跳这个舞，高兴不高兴？”

我又连连点头。

“你去跟妈妈说，她要是不同意，你就不吃饭，你就哭。”

我瞠目结舌地望着周围越聚越多的孔雀阿姨，连连点头。

周六回到家，我怯生生地向妈妈要求：“妈妈，我要去跳

舞。”

“哪个老师跟你说的？”

“不是老师。”

“是谁？”

“是一个解放军叔叔带我去后台看阿姨，那个阿姨我认识。”

妈妈什么都明白了，她生气大人玩花样抓住女儿幼稚的心，她气恨恨地把洗了一半的碗盘摔进水池里，不再理我。

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吃进肚里的晚饭全吐了出来。哭困了，泪眼朦胧地上床睡去。第二天醒来，那股强烈的诱惑仍然排除不掉，神思恍惚，真地照叔叔的话跟妈妈闹开“绝食”，整天缠住妈妈哭闹不休。

妈妈无奈，九岁的孩子懂什么职业选择，岂是听进道理的年龄，讲了也听不进去。我的无知和任性迫使妈妈妥协了，暂时同意我去学舞蹈。她找歌舞团王政委谈话：“我的女儿小，不懂事，什么时候她不想学了，你们还得放她去学文化。”政委笑嘻嘻满口答应。事情却没那么简单，以后军纪约束由不得我们母女了。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凭着一时的冲动，迈进了舞蹈艺术的殿堂。一九六〇年八月正式入伍，我是年底生日，按年份数，正好十岁。

“苗尖子”

学员队四十名学员，二十男，二十女，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正值盛夏，暑假在家整天跟着百姓家孩子去野外玩，皮肤晒得油黑。当兵了，穿上特制的小军装，排在队伍的尾巴上，主课舞训教员李首珠一眼瞧见我，心里犯嘀咕：这孩子这么瘦小，条件再好，将来长不成个也白搭。

舞训室里，她把我调排在侧面墙角把杆上，正面把杆上都是些细皮嫩肉发育良好的大女孩，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她们身上，偶然在转身时捎带瞄我一眼。就这么时不时地带上一眼，积累几眼，凭她多年在舞校任教的经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这孩子素质太好，二十个女孩里，条件没有一个比得上她。

我被调到中间正面把杆上。由于年龄小，体力弱，怕我吃不了苦，李首珠特别严格要求我，常常累得我一堂课结束便跌坐地上爬不起来。那时的情景很惨，训练强度高，腿痛得爬不动楼梯，晚上睡觉全身肌肉抽筋，痛得从梦中哭喊醒来。

吃得苦，才会有收获，孩子们的专业技术突飞猛进，学员队是“苗子队”，我更成了“苗尖子”，全团瞩目的重点培养对象。领导和演员们常议论：“我们团将来一定会出一位全国顶尖的舞蹈家。”

也许是整天关在训练厅里挥汗如雨的原因，我的肤色很快恢复得洁白娇嫩，“嫩豆腐”的新绰号取代了小而黑甜的“葡萄干”老绰号。

个子也争气，一年后从队尾直蹿到队头，排在第一位，李首珠笑逗我：“小张宁，可不能再长了，蹿到天上去，可没有那么高的舞台让你跳舞啊！”没想到她一句戏言，竟言中了我八年以后的悲惨遭遇。

训练艰苦是我始料不及的，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轻松好玩，每天清晨六时起床，基本功、毯子功、芭蕾课、古典课、代表性课、戏剧课、文化课、政治课，忙得“四脚朝天”，到晚上九点半才熄灯躺下休息。

有的孩子吃不得苦公开哭鼻子，我也哭过，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孩子想孩子的主意，怎么逃避呢？动歪脑筋。星期天回家装病，肚子痛，通常肚子痛不是大病，你老说痛就是病了，反正假的查不了，反倒成了疑难病症。这一计正合妈妈意，她早就想

把女儿搞出歌舞团，现在女儿主动打退堂鼓，乐得替我“打掩护”。

一个电话打到歌舞团，说女儿病了需要在家休息。没过几天，学员队董哨队长上家来，见到我，亲切地问：“小张宁，肚子痛好了没有？”一下闹我个大红脸，从来没说过谎，望着董队长不知如何回答。

董队长微笑着拉住我的手，对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我小姨说：“田主任不在家，等她回来请你告诉她，小张宁我带走了，我们会好好照顾她，请她放心。”

小姨也是我的支持者，六十年代初期，还有许多人思想不开通，她说我一个好好的官宦家女儿，什么不能干去干“戏子”，这职业被人瞧不起。

我是重点培养对象，为了杜绝我当“逃兵”的念头，也为了杜绝其他孩子学我的榜样，事态发展出乎我的意料，我被“照顾”到批判桌上，可耻的“逃兵”、“背叛革命先烈”的帽子冠在我头上。十一岁的孩子只凭喜好行事，不想干了就跑回家，哪想到平日老挂在嘴上讲的军纪竟像利刃一样刺向我，一张张小嘴里吐出的大人词汇，好像我真的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的事，我感到很羞耻，有理说不清，好像都是我的错。

在指责批判声中，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挫伤，我强烈地感到，今后只有在专业上出人头地，才能吐出这口气，得到尊严。

妈妈得知情况，气愤难平，找团领导谈话，要王政委实现承诺，放回女儿。团领导们打哈哈，讲好话，说理由，总之是不放人。

妈妈去找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对妈妈说：“张政委临终嘱咐你忘了？怎么让丫头去学跳舞？！我去向歌舞团要人！”

没过多长时间，许世友跟妈妈说：“嘿嘿，田明哟，你的女儿将来出息不小喽，文化部说你的丫头是歌舞团的宝，人家不肯

放有道理。等将来看情况再说吧，学医、学舞，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妈妈没想到许世友出面也讨不回女儿，记得她无奈又寄予希望地对我说：“宁生呀，只要你将来能出息，不管搞什么专业，都不辜负你爸爸的期望了。这可是你自己愿意搞的，将来长大了再后悔，可不要怨我不把关。”

总之，不管我愿意也好，后悔也好，命运已到这一步，不由得我不走。

政治培养

16 新中国的教育很注重政治，小学第一课就教导孩子“毛主席和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共产党万岁”。当兵了，军队是国家特种机构，政治思想教育更上一层楼，小小年纪便论及“世界观改造”，我们正是毛泽东所讲的“一张白纸”的年龄，能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我们所受的教育使这张“白纸”蒙上了一种象征无产阶级的颜色——大红，单调、燥热而又沉闷，把我们这些纯真无邪的孩子熏陶得思想偏激，精神上完全匍匐在领袖的绝对权威下，在以后“文革”岁月中，一代新中国同龄人几乎都成了这种权威的帮凶和祭祀品。

我每天最怕的就是政治学习，结合实际谈世界观改造，自我检讨和接受别人的帮助批评，年复一年千篇一律，一月小总结，三月中总结，一年大总结，哪有那么多缺点毛病？循规蹈矩本是做人的美德，搞得人处处谨慎小心，连睡觉也觉得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你，那就成了精神负担。开会不愿发言就是政治觉悟不高或被视为不愿向组织靠拢，是不信任党的表现，我常在被点名的情况下，被迫发言谈思想，幸而我“出身好”有“红色保护层”，

又因年纪小思想单纯，虽然背个“政治上不要求上进”的名声，总算能平安混日子。业务上我却是块“硬牌子”，幸得有这一长处，在压抑中还有傲视他人的“本钱”。

虽然是“小兵”，军事训练也漏不掉。下野战部队军训，学习使用各种枪械，参加实弹打靶；到军队农场参加劳动，与大人们干一样的体力活。领导上力求把我们培养成政治思想、艺术专业、军事素质全面过硬的“新时代军人”。

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央调动军事力量布置东南沿海地区，迎击台湾武装进犯，因是南京军区的防区，全团演员分成三个梯队赴前线阵地参战，学员队是后备梯队。为防流血牺牲、战场急救，每个演员把自己的姓名、部队番号、血型写在领章的背面。那时我十二岁，也在编队之列。医院化验我是O型血，董队长还跟我开玩笑：“小张宁，到时血浆不够，你可要献血呀。”

沿海战事很快平息，学员队没有得到“前仆后继”的锻炼机会，只是听回来的老演员们讲述战事，那股武装待发的豪情，仍激动着每颗小小的心灵。

军队处处讲纪律，生活上也不例外，谈恋爱不经过组织部门政审也是“违法乱纪”行为。黄莉阿姨芳龄二十六岁，貌美如花，军内外年轻干部像蜜蜂似地围着这朵花，但她情有独钟，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可是男方是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不良成分，政审无法通过，黄莉瞒着组织与男方私订终身，遭受军纪严惩，宣布她是“背叛革命阵营的叛徒”、“蜕化变质分子”，剥夺军籍遣送原籍。

我当时十二岁，在台下望着这位发现我的“伯乐”阿姨，脸色苍白，一双美丽的眼睛饱含着泪水，委屈无言地望着全场的人。我好伤心，我知道很多人同情她，但没人敢公开流露，我震惊不理解：她不就是坚持跟一个组织上不同意的叔叔好吗？怎么会变成叛徒？坏分子？！如果我将来在选择爱人方面也不听组织的

话，领导会对我怎么样？现实令人战栗。

学员队二十名女孩，几年中淘汰得只剩下十二名，个个出落得标致水灵，各有各的性格特征，被人们誉为“金陵十二钗”，我又多了一个新绰号“林黛玉”。花好就容易“招蜂引蝶”，我们这十二朵花就像连枝的月季花，走到哪都是一簇簇，从不分开，领导更是格外小心看护。我们个个老实安分不敢有一点越轨行为，如果有人接到情书，就立即交给领导处理，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那时的青少年单纯，但不可否认的也是生活环境使我们一个个变得胆小听话。

全军汇演和大歌舞

一九六四年我十四岁了，赴北京参加全军文艺汇演。

国防部长林彪委托总参谋长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在全军掀起“大比武”运动，提高军队军事素质，带动了全国各行各业重视技术进步。

文艺战线也不例外，各大军区和军兵种领导都很重视这次汇演，视为各军区在文化领域的“角斗场”。

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到歌舞团做动员报告。他用惯有的直率简明的语气说：“你们代表南京军区参加全军汇演，要为军区广大指战员争光，全军大比武的标兵出在南京，全军文艺标兵也要出在南京，要当班长（第一名）！至少也要当个班副（第二名）！抱个大鸭蛋（零分）回来哇，我撤了你们！”全场欢笑，司令员亲自鼓舞士气，大家信心更足。

编剧根据我的特殊条件专为我量体裁衣，设计高难度技巧，期望独占鳌头。

团长信心十足地说：“各团新演员头一次亮相，比艺术质量，比演员素质，我们要把你用在刀刃上一炮打响！”

舞编天天与我泡在一起，设计试做各式技巧动作，都不满意，达不到一鸣惊人的效果。一次，我实在太累了，卧在地上把上身往后舒展紧贴大腿，想把全身力量拉匀休息一下。

舞编一眼看见，触动灵感，问道：“你能不能站着做这个动作？”简直匪夷所思，我忙摇头。舞编兴致勃勃不肯罢休，催促我试一试。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爬起来，刚起腿叠后腰，就摔了个大跟头。

恰巧舞蹈队长和副团长走进训练厅，一眼瞧见，担心地说：“千万别扭伤腰，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谁也代替不了你，损失就大啦！”

舞编仍不死心，把灵感得出的技巧造型向副团长和队长说明，两人听得眉飞色舞，鼓励我：“只有你的条件可能拿下这个动作，鼓足干劲，攻破难关。”我连着试了几遍，不断跌跟头，腰劲使疲了不愿再做，他们一旁看着，扼腕叹息。

李首珠老师被舞编请来，她仔细看我做了几遍，以肯定的口气对三人说：“张宁能做，我负责剋出她。”她一手调教出我，深知我潜力，被她“逮住”再想推诿是没指望的。

在她指导下，这个技巧终于训练出来，从下腰起单腿，运用腰部和胯部强力控制，再结合腰腿的软度，缓缓起升定格空中，形成立体“飞天”造型，就像弹跳技巧空中“紫金冠”，“紫金冠”凭借冲跳爆发力瞬间在空中形成腰腿互叠，而“飞天”全凭控力平衡和软度形成。

汇演中，在大型歌舞剧《东海前哨》里有一段“贝壳舞”，我担任领舞，从服装造型到演员形象素质以及这个技巧的出现，全场观众屏息静气，由轻微的窃窃私语到赞叹的骚动。

人们都在打听我的名字，议论我的形象，评价我的技巧，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炮如愿打响了，为整台歌舞剧锦上添花，在全军同行中引起注目。我出了名，一些友团

派出主要演员来学这个技巧，没有一人完美学成，以我的条件特设的技巧，别人很难做到位，做不到位就面目全非。

汇演中各团实力充分展现，评比结果我团名列前茅，得个“班长”凯旋而归，尤其是我团新生代女演员，好似江南美女云集，任何团体比量不上。

汇演结束，各团离京，我团因成绩优异，名声响亮，被中央留下汇报演出。周恩来、贺龙、陈毅、罗瑞卿、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陆续观看了我团演出，对我寄予深厚的长辈般的关爱，我对今后的艺术前途很有信心，欣慰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虽然职业选择不符爸爸遗嘱，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样的。

七月份刚从北京回南京，还未喘回一口气，八月又奉命赴北京参加大歌舞《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

中国人民都会唱《东方红》这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对毛泽东的崇拜覆盖全国，在这种形势下，文化部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发动编排音乐舞蹈史诗大歌舞《东方红》，调集以军队歌舞团为主的全国几十个文艺团体，直接与间接为大歌舞工作和服务的人数近一万，周恩来亲自担任“舞台总监”和“历史顾问”，阵容空前庞大，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国际上的关注。

为赶时间在“十一”国庆节献演，几十个团分场次“包干”，序幕加七场，合共八场，压缩在两个半小时之内结束，全国艺术界提供了第一流的作曲、作词及编剧为大歌舞服务。

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厅，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做排练场地，供演员分场次同时排练。从八月中旬开始运作，到九月底彩排政审过关，足足忙乎了一个月，累得人仰马翻、神经衰弱，夜里做梦都在跳舞、哼曲子。

国庆节前夕，大歌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献演，毛泽东率国家领导人出席，驻京三军指战员、中央各部委工作人员、各界

民主人士、工农商学界的优秀分子陪同观看。没有普通北京市民，因为毛泽东在现场，必须安全第一。

前排坐满手捧鲜花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空两排，两头边缘坐着身穿便服的中央警卫局的人，再后一排便是毛泽东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伟岸地坐在中间，旁坐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与他聊着天，他不时微笑，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标准像，不见他有大动作，更不见他露齿大笑。

灯熄了，全场肃静，序幕音乐《东方红》鼓点由轻到重，由远到近，“咚”一声，一锤敲错音律，庞大乐队和台前上千名合唱演员个个紧张得冒冷汗。毛泽东似乎没有察觉，合唱队的歌声汹涌澎湃奔腾而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周恩来出现在后台，临检各团上台前的准备工作，化妆、服装、道具无一漏掉，再三叮嘱不要紧张，全体演员很感动。明纰漏没再出，暗纰漏仍有，间隙换场为节省时间改为熄灯换场，不拉大幕，台上和乐池不能出现一缕灯光，黑灯瞎火的如果谁走错路线，撞一人倒一片，每场上百人衔接，一乱就乱一窝。危险的是大部分道具不是枪就是刀，虽是假的，演员在按分秒计算的奔跑中撞上，劲也够大的，我们把刀枪贴身顺地拖着走，总算没出现大挂彩事故，小碰小挂的不少，跌倒在地被踩手脚也只好忍痛。滑稽的是我团一位女演员跌倒，脸正摔在别人屁股上，那人上场时屁股上清清楚楚印着个女人脸，幸好群舞人多，台下未必看得到，否则又是政治事故。

出访印度尼西亚

大歌舞任务完成不久，一九六五年一月份，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我团随他出访印度尼西亚，参加“纳萨贡”庆典活动。

全团二百多号人，精选出八十人出国，剩下的演员组成三个小分队赴越南战场向我们的军队作慰问演出。

老演员有许多是出国访问过的，青年演员第一次出国，兴奋得好几夜睡不着觉。匆匆整理行装上北京，准备期间学了不少外单位的优秀节目，文化部又调派了舞蹈家阿依吐拉和张筠，歌唱家马玉涛、才旦卓玛、胡松华、寇家伦，以及新疆歌舞团四名歌舞手充实我团阵容，加上行政和保安、翻译、医生等人，共是一百人，算是大团出访。

文化部、总政治部、外交部多次对节目政审，提修改意见，做了两个月准备工作才完善。

这次出访，全团隐去军人身分，改称“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照领导吩咐，演员各依自己的外形冒充起工人、农民和学生。我十五岁，一心想充大人，概念上学生是小孩，我就说自己是工人，领导说我不像，应该当学生。没几个人外形像农民的，只好挑老一点的充当。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地下仓库有很多服装，是历次出访团体归国后上交的。每位演员挑选两套，再到王府井出国人员服务部做两套新的，有四套替换，回国后上交三套，自己可以留一套，还不准留最好的。

换装那一天，大家不约而同穿上了青年装和中山装从各自房间走出来，正嘻嘻哈哈的，政委和团长过来检查服装，见清一色的中山装和青年装，颜色不是蓝就是灰或黑，男的不潇洒，女的不俏丽，灰溜溜一片。政委批评大家：“脱去军装，就要显出百花齐放，像你们这种打扮，跟穿军装有什么两样？都回去换，颜色式样搭配开，别搞得像一群灰乌鸦。女同志换旗袍和布拉吉，男同志换西装。”

大家站在原地不动，都希望别人换，自己不换。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僵化，尤其是军队，讲惯了“艰苦朴素”，讲究吃穿是耻辱，破衣烂衫是光荣，衣服破了打补丁，袜子破七八个洞补补再

穿受表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长期在这种“苦行僧”式的思想教育下，即使是出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一时竟也难改积习。

政委点青年演员的名，大家不情愿地返回房间。不一会儿，出来了，低着头红着脸，挤在一起，你瞧我，我瞧你，忍不住哄笑起来。

团长赞道：“这还差不多，年轻人不穿得活泼新鲜点，显不出朝气。”他指着一位男演员批评：“你的领带怎么打的？跟条红领巾一样，不会要学，别出去闹笑话。”

这位男演员平时就爱开玩笑，性格讨喜，他嘻嘻地对团长笑道：“不是试装吗？先摆摆样子给您看看，我知道怎么打结。”团长不知真假，我们知道他又在嬉戏乱讲，都望着他乐。可惜这位全团的新秀技巧演员，在下半年访问东欧演出中，晚期肠癌发作，痛得他在病区走廊上翻跟头，他不信毅力战胜不了病痛，每次都是在翻腾中痛得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得昏厥过去，他的毅力终没挽回他二十二岁的年轻生命。

我们穿着新装听政委说教：“大家不忘光荣传统是好的，出国不比在家，要代表中国人民形象，显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虽然服装改变了，思想不能变，要提倡‘穿着西装旗袍的三八作风’（军队纪律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艰苦朴素的精神不能变，要自觉抵制外边的花花世界，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国外是不同的战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新环境中经得起考验，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全团分组讨论怎样做到“穿着西装旗袍的三八作风”，其实难分清，形式上就是西装旗袍，不管你怎么表态，谁知道你脑子里怎么想的，这身长期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既要穿在身上又要批判它，真有点搅混不清。

百人的团体化成六人一大组，三人一小组；六人组两男四女，三人组两女一男；合起来是六人，散开是三人；不管怎么合

散，女演员身边总有男演员跟着。大场合下，外籍人与我们在一起，乍看东一撮西一堆，实际上都是有组织的安全小组。安全组，对外防袭击，对内防叛逃，每个人都在监视与被监视之中。

从北京机场登机飞往昆明市，换机出境，当夜到达缅甸仰光机场，进入候机室休息。候机大厅灯火通明，华丽舒适，厅内外旅客川流不息。穿红色制服的侍者托着大盘，上面放着切好的西瓜，走上前来请我们吃，很多人不动手，领导传下话：“西瓜是招待我们的，可以吃。”大家才吃。

我见侍者里有几个黑人，心里猜疑缅甸怎么也有黑奴？在我们的教育中，一向认为美国贩卖黑奴，黑种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被迫的，都是当奴隶的。好好的离开自己的国家，这在我们的认识上叫作“叛国”，叛国罪是要判死刑的。

我悄悄问另一个女演员：“这些黑人是奴隶吗？”

她正疑惑地瞧他们，不置对否。

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干吗不逃跑？”

她估摸着说：“可能没地方跑吧。”

正巧一位老演员从跟前过，我们拉住他问。他小声说：“在外面说话注意些，不管他们是什么身分，都是受压迫的劳动人民。”

在国内我们算是有文化知识的，见多识广，对国外事物却闭塞得跟个乡巴佬似的，至今想起当年那种幼稚的与世隔绝的思想，就禁不住哑然失笑。

“喂，你们谁上厕所？”一位女演员小声问。立刻有五六个女演员响应，成群结队上厕所去，两名男演员不等任何吩咐很自觉地跟上，在女洗手间外面装作闲踱步的样子。

洗手间明亮干净，空气清爽芬芳，有股清洁空气的香味持久不散。国内高级场合的厕所难免还留有浊味，民间厕所就不堪呼吸了。在我们认识上，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资本家享受奢华，人

民的生活在各方面都不如社会主义国家，眼前的景象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比对特别强烈，但精神上仍排斥见到的真实，认为是资本主义表面繁华的假象。

休息两小时再次上飞机。天亮了，亚热带的天空特别蓝，大朵的白云有的像棉絮，有的像花朵，厚实洁白，飘浮在蓝天中特别容易令人遐想联翩，幻想自己飞翔其间或是躺卧在白云上，该是多么舒服惬意的事。历代都有人寻仙，会不会真的有仙？睁大眼搜寻云中，希望看见别人看不到的奇迹，渐渐地进入梦乡。

迷糊中听到人喊：“雅加达到了！”睁开眼，已有不少人立起身整理行装。这是架包机，都是本团演员，行动自由，不用听空姐指挥。

我往窗外瞧，脱口嚷道：“好美啊！”蓝天白云下是蔚蓝的大海，一座郁郁葱葱的岛屿，白色建筑在海蓝和绿树两色衬托下显得尤其典雅耀眼，真像《天方夜谭》里的仙人岛。

飞机临近海面，海鸥飞翔，椰子树在海风中摇曳，雅加达街景清晰可见。颜色鲜艳的小跑车和搭着一方油雨布的人力车，像玩具和甲虫一样移动着。

机场上，中方驻印使馆文化官员和印尼官方、民间的文化界人士早已在机场等候，机场外面还围聚着很多华侨。东主国很热情，欢迎场面隆重热烈，文艺界人士穿着民族服装，浑身上下都是花饰，脖子上、手腕上、脚踝上，甚至耳环、头饰都是鲜花，一片花海香气扑鼻。

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挂上了香气四溢的花环，头发上沾着花瓣，脚下踏着鲜花铺设的“地毡”，喜气洋洋。想到国内“花鸟鱼虫”受到批判，被视为“玩物丧志”的资产阶级宠物，等闲之人不敢问津。望望政委和团长，笑容可掬喜气洋溢，并无不适之态，心下感慨：花的阶级性也分国界呢。

下榻地是万隆体育馆运动员村，所谓的村，是平屋型的别

墅，每幢周围有草坪，与左右邻隔开，路旁栽着白兰花、丁香花、夜来香之类的热带花树，一到晚上就是处处幽香了。

参加“纳萨贡”庆典活动的各国元首、总统、国王都带来了本国第一流的艺术团体共襄盛举。到万隆体育馆彩排的那一天，我们这一批青年演员第一次接触肤色各异的外国演员，同台演出，欢歌笑语，仿佛有点“世界大同”的感觉。

靠着大门口的一群印尼青年出现一阵骚动，不少人趋前迎接一位从门外进来的女人，她穿一件黑色袒胸露背西裙，与众多在场穿民族服装的印尼少女不同，身后跟着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子。她登上台翩翩起舞，舞姿还挺专业，旁边拿衣、打扇、端饮料的人比她跳舞还要辛苦。一打听，原来是总统的女公子，模样倒挺丰满美丽。

最令全场注目的是列队缓缓进来的柬埔寨王国宫廷舞蹈团，演员大多数是王妃、公主，以及得宠的宫女。我好奇地注视这些神话故事里的女人经过身边上舞台。令我失望的是个个身材丰满，个子不高，几乎清一色的明眸圆脸，都像娃娃。音乐一起，她们翩翩起舞，感觉又不同，灵巧典雅的舞姿让人暂时忘了她们不太雅的身材。

相比之下，唯有中国女演员清新夺目，但一个个正儿八经，拘谨、腼腆，除了上台表演，下台来就聚在一个角落，不像外国演员热情奔放四处走动结交异国朋友。我们的“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态，令外国演员望而却步，虽然不断地瞧我们，却没有人上前来。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各国演员早早化好妆在后台等候，演出场内外虽然有警察和保安人员，却不像国内领导人出入场合那样森严壁垒。当时印尼三派领袖（苏加诺、苏哈托、艾地）握手言欢，气氛非常祥和松弛。观摩盛况的印尼百姓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有序。

轮到我们的古装集体舞“咏梅”登台表演，从上往下看，贵宾席上坐着身穿戎装的戴着墨镜的苏加诺总统，身旁靠着日本血统的娇巧玲珑的哈蒂妮夫人；他们的左边是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及夫人张茜；他们的右边坐着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和法国血统的王妃莫尼克。西哈努克亲王永远是一副亲善的笑容，微侧着头，腮上两颗深深的酒窝。莫尼克王妃穿一件深玫瑰红镶金银丝花朵的低胸紧身长裙，肤色洁白，形象极美，大厅里的人都被她艳光四射的容貌吸引着。我幼稚的心不禁赞叹：“这才像个神话中的人物！”不由得多瞧她几眼。

第二天的下午，各国演员举行联欢会，赴会前，政委对大家讲解如何联络国际友谊，要大方得体等等。

语言不通，就靠表情和手势，反正人类起源同一祖先，原始动作容易沟通，也减少了语言上出差错的机会，那时谁不小心说错一句话，都怕担政治责任，搞得大家谨小慎微。

会场出现了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外国演员请我们跳“迪斯科”，我们不会跳，也不敢跳，瞧那些外国演员扭蛮腰蹬腿甩屁股的狂劲，禁不住暗暗咋舌。有的演员不知哪根神经受了刺激，提议道：“资本主义的摇摆舞，有什么好跳的，我们来扭秧歌！”

建议一出口，有的演员不以为然，觉得这种场合跳土风舞不太合适，还是跳交谊舞吧。

一些演员又反对，认为这种场合正是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诱惑的自我考验，要比试较量一下是社会主义的风气好还是资本主义的风气好，在一些人的认识上，被视为摇摆舞的“迪斯科”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没落和糜烂的生活。

教育方面的灌输大家都是一样的，是否在这种场合里跳土风舞的认识却不统一，反对的人也不明言，谁也不愿被人误解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下场跳的人不多，音乐不合拍就嘴巴哼

哼，秧歌舞也是四肢扭动，但与“迪斯科”风格截然不同，并且没有什么舞姿变化，跳到老还是前进两步退后两步，胳膊左右挥动，中国很多老头老太都会跳。

外国人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立即被吸引住，有人上前问：“这是中国迪斯科？”舞者乐呵呵地点着头，做个邀请姿势，外国舞者兴冲冲地夹进来跳。秧歌舞变姿少，不免又加进“迪斯科”舞姿，不伦不类的，最后又跳成了“迪斯科”。秧歌舞队伍中搀杂着一些狂扭臀部的异者，这个舞没法再跳下去，最先建议的人反倒最先下了场。

我一直站在场外观望，觉得“迪斯科”非常有趣，节奏强劲鲜明，舞姿大胆奔放，无拘无束随意潇洒，使人不由得血脉奋张。学舞是我的本行，闻乐起舞是很自然的，心里默默地随着节奏不动身体地模仿着，眼角不断偷瞄左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我的神态和微小的动作。十几年以后国内改革开放，学交谊舞、迪斯科舞是新潮流派，我开了一个舞训班，教授舞艺，每期都有六十多个学员，以西方商业观点看，生意满不错的，这是后话。

联欢会到傍晚结束，赶回驻地冲个凉水浴，换上最好的衣服，当天晚上烟火晚会，是这次盛典的高潮节目。印尼艺术界女士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梭在各国贵宾之中。女人的魅力不论是自然还是加工，充分体现出来，令人们赞叹不止，相比之下，我们的精心打扮反倒显得朴实无华。

草坪上设有许多长条餐桌，摆满各种名酒和饮料，以及点心水果等等，供人尽情享用，谁的手上都空不了。侍者眼尖，见谁的手闲着，立即端着盛满各式饮料的盘子上前邀饮，热情得令你肚子吃不消。晚上九点，草坪上空五彩缤纷的烟火像漫天花雨，把总统宫草坪上欢宴的场面照得如同白天。

盛典欢庆的气氛处处可见，那几天印尼举国上下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周恩来和陈毅外长在庆祝活动结束后返回中国，我团

被留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有些热情的华侨充当我们的翻译，无论在哪里，每场观众爆满。亚热带雨水多，露天演出逢上大雨，观众仍是人山人海，打雨伞、披雨衣，甚至淋雨站着看完两个多小时，很令人感动。

异 国 情

正式的访问演出开始没几天，印尼官方派来了三个陪同人员：两名翻译、一名西装革履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青年男子。这名男子举止与一般的工作人员不同，他不会华语，也不管团里的事，却走哪跟哪，什么地方都有他熟悉的场面人物。他从不摘下墨镜，让人看不清他的全貌。逐渐地有些人发现他转来转去总是不离开我这个组。常有人往我耳里递话——

“你要注意，那个人老从镜片后面注视你。”

“张宁，当心哪，这人不怀好意！”

“他很注意女演员，特别注意你，要小心警惕。”

我们只当他是陪同人员，谁也没认真研究这个人，直到使馆人员向我们透露：“印尼方面已经知道你们是军人身份，连团长和政委的官阶、级别都摸得一清二楚，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安全。”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那个青年，原来他是个特务呀！于是，暗中有人特别注意我的安全，在某些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人看来，我出身高干家庭，社会关系大多不出这个圈子，年纪小，思想单纯，正是“敌人”下手的好目标，至于我的“价值”对“敌方”有多大用处，全凭这类人自由想象了。

而我个人对这个天天近在咫尺的“特务”并不感到多大威胁，觉得他与其他人并无两样。

万隆市有一座苏加诺总统行宫，白色建筑，宫院草坪上放养着孔雀和梅花鹿，不怕生人，我们在演出间隙被邀请来这里参观

休息。行宫后院的山坡下有棵巨大的榕树，树阴下有一方大理石砌成的浴池，温泉从池底冒出，这是专给哈蒂妮夫人享用的。

一位男演员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悄语道：“总统有好几位夫人，公开场合只带哈蒂妮，真是恩宠有加啊。”女演员们笑他，他这人到哪消息都灵通，短短日子里学会几句印尼语，发音标准，连印尼人都被唬住，以为他懂印尼话。

我们不能进入行宫，中午在草坪上用餐，侍者从宫内端出美味佳肴。偶一回头，瞧见那个“特务”从宫内走出，我很惊讶——出发来万隆市时他并未随车，此时怎么从宫里冒出来了？一位陪同迎上前陪着他向我们走来，选择我身边的位子坐下，他指着佐餐用的空了的腰果碟子，通过翻译问我还要不要，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他却向一个侍者吩咐，不一会侍者端上一满盘腰果送到我桌上。大家都注意到他的出现，他这种近似乎主人的派头太不可思议，我很幼稚地想一个问题：总统宫里怎么还养特务？令我更感意外的是他突然开口说起了华语：“张宁，你好！”发音跟鸚鵡一样，舌头短了一大截。我惊愣地望着他，他开心地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可是我看不清他的眼睛，让我觉得他是有意逗弄人，心里不高兴，起身走到别的桌旁坐下。

看得出他有一阵难堪，眼睛四处搜寻可以搭讪的人，很多人回避他的笑容，大家都感到他是个危险人物，少接触为妙。他在餐桌之间巡逛一阵又停在我身后，一位陪同见状立即趋前，他叽哩呱啦一阵，陪同问我：“张小姐，他问刚才称呼你的芳名发音准不准确？”

我窘迫地勉强点头道：“他的发音还可以！”心里却想他干吗对我的名字感兴趣。

那“特务”听翻译说出我的话，兴奋得又不请自坐到我身旁，比手划脚又说了一番话，他是问我万隆市美不美，喜不喜欢这个城市。出于礼节，我称赞了这座城市，再说万隆市确实很

美。“特务”更高兴，通过翻译要求我们“多住几天，好好玩玩。”我有点讶异他的权力怎么如此大，随意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日程。说来也奇怪，我们果然被万隆市官方多挽留了两天，原来一天的日程变成了三天。当时万隆市是右派势力中心，多呆恐怕发生危险，不去又不好，所以去万隆市之前，领导已交代大家要“外弛内紧”，保持高度警惕。

增加的这两天，全团去万隆市附近的火山口参观，归途经过热带雨林，风景极美，确实是“好好玩玩”了一番。

从万隆市回到雅加达，在一次演出结束后，印尼官员上台来与全团演员合影，大家发现那个“特务”一身戎装，头戴红色贝雷帽，跟在官员行列中上台，服装变了，墨镜始终不拿下来。大家好疑惑，这人到底什么身分，亦军亦民，难道是军事情报官？

没两天，印尼文化部长设宴招待全体演员。据说文化部长是苏加诺总统的原配夫人，她身材高大丰满，容貌端正，有着印尼人的棕红色皮肤，穿着一袭沙笼裙，显得雍荣富泰。

“特务”中途出现在宴会厅，又恢复了便装，进进出出十分自由，时而走到部长身旁耳语着什么，部长笑咪咪地不时地“扫描”女演员们。这时，大家已不再只当他是“特务”，他好像无处不在，他的身分更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宴会结束时，部长向全团宣布苏加诺总统第二天晚上接见我们。

第二天晚上，全团由中方大使馆官员陪同，准时赶往总统官邸。官邸花园里聚集着一群丽服艳妆的印尼姑娘，迎上前热情地陪伴我们，等候着总统的接见。

苏加诺总统由文化部长陪着，出现在接见厅门口，随影随形的哈蒂妮夫人却没露面。我们排成一行长队，从花园进入玻璃长廊，缓缓向前移动，逐个经过总统面前，向他致礼问候，进入会见大厅。总统与每一位演员握手，合唱队一位女演员长相有点欧化，总统笑问她“是不是法国血统”，轮到我时，站在总统身旁

的部长低声说了几句话，总统紧握住我的手笑咪咪地上下多打量了几眼。

接见大厅豪华舒适，四壁挂着油画，全体演员围坐在沙发上，总统和我们的团长坐在中间。官员们陪着总统说话，演员们享用着茶几上的热带水果和饮料。

有演员小声传话过来：“你们瞧那个‘特务’，他又跟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他，这时一位老演员悄声通知大家：

“以后不要再说人家是‘特务’，听使馆官员说，他是总统的儿子！”不少演员更加好奇地重新研究这位被误认为是“特务”的年轻人。“总统的儿子！？他一天到晚跟着我们干吗？”一位女演员道出了大家的同感。我们瞧着他正从边门进来，然后站到总统身后，与一群印尼姑娘小声说着什么，此时，他的眼镜摘掉了，露出“庐山真面目”，不少演员好奇地打量，比较他和父母。真像！他跟他爸一样喜欢戴副大墨镜，这是一种象征标志，很多人竟没想到。

他向我走来，身后跟着一位印尼姑娘，中等个，体型异常丰满，浓眉大眼，高鼻小嘴。既已清楚他的身分，我不再嫌忌他，客气地向他点头致礼，他和那姑娘在我身旁坐下。这时苏总统目光瞧向我们三人，讲了一番话，开怀大笑。翻译向大家讲：“总统说，中国女演员漂亮，印尼姑娘也漂亮，这位是我们印尼的美女，名字叫‘蓝宝石’，是我的干女儿。”全场的人都看着“蓝宝石”，“蓝宝石”扭捏腼腆地看着我，我霎时醒悟自己和她处在同一窘境，顿感浑身不自在。总统更开怀大笑道：“双姝并蒂，中国姑娘印尼姑娘一样美！”全场气氛和谐欢悦。由于语言不通，我和“蓝宝石”以手势交流，双方推让着请吃水果，倒也挺开心。苏公子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蓝宝石”立起身，似有不舍地离开向总统那边走去，当她归入总统身后那群印尼姑娘之中，再回眸望向我们，那神情好像有点落寞。

仍在我旁边的苏公子笑着递给我一个红果子，通过翻译对我说：“这是印尼的水果皇后，很甜美，你尝尝。”

我瞧着这果子，心里好奇水果还有皇后？那什么果子是皇帝呢？心里想着就问出了口。

“榴梿是水果皇帝。”

“啊呀，臭榴梿不能吃，还算是皇帝？”我想起那味道皱起眉笑说。

苏公子听懂后忍不住笑道：“那你就尝尝皇后的味道，你一定喜欢吃。”说罢，替我把红果子剥开，果皮溢出紫色果浆，里面有四个圆槽，每个槽里有粒洁白晶莹的果仁，尝了一口，比龙眼和荔枝还滋润可口。我笑嘻嘻地抬眼，见苏公子正愣愣地望着我，别人都说我笑容很甜，他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我心里想：好在是你替我剥果子，不然我连皮一起啃，真要出洋相。

见他那种痴看的表情一时缓不过来，我下意识地急忙四处瞧瞧，生怕别人看见说我的是非。我很敏感，即使他单方面示好，我也担心受到连累，那个年代，未婚女子名节比什么都重要，更因我是军人，在出访时闹出“生活作风”问题，纪律绝不会宽恕我。我慌忙地立起身，走向另一张椅子坐下，身旁一些女演员议论：“他干吗老盯着你？”

“你心里有数，表面上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嗨，你们看，他又戴上眼镜了，又朝这边看，一定又在看张宁。”

个别女演员酸溜溜地讽刺道：“哟，张宁，他还替你剥果子呀，什么味？好不好吃？”

这些话灌进一位老演员耳里，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小张，别怕，我陪你过去，放自然些，要注意场合和礼节。”我望着这位当年给我出主意跟妈妈闹绝食的老演员，自我入伍以来，他一直以叔叔的情分关爱着我，我一颗不知所措的心安然地放下

了，随他回到原处坐下。

苏公子客气而有礼貌，愉快地与老演员聊天，我只管闷头吃果子，不一会便吃完了。苏公子见状又叫侍者送来一盘，比原先的一盘还多，而其他茶几上果盘里的却是一般水果。苏公子说四月份不是出产季节，外面市场上买不到，请我多吃点。听这么一介绍，再与周围一比较，我倒没有心情再吃了。

苏公子见我不动手，便拿起一颗递过来，我忙不迭举双手推辞，还连连摇头，生怕他再替我剥。见我不肯吃，他干脆拿过我的手提包把一盘果子都倒进去，递给我，羞得我满脸通红，不知是该把果子都倒出来还是带回去，眼望着老演员，他却不置可否地继续与苏公子聊着天。

接见终于结束了，部长喜滋滋地向全团发出邀请，她将陪同全团专程去苏总统的故乡峇厘岛参观访问，行期定在第二天。总统和女部长送我们走出会见大厅，花园里，总统宫的卫士们和姑娘们围聚在喷水池旁，他们与苏公子打着招呼，“蓝宝石”依偎在长廊柱下注视着我，夜空下，她的双眸特别明亮，似两颗星辰，我俩遥遥招手告别。

我的那一包红果子，上了车就给大家分派光了，有的演员接见时没捞到吃，尝后赞不绝口，问果子啥名字，我竟忘了问苏公子，只记得叫水果皇后，到底是不是真的水果皇后，抑或苏公子跟我开玩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大大小小十几辆车组成的车队，由威武的开道警车引路驶离雅加达，插着两国国旗的头车上坐着女部长和我们团长（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音乐家沈亚威），随后十几辆小车是中印双方官员的座驾，再后面才是演员乘坐的四辆大巴，最后一辆面包车是医务人员及医疗器械。长途行驶，这辆殿后小车吃尽了“苦头”，四辆大巴扬起的尘土全落在它身上，灰头土脑，已看不出车身原色，让人瞧着怪可怜的。

途中经过许多村落，村舍都用茅草和竹子建成，很古朴，自然风景很美。在田间劳动的都是妇女和儿童，不见壮年男子。陪同向大家介绍风土民情：印尼乡村的劳力靠妇女，男子不劳动，闲着无事就斗鸡，斗鸡是村民乐此不疲的唯一娱乐活动。沿途所见到的靠近公路的村落，穿着筒裙的男子各人怀中搂着大公鸡围坐一圈，每经过一村，都能见到四五个这样的斗鸡圈子，看见这些男子脸上露出嬉笑和亢奋叫喊的表情，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妇女和儿童，很不是滋味。

在车上睡了一觉，醒来已快到峇厘岛，路旁停着几辆小轿车，车边站着几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车队停了下来，从大巴上可以望见女部长下车与路边的那些人握手。他们是峇厘岛政府官员，迎出十多里地恭候女部长。

趁官员们寒暄之际，我们下车活动坐酸了的筋骨。我观察从前面十几辆车下来的人没有苏公子，心里顿时轻松许多。不知怎的，我对这位个子不很高大，但显得很壮实的苏公子，虽说不上反感，却有点怕见他。如果他对所有的演员都一个态度，我就不怕了，问题就在他对我特别在意，令我很不自在。

下午四点多钟，车队进峇厘岛，出我意料之外，峇厘岛并不是一座城市，印尼俗称“千岛之国”，很多城市以岛为基，所以我认为苏总统的故乡一定是座美丽的城市。

虽不是城市，却是座名副其实的美丽岛屿，沿途热带森林里开辟出的公路、沙石土路，路旁鸟语花香，各种果树上的果子鲜艳可爱，涓涓溪水，哗哗瀑布，美景目不暇接，好似《西游记》里的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仙猴，有趣的是前方路上真地出现了一队扮作野兽的艺人，狮、虎、豹、蟒四大猛兽围着一个猴王翩翩起舞，我惊奇地问陪同：“你们印尼也有孙悟空？”

陪同是华裔，懂中国文化，立即理解我的意思，说：“这个猴王跟孙悟空不一样，它是土族信奉的本地神。”

“它的神通一定很大吧?其它猛兽都围着它跳啊。”

“不太清楚。不过神总有神通才受人奉拜吧。”

很遗憾，他不是道地的印尼人，讲不出所以然。不过我想，既然是本地神，外地人不知详细也是很自然的。

人群夹道载歌载舞，本地姑娘为我们戴上芬芳的鲜花环，鲜花一束又一束地往我们怀中塞，我几乎被鲜花没了顶，为了更好地观赏土族艺人的表演，我避开人群爬上路旁一座小坡，依在一棵树下居高临下地欣赏起来。

蓦然间，我发现苏公子出现在对面高坡上，目光四处搜寻，当他看见我，高兴地挥舞双手向我示意，只见他嘴在动，因人群喧哗，听不见，但那意思我明白——他在喊我。我向他点头致意后就侧过身不再看他，这是我单方面的回避举动，我知道是徒费心机，可仓促间也不知道怎么做更好。

苏公子忘了自己是众人注意的目标，不少人顺着他的视线把目光投向我。当天我穿的是一件白底绿花连衣裙，胸前挂满鲜花，样子大概很飘逸，不过，这种美好飘逸的感觉被众多聚集的目光破坏了，反倒使我不好意思久站，转身下坡混入人群中。

“你好美丽。”

“你好漂亮!”

“你是中国女演员中最漂亮的一个!”

一群华侨女青年围住我，赞美羡慕之辞纷纷投向我。“姐姐，我能叫你姐姐吗?”一个女青年亲热地问道。我羞怯得不置可否，我觉得她可能比我大，我不好说自己只有十五岁，实说了恐怕她们不相信，就凭我的身材，“鹤立鸡群”一般，说不定会认为我虚瞒年龄，我只好望着她们微笑不语。

对面山坡上已没有了苏公子身影，而我身旁，几名老演员已不张不显地围拢过来，我这才发现自己孤身陷入那几名华侨女青年在内的十几位异国人的包围之中，也难为了治安组的人为我操

心。

不见苏公子身影，我倒轻松起来，本团同事们都知道我的性格坦诚单纯，正因为这点，他们也没把事情往坏处想，最多只是顾虑我年龄小不谙世事，在外交礼节上或安全上出差错，所以在其他演员心目中，我还是重点关照对象。

欢迎仪式结束后，全团演员和同行官员，浩浩荡荡跟随女部长上山参观庙宇。那时候，我们只有政治信仰，没有宗教信仰，我还不不懂什么叫菩萨，对向导介绍的那些菩萨来历不感兴趣，只凭审美观来判定菩萨的好坏。可是，没有一尊菩萨是漂亮的，大多数面目狰狞丑陋，有一尊甚至浑身长着乳房，观感很不舒服。如今信佛了，真觉得错过增长知识的机会。

第二天的参观游玩中，苏公子挽着一位肩扛遮阳伞穿戴华丽的印尼姑娘趋前向我介绍，这位漂亮姑娘是他的表妹。表妹脸部轮廓清丽，身材苗条，她对我很热情，寸步不离地伴随我，苏公子形影不离地堂堂正正地跟在我俩身后，时不时举起相机为我们照像，忙得不亦乐乎。初时我们三人很快乐，稍久，有演员递话过来：“你跟他们拍那么多照片，不必要吧！”说话听音，我顿感引人非议实在不值，急着想离开他们兄妹俩。苏公子感觉出我受到某种无形的束缚，忙叫跟随的人替我们三人合影，这样一来，我逃得更快，合影终于没照成。

在峇厘岛的三天里，苏公子借着表妹的掩护，在各种场合中接近我，虽然语言不通，但他那种难言之隐的表情我已深深感受到，我不太懂爱情是怎么回事，但我不自觉地感到内心有种沉重，我有点同情他，但那时的纪律不允许有私人友谊，所谓的“国际友谊”只是执行政治任务的需要。

演员中的议论渐渐多起来，因为他的身分特殊，我的年龄也小，还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件事，只是我身边的人经常会提醒我不要落单，要往人多的地方走，这是对我的最初保护措施，我却懵

然不知。

回到雅加达，原定一个月的访问期已到，东主国热情挽留，中方大使馆决定再延期十天，我们就在雅加达增加几场演出。四十天到期，东主国仍不放我们走，再延期五天。最后这五天已属多余，没有演出活动，整天有印尼群众进驻地来看望演员们，全团演员为“国际友谊”忙个不休。说来也怪，那段时间印尼人和印尼华侨对我们特别热情，也特别感兴趣，从早到晚人群络绎不绝，大概是与政治气候有关，来访我的华侨青年中，有人向我公然表示：“有人爱你，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吧。”这句话立即让我敏感到苏公子，偏是在最后的五天里，他没有露过一次面，似乎不太合常态，可我又感到他不露面反倒令我安静自在些。我望着传话的青年，觉得他背景不单纯，但我又羞于直截了当地问他，只有回避，让他和他那一群人呆在原地。

四十五天期满，东主国仍是再挽留，中方使馆出面婉拒，我团转赴柬埔寨王国进行为期二十天的访问演出。离开印尼的那天，去机场之前负责全团安全的副政委再三叮咛大家要注意整体行动，机场外面可能有欢送的群众，不要被冲散了，在最后离开时发生意外。

机场门口和候机室外面果然人山人海，人们向我们投掷鲜花，许多警察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把人群拦在警戒线外面，让出窄窄的一条路，全团得以顺利地进入候机大厅。

令全团大感意外的是候机厅里早已聚满人群，演员们一进大厅，就被等候已久的欢送人群分开了，全团首尾不能相顾，六人安全小组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在热情洋溢的欢送气氛下，演员们忙于礼节应酬，相互之间无暇关照。只是一瞬间，七八个男女青年包围了我，在人群推拥中不知不觉被他们拥簇到大厅侧门。我急问他们：“你们带我往哪走？”其中一人笑答：“起飞时间还早，我们陪你参观候机大厅。”

话说完，已到侧门边，门口孤零零地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门打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子急步向我奔来。身旁的一群男女神情异样不断向后张望，围成屏障把我遮住，其中两人把我推向门外。我心知不妙，惶惑之下还未缓过神是怎么回事，远处传来急切的呼声：“张宁，不要走远，快回来！”我急返身，趁那群人愣神的一刹那，本能地冲出包围，走向朝我奔来的副政委和几名男演员。我跑到政委身边，回头望着那群人，一个个郁郁呆呆地站在当地几乎不会动了，门口那辆车转眼工夫不见了。

几名男演员看着那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副政委微愠地问我：“你跟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带我参观候机大厅呀。”说完，自我感觉不对劲，又回头望那群人，个个脸上都挂着失望的表情，心下思忖：这些人我又不认识，他们想对我做什么呢？真搞不懂。

副政委重重吐出一口气，拍拍我肩膀：“小张宁，你可不要远离了大家，这里人杂，别到走的时候再出个什么事，快回去吧。”

上机时间到了，演员单列长队出候机大厅向包机走去。背后的人推我一下：“张宁，你看，苏公子在前面！”我急张目望去，心里怦怦直跳，飞机舷梯旁边，苏公子携表妹站立着，身后不远处并排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大汉，其中一人有点眼熟，啊呀！不就是从车上跳下来的那个人！我放眼望去，竟然在刹那间记住他的容貌，但他在这时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我心惶惶地低头走到舷梯旁，正想一步跨上去，苏公子急步上前抓住我手臂，呼出的热气喷到了我的脸上，我抬眼看他，那副墨镜后面的眼睛仍然看不清，他用华语向我道别：“张宁，再见！”虽然有点生硬，但听起来很顺耳，充满诚意。我礼节性地向他致意，他转而握紧我的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柄银制匕首，一

块洁白丝巾，递到我手上，又用华语说：“张宁，纪念！”瞬间，我对苏公子涌起一股怜悯与好感。

那个年代，跨国建立感情是一种犯罪，我是军人，军纪更不允许，我对苏公子又能作何表示？我从他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拿着他送我的礼物，说句他听得懂的“再见”，向他挥挥手，转身跑上舷梯。

飞机起飞了，从窗口望下去，苏公子向天空挥着手臂渐渐远去，愈来愈小，变成像点点蚂蚁直至看不见。

泛着泡沫的白色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冲上金色沙滩，海鸥、椰子树在飞机下掠过，一丝悠悠白云掠过窗口，再见了，我心里默默念叨着，从到达的那一天到离开的这一天，好像就是昨天和今天的区别，时间瞬息逝去，可又给人留下那么多的回忆。

我本人和大多数演员对这一未遂的绑架事件浑然不知，因我年轻和主要演员的任务以及全团的名誉，领导对此事件一直秘而不宣。事隔十多年后，政治部宣传处一位作者想写我的经历，采访了当年的代表团团长，团长感慨地说：“张宁当年在印尼差点回不来啦。人长得太俊俏容易出事啊。”

我们在柬埔寨访问演出近一个月。有一天傍晚，使馆传来印尼军事政变的消息，大家震惊得一时说不上话。往后的几天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惨遭暴徒围攻，断水断电，华侨惨遭掠夺杀戮；印共主席艾地和夫人同时遇难；苏总统遭废黜；总统宫卫队在反击中伤亡很大，等等。

我静静站在一旁听着，耳旁响起许多议论、叹息、疑问与惊恐。我眼前浮现出苏公子，他身后站着美丽的“蓝宝石”和青春华贵的表妹。已经有点淡漠了的苏公子的形影那么顽固的不肯消失，我不由得暗暗祈祷他的一家能在这场政变中幸免于难。想到血淋淋的总统宫，原先那么美的夜晚接见场景，如今成了杀戮场，我感觉到一种凄惶，世事反差如此之大，实在是人间的悲

哀。我的感情在流泪，但我知道不能露于形迹，那会招来很多不理解的非议。

东欧观感

从柬埔寨归国已是七月份，全团放假。一个月假期未滿，中央又下调令，再组团出访欧洲。到北京准备期间，东欧司派了一位副司长教习全团学东欧礼节。他是胶东人，官做“洋”了，仍不改一口山东腔，说话风趣，告诉女演员们：“送一束花，你们可以接；送一支花，尤其是男性送的，千万不可接，那是表示求爱，你接了，麻烦就来了，他以为你接受了他的爱情。”

“万一发生这种事，如果不接，对方会强行动作呀？”有位女演员担心地问：

有位老演员自作主张地说：“出现这种事，让男同志上去顶一顶。”

副司长忙说：“不行、不行，男同志不可以上去顶，失礼节的事嘛。”

演员们哈哈大笑，看来他这个老八股还没有我们灵活。果然，舞队最爱说笑的人向他提了个饮食问题：“你说吃饭要用刀叉，吃鸡割不下来怎么办？”

“吃鸡可以用手！”副司长用浓重的山东腔边说边做了个啃鸡撕鸡腿的动作，演员们笑成堆，连严肃的副政委也忍不住哈哈出声。副司长乐呵呵地看着大家，并无半点尴尬。我想他可能是解放战争以后调到外交部工作的老区干部，不然怎会这般“大度”。

生活组在北京城采购了很多罐头，每人分到四罐，鸡鸭肉齐全，每个人还分到一个十几斤重的大西瓜和几斤水果，一些老演员买了咸菜备用。这些食品是为应付列车进入蒙古国境准备的，

国际列车进入谁的国境就挂谁的餐车，我们不惯吃羊肉，蒙境里跑两天还不饿坏了？所以大家把“粮草”准备的足足的。我还特意买了一旅行袋的零食：花生、瓜子、小胡桃、话梅、巧克力、各式果奶糖，可以开个小杂食铺了。我从小不喜主食，长大后又偏素，任何时候不会担心饿着，就怕没零食，有时每天一个苹果就可解决饥饱的。大家都知道我的饮食习惯，谁也不奇怪我采购这么多零食，我的组长还关心地问：“够不够吃到回来？”我也向大家宣布：“谁想吃东西尽管到我这儿来拿。”

正是八月季节，乘坐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晚上出发，开往马列主义发源地欧洲，心里又是一番不同的感觉，一种神圣感、期盼感更甚于第一次出访东南亚的新鲜感，虽然当时中苏两国交恶，但自小受政治教育的那份崇拜仍揣在心里。

夜幕中，列车里的每扇窗户亮起绿色的灯光，衬托出白色带花窗帘，沿着弯曲的线路伸延，像一条飞驰着的闪着绿色光芒的长龙，非常好看。从大同出境时，中蒙两国边防官兵们对列车和乘客进行出入关的检查。第一次见到本国边防军，好神气，呢子服，高筒皮靴，把个人撑得挺挺的，不像国内军人服装，从头到脚是布质，大中小三个号码，不管肥瘦高矮，按号取衣，拖拖垮垮没有线条，再神气的人也挺拔不起来。我们常常为偷改军装挨领导的批评，说是资产阶级审美观，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应该是劳动者的粗壮美，那是健康型的，虽然现实中舞蹈演员最忌粗壮体形，但精神上却要求绝对革命化。

列车奔驰在外蒙草原上，说是草原不如说是荒漠更确切，时值盛夏，见不到绿色，偶见几棵矮灌木，也像枯了一样没生气，一望无际的黄沙丘。歌中的“牛羊成群”，也渺无踪影。

出于好奇，我约了几个演员去蒙古的餐车看看。几位蒙古侍应生坐在餐桌旁聊天，见我们进来，望一眼，身不动脚不移，继

续聊大天。餐车内四壁皆空，食柜里没有任何样品摆设，好像刚施行过“坚壁清野”，厨房里膻味浓烈，却看不到羊肉。

第二天下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见不到城廓和车辆，不知是不是沙丘挡住了，或是列车一直行驰在洼地里，奇怪的是连公路也见不到，大家很想看看蒙古首都是啥样，竟连顺道一看的机会也没有。

列车缓缓驶进车站，时光好像倒退到成吉思汗时代。到站台上走走，漫天黄风沙吹刮得睁不开眼。说是站台，实际就是露天土路，路旁有几顶旧帐篷，四角用木杆支撑着，帐篷兜风，发出挺可怕的不规则的“哗啦、呼啦”响声，木杆“吱吱呀呀”地摇晃着。在这样的“餐馆”里，木板条凳上坐着几个蒙古旅客，或靠或扒地吃着破桌上的羊肉汤，外加免费的“胡椒面”——黄沙。

站台上还停着两轮手推售货车，我们趋前想买点纪念品，近前才发现是空的。失望之下，打量售货员，灰头土脸，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那表情好像她们不是卖东西的，而是摆样子站在那里等下班。

车站旁边有座圆顶的白色建筑，远看像清真寺，还未进门，一阵浓烈膻味扑鼻而来。漆黑的大厅里，木条长椅上坐着许多候车的人，这些人从哪来的？四周旷野不见车辆，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蒙古的情景让我们吃惊，难以置信。回来路中议论：“这味从哪来的，这样熏人。”

正巧外交部东欧司派给我们的谭翻译从后面赶上来，接口道：“你们说人家膻味重，人家还说你们身上有股青草味呢。”

“哎呀！他们的牛羊可别把我们当草吃掉！”我脱口而出。不是怕牛羊，是怕人，这种环境，这种议论，真让人有点发怵。大家一路又嬉笑又怕怕地上了车，再也不下来“观赏”。

到达蒙苏边界正是深夜，列车停数小时接受苏方的人关检查。

从北京出发以后，全团仍然坚持政治学习，叫“天天读”，就是读毛泽东著作，这是在国内每天的政治必修课。出国了，每个队（舞蹈队、合唱队、乐队）都携带一块小黑板，抄写毛泽东语录，作为每天的思想行动指南。舞队的小黑板正挂在我的卧厢里，又正巧挂在我的卧床上方。上写“要批判修正主义思想。”

舞队的车厢上来了四名苏联官兵，从第一间卧厢开始慢慢查过来。与我同住的组长突然想起小黑板上的语录是批评修正主义的，忙摘下用布擦掉。我说老毛子不认识中文，紧张个啥。她认为谨慎些好，避免意外麻烦。组长紧张不无道理，中苏两国政党为谁是真马列主义辩论得撕破脸后，到苏联国境，还把毛泽东批判修正主义的论述活学活用到人家门里来，万一让懂中文的边防官员看见，说你搞政治颠覆，也是扯不清的麻烦事。

四名官兵出现在门口，表示要检查护照，我正斜倚在床上看书，顺手递给他们。军官看后还给我，举手敬礼退出，满有苏联红军气派，看不出什么“修味”。

几分钟后，走道上一阵靴响，听起来好像是几只皮靴的合奏，骤然停在我门口，连门也不敲，哗啦一声拉开卧厢门，进来两名身穿黑皮夹克不军不民打扮的男人，神情透出一股凶悍之气，不打招呼就翻查我的东西，门外站着几名士兵。

惊愕的瞬间，我不自觉地放下书抬起上身，下意识地问道：“你们干什么?!”

两个男人极不友善地看着我，停住手反问我什么。双方都听不懂，可是都已猜出彼此的意思，他们是在问我：“你说什么?!”我当然没法再重复，对于他们的凶霸无理，我很生气，从床上坐直身子直视他们，看着他们搜查。

这两人叽哩呱啦地向我挥手，态度恶劣，我意识到今天碰上

的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克格勃”，从那几名士兵脸上流露出的敬畏神情，我估计是差不多了。

“见你的大头鬼！”我心里暗骂一句，明知他们挥手的意思是叫我下床，要检查卧床底下的空间（里面是空的，可以放行李和杂物），我偏装糊涂不理睬，坐着不动身子。组长一边看着，觉得气氛不对，忙出门去找翻译。

谭翻译得到消息往这边赶，同组长一起拥进小小卧厢，一问，他们真的是要检查床下。我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下床让他们掀起床板——四个大西瓜！我嘻嘻笑起来，望着那两人一言不发地出门走了。

我忙转身问谭翻译：“老谭，他们是不是克格勃？”

谭翻译吐出一口气，掏出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她很胖，加上天热，又紧张了一下，出的汗比别人都多，说我：“看那架势，八九不离十吧。这些人横着呢。小张，你也是，让他们查呗，让这种人逮住，扣你一人，全团都得给拖住。”

“我又不违禁不违法，他再横也管不着我外国人。”我心里还不服气。

谭翻译是个很好脾气的中年女子，也不和我争，打圆场说：“算了，总算过去了，你们休息吧。”

组长是老演员，平日就视我为小妹妹，知我率直任性，笑嘻嘻地劝道：“好了，出来语言不通，别还像在国内一样由着性子来，没事就好。来，我们切个西瓜吃，不查还差点把这几个瓜忘了。”

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茫茫原始森林中，贝加尔湖远看像天空般蔚蓝，湖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水雾，景色极美。列车绕着贝加尔湖行驶近两天，不见人烟。

进入苏联国境，挂着苏联餐车，一天三餐按时去吃饭。第一次用刀叉挺新鲜，吃饭好像在玩。在东南亚生活两个多月，吃饭

用匙和筷，还是东方人习惯；此番土豆、面包加黄油，凉菜一小口，牛排或鸡腿一小份，统统装在一个小碟里，挺好看就是吃不饱，每人一份不能再添加，不够吃就啃黑面包，有点酸味。在国内上政治课，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搞得人民吃黑面包。“土豆烧牛肉是共产主义”，现在嘴里吃着这些食品，便觉得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些不伦不类。

到了莫斯科车站，女演员按规定换上高质丝绸面料做的旗袍，五光十色，线条优美，一眼就瞧出是中国人，而不是东方种的日本人或朝鲜人。不少苏联民众，甚至是些军人，都借故上前和我们打招呼：“你们好，中国朋友！”“莫斯科——北京！”

“中苏友谊乌拉！”这些人立即被赶上前的军警和穿黑皮夹克的人驱离。

中国大使馆的建筑风格中西结合，庭院宽阔豪华非常气派，大门口的警卫由苏方负责，在院内就像在本国土地上一样自由安全，我们轻易不出大门。因苏联副食品供应匮乏，使馆院内自种一部分蔬果，还利用人造湖养鱼，在异国土地上，也提倡发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苏联不是我们正式出访的国家，为等班机转往波兰，在苏联停留了一星期。

大家怀着虔敬的心情去红场瞻仰列宁墓。红场是莫斯科最大的广场，但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相比，小得很多。平地上隆起一个黑色的圆包，那是列宁墓的进口。据说守墓士兵值勤时不眨眼，每班十五分钟换岗，经过特殊训练的。一位男演员出于好奇，轮到他进墓口时，故意在值勤士兵面前抬手搔头皮，双手上下在士兵眼前来了两下，果然不眨。虽然大家怪他行为冒失，但也真地验证了人们的传说。列宁躺在地下墓穴中的水晶棺材里，面部安详，像睡觉一样，身材很短小，不知是缩水了还是生就这副小身材，脑袋与正常人一样，额头却很大。

墓穴的另一边空着，那里曾置放斯大林的水晶棺，后被撤

掉，遗体也被赫鲁晓夫火化扬灰。

从墓穴另一出口转上地面不远就是克里姆林宫外墙。沿墙一带绿草茵茵，是苏共功勋大臣们的陵墓，每块草坪上立着一座有墓主头像的石碑，送鲜花和观瞻的人不多。角落上有一块草坪没有石碑，曾经放着斯大林骨灰，骨灰扬弃后，草地一直荒芜空置。听说每天都有人偷偷送花，等送花人一走，鲜花就会被监视者收走。为了验证真假，我们放了几束鲜花在斯大林墓地，十几分钟转回来，果然没有了。

逛市场闹出笑话。苏联轻工产品不错，尼龙、的确凉之类化工纤维布料品种繁多，花色鲜丽，当时在中国这些产品尚算是“高级品”。发给我们的苏币不多，几个小钱买不了大的买小的，到水果食品柜跟前，玻璃纸包着红艳可爱的果子，我以为是异种苹果，要一磅，八卢布，折合当时人民币二十四元。打开一看，竟是西红柿！国内几分钱一斤，这里上了大公司水果柜台，白耗了我八卢布。不甘心，又买了一罐花生米，回到使馆打开一看，是黄豆！商标明明画的是花生米。

苏联这一趟留给大家的印象，可用一句俗语形容：挂羊头卖狗肉。

波兰和匈牙利执政党当时都受到毛泽东批判，从所谓“正统”马列主义角度来评论，这两国都“修”得够呛。

但从观感上说，这两国的文明素质都不错，社会进步比照苏联和中国，前进了许多，虽然曾经是苏联的卫星国，在逐渐摆脱苏联控制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从饮食、服饰，到公益环境、交通设施，处处显得比苏联好。

有的演员说这两国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样板，更有些演员认为，管他什么样板不样板的，人民生活得好最现实，就拿我们来说；身处其境，感觉舒坦是实在感受，比什么说教都强。

波兰首都华沙的海边立着一座美人鱼雕像，这是华沙城的象征。我小时候爱读安徒生童话，美人鱼正直善良勇于牺牲去造就他人的幸福，死后化为海上的泡沫升到天堂做了上帝的天使。这段故事，我每读一次都很感动，心仪美人鱼已久，此次见到，留连忘返，抱着她、靠着她拍了许多照片。

匈牙利是我们等候中转飞机临时停留的国家，我们住在中方大使馆里。使馆的建筑是一座古老的中欧式别墅，有点像古堡，一种俗称“爬墙虎”的植物爬满庭院墙壁，像章鱼的爪子把整座房子和庭院牢牢地罩住，白天也显得阴森森的，夜晚更觉得黑漆。我们都睡地铺，因为没有那么多床。白天去逛街看市容，晚上躺在地上聊天打扑克，消磨时间等待上机。

布达佩斯很美丽，现代化建筑群中处处可见保护很好的中世纪古墓，成群的鸽子飞翔在空中，时而落地啄食人们撒下的面包屑、玉米粒，时而飞上古堡凉台或栏杆栖停，咕咕的叫声给人一种祥和的感受。

城市空地到处是花圃和绿茵如毯的草地，神话人物的雕塑在喷泉池里或躺或站，随处可见，很具观赏情趣。

布达佩斯人的装束很讲究，衣式新潮大方，比苏联和波兰的青年人还讲究，看他们的精神气质，并没有因“修”而“萎靡不振”。别开生面的外部世界，在我心灵上留下殊异的印象。

“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地理位置在地中海巴尔干，远离中国，被毛泽东赞誉为“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步上阿尔巴尼亚国土，除了人们那张脸是欧洲型的以外，处处都好像回到了中国。男人们穿民族服装，有点身分的都穿中国毛式中山装。我们只听说中国援助他们粮食和机械，看来衣服也是中国供应。街上行人脸部表情呆滞，跟中国农民差不多。人们的言谈举止正儿八经，开口必称“同志”，循规蹈矩，看不出一点欧洲血统特有的热情奔放。

我们下榻首都地拉那最“豪华”的国宾馆，据说也是中国出全资供应材料帮助建造的。

第一餐就让全团倒胃口——羊油拌面条。一进餐厅，许多人忍不住捏鼻皱眉，硬着头皮坐下。到散席，大多数人没动刀叉，因为除了羊油拌面条，再也没有其他食物。餐厅总管急得满头汗，我们提出最简单的要求：米饭、鸡蛋，总管连连摇头，当晚许多人饿肚子。

第二天开始，鸡蛋、火鸡肉、羊排都上了桌，我们吃在嘴里很不是滋味，心里都在琢磨，他们一夜之间从哪里搞来这些食品？向总管打听，总管还保密不肯说。以后每餐吃饭，总管都尽量安排一些适合东方人口味的菜肴，后来才知道，为了解决我们这一批“国宾”的饮食，阿国动用了“特殊级别”的食库。阿国土地贫瘠，土少石多，不长粮食，缺少粮食就影响家禽和畜牧业生产，副食品极缺，人民的主粮是高粱和玉米，大学生待遇每餐两片面包一串葡萄。阿国出产的葡萄特大，颗粒如荔枝般大，汁多而甜。

首都剧院和体育馆的演出场地还算不错，各城市的巡回演出场地就很差，很像在国内下野战部队或下海岛演出的条件。因地制宜搭简陋的露天舞台，粗糙的木板条拼接成“地板”，布景不好搭，灯光更没有，大型舞蹈不能跳，小型舞蹈还得防地不平或碰上冒出的钉头而跌跟头。

我不担任群舞，只跳独舞和领舞，向来主要演员吃香，此番却轮到我“卖苦力”。舞台条件不好，旋转旋不出样子，跪在地上的动作眼不尖就跪在钉头上，裤子也撕了，腿也破了，咬咬牙坚持“走”完而不是跳完，当时心里想，为“明灯”，为国际阶级弟兄演出，吃点苦算不得什么。

吃、住、行三项最怕的是休息不好，至今忆及尚感心悸的是一些城市的旅馆，看上去不错的毛毯和床具，里面跳蚤臭虫成

团，上床立即感到奇痒，开灯检查找不到东西，浑身却冒出一串串红包，仔细找，发现毛毯里和床垫里全是可怕的“小家伙”。床具和毛毯扔出房去，借着夜幕的掩护，洗完澡，穿着极少的衣服（算是光身子）将身子“抛”到凉台上去，好在凉台那一面是海，吹着海风彼此聊着天熬过一夜。

离开阿尔巴尼亚之前，霍查主席和谢胡总理率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团演员。接见大厅里，茶几上放着糖果和瓜子，都是中国货，大家边吃边等。

“来了！来了！全体起立欢迎！”副团长从门外冲进来兴奋紧张地招呼大家。全体演员翘首期望这两位传奇式的领袖。

霍查和谢胡在一大群警卫人员簇拥下步入大厅，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全体落座后，霍查开口讲话，声音微小，只能辨声不能辨音。翻译的声音可大，霍查讲了两国友谊以及对我们的演出表示感谢，并虚实地说本国条件不好。谢胡一旁微笑地听着，不插一句话，全场静谧。“咔吧”一声，是我嗑瓜子发出声响，在静谧的气氛中显得格外清脆。全体演员目光都集中到我脸上。我下意识地一点表情也没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霍查和谢胡，其他人的责备目光我全不在乎。

霍查和谢胡笑了，问了一句什么，翻译向团长说着什么，团长的声音很清楚：“这是我们团年龄最小的演员，《贝壳舞》的领舞就是她。”说完笑嘻嘻地望着我。

霍查和谢胡以老人看孩子般的慈祥目光望着我，微笑着。下了好大一个台阶，我的手心都在冒汗，一把瓜子湿透了，变得水滋滋的。

其实我并不是故意在这种肃穆场合吃瓜子，他们进来的时候，一粒瓜子刚进嘴，当时好多人嘴里都含着瓜子，不知别人是怎么处理的，反正我这颗瓜子磨得牙痒痒，聚精会神之中忘了牙缝间磨的是粒瓜子，稍用劲，就发出了那种很不雅的“咔吧”

声。

离十月一日国庆节还有几天，中方大使馆要求已结束演出的我团多停留几天，为庆祝活动献演。

国庆节的晚上，中方大使馆邀请各国驻阿尔巴尼亚的使节和夫人们以及阿国党政军高级官员和夫人，到使馆欢宴，我们出了几个小节目助兴，因使馆场地不大。我跳了一支新疆独舞《牧羊女》，大厅地板很滑，四周围放餐桌，中间剩下的空间就很小，旋转刹不住脚，冲向正前排当中坐着的霍查，情急之下，硬生生地停住，朝近在咫尺的霍查歉意地一笑，重新起步开始跳。下场后首先想到霍查的反应，见他脸露微笑，我放心地转身走向长廊，偶回头，见他若有所思地仍然看住我，我当时有个感想：一国之君，娱乐之时也怀着心思。

换完装走入厨房找吃的，见两个英俊高大的阿国男子正端着盘子品尝食物，吃两口就往外端。我好惊奇，这两人不讲卫生，把吃过的东西端上桌。厨师向我解释，这两人是霍查的贴身警卫员，霍查吃的东西先得经过这两人尝试，怕有毒。我还是想不通，中国大使馆怎么会毒他？中国对他那么好，还不放心？我对霍查的印象起了微妙的变化，心想，无产阶级的领袖不该是这样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我们结束出访演出任务回到祖国首都北京，从年头到年尾算起来约一年都在国外，对衣着打扮和国外生活方式，从不适应到适应，什么“穿着西装旗袍的三八作风”、“艰苦朴素”、“世界观改造”等等说教，没有人再着重提起，一切都暂时恢复到自然本质。

我们的军装留在南京，一时不及换装，就穿着出国服装在北京和天津汇报演出。闲时逛天津市场，竟遇百姓唾骂：“假洋妞，装什么相！”骂得我们脸上火辣辣的难堪，这才意识到这身衣服与普通百姓的认识水准差距太大，民众心理上的畸形不就是

我们当初出国时思想上的写照吗？封闭社会的封闭式教育把人们搞得既愚昧又偏激。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

提起世界瞩目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国家大动乱。领袖因个人理念率先发难，引发全党全民大乱，这个乱，乱得很彻底，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从城市到穷乡僻壤，无一不缠绕进去。从执政党立场来说，是一桩违逆常理的怪事。无独有偶，政治怪事中又冒出一桩生活怪事，就是中国当时第二号掌权人物林彪的妻子叶群为儿女在全国选佳偶，被人们称为选驸马妃子的“选美”活动，更彰显出极权制度的封建色彩。运动开始不久，我不幸成为“选美”的“猎物”，受控制，受审查，去劳改，因美貌而厄运接踵而来。我因身在其间长达七年，知道了许多内情，现从头说起。

第二章

选 美 内 幕

初选概况

副总长夫人两下江南

第一次被选进京

叶群忌，林立果迷

林立衡、林立果身分揭秘

蟒与异梦

林立果“偷”我第二次进京

检查身体

与林立果重逢

“首长俱乐部”

抗 命

“执行任务”充当样板

初选概况

严格些讲，初期的选人还不叫“选美”。叶群明知自己的歪招在林彪那里明讲了肯定通不过，她采取“暗渡陈仓”策略，向林彪建议：“我们的地位接触面小，又不好直接出面，哪去找首长要求的条件，我看还是请一些人帮忙吧。首长有不少老部下，他们有儿女，让人去看看，有合适的就挑一个吧。”

林彪说：“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你不要去麻烦人家。”

叶群说：“老虎和豆豆老实害羞，这种事他们从来不主动，人家都抱上孙子啦，等他们自由恋爱我们都老啦！这件事我们不想办法，等到人家（指毛）找给你把我们捏在手上呀。”

林彪终于点头同意。林彪曾在锦州地区打过仗，还有印象那里的女性模样不错，他的一些部下也留置在那里，就信口说了一句：“锦州的女人长得不错。”这次谈话后，林彪再未过问选人之事，直到叶群发展扩大到全国选美，并有几个女孩带去给林彪看，他还以为是老部下帮忙介绍的。在后来的揭发中秘书们说林彪不知道选美一事，连我都不相信，但我回忆了林家的生活，亲眼见到叶群处理事情的手腕和禁严家规，才不由得不信。“林办”的人讲起骗林彪的一些事时口气十分随便轻松，在叶群的榜样作用和雌威下，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秘书们已“磨练”得游刃有余，甚至有恃无恐。在“林办”里，秘书对林彪说谎不构成罪名，相反，谁要违了叶群的意思，才是大祸临头，所以不少秘书到“林办”工作不久，便都萌生退意。

叶群甜言蜜语地哄骗秘书：“首长这么大把年纪，人家都抱孙子啦，我们的儿女还不懂得谈恋爱。豆豆、老虎都怕羞，自己不着急，我不能不替首长考虑呀。我和首长都忙，你们做叔叔的

就帮着关心关心吧。”

几个秘书利用出差办事的机会顺道替叶群做这件分外事。但是秘书们通过战友、朋友介绍的女孩送到叶群那里，都被叶群退掉，其中有两个未满十八岁，她还说怨言：“我这里又不是办托儿所！”

秘书们原以为很简单的“媒人”差事竟这样难办，到底找个什么样的才算合适？都认为叶群难侍候，谁也不愿再担当“媒人”差事。叶群也感到难支使他们，都是首长跟前的人，得罪了，万一说句什么话，对自己不利。秘书却因叶群打着“我跟首长商量过，首长同意的”幌子，谁也不敢在林彪面前多嘴，这个空子让叶群钻大了，直搞到后来人人沾腥带臭的地步。

王老太太说叶群怕秘书们“窝里反”，又觉得秘书们都是男的，不懂审美，便召见了几位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们的夫人，向她们诉苦，把对秘书们说的话又重复一遍。第二夫人开口请帮忙的事，谁也不好推却，成人之美，自古有之。

几位夫人的丈夫分管海陆空三军，她们又是其夫的办公室主任，过问起这件事，一张网撒下去广及三军，加上亲朋好友老部下，大网拉开撒向京城到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选美”就此拉开序幕。

男女人选四面八方一个接一个送往北京。邱会作夫人胡敏从家乡西安市选送了一个省委干部的女儿，赞誉她是“杨贵妃第二”；吴法宪夫人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选了一个扬州籍女孩，赞誉她是“西施再现”（这个女孩后来分配到我团，确实非常秀气漂亮，我们都叫她小陆子）；李作鹏夫人董琪才从哈尔滨选到一个男子，夸他是历史美男潘安。（后来与李作鹏的一个女儿结婚，事件后跟我一起关在劳改农场，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擅长油画，改革开放以后在哈尔滨开设画店。）

这三位人选都是三位夫人经过无数比较筛选挑中的优秀者，

到了叶群那里，她只说了句“立衡、立果不同意”便打发掉了。

那一位“杨贵妃”曾作为重点对象安置在胡敏家，以最好的膳食款待，这又是叶群的馊点子。不到半个月她果然发胖，叶群说：“她这么快就胖得像个冬瓜，到我家来吃我的伙食不得更胖啦。送回去吧！”

胡敏又从江苏歌舞团选来一女孩，也安置在家里。搞舞蹈的演员多数节食，叶群的试验没有成功，她却挑剔别人家“长得像个瓷娃娃，个子太矮”，又退掉了。后来我在朋友家见过这个女孩，长得也不错，小巧玲珑。

胡敏又从江苏无锡市选中一女孩，姓陈，白皙漂亮，聪明伶俐，叶群仍嫌不足。

几位夫人的辛劳都被叶群打了回票，到底要什么样的人，都感到困扰，同时也担心再兴师动众地选下去影响太不好，感到棘手又不敢正面提意见。

叶群对几位夫人的难处故作不知，进一步向她们下达了具体的人选标准：

男性：政治条件好，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左右，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左右，英俊有气质。

女性：政治条件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高一米六〇至一米六五左右，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五官端庄秀丽不能显妖冶之气，皮肤粉白洁亮，体形婀娜，亭亭玉立。

女性还规定几种不要：

- 一、有抬头纹不要；
- 二、脸上有雀斑、黑痣不要；
- 三、牙齿不整齐或发黄、过大或过小不要；
- 四、眼白多瞳仁小不要；
- 五、头发稀黄不要；
- 六、双手粗糙、十指短粗不要；

七、形体不好看不要；

八、脚长得不好、走路姿态不好看不要；

九、说话仪态不好不要。

林立衡和林立果对叶群所为很不满，林立衡自由恋爱的对象也被叶群破坏，男方被遣送到原子弹基地永不许返京。林立衡反抗，遭叶群辱骂毒打，愤恨自杀，幸被抢救过来。林立果自由恋爱的小梅姑娘也中途夭折。林立衡和林立果认为感情要讲缘分，不是完美形象能够代替的，向叶群明确表示过反对，偏偏叶群又想利用这一招控制渐露反意的儿女，她要防的对手太多，连她的儿女也成了对立面。我听“林办”的人说，选人这件事叶群是自作自受，她原想用她选来的人控制立衡、立果，立衡、立果不要，她拼命塞；等到立衡、立果看上了，她又偏偏不给，怕他们自己看上的人成了帮手联合起来反抗她。

叶群与儿女之间的“拉锯战”产生新的矛盾，人选一批批送来又一批批送走。几位夫人非常为难却又罢不了手。

副总长夫人两下江南

叶群认为几位夫人各有特点，李夫人古板正经；黄夫人太老实；吴夫人是贤妻良母；邱夫人开朗灵活善结人缘。叶群“吃”准邱夫人，抓住不放。有一次叶群召见她，说：“你在江南工作过，熟人一定不少，请他们帮帮忙。江南出美女，那么大个江苏就挑不出一个好的来？我们不要多，就要一个，再辛苦一趟吧。”

胡敏从叶群话音里听出有嫌她不尽力之意，邱会作被造反派摧残得奄奄一息，若不是毛泽东亲自表态保邱会作，叶群出面去传达指示，她早已家破人亡，这个情要还，再难也得想办法，不管叶群是否满意，力总要尽到，让叶群没有话说。

在这之前，胡敏已动用了江南一些关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专为选人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省革委会蒋副主任主持，他身兼省军区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之职。

江苏常年有北京下达的选人任务，都是人民大会堂和主要服务单位要的服务员，虽然也要求形象条件，却没有这次苛刻。下达任务只说挑选国家机要人员，搞机要工作哪要这么高的形象标准？而且只要一个！种种迹象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背景，令蒋副主任大惑不解。严格的纪律不准经办人过问因由，只准执行命令，并三令五申此项任务是“国家机密”，不许泄露，不是经办人不准介入。

蒋副主任见胡敏亲自到南京，忍不住发牢骚：“我是个大老粗，从没干过这种事，机要员哪需要这么高的形象标准，让人摸不着头脑噢。送去的几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你还看不上，下面人有想法，再挑下去影响不好。我看江苏是挑不出你要的人，还是到别的省市看看吧。”

胡敏也无从解释，安抚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们要无条件地执行。江苏这么大，江南水土养人，一定能找出一个，不要泄气嘛。江苏还靠你帮忙，若能圆满完成任务，你的功劳可大啦。”

蒋副主任心知推不掉，但是江苏地区的地方单位已寻遍，家庭出身没有问题模样又好的未婚适龄女子一个没漏掉，再上哪去找？蒋副主任愁得抓头皮。

胡敏提出到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看一看，蒋副主任有些犹豫，他知道许世友的脾气，特别是军区歌舞团那一群如花似玉的女演员，在全军汇演中是独占鳌头的佼佼者，动一个都得惊动军区。许世友最看不惯歪风邪气，他若知道可就麻烦大了。

在胡敏的坚持下，蒋副主任陪同她巡视了三军医院、医校，轮到歌舞团，蒋副主任就打哈哈，说：“嗨，歌舞团那帮女孩我

最熟，江苏省歌舞团挑去的你看不上，水平差不多，你就不用看了。”

胡敏笑说：“既然来了还是去看看放心些。”

我当时在北京出差，胡敏到歌舞团去看了所有未婚女演员，一下看中三个，立即带上照片返京，又被叶群以各种理由回掉。

两个多月后，胡敏第二次到南京，转了几个地方一无所获，心有不甘地说蒋副主任：“一个歌舞团就有三个，还有没有更好的地方？你可不要给我打埋伏。”

蒋副主任说：“要是那三个你还不满意，我可没有办法了。”

胡敏临回北京前去南京军区看望一些邱会作的战友，这几个首长问起她来南京的公干，她说了。其中一位首长不相信地问：

“到我们歌舞团你还挑不中一个？是不是都看全喽？”

胡敏说都看过了。

那个首长笑说：“那可不一定。有个叫张宁的女孩子，你要是看不上她，就不要再来江苏。她是主要演员，歌舞团一定是怕你挖墙脚，不给你看。”

胡敏说：“不会，歌舞团政委是我熟悉的老同志，他不会隐瞒我。”

几位首长不以为然地笑起来，并且异口同声夸赞我，并介绍我的身世，说他们看着我长大，不会推荐错了。一位首长提醒胡敏：“歌舞团最近搞内查外调，你去看的那次她很可能不在哟。”

胡敏忙叫秘书打电话到歌舞团，接电话的正是王政委，证实了几位首长说的话。胡敏问王政委：“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王政委支吾道：“她当时出差不在。”

胡敏立即要看人，王政委说我又出差不在团里，胡敏要求王政委马上调我回来，政委说不好办，只能先送一张照片。

胡敏拿到照片即刻返京见叶群。叶群下令南京方面送人。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我从上海返宁，脚上生个大冻疮，肿胀发炎痛得不便走路，本想好好休息治疗一下，政委找我去布置上北京的外调任务。他见我很不高兴，拿出一封信递给我，信封上写“军委办事组胡主任收”。我问：“这个人是男的女的？找他干什么？”

政委责怪道：“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她是邱副总长的夫人，你要叫她胡阿姨。她是我的老上级，你去北京帮我带封信给她。上北京外调的人多，住宿很困难，她帮忙替我们安排了住处。你先打前站，后面的同志整理好调查线索再出发。”

“叫我打前站安排食宿？我不会。我脚痛，你叫别人去吧，老派我出差，该换个人让我休息了。”

“你看你这孩子又要小脾气，现在人手紧，你就克服点困难吧。”

“我一个人出发不太方便。”一想到走哪都成人们注视的焦点，没有一个人陪伴心里真有点怯怯，皱眉发愁。

“忘了告诉你，省革委会有位朱同志正好去北京出差，请他们买的火车票，你随他一起走，行了吧？还有什么困难，到北京给家里来个电话。”

第二天我便随朱同志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第一次被选进京

火车上，老朱很快发现我的处境“不妙”。去北京行程一天一夜，我只食两个苹果，不起身走动，老朱很担心我饿着渴着，我将难处告诉他，坐火车对我实在是一件很“受罪”的事，他不禁乐起来。

到达北京车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站外广场，车边站着一位

青年军官，远远地向老朱抬手。老朱也不向我介绍对方身分，让我上车开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我一见是空军招待所，心里觉得奇怪，按惯例，各兵种出差都有本兵种的落脚点，我怎么落到空军的窝里来了？

所有副楼已住满人，都是空军，只我一个陆军和地方身分的老朱，非常惹眼地住进空着的主楼。主楼专供高级别首长下榻，低级别出差人员住不进去。吃饭也到标准最高的空勤灶小食堂。我的相貌和特殊待遇引起众多出差的空军军官们注意，只要我一露面，许多目光都迎视着我，我不敢看他们，我知道目光一旦对上，会产生很多麻烦。但还是有一个青年军官鼓足勇气上前与我搭讪：“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住到这里来？”

我隐去自己的单位，答复他我是出差的。

他掩饰地笑着说：“你一定是高干子女，不然你怎么住进主楼、吃小食堂。”

我无言以对，只好笑笑，赶紧离开他。

这个人对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对人说，听我说话流露出的语音气质非常娇，后来的报刊写我的故事也把这一特征写进去。我从不知道自己说话啥味道，我三岁才开口说话，口齿并不伶俐，及到长大又很害羞，很少开口言语。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胡敏带同“邱办”吴秘书来到招待所，老朱忙上楼叫我去他房间见胡敏。我拿上政委的信赶下楼去见她，进门见沙发上坐着一位皮肤白皙、弯眉大眼、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女军人，气态雍容华贵，我知道她一定是邱夫人，忙迎上去叫声：“胡主任好！”因她不是我父母的熟人，不便照政委交代的叫她阿姨。

胡敏在我一进门时，便脸露喜色，与我握手时盯住我看，欣赏赞叹。对于这种神情，我已司空见惯，到哪都会碰到。倒是我见到胡敏感到有点意外，老干部的夫人们多数不漂亮，甚至土里

土气，眼前这位夫人中等身材挺有模样，心里不禁自语：到底是大首长夫人。

胡敏笑嘻嘻地夸道：“你的皮肤真好，气色这么好看，粉面桃花似的。”又拉住我双手瞧：“你这手怎么长的，十指尖尖这么好看。”

我不好意思地望望一旁窃笑的老朱，由着胡敏拉着我的手左看右瞧，面对长辈我总是这样，让她们看个够，喜爱个够。

胡敏看完王政委的信，笑对我说：“这个小王，还这么客气。他是我们新四军宣传队说快板书的，那时候还是个小鬼，现在都当上政委啦。”

胡敏与我聊家常，说说笑笑很高兴，临走嘱我好好休息，说有空再来看我。我以为她嘴上说客气话，大首长夫人总是很忙，就是来，我有任务在身也没空陪她玩。第二天就挂电话回团催促后面的几个人快点来，我那时十八岁仍很单纯，对政委说：“快点叫他们来吧，房间空着很多，伙食也很好，胡主任真帮了大忙。”

第二天中午，我正坐在房间里绣花（那时市场上物资缺乏，什么都买不到，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只好靠自己做），听得院外有轿车停靠的声音，我心想会不会是胡主任真的又来了？往窗外瞧看，果然是她，却又多了两位空军和海军的中年妇女，我以为她另有事情，不便下去打扰她，又坐下绣自己的花枕套。

不一会门被推开，胡敏笑嘻嘻地领着那两位女军人进来，很新鲜地问：“张宁，你还会绣花？瞧瞧你绣的什么？”

突见她们进门，我慌忙将绣工往枕头底下藏，已来不及了。胡敏看着我绣的菊花直夸奖，我不好意思地望着她们。见胡敏不介绍另外两个人，我也不问，看着她们一一落座。

等了好一会不见她们开口，却见她们一个个笑咪咪地上下打量我。胡敏摸着我的头发胳膊，搂着我肩问另两人：“怎么样，好

看吧？”两位女军人含笑点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我聊起家常和团里工作情况，其间夹杂着：“她脸上一点斑痣也没有”，“皮肤真嫩、肤色真好”，“鼻子好看”，“嘴型也好”，“这样大辫子又黑又亮”，“眉毛又黑又长像画出来的”。

虽然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评头论足，但被“抓住”了议论还是头一次，我惶惑害羞地不知所措。

那位海军以行家口吻说道：“小张耐看，有人初看漂亮，不经看，她第一眼亮丽，越看越好看。”

她的音色像歌唱演员，人很高也很漂亮，后来知道她是海军政委的夫人，曾是海政歌舞团的歌唱演员。那位空军是吴夫人陈绥祺。

我低着头听她们评论，尴尬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毛躁躁的十分不自在，不由地想起几次到外面公共浴室洗澡的糗事：一次洗澡，身边围拢不少人议论“这个女的好漂亮，快来看，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另一次，身旁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地喷咋着嘴巴说：“这么美的人儿，不知哪个有福人能消受啊！”

这次面对着三位女性，虽穿戴整齐，仍感到像那几次裸体被人围观评论的羞耻。我羞红了脸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卷搓衣角。

好不容易盼到她们离开，关上门默想好久：她们为什么对我的相貌感兴趣？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下午，二楼走廊里传来纷杂脚步声，顷刻响声在我门口停止，门外传来窃窃细语。我拉开门，冷不防撞进一位空军，像是被人推进来，差点撞到我身上。我还不及问话，鱼贯地进来五六位男性军人，不请自坐各就各位。我心中一阵紧张气恼，站在门边张目望住他们，见这几个陌生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的低头窃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军人干咳两声问道：“你是南京来的张宁同志吧？”

我点点头。他问过以后便没话说了，五六双眼睛像聚光灯一

齐射向我，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噢，你是友军同志，来我们招待所住，请给我们提宝贵意见。”那个戴眼镜开口说完，身子很不自然地动一动，脸上的表情怪怪的，又捂住嘴斜睨一眼同伴们，其余几人好像强忍住笑。

瞧这群人海陆空都有，却称我为“友军”，再看他们一个个不好意思的样子，不像歹人的表现，我不由得笑起来，招呼服务员进来倒茶水，并向他们表达谢意：“麻烦你们了，谢谢。”

我发现一位青年空军旁若无人地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态气质与众不同。我瞧他一眼，他目光并不回避，愣愣地直视着我，似有所思，又似看入了神。我微微皱眉，心怨：怎么这样看人！我避开他逼人的目光，转身从抽屉里拿出甜桔分送大家，作为惩罚，最后分到他，还是一个最小的。

当我近前递给他时，微愠地斜睨他一眼，这一眼反倒令自己吃惊不小，好面熟啊！在哪见过？这浓眉，这带点钩的高鼻，这脸型神态，我断定自己见过他，就是想不起曾在哪种场合见过，不由地蹙起眉。

那青年接过甘桔，见我蹙眉看他，便低下头剥起桔来，神态腼腆得像个姑娘。所有人都客气地将甘桔放桌上或拿在手上，只他接过来就剥，全无做客应有的客套，给人一种单纯直白的感觉，再配上他那种神情，好似个大孩子，我不由得扭转了初时的印象。

这群人坐一会，什么也没再说，便离开。

叶群当天听胡敏汇报情况，不相信真有像胡敏形容的“古典美、现代美、病态美、气质非同一般”集完美于一身的女孩子。叶群认为女人看女人不足为奇，叫“林办”几个工作人员再次去以男人的眼光审评一下，各人审美观不同，要大家都说好才叫真好。

工作人员谁都不愿去，几个男的围着一个女的看那算什么。

叶群生气，下硬命令凡是抽得出空的人都得去，林立果也在叶群催促下抱着无所谓走过场的心情随“林办”的人一起到招待所。几个人正在门口推搡谁先进，没料到我拉开了门，撞进来的第一人正是内勤警卫参谋大刘，借理由说话的是当时的“林办”党委书记张云生。

工作人员回去向叶群交差，都说“不错，挺好”。叶群要他们说具体详细点，这些人不是拿笔就是拿枪，谁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女人，找不出适当词汇，只好说：“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叶群哭笑不得，跑去问林立果：“你觉得怎么样？”

林立果有心思，不回答，给叶群吃闷葫芦。林立果情绪反常，众人都说好，到底怎么好法，叶群决定出面看看。

当晚九点半以后，胡敏请我和老朱上人民大会堂看样板京剧《智取威虎山》。

江青披一件黑斗篷，内穿特制军服，不男不女气派非凡地出现在礼堂门口，脸上挂着招牌笑容环顾全场起立欢迎的观众，然后将头微微一昂，大踏步走向首长席，那模样真像传说中的川岛芳子。

江青身后鱼贯跟着手举“红宝书”的叶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虔诚恭谨的神态与江青飞扬跋扈的气势形成强烈反差。

幕间休息十五分钟，我随胡敏到一间小厅休息，刚坐下，黄永胜与吴法宪一前一后踱进来，笑呵呵地向胡敏打招呼：“胡主任在这里，邱部长好哇？这孩子哪里来的？”

胡敏从沙发上立起身应道：“邱部长挺好。总长好吧？”又悄语教我：“快上去问候总长。”

我趋前向黄、吴二人问好，胡敏介绍说：“她是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小张。”

黄问：“就是那个张宁？”

胡笑道：“是呀，总长看怎么样？”

黄握住我手细瞧几眼，夸道：“不错！哈哈，不错！不过，光长得漂亮是不行的，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个好接班人。”

吴法宪因胖不耐久站，趁我们讲话，他已落座到沙发上，像尊弥勒佛笑咪咪地看着大家。

胡敏说：“吴司令，小张和你还是同乡呢。”

“哦，你是什么地方人？”吴问。

“我在南京出生，祖籍江西兴国县。”

“噢，江西老表！我们是一个县的。”又转向胡敏：“邱部长也是兴国县的嘛，小张也是你们小同乡。”说着就想站起身，因太胖又跌坐下去，便欠欠上身以示意思。

叶群生活在林彪身边常感无聊，转着心思寻乐子，四个总长都有她起的绰号：吴法宪叫“胡传奎”（京剧《沙家浜》里的伪军胖司令）；李作鹏叫“瞎子”（一只眼有毛病，东北的熊也叫瞎子）；邱会作叫“秀才”（邱会书法擅诗词）；每次军委会休息间隙，叶群都叫吴法宪指挥大家唱歌，吴人胖四肢短，横交困难变成上下挥动，像两把小擀面杖，逗得叶群笑出眼泪。

胡敏与黄、吴闲聊几句带我去另一个大厅。推开门走去里面空无一人，灯光通明，四壁挂着山水画。胡敏引着我沿一条红地毯往前边看边走，前方门打开，一名警卫陪着叶群向我漫步走来。胡敏停步，指着叶群背后墙上一幅画叫我评鉴。我正面朝向叶群，已无心看画，突然出现副统帅夫人，离得如此近，又与我走在同一条地毯上，马上就要临近身旁，我该怎么办？上去问好？太唐突，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称习惯，因职业关系常见到大首长，有时首长不打招呼，我们不能主动“发癫”，以免首长不高兴。出于礼貌，当叶群走到我身边时，我见胡敏没有任何提示，便低头退后让出走道。叶群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直到走出好远，还不断回头看。当叶群消失在门外，胡敏才说：“好啦，演

出开始了，我们走吧。”

出了大厅，迎面遇上李作鹏，当他与我握手时，出于童心，我极力想看清楚他墨镜后的眼睛是否真瞎了一只，想证实一下社会上盛传的这个秘密，但他那副墨镜总也瞧不清楚。李作鹏笑呵呵地听胡敏介绍，并未问我什么。

叶群忌，林立果迷

叶群看过我以后，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甚至大发雷霆。以后我才知道她大发脾气的原因：首先，我见到她竟然毫无反应，不恭维问候她，又没有一点其他女孩子的怯懦之态，她认为我目中无人连她也不放在眼里，要是让我进了门，准与她不一心，一定与林立果联手抗衡她；其二，她一见我，便明白儿子为什么情绪反常，有这种魅力的女子，将来儿子还会听她的吗？“家里放着个小妖精从此不会安宁”；其三，她与我的身高比差太大，如果带我出场面，媳妇喧宾夺主抢了她的风头。

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传唤见过我的工作人员，训斥他们说：“叫你们去看张宁，是工作，不是玩！你们一个都没看出来吗？张宁是个近视眼！她对我们林家没有感情，目中无人！眼睛看人带勾，个子也太高，退回去吧！”

秘书们见她发无名火，语句尖刻挑剔，猜想一定是在哪方面冒犯了她，也有的认为她挑花了眼，反正挑上哪个都跟他们没关系，是退是要全凭她说。

叶群又去试探林立果：“你认为张宁怎么样？”

林立果玩心计，以前不热心，叶群就拼命加温，他以为用老办法能叫叶群入套，便不动声色地说：“无所谓，没兴趣。”

叶群马上接口道：“好。把她退回去。她长得是不错，但还不够全面，妈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林立果一急之下，跑去求助于林立衡。姐弟俩商量后，第二天就瞒着叶群到招待所见我，林立衡想见见弟弟中意的女子到底什么样，值不值得弟弟选择。

下午刚起床，服务员推门进来说有客人找，我正纳闷北京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我来京，门外走进两位青年男女空军，那个男的正是昨天下午来过的让我眼熟的人。女的文静清秀，个子不高很苗条，举止文雅，微笑地问我：“你是张宁同志吧？”

因几次来看我的人都不介绍自己身分，我也懒得问，都礼貌地请他们坐，谁叫我落到空军地盘上，人家来“客气”，我也客气识趣。

坐下后，男的和女的对望一眼，男的垂下头不吭气，女的问我：“来北京几天了？”

“三天。”

“来北京做什么？”

“来北京外调。到北京出差的人很多，住宿不好解决，请胡主任帮忙住到你们空军招待所，打搅了，谢谢你们。”我仍把他们当成空军接待人员。

俩人相视而笑，我不理解他们笑什么，以为自己说话有什么不妥，羞红了脸。

“你来过北京几次？”女的又问。

“好几次了，以前全军汇演、《东方红》大歌舞、出国准备工作都来过北京。”

“全军汇演和大歌舞你都参加了？跳什么舞？”

“汇演跳贝壳舞领舞，大歌舞里部队包的那几场都参加了，跳群舞。”

女的扭头对男的说：“那一年我不在北京，你看过汇演吗？”

男的低声答道：“都看了，就南京军区的那一场我有事没

看。”

“你还出国啦？到过哪些国家？”女的继续问。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苏联、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

“你去的国家不少啊，穿军装吗？”

“不穿，是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出访的。”

“你下过部队吗？”

“下过，部队文工团为部队服务，不演出的时候常下部队体验生活。”

“下过农村吗？”

“去过，前年到大别山搞过半年社教运动，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

“你做什么？那时你多大年纪？”

“负责青少年工作，给他们上政治课，补习文化。那时我十六岁。”

“哟，你那时才十六岁就管人家啦，工作难不难？”

“学呗。”我自感惭愧地笑起来。那男的默默地看着我，我更感到不自在。

“你出国的时候多大？”

“十五岁。”

“哦，十五岁就跑了那么多国家啦。”女空军笑着又问：

“你读过党史吗？”

“党史？没有系统读过，政治学习的时候知道点。”

“党的第一次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的知道吗？”女的又问。

“第一次会议呀……”我摸着辫子一时回答不出。不知怎地，脑中突然蹦出个“瓦窑堡”，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是瓦窑堡吧。”

“嘻嘻嘻……”女空军笑起来，连一直不开口的男空军也

“哈哈……”笑出声。

我心想一定说错了，连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哪开的这么件政治大事都不知道，让人笑话，我窘迫地涨红脸望着他俩。女空军缓和道：“你年纪还轻，多读些政治书籍。你经历见多识广是个优点。”

他俩在我房间坐了大约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我想问他们是谁，为什么找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女空军把我拦在门里不让送，客气道：“打搅你了，你休息吧。”

以后听王老太太说：“立果请他姐姐去看你，两人都觉得你对政治不感兴趣，要是弄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到身边来，他们是不喜欢的。立衡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立果找个热衷政治的人，叶群有政治野心，再弄个有野心的弟媳妇，林家就没有安静日子过。你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是本单位出了名的“不要求政治进步，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文革”开始后又被母亲藏匿家中不参与造反活动，秩序恢复正常以后，我由“逍遥派”变成党委培养的政治骨干，搞起内查外调工作。其实我的单纯思想根本跟不上当时的政治节拍，搞外调我“觉悟”也跟不上趟，有一次去上海查一位老演员少年时当童子军的历史，领导说童子军是三青团外围，三青团是国民党外围，叫我谈收获认识，我以此类推，说童子军是共产党的少先队员，小孩子的事不能算是历史问题。我是认真的，领导瞠目结舌，半天笑出声来，说我太幼稚，没有阶级警惕性。

林立衡和林立果离开以后，招待所里刮起一阵“大风”，众女服务员围住我问认不认识刚才来的两位客人，又有人猜我是张春桥的女儿，不然他们怎会来“看望我”，又怎会住主楼、吃小食堂。我虽否认，仍断不了她们的好奇心，我不禁也发起强烈好奇心，问她们那两位客人是谁。众服务员见我态度认真，反倒缄口，只有一个服务员答道：“他们一个叫李改，一个叫吕果。”

我从她们的神态以及问话猜想这两人身分不一般。想到这两天种种怪事，心中不免泛起一丝疑心与不解，问她们：“以前这里住过像我这样的人吗？”

“住过一个从成都来的，也很漂亮，住一段时间就走了。”

“他们也来看这个女孩吗？”

“那就知道了，但也有好多人来看望她。”

“是胡主任吗？”我问。

“哪个胡主任？我们不认识。”

我又对不上思路，也想不出所以然，便不再追问。

以后知道这个女孩姓王，她与几个被叶群看上的女孩都穿上了军装，以参军入伍的名义安排到部队作为候选对象加以控制。后来大批选送，新人来了旧人搁置一旁不管不问，秘书们说连叶群自己都搞不清备选了几个。直到事件以后，这些被控制的女孩才得到身心解放，获得自由。

林立衡、林立果身分揭秘

我接到团里来电话通知，要我第二天返宁执行别的任务，北京外调任务由其他同志来接替。当晚胡敏来车接我和老朱去她家吃饭。

胡敏的家在总后大院里的一座小院里，住家是平房，外表不起眼。客厅很小，餐厅也不大，除了一架黑白电视机和冰箱别无奢侈品，与后来修建扩大的规模相差很大。

胡敏请我们在客厅坐下，说道：“部长正好今天在家，我们吃个便饭。”

餐厅小圆桌上摆着几样精致家常小菜，一只高颈瓶红葡萄酒增添了一点家宴气氛。邱会作由警卫员陪同走进来，高个子，微显发胖，神态安详，鬓角已有几丝白发，客气地打手势请我们入

座，说道：“坐吧，家常便饭，随使用点。”

席面邱会作问我是兴国县哪个乡的人，得知我是樟木山乡，高兴地举杯道：“你是我和吴司令的同乡，来，小老表，喝点酒。”

“爸爸!妈妈!”话音未落门外奔进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一下扑到胡敏怀里，一双亮晶晶有神的眼睛盯着我，问胡敏：“这个姐姐是谁?”

胡敏介绍她：“这是我小女儿邱京京。”

又对京京说：“这个姐姐会跳舞，你叫她张宁姐姐吧。”

小京京大方地张口就喊姐姐，亲昵地挨着我坐下，就此粘上了，问长问短。

胡敏笑说：“我就这么个女儿，最小，宠坏了。就喜欢跳舞，看《红色娘子军》入了迷，成天吵着要去学跳舞。你看，我一说你会跳舞她就缠住你不放。”

小京京娇嗔地嚷嚷：“不要说嘛。妈妈，这个姐姐好漂亮，从哪来的?”

“从南京来。”

“不走了吧?”

“怎么，你想跟姐姐学跳舞?”胡敏爱抚地逗弄她。小京京又撒起娇来嚷嚷道：“不许你说!不许你说!”

我很喜欢小京京，大方纯真，没有一点高干小孩的傲气，与我未泯的童心一触即合，我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小手悄语道：

“你想学跳舞跟我回南京去，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胡敏乐道：“让她跟你去可要疯死了，谁也管不住她。”

小京京不服气地说：“我听话!”

“不行，你去了要影响姐姐工作。”

我真喜欢上了小京京，对胡敏说：“不要紧，她跟我住宿舍，基训的时候带在边上看课、练功都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回

来。”

小京京得意地望着胡敏，胡敏未料到我认真起来，笑说京京：“你还小，好好念书。吃饭不要胡闹。”

屋内暖气充足，又喝了点酒，我感到很热，当面脱衣服又不礼貌，小京京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见我流汗，悄声说：“姐姐，我带你脱衣服去。”拉住我就往外跑，胡敏正替邱会作和老朱布菜，扭头看一眼也没在意。

小京京领我进入一间卧室，说是她爸爸妈妈的房间。环视一圈，除了一张双人大床，一个衣架，一个床头柜和宽大的书桌，并无旁物，俭朴无华。脱下军装，除去贴身毛衫，穿好衣服正欲出门，一眼瞥见门旁桌台上放着林彪一家四口合影照片，近前细瞧，那两个青年男女空军正是来招待所见我的人，我疑惑地问小京京，那两人是谁，小京京快乐地答道：“这是我豆豆姐姐和老虎哥哥。”小京京的直白令我再无怀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小京京说豆豆叫立衡，老虎叫立果，我的心震惊得突突猛跳。

冷静后，感到自己乱闯撞开了人家不愿让我知道的秘密，心中忐忑不安，忙拉着小京京出门。

进入餐厅，胡敏问小京京：“你带姐姐到哪去了？”

京京天真烂漫地说：“我领姐姐到你房间脱衣服去了！”

胡敏迅即抬眼看我，正碰上我想回避的眼光。自此，我们双方都明白了那个已不存在的身分秘密。胡敏以后说过：“张宁很聪明，她始终不捅穿这个秘密。”我正是借此在以后的反抗中保护自己。

晚上回到招待所问老朱：“这几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看我？你认识吗？”老朱推说不认识。我告诉他有两个是林彪的儿女，老朱显得很惊讶，当得知我知晓的经过后，竟惊慌地叫我不要乱说，他也什么都没听到。那时的政治空气严酷压抑，上层人物家庭情况也属政治机密，不该知道的事让人知道，如果再加以议

论，不谨慎小心出差错，就是政治罪名。所以人们对上层种种不愿公开的秘密都小心回避，以免惹上政治麻烦。

一夜的失眠换来许多疑问迷惑。

第二天上午外出想买点北京特产回去赠送亲友，刚走到大栅栏，背后远远有人高喊：“张宁，请等一下。”扭头看，是位不认识的陆军军官（“林办”秘书老郭），在他后面缓缓行驶一辆黑色伏尔加。我停足望着他，心想这人怎么冒冒失失当街乱喊人，又是个不认识的，真莫名其妙！

那人气喘吁吁跑到面前说：“请你等一等，有人找你。”

我问谁找我，那人不回答，扭头往后看，我顺他视线望去，心下惊突一跳，见林立果正从车上下来，手扶着车门望着我，好像等待我答复，见我点头，大步向我走来。

当时我只觉得慌促不安，从不认识他，他干吗老来找我？要是一般男性，我会立即敏感他想追求我，我会立即还以“颜色”对付他。但他的身分不寻常，他父母头上的“光环”令我不敢把他的行为往歪处想，不但不敢，精神上还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

7
5

林立果陪伴我走出一段路，双方都默默无语。最后林立果开了口，问：“你今天下午要走？”

我点点头。

“这么快就走，不多住几天？”

我心想多住几天干什么？走与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心里这么想嘴上又懒得说，便不吭声。

“你以后再来北京，欢迎你来玩。”林立果说。

我心想，找你玩什么，我又不认识你，还是不作声。

林立果问：“你好像很忧郁，怎么了？”

我内心真有点生气，什么怎么了，你又不介绍自己，又叫我以后来玩，有这么交朋友的嘛，简直莫名其妙，又不出声。

林立果见我老是沉默不回答，犹豫一下，停足握住我手说

道：“你走，我就不送了。”

我点点头仍然无任何言语，林立果很难堪地道声“再见”，匆匆跑向车子走了。我望着车子开走，那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顿时消失了。

事后知道，林立果此次瞒着叶群，带上最心腹可靠的郭秘书来送行，意思是想与我建立联系。但他是个不擅言辞没有恋爱经验的人，他疏忽了一点，任何人都不会与一个身分不明的人交朋友，虽然我知道他身分，但在感情上对他根本“不来电”。

我回到南京，向政委做例行汇报，许多不理解的事请他做解释。他听说林彪儿女也来看我，吃惊不小，但他也估摸不透什么意思，嘱我不可“乱说”。我一贯不喜欢多事，见的大首长多了再见个林彪儿女也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团里的地位本来就特殊，犯不着说这些事再让大家议论我。这件事一直没向其他人提起，不久便淡忘了。

蟒与异梦

南京的春天很美，自然环境配上绿化建设，有“东方绿珠”之称。

紫金山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山脚下有梅花山，白、黄、粉、紫四色梅花盛开，兼有十几种其他花树，每逢春夏两季，紫金山脚就像笼罩着瑰丽的彩霞。

梅花山东方高坡上是我的母校“卫岗小学”，一九六四年解散，军区各机关抢要这座大院，许世友做了主：“司政后机关是打仗的，住这座‘大观园’不像样子。我看呀，给歌舞团吧，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司令员表态，军区直属三团一队：歌舞团、话剧团、歌剧团、军乐队全搬进了卫岗大院。

这下可便宜了我，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门口当兵”，骑自行车两分钟就到家。我把儿时与百姓家孩子玩时学到的气象预测经验告诉同事们：紫金山“戴帽子”就要下雨。当地农民把清晨云雾罩山头说成“戴帽子”，下午准下雨。紫金山上什么地方好玩，哪里蘑菇多，哪条山涧有鱼虾，我都告诉一些有小家庭的老演员，让他们得点不花钱的副食品。

已是五月初，大院里几处花圃盛开着玫瑰和月季。蜜蜂、蝴蝶和女演员们抢花，蜜蜂蝴蝶采花粉，我们忙着摘好花。每个女演员床头桌上都养着鲜花，一进屋香气扑鼻，那正是我们花一般的年龄，少女们的体香与鲜花香自然融合一起，是一种非常醉人的芳香。那个时代我们没有人为修饰，口红脂粉是舞台上用的，生活中不敢沾化妆品，那是“资产阶级奢侈品”，谁要是穿件花衬衣或质地好点的便衣，那就等着开会做检讨吧，挖“蜕化变质”苗头。所以，我们只能靠自身美和大自然美来享受人生乐趣。

这一段时间，我又发起无名高热，每天近四十度，医院各项化验检查都正常，吃药打针不降温。几天吃不下饭，只以少量水果维持，精神却非常好。

这个病不是第一次发作，说到起因，有段不可思议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初，我随军区“社教运动工作队”赴安徽大别山，演员们分散到村民家食宿，我与两位军医、护士住在半山腰一座农舍里。六月一天傍晚，我独自走山路，遇见一条黑色白鳞大蟒，头与尾隐在路两边深草中，茫茫暮色里，以为是根朽树拦路，及至跟前骇然看清是条巨蟒，吓得我想跑不敢跑，前是上坡，后是下坡，惊动了它，不论上跑下跑都跑不过它，如果是条恶蟒，后果不堪设想。急抬头四望，远处有农民蹲在屋檐下吃饭，忙向他们打手势，指着脚底下，可是低头一看，巨蟒已无影无踪，几秒钟竟悄无声息消失不见。我慌忙向坡上奔跑，迎面赶

来两个拿着斧头钉耙的农民，问怎么回事，我说被一条大蟒拦住路了，他们不相信地说：“我们这山里从来没见过蟒，毒蛇倒不少。”

遇蟒后不到两天，我突发高烧四十多度，吃不下任何东西，光吐，最后连胆汁也吐不出来了。附近的部队医疗设备检查不出发病原因，虽没有感冒和食物中毒现象，两个医生护士还是给我吃药打针，一个多星期过去，仍不见高烧减退，神志却非常清醒，她们俩很觉奇怪，对我说道：“你这是什么病，这么古怪。”

领导怕我发生意外，联系野战医院，备好车准备第二天一大早送我去急诊，因路远，车上还备了急救药品预防路上出事。

清晨，护士替我量体温，拔出口表一看，惊讶地喊道：“哎呀！你退烧了，完全正常，你这人生的什么怪病？”

房东老乡煮稀粥给我喝，说大病初愈的人不能吃硬饭。稀粥只喝了几口，也不觉得饿。

看看表，上午九点多钟，众人见我已好，都去参加劳动，留我一人在家。我拿起洗脸用具出屋向山里小溪走去，想好好清洗一下一个星期未洗的脏脸。

树上蝉鸣鸟叫，兰草花的幽香沁人肺腑，天气晴朗，山里的清新空气令人非常舒爽。蹲在小溪边仔仔细细地洗漱完毕，正想拿上东西起身，突见水里翻卷着大大小小无数条水蛇，小溪水清见底，鹅卵石粒粒清晰，怎么刚才洗脸时没见到这么多蛇？瞬间从哪冒出这许多蛇？我忙揉揉眼，从水里直插索到溪边草丛，草丛中也那么多蛇！脚边草丛里也是！吓得我失手丢下手中毛巾就跑。

跑出十几步，气虚目眩，双腿发软跌坐田坎上，心有余悸地四处张望，田地里也那么多蛇！一团团搅缠在一起，在我四周围成一个圈，我竟是跌坐在蛇阵里，吓得我惊喊不已，身子软得动

弹不得。

一个路过的农民闻声跑上前问我怎么回事，我指着地上大喊：“蛇！蛇！你看那么多蛇！”他四处望望说：“哪里有蛇！我怎么看不见？”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的神情不像是骗我，难道是我神志不清？看看天空，鸟儿在飞；望望树，风吹枝叶摇曳；鼻子闻到花香；耳里听到蝉鸣鸟叫；再看看四周地上，仍是那么多蛇！我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农民想帮忙扶我站起来，我摆摆手自己支撑着站起来，一步一回头地走回屋，见那农民还愣愣地看着我。我真纳闷：我们两个到底哪个不正常？直到现在，回忆见蛇一事仍那么清晰。

眼下这个无名高烧病症与山里发作的那一次一模一样，当年在山里医疗条件不好，现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内外科主治大夫也检查不出病因。医院正缺床位，见我神志无异状，就先开了一张住院通知单，在团里休息等候床位。

有一件怪事与当年发病前一样，又看见巨蟒，不过不是在现实，而是在梦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巨蟒非常大，能飞，不论我上天入地的奔逃，都摆脱不了它的卷缠，血盆大口尖牙利齿舌芯刮到脸上，非常恐怖，有时张嘴咬我，却一点不痛，也不见伤痕。我常在恐怖中惊醒。同宿舍女友问我：“你碰到什么事了？老做噩梦？”我觉得奇怪，大别山遇蟒一事早忘了，怎么这条蟒在我梦中出现？

在这些连续不断的噩梦中，有两次被巨蟒追到一个大湖边，遥望湖心烟波飘渺中有座小岛，意念里天涯海角只有这座小岛能救我，可是没有船只上去，眼见大蟒追上盘住我，恐怖无助中望着小岛嚎啕大哭，一直哭到醒。

林立果“偷”我第二次进京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卧病在床，陈副政委突然进门。我感到很意外，副政委一向不大到女演员宿舍，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望我。

他走到床边问：“你觉得好些吗？”

病了十多天，天天如此，没什么好与不好之分，我说：“高烧老是不退，等医院床位通知，住院再全面检查一下。”

副政委却说：“团里决定派你去执行任务，马上收拾一下走吧。”

我吃惊地看着他，心想他原来不是来关心探望我。瞧他那一脸冷漠，我心中委屈得真想哭，领导做事太不讲情理，便说道：

“我病成这样，怎么执行任务？”见他不回话，又怨道：“什么任务一定要我去执行？不去！你们换人吧。”

副政委这才说道：“我做不了主，你去跟政委说吧。”

“你替我向政委说说不行吗？”

“你的事还是自己向政委说吧，我做不了主。”副政委再次强调。

我觉得他有点反常，几句话都不肯带，还说是我自己的事，我执行任务是为公家办事，怎么是我自己的事？便再次问他：

“到哪执行任务？非要我去吗？”

副政委说：“我们不清楚，你见到政委就知道。”说罢出门。

我坐床上哭开了，心想全团那么多人为什么偏要我这个病人出差！

我的朋友小李买到一个新上市的西瓜推门进来，见我哭，惊问何事，知道情况后气愤大骂：“领导还把你当人吗？！病成这样

还逼你出差，讲不讲理！找领导评理去！”

一句话点醒我，忙爬下床穿衣服。多少天食欲不振，身子软得双腿直打颤，由小李扶着出了门。

团部的政委办公室空着，从另一房间里走出人保干事老罗，他告诉我是去北京执行任务，政委已先走，门口有车等着接我。

“我生病不能出差，你转告政委，我不去。”

我有气无力地说完，便想回宿舍。

“政委知道你生病。组织上决定的事情我做不了主。现在到哪去找政委？你还是先上车，见到政委再说。”老罗着急无奈地说。

小李冲着老罗发火：“政委躲着不见人，明知张宁病成这样，还要她出差，还把她当人待吗！”

老罗急忙解释：“你可别对着我来，我只是执行命令在这里等张宁。”

小李拉住我说：“不去！我们回去！”我晕晕乎乎地跟着小李往回走，老罗急得嚷嚷：“喂，喂，你不去也得当面向政委讲明啊……”

副政委走来，见状对我说：“我陪你去整理行装，有什么想法见到政委再说吧。”又命令小李：“你回去！”小李执拗着不肯，憋气又无奈地说：“我也去送她！”副政委严肃地望着他，小李觉得再坚持也达不到目地，气得只得掉头走了。

我默默地随副政委回宿舍拿了两件换洗衣服，一个牙具袋，往挎包里一塞，副政委问就带这么点东西？我望着他点点头，他已成了“双影”，我头晕极了，跟随他走到大院门外。

一辆黑色伏尔加停在路边，门打开，从里面走出胡敏的吴秘书，我懵懵地看着他，问：“你怎么来了？”我一时还不能清醒地想到我“执行任务”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吴秘书微笑地朝我点点头，并不回答我，伸手与副政委握手

客气道：“请回吧，我送她去。”

车子驶进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火车站。车子停在空司招待所门前，吴秘书领我走上二楼，在一间贵宾房里，胡敏正与我团政委聊天。我心中一惊：胡主任怎么也来了？政委怎么跟她在一起？我执行任务与胡敏有关？我的脑子真被高烧烧糊涂了，像一盆浆糊。

胡敏见我进门后一直木愣愣的，便立起身拉我坐她身旁问我：“听说你身体不大好？”我点点头。

政委笑呵呵地大声说：“这孩子，这么大了不懂礼貌，见了胡阿姨还不问个好。”

我低声问候：“胡主任好。”实在没有底气大声说话，胡敏笑嘻嘻端详我，说：“还好，气色不错，就是瘦了点。”

我问政委：“执行什么任务呀，非要我去？不好叫别人去吗？”

政委答非所问地道：“北京医疗条件不比南京差，你不用担心。”

胡敏关切地接口道：“到了北京先看病，工作的事先不谈。”转身叫住一个刚进屋的护士，让她领我到卧室里打一针丙种球蛋白，说：“先打一针增加抵抗力，到北京找好医生替你查一查。”

正说着，门外传来一阵哈哈笑声，听到吴秘书在门口迎着问候：“蒋主任来啦。”

进门的正是省革委会蒋副主任，胡敏起身向他介绍我，蒋副主任打断道：“不用介绍，我熟悉她，她那么小的时候（用手比划到腰际）我就见过，喊我叔叔呢。她爸爸妈妈我都熟悉，都是老同志。”

胡敏说：“小张对自己身体有顾虑，不想去。”

蒋副主任笑道：“怕什么？小张，你胡阿姨过去是医生，北

京条件比南京好，还怕治不好你的病？放心去。”

我被他们说得不去不行，一般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个人是改变不了的。我就这么突然走了，不知情的妈妈一定会着急，我便要求回家通知母亲。

政委说时间来不及了，由他去事后通知。政委夫妇与我母亲熟悉，我便不再坚持亲自回去见妈妈，蒋副主任也打保票说：

“我打电话告诉她。你怕你妈妈不放心呀？你妈妈是个爽快人，年轻的时候可有模样，你像你妈妈。”

胡敏感兴趣地问道：“你见过她妈妈年轻的时候？”

蒋副主任说：“我们很熟，山东人，大个子，年轻的时候可漂亮。”又问我：“你还记得不？”

在我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好看，我常趁妈妈不在家时，偷拿她的脂粉涂擦脸上，想跟妈妈一样好看。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妈妈的肤色是自然色，以为是那些摆样子的化妆品起的作用，所以我常常在化了妆后挨保姆的骂：“看你这个小脸，抹得像猴子屁股！”

胡敏抬腕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便起身向大家告别，带上我坐车向机场驶去。

那时南京只有东郊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停着等候我们。上机后，胡敏下令起飞。我出国访问演出坐过不少次飞机，坐专机是第一次。常听说许伯伯、田阿姨（许世友夫妇）坐专机上北京、上海等地开会，常识知道坐专机是为安全，其次以为很享受，此番自己坐上，滋味平平，比不上坐国际航班那么舒适享受。小飞机噪音挺大，头痛欲裂，到达北京，体温从原来的三十九度九上升到四十度二，胡敏立即送我住进解放军三〇一总医院。

以后我才知道，这次来京是林立果央求胡敏帮忙，瞒着叶群把我从南京“偷”到北京的。自从我回到南京以后，各地送来的姑娘都被林立果拒绝退掉，并计划瞒着叶群独自上南京找我。事

不缜密，被叶群知道，说林立果：“张宁这个人你动不得，她家与许世友有关系，她又是个出名的人，动了她，让田甫（许夫人）知道，田甫正愁抓不住你呢，你倒自己送上门去，当心许和尚把你扣在南京！”

许家有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当飞行员，与林立果熟悉，对林立果印象不错，人长大了很自然涉及婚恋问题，各人考虑的因素和择偶标准不同，产生一些误解不愉快，林立果就老躲着这位女公子。叶群抓住这件事把不了解情况的许世友夫妇抬出来阻吓林立果到南京去。

叶群一番话把林立果镇住了。但林立果仍不甘心，跑去求胡敏，他认为王政委和蒋副主任是胡敏的熟人、老部下，王政委又与我母亲熟悉，通过这条热线一定能做通我的工作达到他的目的。胡敏很同情他，觉得应该让孩子们自由恋爱，再挑选下去影响实在不好，但又顾虑叶群知道后一定会怪罪自己，怎么办？两难哪。

林立果出主意，请胡敏先把我偷偷调来，在总后范围内学习生活，给双方一段培养感情的空间，如果成功了，说起来还是胡敏老部下介绍的，避开讨人嫌的“选美”话题，名正言顺地算个自由恋爱。“选美”这件事在胡敏和林立果思想认识上都是块难以启齿心病。

林立果的一再恳求，胡敏的心软，我就这样被“偷”来北京。

可是事情很快泄漏出去，风声传到叶群耳里，胡敏不敢再隐瞒，据实相告，叶群大怒之下责骂林立果：“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妈吗？一个张宁就把你迷得忘了娘！你的翅膀硬啦，敢自己做主叫胡敏替你办事！不把我放眼里啦！”

林立果被责骂得羞愤不已，抬出林彪，说：“你不要对着我叫，有本事找首长去，是首长点头同意的。”

原来，林立果把我弄来北京后，心想叶群迟早会知道，这事是自己求胡敏的，不能让胡敏担责任为自己受过，便采取补救措施，向林彪吐露真情。林彪认为儿子选择到一个理想恋人是件好事，自由恋爱是儿女们自己的事，他却一点不知我第一次来的情况及整件事的背景，表态支持了儿子。

叶群被林立果一激，盛怒之下不及思索，跑去找林彪算帐。林彪正坐在客厅闭目养神，叶群冲进去指着林彪破口大骂：“你这个摘桃派！我辛辛苦苦一场全没捞个好，你倒取乖讨巧来现成的！”

林彪愣愣地睁开眼瞪着叶群，问：“你说什么？”他没听明白。

叶群见状以为林彪装糊涂，更控制不住地嚷嚷道：“你干的好事！还装不知道，你是个摘桃派！”

林彪此刻已清楚，喝问：“什么摘桃派？！”

“女人！摘女人的摘桃派！”叶群提高嗓门重复道。

林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叶群辱骂，怒火中烧，“啪”的一声，叶群脸上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叶群立时撒泼大哭，嘴里不停地骂：“你打我！为了一个女人打我！你欺负我。你这个摘桃派！我辛苦你来拣便宜……”

林彪气极大骂：“你无理取闹，你这个坏婆娘，我跟你离婚！”气得双手发抖，气喘吁吁。林立果未料到为了我，竟让父母闹到这一步，悄悄地走了。

叶群见林彪真动了气，自己这把嫉妒之火发错了对象，正哭哭泣泣不知如何收场下台阶，张秘书进门见状上前劝止。岂料叶群这个人见好不说好，事后反忌张秘书见了她的丑，不久便将张秘书调离“林办”。

事情既已公开摊牌，叶群知道不好再公开反对，否则林彪面前不好交代，又失去了儿子的心，转而指示胡敏把我留在医院做

全面检查，希望从中找出毛病，再作打算。叶群从丈夫和儿子那里受到的气，全集中到我身上，她说过“人长得太美不吉祥”，从此，她由嫌我转为嫉恨我。

检查身体

三〇一医院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与设备最齐全的陆军总医院。我住进内二科，为我主治的医生姓李，是内科技术水平很高的青年医生。

各项化验检查都很正常，查不出高烧病源。李医生与各科医生会诊，研究我家庭成员及本人病史，都健康。他们曾经收治好几个患无名高烧的病人，病程发展从高烧昏迷直到死亡，而我持续高烧却神志正常，内脏器官完好无损，李医生一时下不了诊断，坦诚地告诉我：“你这病我头一次见到。”李医生为查找病源，停了我近半个多月一直用着的退烧抗菌素药品，改用无副作用的中药，观察病情变化。经过大剂量服食中药，三天后，体温恢复正常。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病因，李医生很坦白地说：“我们没有找出病因，看来还是病毒感染。”这两次高烧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发过无名高烧，可是我的血型却由“O”型变成了“B”型，这是十年以后才发现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那两次高烧的原因还是因为林彪事件前后长达六年的精神折磨造成的。

身体恢复了健康，便想早日出院完成工作任务返回南京。岂料上面又下达体检命令，要求各科更详细地检查，院方不厌其烦地将我从头再来一遍。不服从命令不准出院，我心里挺纳闷，这不是无来由地折腾人嘛。

胸透时医生叫我脱掉毛衣，我不情愿地问医生：“过去胸透都不脱衣服，为什么这次要脱？”医生嘴里像含着一粒糖，含糊

应道：“脱掉衣服清楚点。”

脱掉毛衣，医生还叫脱，直脱到全身只剩下背心内裤，再不能脱了，心里又羞又气，苦着个脸。透视刚完，忙扯衣服要穿。灯亮了，医生制止我穿衣。围着我前后左右看，我盯牢他们，心里很紧张，戒防警惕着。

他们不但前后左右看，还上下瞧，我心想他们在我身上找什么？一名医生对另一位医生说：“皮肤光洁无斑痕”，说完又伸手在我大腿上探试一下：“皮肤弹性好。”另一名医生做着笔录。突然，医生做了个怪动作，抬起我胳膊低头看腋下，说“正常”，大概是看我有没有腋臭，这种距离，这种姿势，如果有腋臭是可以闻到的，还看什么，反把我吓一跳。

与众不同的检查方式，令我感觉到异常，又感受到一种羞辱，就像一个人体标本赤裸裸袒露在别人面前，什么了不起的任务需要如此“修理”我，心中不由得非常气恼，拒绝再检查下去。李医生很同情我，觉得各科不必要再重复检查，他也纳闷不理解，感到我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胡敏终于露面做我工作，说不检查完便不能出院执行任务，不完成任务就回不了南京。这一着很灵，我服从了。院方医护人员都猜测我是副总长家的亲戚，故如此关心。

各科检查都请了专家，妇科原想请知名专家林巧稚教授，又怕惊动面太大，请了本院的专家检查完毕，边做记录边对胡敏说：“都正常，生育没有问题。”什么生育？我还没结婚呢，她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与我执行任务风马牛不相及，怪怪的。我望着她们，不好意思地垂下头。

全面体检从头顶查到脚趾，无一漏处，除了左眼有点轻微的散光近视，叶群再挑不出任何毛病。我终于获准出院。

与林立果重逢

从医院出来令我深感意外地住进了胡敏家，整日好茶好饭地享用，就是没有人搭理我要求执行任务的请求。小京京与我作伴，可乐癫了她，常要我跳舞给她看，她成了我排除寂寞的唯一小观众，我成了她一个人的，不准任何人分享。

一天晚上，我和小京京随胡敏到总后礼堂看杂技团演出，进去时演出已经开始，中间座位留四个空位，胡敏叫我坐进去，我想让小京京在一起坐，胡敏已将她带到后面入座。当我回头张望她们时，发现林立衡和林立果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向我走来，我以为他们碰巧也来看演出。

林立衡与一位英俊挺拔的青年军官由王老太太陪同，走向前排落座，后来知道那位军官姓王，是叶群为林立衡指定的，据说叶群特别喜欢他，但他在下部队体验生活时感染上肝炎，落选退回去了。

正当我观望林立衡时，身旁空位上有人落座，侧脸一看，顿时紧张起来，林立果不但紧挨着我入座，手臂还有意与我胳膊紧挨一起，正歪着头含蓄地望着我微笑。

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就浑身不自在。那时的教育正儿八经，虽搞文艺工作，性格上并不活泼，有人评价我“光漂亮不风流”，更有许多异性觉得我身上一种缄静的气质不可冒犯。在我心目中，从一开始就把林立果当成一个神圣家庭里的一员，除了令人崇拜的光环以外，再没想到其他方面，男女嫁娶之事是民间俗事，他们只代表极权和政治。还有一个我当时并未意识到的潜意识，那就是他的形象并不足够吸引我，虽然他的相貌并不丑，身材也很魁梧，但以我训练有素的文艺眼光看上去，他离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还相差得远。所以，林立果对我的感情流

露，我一直搁浅不入“港”。

看演出时，眼角余光见林立果根本不看舞台上，一直侧脸望着我，回望他一眼，他的表情很温和，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却不回避灼人的目光。我俩都不说话，也不相互问好，他大概还认为自己的身分保密，而我因为他一直不主动介绍自己，让我感到他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犯不着我去问候他。

沉默了很久，他忍不住借题轻声说话了，问我：“你看字幕上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

字幕上正打出一行字：“请×××到后台找我”。

我瞄了一眼就念道：“请×××到后台找找。”没看清“我”字头上那一撇。

林立果笑道：“你戴上眼镜再看看。”

掏出眼镜戴上再看，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笑，忍不住也低头笑起来。他见我笑，高兴地说：“你戴眼镜也很好看。”一听到年轻异性赞美我的容貌，就会产生戒防心理，忙低下头。我这种心态并不正常，小时候常听大人的赞美，还不觉得怎样，长大以后，出街常被人围观，水果摊子被挤翻了没人去捡水果，男女老少的神情都一样；进饭馆吃饭，人们停筷不吃只顾看我；骑自行车的人看我不看路，撞跌成堆。上街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天稍凉点我就把口罩带上，为的是遮脸。星期天我总是往家里去，非上街不可就一定带上两个弟弟，他们成了我的小保镖。有人批评我太清高，见了面都不理睬人，我真冤枉，由于心理压力大，养成了低头走路习惯，人到面前自然看不见。我的家教很传统，除了恋友，异性的目光都被我认为是对我人格的亵渎。

幕间休息十五分钟，胡敏来请我们到休息室喝茶。林立衡与胡敏聊天，林立果坐我身旁目不斜视不再看我。我松了口气，抬起头来仰一仰酸了的脖子，见正前上方有大方镜，林立果和我都映在镜子里，林立果直视镜中的我，怪不得他不再扭头看我。发

现了他的秘密，我顾不得脖子酸，忙又垂下头。林立果动了动身子，显然是不好意思。林立衡笑着替弟弟解围：“胡主任，时候不早了，我们走了。”我随胡敏送他们到礼堂门口，看着他们上车离开。

看完演出，胡敏不提刚才的事；我也不问。胡敏以为我缄默有心计，其实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认为他们是来看演出的，巧遇而已。我团很多演员了解我的性格，待人接物单纯不存杂念，所以尽管有少数演员出于嫉妒想各种歪点子整我，却没有市场达不到目的，因为同辈和老辈的多数演员们都很关爱呵护我。

“首长俱乐部”

我来北京的事既已在林彪面前公开，叶群不好再阻拦不让林彪见，林彪也想看看老虎看中的对象到底是啥样，为什么叶群要极力反对。林彪开了口，叶群立即布置。

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胡敏进来推醒我，要带我和小京京上首长俱乐部去玩。我困劲正大不想去，胡敏说机会难得，勾起我好奇心。常听人说中共首长夜里工作，看看他们夜里怎样玩确实机会难得，我马上起身穿衣随她出门上车。胡敏交代说：“那里首长多，如果见到首长要有礼貌。”

长安街上夜深人静，我不熟悉北京的道路，坐车里打着瞌睡。车子进了一条小巷，两边青砖围墙很高，我心里奇怪北京城里怎么有监狱？南京城里的老虎桥监狱和娃娃桥监狱外形上都是这样的。车子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铁门启开走出两名武装战士，往车里面看看便挥手叫开进去。

院内一片黑暗，静悄悄的一点不热闹，我心想这哪像首长俱乐部。黑暗中匆匆走来一位中年军人，客气地问候胡敏并引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门，我猜想他一定是俱乐部主任或管理员之类的

身分。小院左边长廊里停着一排轿车，我心想首长来的还真不少。见胡敏谨慎小心的神态和小京京乖巧不嬉闹的样子，我想里面的首长一定够大的了，是哪几位呢？万一遇上了，我该怎么办？举目四望，按惯例司机和警卫员在这种场合下应该守在车子周围的，怎么连鬼影子也不见？都去玩了？大概吃夜宵去了。我独自乱猜着随他们走近一座大平房。门里迎出一个瘦高个子中年军人，向胡敏点点头：“你们来啦，请先坐坐休息一下，我去通报。”又对领我们来的中年军人说：“这里没你的事了。”那人立即返身消失在黑暗中。

进门是间小客厅，很小，红沙发红地毯，看不见门，通向里面的空间挂着一条落地红丝绒帷幔。两名青年军人送茶水进来，放下茶杯就退出去，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谁也不说话。

隔不一会儿，瘦军人出来请我们进去。里面是一条灯光幽暗铺着红地毯的长廊，两边的几个门都关着，听不见里面有什么动静。转一个弯走进一间大客厅。陈设都是绿色的，中间放一张乒乓球桌。瘦军人引我们入座，又有军人端上茶水，胡敏示意我喝茶。她从进了这个院子就变了个人似的，神情肃穆，哪像来玩的样子。我望着乒乓球桌，很想叫小京京跟我一起打球，但看小京京那神色，胡敏不发话她是不敢动的。

瘦军人又走进来附在胡敏耳边嘀咕了几句，胡敏笑着叫我和小京京：“你们可以打球玩玩。”小京京高兴地蹦起来，跑向桌边抓起球拍叫道：“姐姐快来！我给你几个抽球，你接得住吗？”我起身应道：“不定谁抽谁呢，让你几球。”走向桌边抓住球拍占了门口的位置。到北京半个多月了，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准往外写信、走访亲友，简直把我闷得够呛，此番左右开弓真玩得痛快。在团里每天晚饭后都去抢球桌，那时的娱乐活动极有限，除了八个样板戏什么也没有，一个球桌便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消遣的寄托，排着队打球等得挺着急，这下可好，可以畅快地打了。

正玩得高兴，瘦军人又从外面进来向胡敏耳语，胡敏说我：“看你热的，把军装脱了。”我脱掉军装，里面是件黑色紧身衫，继续打球。京京抽脱一球往我身后门外滚去，我立即返身捡球，见门外黑影里站着两个人，前面一人的轮廓好像林彪，我以为他正好经过这里，他不主动露面，我也不便上前惊动他，便装作没看见，捡起球跑回桌旁。

瘦军人又进来向胡敏耳语，胡敏叫我跟小京京换个位子，我心想又没人排队打比分，换什么位子，但小京京已跑向我，我也就换到她的位置，面向门口继续打起来。

瘦军人又进来与胡敏说话，胡敏便叫我们过来休息喝茶。我心想，真没意思，这瘦军人老进来干什么，胡敏怎么老听他的，这首长俱乐部的规矩也真大，早知这样不来玩了。

我挨着胡敏坐下，拿起小毛巾擦汗，一名军人送进来两大盒贝壳做的毛泽东纪念章。当时社会上盛行收集毛泽东纪念章，式样品种繁多，后来越做越大跟个大海碗似的，胸前不能挂，摆到桌子上钉在墙上看。贝壳做的纪念章头一次看到，真想胡敏开口要几个来送我。胡敏介绍说：“这些贝壳像章是海岛上战士们送来的，做一个磨半天，很费功夫，听她口气没指望，便逐一欣赏起来。

正看着，一名军人双手执着一盏台灯走近我身旁为我照亮，我抬头看他一副尴尬样子，心里挺过意不去，大厅灯挺亮的还要人当台灯架子，这份“礼遇”我很不习惯。还未等我全看完，瘦军人又进来对胡敏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胡敏即刻起身叫我和小京京穿好衣服出门回家，我真奇怪，这算玩啊？早知俱乐部这个样，不如在家睡觉。

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首长俱乐部”就是毛家湾，领我们进小院的是外勤警卫处长老刘，瘦军人就是内勤警卫处长兼林彪贴身警卫老李。

当天夜里我走进大厅以后，几扇窗户外面站满了林家和“林办”的人，叶群个头矮，踮着脚很吃力，命人搬来一张小凳垫在脚下，聚精会神之中忘了脚下是只凳子，移脚踏空从凳上摔下，幸有工作人员扶住才没跌地上，忙乱中发出一阵响动，叶群怕我听见急制止人们出声，又嫌灯光不够亮，命李秘书充当“灯柱”。林彪一直隐在门口黑影里。以往林彪和叶群曾公开见过几个女孩子，此次看我搞得这样神秘，是因为叶群顾虑我与许世友家的关系，担心我知情后惹出节外生枝的事，所以对待我不同于其他女孩，安排上格外小心。

林彪看过后连说：“不错、不错、很好。”他一表态，我便成了林家内定的对象。

抗 命

胡敏老是不提执行任务的事，对我的催促也尽量回避，我莫名其妙地住在邱家，心里越来越不安。一天夜里，走廊上传来脚步声，那是邱会作的警卫参谋江水，他随邱会作的作息时间，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平时很少看到他们，今夜回来得早些，老在我门口走动，好像有什么事。随着日子延长我心中疑问越来越大，邱家工作人员都回避我，今夜江水出现反常，我忍不住穿衣起床开门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他停步望向我踌躇不前，我更确信他有话想对我说，便请他进屋来。他走进屋审视我好一会儿，我很焦急，因为深夜一个男性进屋，被人撞见说不清楚，催他有话快说。

他问我：“你好像不大愉快。”

我不置一辞，心想我愉不愉快干你什么事。

他问：“你知道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吗？”

我摇头问道：“你能告诉我吗？”

他没头没脑地说：“老虎会吃人的。”

我大吃一惊，“老虎”是林立果乳名，我早知道。他指的“老虎”显然是指林立果。刹时间，前前后后的一切“谜”全部明白了，原来林立果正打我的主意。

心里震动，又感到江水动机不可捉摸，便问他：“你要为什么要告诉我？”

江水说：“过去邱家也住过几个女孩子，但她们不像你，她们很高兴，我看你不太愉快。你要是不想住下去，得赶快想办法离开。千万不可让胡主任知道是我告诉你的。”说罢匆匆离去。

这一夜我失眠了，想了很多。当时中国很多女孩(包括我)如果能与林家结为亲家，那是很荣耀光彩的美事，不只是地位上的一步登天，政治上的荣誉才是头等大事，谁不羡慕？

震惊与激动过去后，考虑到许多细节问题：中央首长都有女儿，林立果为什么不求门当户对的姻缘？空军招待所服务员说的“小王”姑娘和江水说的几个女孩都是什么人？自己两次被莫名其妙地弄来北京，从不明确向我介绍林立果身分，也不向我明确表示什么，却像软禁一样对待我。回想照片被政委借口要去，未婚女演员座谈会，几位夫人相面，许多不明身分的男军人到招待所看我，以及此次高烧下非我不可的“借调”任务，令人感到羞辱的体检，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被耍弄欺骗的滋味。

明白了林立果的意图，这等婚姻大事他不但隐瞒我不尊重我的选择意识，更不提我的父母家长，两家地位悬殊更令我敏感到不平等。林立果毫不掩饰夸我好看，那几个女孩也绝不会是平庸之貌，以美色选择妻子？思路顿时清楚了，所有的疑问困惑迎刃而解。

心凉了，眼前浮现小时候常见一些阿姨在妈妈面前哭诉丈夫薄情遗弃她们另寻新欢的情景，妈妈曾说过：“一些人进城当了大官，就嫌自己老婆土里土气，离了再找小的，没良心。”又

说：“宁愿要个讨饭的娘，不要当官的爹。”更清楚记得有一次一位叔叔被爸爸叫到家里来，听到爸爸在屋子里骂他：“你要是敢离婚，甩下一窝老少不管，我毙了你！”

我也清楚地记得那些被抛弃的曾是官太太或夫人身分的阿姨，地位一落千丈，失去儿女、家庭后的那种能致人死命的精神沮丧。曾有一位元帅夫人遭遗弃受到形同软禁般的待遇，我们聊了几句，她是江南人，小巧玲珑五官显出她年轻时的美丽，老来却如此凄凉，连常人也不如。

想到这一切，深深叹口气，自古以来红颜薄命，不就是“好花能有几日红”嘛，现在凭借美貌讨得林立果欢心，虚荣能有几年？人老珠黄被遗弃时，遭人耻笑还在其次，嫁给这种地位的人，一日失宠，连自由和生命都保不住，我深知自己性格，将来准是一场悲剧。

思路越来越明确坚定：我家庭出身好，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低；专业条件好，今后凭自己力量立足社会的资本也不薄，总较那没有基础的依附权势自寻烦恼的生活为好。

下一步该怎么办、林家可是统治中华大地的第二号家族，得罪了他家，灭顶之灾是逃不掉的，我一家老小还得在这土地上生存。既要脱身又不落罪名，办法不太好想。

有了！借着他们不愿暴露身分这一点，我正好装糊涂到底，回旋余地可能会大点。策略想定了，办法呢？想起胡敏三番五次劝我多吃养胖些，可能林家嫌我瘦，干脆闹绝食吧。

第二天开始，每餐只两口，好菜根本不动筷子，一连几天，胡敏急了，说：“你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我笑嘻嘻地说：“我一直吃素，向来不多食，吃不下没办法呀。”

胡敏是聪明人，几次“递话”暗示我，我都打岔或不搭理，她很快就明白了。可是林立果要我的决心不变，林彪和叶群为我

又撕破脸吵架，不容易统一了，林彪又看过点了头，现在闹出我不情愿，她不好向林家交代啊！

在处理我的问题上，胡敏动了恻隐之心，她从各种利害因素考虑，没有把我暴露在肉砧上，而是从各方面设法替我圆场解围，慢慢做思想工作，从她主观愿望上讲，她一点不想强逼我。她几次说过：“你想回去？唉，我做不了主呀，先安心住下吧。”“你要回去的要求，我和你邱伯伯都决定不了，我给你请示上面吧。”

对于我催请执行任务或要求回南京，上面迟迟不做答复，胡敏唉声叹气，没法向我做解释工作，邱会作看在眼里，忍不住开口说话了：“你要好好地吃饭，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知是胡敏做林立果的工作还是林立果自己想通了，事情有一点转机。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家不敢向我挑明这层关系是忌惮许世友，他们怕我不情愿，跑去向许世友诉说，一旦许世友袒护我，林立果的希望就泡汤了。许世友拥重兵驻守东南，叶群为拉拢他的势力不肯轻易得罪他。我单纯的思想恰恰没想到这一点，认为谁也不敢反抗林彪，这当然是事实，但婚姻是软杠子的事，摆不上桌面、拎不上纲，做工作的余地很大，我偏偏没想到去求助自己的保护神。

一天晚饭后，林立果突然来了，他想亲眼见见我的情绪是否真像胡敏说的那样。他和我玩牌，为这场牌局吴秘书凑了不少趣，因为我一见林立果进客厅就想往卧室退避，胡敏拉住我叫我陪林立果坐着聊聊天，我说头痛想休息，吴秘书赶紧从桌上拿起扑克牌，先就摆好位置，催请大家入座。林立果很主动地拿起牌，一边出牌一边观察我脸色，说我脸色苍白得很，是不是不舒服。我顺着他的话再次说自己头痛想休息，林立果听后不作声继续出牌。谁也不说话，无情无绪。林立果终于忍不住了，将手中

牌向桌子上一丢站起身望住我。他盯视我，面无表情。我低头垂目不再看他。他转身往门外走去。胡敏和吴秘书送他到车旁，林立果声调干巴巴地对胡敏说：“哦，别送了。按原计划执行吧。”

我心悸地想他会想什么坏点子整我？愣站在客厅里望着进门的胡敏，她脸上表情很温和并没有怪罪或指责的意思，说道：“你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透着一种无奈和遗憾。

“执行任务”充当样板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胡敏办公室去，她的情绪比昨晚好多了，笑呵呵地，又恢复到第一次见到她的模样。她向我布置任务：“我们总后勤部要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期间所有文艺单位都赶政治时髦，改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借你来北京执行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挑选演员。前些时候你身体不好没跟你说，现在身体好啦，就开始工作吧。”

我听她这么一说，顿时高兴起来，心里想：“错怪她了，自己疑心到哪去了，幸亏没任性讲出口，真羞死人！”不由地脸上发烧。为掩饰窘状，我说：“胡阿姨，你怎么不早说？我能完成任务，保证为你们宣传队招收好演员。”

胡敏笑说：“看你高兴的，真是个孩子。”正说着，门外走进一个瘦小的女军人，恭敬地看着胡敏，随即眼光停留在我脸上，语露惊讶地“哇”了一声道：“好白啊！跟象牙似的。”

胡敏笑道：“第一次看见吧？你刚从外边进屋，大概是屋内光线暗了点，显得脸色白了点，去阳光下看看，粉白着呢。”

胡敏向我介绍这位女军人是总后门诊部护士小梁，湖南人，告诉我：“你们俩一同出差，小梁是护士，路上有个照顾。”

小梁笑嘻嘻地看着我，向胡敏说：“主任放心，我一定照顾

好小张。”

胡敏说：“你们俩相互照顾。吴秘书同你们一起出发，工作上听他安排，明天就出发吧。”又强调道：“你们出差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到了外地，人家会认为你们是中央下来的人，地方的事少过问，执行自己的任务，少管闲事。”

我脑子里转了一下，不是总后的工作吗？怎么成了军委？既而又自解：邱部长是副总长、军委成员，说军委也没错。

第一站到达山西太原市，住进驻军招待所。当晚召开军部会议，吴秘书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听内容与胡敏交代我的任务毫不相干：“我们来太原市是执行政治任务，为国家挑选机要工作人员，条件是男女青年，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形象出众。执行任务中要注意保密。你们在本地军管，还望各位首长大力协助。”

吴秘书问我：“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你讲讲吧。”

我正纳闷他把任务内容说错了，听他招呼我，真想问问清楚怎么回事，又觉得当着那么多军、师级首长的面与他争执太伤“军委”的面，就这么三个人，任务内容还搞不清楚，真让人笑话，我朝吴秘书摇头，将疑问闷在心里。

一位首长发言：“你们早先不是来看过吗？全市的工厂、学校、机关和文艺单位都看过了，没挑走一个，这次再看，恐怕也不行。上次你们走后，惊动面很大，来问消息的人不少，以为是招兵的，很多人想当兵，你们走后又没有个答复和说法，我们很难做思想工作。”

吴秘书支吾着装糊涂：“上次？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另外的任务。”他见许多首长流露出一不以为然的表情，忙又改变口气说：“我们这次来多有麻烦各位首长，时间紧，帮忙安排看一看，学校和文艺单位作为重点，最多一星期我们就走，拜托各位了。”

吴秘书的口气简直就是求人，众位首长沉默不语，主持会议的龙军长代表大家表态：“既然是军委布置的任务，我们执行吧，散会！”

我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辱，原以为担着军委的名义很光荣，人家却不放在眼里，吴秘书是为组织工作，为什么要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前一次来太原市的是胡敏和警卫参谋长江水等人，副总长夫人亲自到太原市选人，惊动面确实不小，可是光响雷不下雨，事后不了了之没有给效力的官员一点交代，大家很有意见。所以这一次听说又是选人，众人都反感。

散会后我认真提醒吴秘书：“吴主任交代我选演员，你怎么说机要员？讲错了。”

吴秘书打着哈哈说：“你的任务是选演员，我的任务是选机要员，一同出差有个照顾嘛。”我信以为真。

几天里看遍太原市十几个单位，恐怕是水土关系，这里的人都比较黄黑，形象上过不了关，好不容易看中两个腰腿不错的女学生，化了妆可以弥补容貌上的不足，我想把她们定下来，吴秘书直摇头说：“差远了，是你看人家还是人家看你。”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话意，但听出他讥讽我，人家围看我并不影响我执行任务呀，我不高兴地说：“政治上你把关，专业条件我把关，我看不错，你看不行，那你去挑吧！”

吴秘书见我不理会他的话意，好像生了气，圆场道：“好，好，下一站到西安，由你挑。”

我埋怨道：“你也太不尊重人，辛辛苦苦选中的人，你摇下头就算了，再这样我不干了。”

小梁一旁捂嘴笑，她一路上从不多话，待人接物很友善，她不做事不发表意见，整天随我进进出出，我竟没看出她是专职照顾我的人。我的观察力差是因为思想太单纯，但是小梁确实是一个非常老实安静的人。

吃罢晚饭，我出去散步，在招待所小树林中遇上吴秘书。他与我闲聊，自认识他以来，这是第一次与他聊天。在他引导下我们谈起历史，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阅读中得来，比较肤浅，而吴秘书所谈，恰是历史各朝帝王后妃轶事中人物，“楚王爱蜂腰的故事你知道不？”

“知道，楚王爱蜂腰，后宫多饿死。”

吴秘书笑道：“你还会文绉几句。历史上美女都苗条，赵飞燕、西施、大乔小乔、阴丽华、张贵妃，就杨贵妃肥了点……”

我停足望着他，心想他好像专门研究过历史美人。他是个男人，论及此道我非常敏感不舒服，便借口天凉回屋去。

小梁不在屋里。闲着没事便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阅读起来，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什么好书看。过了好一阵仍不见小梁回来，决定去吴秘书房里去看看，一般情况下她不会去其他地方。

吴秘书住我楼上。上了楼，见他房门虚掩着，传来他俩说话声，我穿着布鞋，走路轻巧没声音，走近门口正想推门，听得吴秘书说：“唉，没一个像张宁的。”小梁笑答：“像她那样的上哪去找？”几秒钟之间的对话恰巧被我听见，伸出去准备推门的手缩了回来。急急下楼，心里疑问重重，为什么拿我做样子？干革命工作一定要形象条件好？是选机要员和演员吗？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后来听说见过我的驻军首长们曾私下议论：“军委来的那个姑娘，像她那样的标准太原市找不到，自己已经有了还来挑什么。”

总算离开了太原市到了西安市，住进总后西安办事处招待所，办事处白主任当时因病住在北京三〇一总医院，他的赵秘书负责接待我们。不知为什么，赵秘书初见我便留下好印象。我是第一次到西安，向往已久的历史名城终于置身其中，有一种冲

动，很想到处去看看。吴秘书不发话，我一人人生地不熟很难走动，赵秘书便带我去看附近的大雁塔。我们边走边聊。赵秘书一扫在吴秘书面前的谨慎寡言，有问必答，我把心中的疑问向他请教：“吴秘书来过这里吗？”

“来过，他和胡主任都来过。”

“他们来干什么？”

“跟这次一样，选人。”

“选什么人？”

“选像你这样的人。”

“选多少？”

“只选一个。”

“选一个干什么？”

“不清楚。”

“那你没听白主任说什么吗？”

“他身体不好，也不爱管这种事。”

“什么事？”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我望住他看了一会儿，笑了，问他：“那你是什么态度？”

“我？我的态度算什么，他来我接待，他走我送。我看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心里应该有数，旁人多说无益。”

仅此一段话，我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上层圈子里还是有不阿谀奉承心存正义的人，这对我精神上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力量。

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确定了林立果是以选美形式为自己物色恋人，心中产生极大反感，中国这么大，美女多的是，越发觉得自己不能跟他沾边，得想办法赶快摆脱他。明抗，政治罪名我承受不了，还可能株连整个家庭，今后的路是一条钢丝路，前途吉凶未卜，心里极度忐忑不安，“任务”显然是假的，利用我当模特儿，陷我于不义之举，不知不觉中参与了选美活动。去坑

害别的无辜姑娘我不会干，虽然政治观念上我不可能跳出当时的桎梏，但在良心知觉上我不能再干害人害己的事。

我开始消极抵抗，一再以出差时间太长影响团里工作为由向吴秘书提出要回南京。

当时我还太幼稚，组织出面的事向来是上下左右串通好了的，就像一张捕鸟的网，疏而不漏，岂是我想当然编造的借口可以混得过去的。

吴秘书对我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批评我：“你急着回南京干什么，歌舞团缺你就不行啦？看，刚出来就想回去，你对执行任务是什么态度！还早嘛，这才到西安，还要到新疆、成都等地去，不要不安心嘛。我们可是为军委出任务，你在南京的事比这个还重要吗？”说罢露出不友善的笑容。

我看出他的笑是为了掩饰他的话锋，其实他内心对我的表现已很不耐烦，人各有志，矛盾既产生又要掩饰，当然令双方都不会愉快。但“戏”还得唱下去，吴秘书担此任不得不强按下火气，耐着性子“侍候”着我。

我非常烦躁，知道朝他发火没有用，因为他根本决定不了行程安排。我情绪反常日趋严重，吴秘书的情绪也随着我变得焦虑不安。到后来反正对我没什么秘密可言，干脆拉上我和小梁上街“逛市”去，因为几天下来在西安市正规安排的单位没选上一个，便想出走街串巷寻找“街头美女”，指望撞上一个美人儿好顶替我回北京交差。整整两天在街上转，瞄见好一点的就跟在后面追，堵住人家借口问路或直接打听人家是哪个单位的，乘机详观对方五官，皮肤长得如何。被追逐的女孩要不是看他是个“敬爱的解放军同志”，后面还跟着两个女军人，准得大喊“抓流氓”！那模样举止真是俗不可耐。有一次盯上个女的，吴秘书大喊我们快跟上，及至眼前，吴秘书已问完放人走了。我笑他：

“这女的不错，你怎么放她走了？”他听出我讥笑他，翻翻白眼

嘟囔道：“结过婚的女人，还是个回子。”我和小梁走街串巷观赏市容，倒是另有一番乐趣，吴秘书对我们无可奈何，好在有一点被他所用，我们是女的，对他跟踪女人起了一层保护色作用。

落魄街头后几天，有天晚上吴秘书踱进我们房间聊天，问小梁：“你多大啦？”

小梁笑道：“二十八岁，你问我多大干什么？”

吴秘书笑道：“关心你嘛。替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

小梁顿时通红了脸说：“别拿我开心，组织上怎么会关心到我，给小张找一个还差不多。”

吴秘书转向我：“小张，给你介绍一个要不要？”

我立即敏感到他的意思，生硬地拒绝：“不要！”

吴秘书笑嘻嘻地说：“别耍小孩子脾气嘛，组织上给你介绍一个政治条件好的也不要？”

我乘机发泄不满和看法：“政治条件再好也不要！自己长得不好看还到处去挑人家！”

吴秘书的笑容刹时僵住，顿时变了脸，冲着我冷冷地吭一声，斜着眼看我。我从小到大一贯受娇宠，从没见人敢如此公开对我无理，不由地怒火冲头，回眼瞪视他说：“你告诉胡主任，我要回南京，不干了！”

吴秘书缓下拉长的脸，悻悻地没好气地说：“想回去？不行！”

既已公开闹了，我索性强硬到底：“不让回去我自己买车票走，不要你们送！”

吴秘书干笑两声：“你到哪买票？不经过我们同意，你能够回得去吗？”

“我自己买票自己回去，不要谁同意。”气愤之下我一时忘了没有组织发的军人通行证和介绍信，个人是买不到票的。

“你还有组织纪律性没有？！还是个当兵的呢！简直无法无天

了。”吴秘书恨声道。

“怎样啦，当兵的又怎么样，不放我就自己走。”

“你敢跑，你跑试试看，用绳子把你捆起来！”吴秘书恼怒地狠声说道。我立即意识到他是暗示我若反抗，就逮捕我。

我激怒地大声嚷道：“你敢！你马上打电话回北京告诉胡主任我不干了，明天就走。你打不打？！我真走，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见我真发脾气，吴秘书一时无语。小梁忙劝道：“不要生气，吴秘书跟我们开玩笑，不要当真，他不也说给我介绍对象嘛。好了好了，这样多不好看。”

我余怒未息地冲撞小梁：“你知道什么！他哪是开玩笑！我可不不管，反正我要回去。”

吴秘书冷着脸往外走，我追上一句：“你去给我挂电话，你不好讲我讲。”

吴秘书烦躁地应道：“我一定替你挂电话，好了吧。”当夜，吴秘书一直守在电话总机室，一直等到北京有了明确答复。第二天我们就起程回北京。

一听说回北京，我心里就紧张，担心回到北京又被扣下，要求从西安直接回南京。吴秘书说西安南京不通车，必须从北京转道。临上车前数小时，吴秘书接临潼县消息，单独驱车赶到临潼接回一个姓冉的十七岁姑娘，身材苗条，眉清目秀。吴秘书把她领到我面前，面带得意之色问道：“你看她长得怎么样？”

我看着她，见她也正张目望向我，我心想这女孩是漂亮，可她就是不知道去北京干什么。唉，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今后不再找我麻烦，你林立果找什么样的美人儿也与我无关。嘴上向吴秘书漫应道：“不错，很漂亮。”

吴秘书见我无所谓的样子，很不是滋味地吭吭两声不再说话。火车上，吴秘书一心照顾冉姑娘，把我晾一边。我心里更加

明白他们曾经对我的关切只不过是看着林家来的，对我并没有真情谊，新与旧的反差那么大，真庆幸自己没有被一时的“幸运”迷昏了头，断然中止婚恋歧途，心情反而轻松，觉得有人替我，可以摆脱压力从此自由了。

回到北京，胡敏不露面。在胡敏家住一夜，谁也没见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在滂沱大雨中乘车到达火车站。上了火车查对卧铺票，是一张最便宜的上铺票，爬上去头都抬不起来，心里反而乐开了，来时专机，去时连个中下铺都舍不得花钱，这么势利眼，早知如此我自己掏钱也买得起坐卧自由的下铺票，让我这个大高个睡上铺，不明摆着捉弄人嘛。

在北京被“关”了一个多月，真感到自己像一只出笼的鸟，一心巴望着快些飞回南方。望着窗外快速倒退的北方田野，心里好畅快，就要看见南方的田野了，就快到家了，一切将成为过去。

团里正盛传小道消息，说我“上了天”，有些人不服气，向领导提意见：“张宁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凭哪一条选送她到中央工作，这是领导不突出政治的错误。”

我一回到团里，好朋友们就向我说团里的种种议论，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过去各方面条件好，得“红眼病”的人看着无奈；“文革”了，是突出政治和“吃政治饭”的人的天下，我仍然地位超然，令一些妒嫉心强的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若让这类人知道实情，准会嫉妒疯掉了。不过有这种心理的人只是少数人，可惜容貌不争气，否则好戏让她们去唱，那可热闹了。

这类议论算不得什么，令我头痛伤脑筋的是如何向领导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凡是出任务的人回到本单位都必须向上级汇报工作。说实话明摆着挨批，盘算后，打定主意向领导撒谎，这又是我犯幼稚病。

第二天走进团部，笑嘻嘻地向政委说：“政委，我回来了。

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想一句话笼而统之地带过去，我没办法汇报具体的细节。

政委严肃地望着我反问道：“很好？胡主任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我很自信干脆地回答。

突然政委大声地训斥道：“没有？还跟我撒谎！北京来电话啦，批评我们没有教育好你。你任性胡闹，北京方面意见很大，说你执行任务态度不严肃认真，思想觉悟不高。”

我吃惊得很，告状比火车轮子还快，我又不影响你们的好事，干吗放我走了还要背后捅我一家伙，让单位来整我，好狠啊！我马上意识到是不是吴秘书嫌我对他不恭，背后放我的坏水，便问政委：“谁打电话给你的？”

政委气恼道：“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分寸，谁打电话都不是你该问的，人家说的是实际情况吧？”

我很不服气，正想分辩，政委急忙制止说：“我不要听，不该我知道的你不要跟我讲，北京来电话说你执行的任务是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蒋司令来了，有什么话你跟他讲吧。”

一听蒋司令来了，我心里有点慌乱，县官不如现管，他是我爸爸老熟人，算前辈了，要放别的事上我不怕他，但这件事无论于公于私，从精神上他就压我一筹，得准备着挨他剋。

硬着头皮走进另一房间，进门先喊一声蒋叔叔，心想凭着一声叔叔的亲热劲，他会客气些。

他转过头来望住我，铁板着一张黑脸，他肤色很黑，身材魁梧，不用化妆就很像包龙图。他说：“别喊我叔叔，你以为喊我叔叔就算没事啦？你这孩子真不听话，任性！到中央去还任性！也不看个地方不分个对象！你知道你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呀？要态度，向谁要？！你见到谁啦？心里明白吧？你是个聪明人，怎地不知好歹？别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事你却不愿意。知道不，傻丫头，选你去，不但是南京军区的光荣，也是全江苏省的光荣，你真糊涂

啊!”

他一顿剋把我剋懵了，有这么严重？见到谁了我当然明白，不就是邱副总长和胡敏吗？但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嘛，什么国家机密，不就是为林立果选恋人呗，情急之下，我直捅出内情。蒋司令听着一下变了脸，忙制止我往下说，不相信地摇头说：“他们明确跟你说了吗？你怎么敢肯定就是林立果？”

我说：“我见到林副主席一家的照片。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来，我自己看出来的。为了一个林立果，到处选人就是不好嘛。”

“胡说！你怎么可以瞎猜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你不想想刚才说的那些话的分量，凭哪一句都够得上反革命罪。你可不要犯糊涂，你说的事都不像你自己想的那样，我是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你听明白没有？”

我睁大眼望着他，他原来也这么怕事，心里嘀咕：“事实就是这样嘛，谁敢造谣，你不信就算了，我还懒得说呢。”

蒋司令倒背着双手皱起眉头在屋子里踱步，心神不宁的样子。我一旁站着看他，他不说话，我也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停足望着我，想说什么又自己摇摇头，又踱了一会儿终于开口对我说：“你回来就算了，上面来电话要我好好批评教育你，还要给你处分，我看算了。今后对谁也不要谈执行任务的事，明白不？上面要求保密，你泄露了就是泄露国家机密，上面不会原谅你叔叔，也不会迁就你，会严肃处理你，到那时，唉，我们想保你也保不了啦。我再交代团领导，不许他们问你上北京的情况。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能乱说，对妈妈也不要讲。回去吧。”

我牢记蒋司令的话，不但没有对任何人说及此事，对妈妈也守口如瓶，生怕她与亲朋好友聊天聊出这件事惹政治麻烦。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被关进中央专案组，从秘书们的揭发中才知道这次所谓的执行任务是鉴于我流露出反抗情绪，

林立果特意安排我参加选美任务，一方面想在行动中摸清我的真实态度，另方面也想以我的样子实地对比重新物色驯服的女孩子。

秘书们已说明这个情况，专案组仍然把我定性为“参与选美活动，为林家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服务”，算是我“犯政治错误”的依据。

第三章

动乱年代的恋情

初 恋

许夫人做媒

与恋人分手

叶群迂回战术绕过许夫人

求援失败异梦再现

改行学医

初恋

“文革”初期红卫兵阶段，我们刚从安徽大别山区“社教”归来，所谓的“社教”就是对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清查农村干部经济问题，带动一般农民提高阶级觉悟。原有的地主，富农虽不是运动重点，但这个阶级一向是各种政治运动的“靶子”。在半年的农村实践中，我的认识第一次与所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那些蓬头垢面的“地富分子”及其后代子孙们，生活待遇比贫困的贫下中农更加悲惨，由于政治上的管束歧视，承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困境。出于人性知觉，内心深感同情，思想上很困惑：地主阶级已不存在，为何子孙还要生活在祖辈阴影中？不管他们多么安守本分，认命的那份可怜仍得不到宽恕。

在穷乡僻野中通讯困难，听说城里开展“文革”运动乱了秩序，学生罢课，“打砸抢”。全团调回南京，我放下行李匆匆赶回家，想了解第一手的可靠消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母亲任职南京农学院搞人事工作，在共产党组织系统中算是个“阎王殿”。母亲的思想很前卫，可观念上又很传统，性格上既开朗豁达又善良，由于我父亲是高级干部，他那条线上的同僚们都是当时军内外的掌权者，因此母亲的“背景很硬”。她坐镇组织系统，多年来在她手底下放过的“有问题”的人不在少数，母亲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关系很不错。

可是当我一进门见到母亲时不禁大吃一惊，她面色苍白，脸颊和额角带有伤痕，两个上小学的弟弟正拉着她的衣角哭泣。弟弟们一见到我，哭得更加厉害委屈。大弟弟哭喊着叫我：“姐姐，拦住妈妈不要她去上班！”我立即意识到母亲在学院遭到麻烦。

1
1
1

母亲素知我烈性，强装笑脸缓和道：“你放心，我在学院群众关系好，学生不会对我怎么样。你快让开，我得赶九点钟的党委会议。”

“姐姐，妈妈骗你，她是赶着去挨批斗，不要她去！他们打妈妈！”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我气愤地问母亲。她解释道：“所有党委成员都挨批斗。学生罢课造反，领导靠边站，组织瘫痪。你也不要生气，毛主席号召群众参加运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群众，我工作上也不是一点错误也没有，经历一下群众的运动也不是什么坏事，让我走，你跟弟弟老实在家呆着，不要到学院去。”

我被母亲一番自我革命的道理弄得更加气恼，像母亲这样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也被批斗，造反派是不是精神错乱了，落在这么一群人手里能有好结局？自父亲去世后全家就依母亲为支柱，大哥在外地服兵役，两个弟弟幼小，我若不出头保护母亲，万一有个差错，整个家就完了。

“姐姐，别信她说的，前些时候妈妈还被拉出去游街，胸前挂‘牛鬼蛇神’的黑牌子，头上的伤口就是他们用藤条戳破的，还罚她站独木板凳，摔得鼻青脸肿。本院学生没有斗她，都是外院的学生打她的，今天又是外院的学生借她去批斗，还要打她。”

母亲责怪地瞪了大弟一眼。无需大弟再说什么，一切都明白了，做女儿的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母亲被病魔了的不明事理的学生拖出去摧残。我坚决制止母亲再做无谓的牺牲，要她坐家里等我回来，九点钟之前我一定赶到。

当时已八点多钟，我骑上自行车风一般赶回团里，战友们是凌晨五点多从安徽返回团里，很多人都已睡觉休息，我闯进去拉起几位战友，匆匆说了情况，大家立即穿衣随我赶回家中护卫母

亲。

运动初期，部队是禁区，军人威信很高，造反派还不敢对军人为非作歹。

母亲一见我领进一群年少气盛的军人，个个英姿勃发，摩拳擦掌，我准备先礼后兵打一场硬仗，有准备而来请的都是男战友，母亲便担忧地告诫大家不要乱来，说对方也是思想单纯的学生。两个弟弟可高兴了，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准备参战，我把他们撵到楼上去。

九点半钟，院子里响起一片噪杂声，我家是独院，学生们一涌而进在院子里聚集队伍。为首者是一个壮实土气的年轻人，他们个个臂膀上戴着写有“造反派”或“红卫兵”的红袖套，显得杀气腾腾，这是我们进城第一天看到的造反阵容。

我们护卫着母亲，让她坐在客厅正对大门的位置上，客厅正壁上挂着父亲将军戎装遗像，虎视着进门的造反派们。

造反派们一进客厅就被这一阵容震住，一时间竟然没有人讲话。我问为首者：谁让你们到我家来的！

为首者口气明显地受到压抑，但又不肯轻易丢了威风，答道：“我们是南航和南大的，请田主任去开会，九点钟已过了为什么不去？”

“你们是南航南大的，为什么跑到南农来管事？我妈妈本院的学生不斗她，你们外院的为什么乱来！”

“是呀，田主任有什么错误？你们为什么虐待她？今天就请你们把话说清楚，否则不能走人！”战友们指责造反派。

为首者语塞，嗫嚅道：“我们几个学院相互交换领导批斗，毛主席号召批斗走资派，凡是领导都要批斗，这是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的是批斗走资派，我妈妈犯哪条错误算得上走资派？凡是领导都批斗，符合党的政策吗？你们侮辱虐待我母亲，不说她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就凭她是红军烈属、现役军人的母

亲，你们就是违反党的政策，扰乱军心，我这个家不欢迎你们来。”

“对待军人家属和老革命，搞体罚侮辱人格这样做对吗？毛主席号召你们造反，你们造哪个阶级的反？”

“田主任如果有错误你们可以批评，为什么打人？毛主席叫你们这么做的么？”战友们七嘴八舌谴责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人问：“你们是田主任的什么人？”

一个战友气壮地回答：“她是我们战友的母亲，也是革命的母亲，她的儿女都是军人！”

造反派中纷纷议论这是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一部分人开始往外撤，剩下的几个下不了台。一个战友向我丢眼色，见好就收。我叫为首者转告他们的头头们，我的母亲从今以后不再去参加任何批斗会，她有心脏病，出了问题后果要他们负责。

这一场“护母战”很漂亮地收场，双方都是“初生牛犊”，我们依仗军人身分占了上风。其实我们当时刚返城，根本不了解当时的造反情势，说的话都是“老教条”，却站在理上，侥幸取胜。后两天我便把母亲送到郊区军营里长住，躲过了后来更强大的冲击。在那动乱的时期，像我母亲这么好运的老干部不多，许多人被残酷斗争致死致残，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有个干部子弟感慨地对我说：“当官的没有穷朋友，这个时候穷朋友最有用，躲到这种人家去，又不是亲戚，谁也找不到。”共产党高官都讲廉洁奉公，实际情况如何暂且不论，因奉行这条“美德”，许多高官似乎成了“六亲不认”的人，一旦自己落难，确实无脸求人。

我返城以后不久，有个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来看我，她曾是红卫兵组织里的小头头，虽然当时红卫兵已开始过气，她仍然一副腰扎宽皮带袖子撸得很高、一派男性装束。从她那里了解到红卫兵“破四旧”的威风，她一点不掩饰地描述用皮带怎样抽打被抄了家的“资本家”，并送给我一块上等衣料——战利品，

我不解地问她：“既然这些东西是‘四旧’，你还拿来送我？我不要。”

“不要白不要！我到上海去，那些工人都不上班，挤在拍卖行里抢购抄家物资，一块金表十五块钱，一件上等呢大衣几块钱，红木家具几十块钱就扛走，你不去看看？都是工人阶级，抢疯啦。”

我瞪视着她，其实是“目中无人”，我眼前浮现的是她描述的一幕疯狂抢购的人群，好似《乌鸦与麻雀》电影里那一群疯狂“割金子”的穷人。

军委颁布命令，军区直属各单位允许介入运动，我们团一下子就乱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从团长、政委到各队队长、指导员，凡是领导都“靠边站”，党委瘫痪，我则成了“白专典型”、“领导的宠儿”，外加“妈妈是走资派”、“与许世友家关系深”，便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小奸细”、“内奸”，被排斥在造反组织的外面。从这时候起，我离开了相处多年的舞队姐妹们，站在外围看别人造反，看人们成帮成派地辩论争吵，我真不理解，为何要像仇人似地相处？长期一起工作的，谁不了解谁？

我很孤单，但精神上很坦然，我不喜欢争名夺利出风头。尤其是以“泼妇”、“悍妇”的形式去争论某个观点、争夺一席之地，更与我的性格不符。那时的人们都让一种狂热的政治崇拜迷惑了，浑然忘我参加“革命洗礼”，我更成了人们看不起的“政治冷血动物”。我并不在乎政治极端者的讥讽指斥，实际上在我思想感情深处，对这场迫害老干部、群众自相派斗的残酷政治运动，深感太悖逆情理，我怎么可以用暴力去打击侮辱曾与我父母一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夺下这片江山的前辈们？！我无法理直气壮，坦然得一点不愧疚地面对他们，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我们这一代的安定生活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我虽然还小，不大懂政治

效果，但作为一个人的天良，感受上是一种悲剧气氛，我很不喜欢这种气氛，看见那些被打击迫害的人，内心都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悯，但我知道这种感情不能表达出来，只有深深地藏在心里。我这种思想感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教，我父亲是贫农的儿子，幼年就受穷吃苦，在他枪伤累累的躯壳里有一颗深知人间冷暖的心，为人十分善良通情理。与他同一辈的伯伯叔叔们常给我讲他们的身世和战争年代里的故事，他们的感情很朴实，越朴实的事迹越教育人，一点没有政治极端者的那种“高调子”。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年夏天，院子里来了一个挑担贩水果的汉子，把大堆的瓜果白送我们不要钱，母亲认出他就是当年众多上门讨饭中的一个，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还不忘当年舍饭的恩情。

“文革”运动引发社会秩序大乱，社会上各类人都可以借口“革命串联”涉足我团驻地，我一人“散兵游勇”没一个组织保护我，党组织贬得一文不值，人人挣脱约束决定自己命运。尽管“逍遥派”被人唾弃，为了安全，我躲回家去，乱世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一措施很及时，社会上一些人乘乱想占便宜，不久发现不明身分的人行踪诡异地在我家附近昼伏夜出，一些基层造反派头目也借口登门造访，来意不言而喻。当时造反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这些乱世起家的“草莽英雄”让我感受到自己会成“压寨夫人”的威胁。我决定带上两个弟弟到郊区军营里与母亲同住，留下保姆看家。

母亲很担心我的安全，怕她的“走资派”身分连累到我，她说我长得是个丑八怪她就不担心了。原以为军人身分能保护我，现在军队内部乱起来，她忧心得夜里也睡不着，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现在她面前，她喜极而泣，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野战军是“钢铁长城”，我们一家在这个坚强堡垒里很安全地度过了一段日子。

好景不长，野战军内部传达了来自上面的指示，不准收留逃避运动的人，我们只得离开军营返回家园。好在初期的批斗风已过，各地造反派仿效上海“一月风暴”夺了各级行政领导大权，造反派们都忙于营造自己的权力，把“走资派”们当成死老虎晾在一边无人问津。我母亲就此闲置在家。家院宽阔，每天垦地种菜，原有的花草已被造反派糟蹋完了，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不准种植。

我也回团去看看，团里成了夺权的天下，除了闲置的旧领导班子以外，为响应毛泽东参加运动的号召，人人都参加了组织，连出身不好的一些老演员也组织了战斗队，以期表明政治态度，我好像“星外来人”显得特别起眼。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老演员对我说：“我们都是没人要的人，你参加我们的组织吧。”这个战斗队名叫“红旗”，意思是虽然出身黑，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这样，我总算是政治上有了个家。成员出身都不好，就我出身革命家庭，大家开玩笑说这个阵容是“群黑之中一点红”。因为背景不好，我们从不主动去跟别的战斗队争什么，倒也相安无事，闲着打扑克下象棋，织毛衣聊天，上街收集造反小报看新闻。我臂膀上也有了一个红袖标，标示我的造反身分，这是我的“护身符”，军装加上“护身符”，走到哪没人敢覬覦。

好不容易“安身立命”了，麻烦接踵而来。那时的人毫无约束，只要不反革命，想干什么干什么。身边出现了追求者，不是一个，是一群，我又陷入谣言诽谤者和追求者的围困。

什么叫爱情？在强化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代中萌发得很迟。十二岁时，很喜欢学员队里一位男学员，幼稚的心只当是一种难得的友谊。当“他们两个好”的闲话传到我耳里，两小无猜的纯洁感情顿时蒙上一层亵渎阴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过早地将我们成熟化，我感到被曲解和侮辱，从此堵上一口气，再也不和那位男学员说话，直到他转业离开军队。

十四岁参加全军汇演，一炮而红，引来外团的追求者，人家言明了要跟我交朋友，我却问领导：“我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干吗要跟我交朋友？”无心的一问闯下大祸，当时的我是大姑娘外表，儿童心理，那些外团不知底细的异性们白用了一番心思，还挨领导批评。

我的家教很传统，避开麻烦的最简单办法是尽快确定男朋友。我对乐队的小李一直有好感，虽然在一个团工作，因为不是一个队，平时既不讲话也不接触，没有沟通。我主动与小李确定恋爱关系，将之公开化，竟引起舆论哗然。众议两极化，一是“门当户对”等级观念重的人，不看好这种关系，有用脑袋打赌的，有说小李“不配占花魁”的；二是赞许鼓励我们的。说好说坏的都有，消息扩散出大院，在社会上成了件新闻，引起众说纷纭。

我母亲大受震动，未料到在众人眼中高不可攀的宝贝女儿就这么轻易地决定了终身大事。她想不通，形势再乱也不可草率选择，她动用社会老辈们希望挽回我的决定。她失败了，小李家世虽然清贫却很清白。母亲要求见见小李。小李很惶恐地到我家来拜见母亲，母亲像政审干部一样把小李查了个祖宗八代，小李的言谈举止让母亲放心，认为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只好妥协，但她提醒我们：“你们还年轻，只能交朋友，不能发展关系。党委虽然不管事了，今后还是会恢复党委领导的，别人不把组织放眼里，你们可不能学，到‘秋后算账’的时候，别怨我没有提醒你们，千万不能乱世下胡闹。如果不听我的话，你们现在就分开，连朋友也不要做。”我与小李频频点头，母亲这一关总算通过。

小李的性格直率正直，为人热忱，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分配到我团，一直是乐队的业务骨干，他吹西洋乐欧勃(双簧管)，音色悠扬美妙，每天清晨他总是站在草场边缘面向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吹奏练习曲。我有练晨功的习惯，每天凌晨四点到

六点的晨功一结束，就能听见远处传来悠扬的欧勃乐曲。本团的一些小伙子问小李：“介绍一下经验，你是怎样用欧勃摄取了张宁的心。”其实小李完全没有料到我会选择他，在一帮男青年眼中，舞队“十二钗”高不可攀，对我更是“想都不敢想”。

突然到来的幸福令小李头晕目眩，我选择他并不轻率，虽然当务之急他是我的安全保障，在我心理上，认为像他这样的家世背景，会懂得珍惜，不会因岁月的逝去而变心，我期盼的是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我不想将婚姻高攀到烦恼纷呈的程度。

许夫人做媒

我与小李谈恋爱的消息迅速传遍我涉足的社会圈子。许世友的夫人田阿姨听到风声，打电话叫我去见她。见面就问：“你谈恋爱了？是个吹小号的？你怎么搞的，不事先听听叔叔阿姨们意见，你妈妈的话你也不听。年纪还小，不着急，等两年我给你介绍个好的。把那个吹号的拉倒了吧！”见我不吭声，又教训道：

“你们年轻人，头脑单纯，终身大事不能当儿戏。”

我陈述自己的想法，被她斥为“小孩子懂什么！”我只好恭顺地听着。在她面前我一向是“乖乖女”，颇受她疼怜，这是因为父亲早逝的关系，又因我的外形和专业水平都讨她欢心，她对自己的女儿说过：“去看歌舞团演出，我就看张宁一个，别的不要看。”特偏爱我。

没想到她真动了心思，当时江苏省数百万造反群众分成两大派，一派叫“红总”，一派叫“八二七”，“八二七”是拥军派，领袖人物名叫曾邦元，深得许世友夫妇赏识。

一天，田阿姨电话传我立即去她家。她家住中山陵八号。已是晚上，独自在树林里走有点害怕，好在因她住在这里的原因，梅花山以及通往中山陵干道一带已被警卫部队驻守，我很安全地

到达她家。

进了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位学生装束的青年男子，宽广的前额，白净皮肤，眼睛不大，顾盼之间不笑也像笑，显示一股狡黠。我问他田阿姨在哪里，他说可能在楼上，一口苏北腔。我心奇怪田姨哪来的苏北亲戚，这个时间和地点令我没想到他是个客人。

我没再理他，跑上楼喊田姨，她答应着从卧室里出来。我心里一惊，以为许伯伯在，有一次我冒冒失失跑进卧室，许伯伯正睡觉没起床，田姨从更衣间走出来，见是我，便去床头叫他：

“还不快起来，张宁来看你，你还只管睡大头觉。”许伯伯睡眼惺忪地起身披衣望着我嘻嘻地笑开了，腮上显出一对深深的小酒窝。外人只看到他威武的一面，实际上他是个很有爱心的长辈。我无意中打扰了许伯伯的睡眠，心里很歉意，这次我便大喊不敢进卧室。田姨喜眉笑眼地说：“你许伯伯不在。走，我给你介绍一个人。”牵住我手下了楼。

那个青年一见田姨立即起身恭立，眼睛却望着我。田姨问我
知道他是谁吗？我摇摇头，她说没见过总听说过吧，他就是“八二七”的总头曾邦元。我好奇地重新打量他，应该说是“刮目相看”，传奇式的人竟就是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我以为能统帅百万造反队伍的人一定是个有把年纪的涉世经验丰富的老家伙。我只顾瞪大眼瞧他，心里充满了好奇心。田姨嗔怪道：“你这丫头没礼貌，怎么不问声好。”我脱口而出：“叔叔好。”我自然地把他的辈分与能力等同起来。曾邦元情不自禁地嬉笑而不好意思，田姨乐道：“叫错了，他比你大不了几岁，应该叫大哥才对。”我便红着脸改口叫他“曾大哥”。

田姨对曾邦元说：“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张宁，军区歌舞团的尖子演员。”

田姨叫我们坐下聊聊，我一贯不多话，曾邦元也只说三句

话：“有空到我那去玩，我住在南大后院小楼，问谁都知道。”他送我许多毛泽东纪念章和一本南大校版的市面上很抢手的“读报手册”。

田姨送我出门时关切地叮咛道：“你和小李的事不算数，我看不上。这个小曾将来政治前途不小，阿姨是关心你，可不能拿婚姻当儿戏，回去跟妈妈说是我的主意。”

我不忍当面悖她意，含蓄地回道：“小李不会同意的。”

田姨笑道：“他当然不会同意，可你自己也做得了主啊。你们又没成亲，还有个选择余地嘛，组织这一关还没过，不算数。可别以后吃后悔药，趁早拿主意。”

母亲得知情况后很为难，怨我不听她的话，她早料到老一辈这一关难过。当时老一辈对下一辈的关爱着重在政治上，到了儿女论婚嫁的年龄，对象都尽量选择有政治前途的，虽不是“门当户对”的老观念，却也不能随便降低条件，母亲对小李印象不错，在权势与幸福之间衡量，她更关心我的终身幸福，她有切身的体会。她不忍伤害小李，因为政治观点的原因，她又很欣赏曾邦元，两难之下苦笑道：“谁叫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但她明确地告诫我：“你不可以同时有两个男朋友。”

母亲并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跟小李断关系，我心里很稳妥，从感情上说，小李是我的恋人，曾邦元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林立果的阴影已经笼罩着我，因为事情没有挑明，又担着“泄露国家机密”的压力，我对田姨和母亲都隐瞒着，为了小李，我不想再节外生枝给双方精神上带来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曾邦元常来玩。我不太愿意到他宿舍去，他是掌权人物，常是客满盈门，我不想成为社会上的新闻焦点。曾邦元是个很幽默很有思想水平的人，他既已有心，很快就打听出我与小李的关系，我们坦诚相待，成了朋友。

小李是个很敏感的人，初恋的喜悦很快被我的社会关系所淹没，他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愿再涉足我的社会圈子。他数次盘问我两次进京的情况，对曾邦元的邀请也置之不理，我感到精神上莫名的压抑，这是我选择他时始料不及的。都说爱情是甜蜜自私的，可是我纯洁单一的感情接受不了甜蜜的自私带给我的委屈，心中无愧而又忍着不能言明的压力，受着对方的怀疑不信任，心里确实非常难过，但我不能怨小李，任何一个有漂亮女朋友的男人，都会很自然地产生防备心理。

有一天曾邦元来我家，我见他情绪有异，往日有说有笑的，今个怎么老是沉思？问他原因，他说我有事情瞒着他。我说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干吗这么过分要求我。他摇摇头关心地说：

“你和小李的关系夜长梦多，要防生变，谈成熟了早点结婚，我还可以讨杯喜酒喝。”我问他怎么提到这件事，我是军人，没有组织许可就擅自结婚，自讨处分呀。军队纪律不像地方那么松懈，这种事一旦处分，轻者档案上记过，行政上不提级；重者开除军籍，剥夺干部待遇，“污点”走到哪背到哪，一辈子做人抬不起头。曾邦元对我说了——一个情况：前两天他参加省革委会会议，碰到蒋司令，蒋司令拍拍他肩膀笑问：“听说你认识张宁，什么关系呀？”曾邦元回答是朋友关系，蒋司令哈哈笑道：“老弟，名花可是有主的哟，你可别犯糊涂喽。”曾邦元也笑道：“知道，歌舞团那个小李是她男朋友。”

曾邦元诉说完后怀疑地问我：“你两次上北京执行什么任务？蒋司令的话大有来头，倒看不出你心里挺能存东西。”

我反问他：“你是革委会成员，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

曾邦元认真地摇摇头，问：“和蒋司令有关系吗？”我点点头。他说：“难怪蒋司令那么敏感，你的北京之行大有名堂。”他问小李知道不知道，我摇头并反问他：“你为什么不想问清楚？”他笑道：“小李都不知道的事，我哪有资格问呢。”他是

个有政治经验的聪明人。

曾邦元以后很少来玩，偶尔来一次神色也很黯然，他解释说：“你的事背景不小。我来玩某些人很敏感，看来谁都不能接近你，我还是少给你惹麻烦。”

我反感道：“是你自己怕惹麻烦吧。”

他忙说：“哪里的事，我怕什么，我又不了解情况，倒是你自己说不清楚啊。”我不禁长叹一口气。他安慰道：“看看，人未老，常叹气，我说你怎么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心头压着大石头就不会舒畅。这件事谁也帮不了你，我看小李不错，要争取，这关系到你一生幸福。”

“原来你早知道是什么事了。”

“不、不，我是用脑子分析的，恐怕八九不离十吧？”

自这次谈话以后，曾邦元再也没来过。田姨曾问过他进展如何，他说：“我高攀不上呀。”我得知后也不解释，被控制到不能结交异性朋友的程度，说什么都会让人觉得你精神上有毛病，因为外界根本不了解我的处境。

与恋人分手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社会形势逐渐稳定，各行各业开始“抓革命促生产”。

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又恢复了党委领导制，实际上是夺了权的新生代结合原有的一些老干部重组的领导班子。

这个夺权，分正确夺权和错误夺权，虽然都参加运动，但是各人表现不同，还分“保皇”（稳军派）和“乱军”（乱军派）。毛泽东靠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毛泽东说过：天下大乱，只要军队不乱，敌人就翻不了天。军队是“钢铁长城”。所以“毁我长城”的乱军派就成了运动后期“秋后算

账”的重点对象。

“路线”站对了的稳军派被上级用来作为整肃乱军派的骨干力量，又一波群众整群众的序幕拉开了。

军队各直属机关办起了“斗私批修”学习班。我团四个队各自成立学习班，人人清理运动中的思想和行为，自我检讨批判。

“不自觉”的人，别人帮助揭发批判，这一轮“斗私批修”是先理出个“线”，运动中闹轰轰，看起来一窝蜂，却有轻重主次，在检讨认识后，掂出每个人的“分量”，做出处理的底案。

几个重点对象揪出后，大会小会的批斗，站错“路线”的乱军派群众就用“转业”名义清洗出军队。全团刮起十二级转业台风，二百六十多口人，清洗掉大半，工作瘫痪，人心惶惶。

学员队科班出身的“金陵十二钗”，一下清洗掉八名，包括三名业务水平与我差不多的主要演员。落寞不舍的感情再一次深深困扰着我，虽然运动中因观点和做法不一样而将我独自摒弃在外，但“十二钗”的舞台命运是相连的，大家都走了，剩下四人有两人的“重大”错误留待军内处理，留下我一人有什么用？我也走！

我找政委提意见：“你把这一批都处理完了，我一个‘光杆司令’还跳什么舞，我也走算了。”

政委哈哈笑道：“孩子气！全部走完了你也不能走。她们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她们本质上跟你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出来，你反而同情她们，不下狠心处理掉，留在部队继续捣乱呀！”

听着似乎也有道理，可感情上总觉得不对头，从小一起滚爬大的，谁不了解谁呀？大家响应主席号召积极参加运动，虽然乱军行为过分了，“斗私批修”时大家不都检讨认识了嘛，怎么又本质不同了呢？

“你呀，就是单纯，过去不关心政治，这次运动中立场很

稳，表现得很有头脑，今后组织上要在政治上多培养你。”

我心想：“立场稳？那是造反派不要我，虽然我不赞成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要谈政治觉悟多么高嘛，我可是全团第一号的‘逍遥派’，家庭背景决定了我的立场，实在是碰巧站对了队。”想到此不由得笑起来，政委以为我对他的一番表扬有了反应，一只手拿支牙签剔着牙，一只手背在后面，高兴地望着我笑。

“那么，陈××、谢××、钱××三个人能不能留下来？”我还是按原有的思路向他提要求，不过降低了条件，心想留下她们三人，今后我们可以再发展。

“什么？你这小脑袋瓜子想些什么？统统走，一个不留，组织上决定的事不能改变。”政委生气了，想走。

“领导培养我们这批学员不容易，今后从哪再找这么好的呀！”我着急得嚷嚷。

“怎么啦，离了她们地球不转啦？！就要让她们看看违背党是什么下场，不把党组织放眼里，业务再好也不能用，今后可以培养更好的。”政委走了，不再理我。那时的我也太单纯，以为凭着自己的“脸面”和充足的理由，可以挽回一些少年时的伙伴，岂料得到的回应却是“铁面无私”的组织原则。

相反的，这所谓的原则也会出现弹性，对一些阿谀恭维、见风转舵、诬陷别人掩盖自己错误的人，领导却有另一种谅解，赞扬这类人“立场转变快”、“提高了觉悟”、“敢于揭发别人”、“对自身错误有积极改进的表现”、“愿意向党组织靠拢”。有这么个人，运动中诬陷一名出身不好的老演员喊反动口号，害人坐了十五年政治大狱，乱军活动中又是个冲击军事机关和重要战备设施的急先锋，一到“斗私批修”，立场转变得特快，带头狠批自己的世界观，对别人也毫不留情，发言可积极，

“别看我眼睛小，小怎么的？还能看到共产主义呢”，后来团里

的很多人背后都叫他“小眼共产主义”。

转业的演员走完了，轮到资历老、运动中表现中立的老演员。每次的政治运动到收尾时，人人都要过筛子，没有现实问题也得查查有无历史遗留问题，借政治运动来“洗洗澡”。

一次，领导派我去上海调查一位舞编在四十年代当过童子军的“历史问题”，我问领导“她当童子军的事是谁提供的线索”，领导说：“你别问那么多，群众揭发嘛。你的任务就是调查、汇报。”

当时团部门口挂着一个上了锁的检举箱，大家从没看见白天有谁往里投信，乘夜幕来投信的人，心理上一定跟夜幕一样黑。我最不喜欢不光明磊落的人。这位被调查的舞编不但是我“贝壳舞”的编舞，也是老、中、青三代演员所熟悉的老演员，共同生活十数年，竟还有人检举陷害她，实不可思议。

我去了上海，在档案馆里翻查解放前的旧报纸新闻和社会活动报道，终于找到一份童子军节目表演单，上面有那位舞编的名字。回到团里向领导汇报，他要我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童子军不就相等于现在的少先队员嘛，表演个节目算什么政治问题。”领导批评道：“你就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童子军是三青团外围，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外围，怎么不是历史政治问题？”

我心想：“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三个层次差很大，少先队员娃娃怎能跟共产党员相比。”心里想着嘴上就溜出来：“少先队和童子军是差不多的吧？都是小孩子组织。”

领导愣了半晌，扑哧一声笑起来，手指着我：“你呀你呀，我说张宁你呀，怎么说你呢，看问题要有个立场，你怎么老是小孩子气，组织上把你当政治骨干培养，你可不要不争气哟。”

说起我这“政治骨干”，真是阴错阳差，有人说领导偏心瞎了眼，传到我耳里，一笑了之，要不是“文革”中大多数人昏了头，犯了各种程序不同的“错误”，“政治骨干”的“美称”哪

会轮到我头上？

不久，小道消息风传小李要转业，我根本不相信，放着我在团里，谁还敢动小李？除非我走。有人来问我，我坦然自信地一口否认：“根本不可能。”

很快地，小李的情绪变得很沮丧，果然乐队领导找他谈了话，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要他转业。我大感意外，领导别是吃错了药，小李是乐队的业务骨干，运动中也站对了“路线”，更何况我与他的关系，谁人不晓，哪个不知？叫他走，我还能安心工作？不怕我闹个天翻地覆？

我安慰了小李，又去找领导谈话。奇怪的是所有领导在这件事上都好像造反初期“靠边站”似的，都否认不是他们让小李转业的。党委决定一切，党委书记就是政委，找他评理去。

政委三番五次躲避或借口开会没时间，逼得我只好在路上堵截他，他走东，我堵东；他走西，我堵西，就像捉迷藏，有一次甚至把他逼得钻进厕所。政委的反常令我疑虑重重，虽也想到小李转业恐怕与北京方面有关，但没有直接把柄怎可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质问领导。

政委终于接待了我，明知故问道：“你找我有事？”

“谁决定叫小李转业的？”我劈头就问。

他生气道：“把你惯坏了，怎么这样跟我说话！组织决定的事，又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党委研究的。”

我顶撞道：“我找过所有领导，他们都说没有参与意见。你是党委书记，党委决定也得通过你，你不点头，党委决定有什么用！就是你决定的，为什么叫小李走，你要讲出理由。”

政委搪塞道：“看你这孩子，我个人怎么能凌驾组织之上，少数服从多数嘛，组织决定的事我怎么好反对。”

我立即反驳他：“根本不是其他领导的意见！就是你决定的，你如果不改变决定，小李走掉我也不干了，反正舞蹈队都走

完了，留我一个也没用！”

政委语塞又想溜，我拦住说：“还没讲完，别走。”

政委急道：“你想怎么办？”

“让我转业！小李到哪我到哪。”

“胡闹！全团走完了你也不能走。”

“那好，你先批我和小李结婚，申请报告已写好了，不然我坚决不留下，硬留下我，也不参加任何工作。”

政委急道：“我可警告你不许乱来！你和小李趁着运动没人管私自谈恋爱，经过谁的同意？！组织根本不承认你们的关系，还想结婚，还有组织观念没有？！”

我羞愤地辩道：“我们恋爱正大光明！又没超越界线，运动中哪个不谈恋爱？为什么不管别人偏管我！反正我要结婚，你不批不行。”

政委气得直嚷嚷：“胡闹！胡闹！简直胡闹！”

过路演员好奇的目光投向我和政委。政委劝我先回去，以后再谈，不要弄得影响不好。我偏不，缠住他立等答复，这是解决我和小李困境的唯一办法。

政委看着我长大的，素知我脾气，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

“本来不该跟你说，你是聪明人，该明白原因。我夹在中间很为难啊。实话对你说，小李转业不是我决定的，是上面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胡主任要我做你思想工作，我说难办，你这个孩子不好说话。你知道的事比我多，不用我解释，上面指名要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别让我为难，只要你以后跟小李断绝关系，我向上面说说情争取让小李留下不走，我帮忙只能到此为止。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不保证小李今后会怎么样。结婚的事想也别想，闹出后果，我们保不了你，你千万不能对小李说什么，他那个脾气，年轻人没经验，政治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别害了他，明白不？”

政委见我萎缩得失了锐气，开导道：“你也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恋爱观，英俊漂亮管什么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注重培养你，你可不能辜负了上面的期望。我把话说明了，再任性下去不听话，政治问题不留情面，那时我们想保你也保不成了。”

我不知道政委什么时候离开我，天越来越黑，浑身冰凉，抑郁的情绪挤压得胸口发痛，喘不上气，真想朝天放声大骂一句吐泄心头一团浊气。但这口气无法吐出来。静静地回到宿舍，趴在桌上哭起来。我狠不起来也嚷不响亮，我如果喊出心中的反抗，人们一定会把我当成精神病或反革命群起攻之，长得再美也会顷刻变成人们攻击的对象。

我不敢到小李宿舍去，虽然我知道他正焦急地等我的消息，我需要时间先说服自己，很难很痛苦的。为自己得伤害小李，不为自己得连累小李和我的家庭，其实已分不出界线，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与选择，偏偏我与那种期盼“好风送我上青天”的女孩不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这张脸到底什么地方令林立果不舍？在我记忆中，镜子里从来都是笑脸，今天连镜子上都是泪。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强烈的感觉，好像我是古代帝王制度下的女子，却穿着解放军的衣服，十分古怪，舞台上的荒诞剧竟在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来，我突然失控笑起来。

正哭着，同宿舍小申吃完晚饭进门，吃惊道：“你哭了？我怎么听着好像在笑，有什么伤心事，跟我说说。”

小申是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毕业生，刚分配到我团第一天见到我就直率地问大家：“她是谁？好娇艳啊！”我从她这句话里认识到她一定是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还住在一个宿舍里。

她见我只哭不说话，以为是为小李转业的事，便笑劝道：

“你真是的，这事放在别人身上还值得愁，放你身上算什么事，你熟悉那么多军区首长，跟他们说说去嘛，我看不会有问题，别

伤心了，快把眼泪擦擦，眼睛都哭肿了，让别人看见又好瞎猜议论，让小李知道他就更急。”

她一说我更伤心，心想再多的首长也抵不过一个副统帅，如果讲明了哪个首长敢帮我？说不定还要做我工作呢，我岂不是更加孤立。

再难的事总要走第一步，我不知怎么跟小李说，但我不能不去见他。

我洗了脸，用凉毛巾敷住眼，一切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忧心忡忡地去见小李。小李情绪不好。我俩都没吃晚饭，实质性问题不敢告诉他，只说领导对我们年纪轻就谈恋爱有意见，如果断绝关系他就可以保留军籍。

小李太了解我，不相信我的话，他用“我们可以不结婚，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一句话就把我堵得没了话，这本来就不符合逻辑，他捧起我的脸，发现我哭过，惊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支吾地说不出来，他马上警觉出问题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追问我去北京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我的沉默激发了他的判断：“你一定是牺牲自己来保护我。我不要，张宁，你给我听着，我宁愿不要这身军装也不跟你断绝关系，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在一起。你不要再为我的事奔波求人，我认了。如果用你做交换，我宁愿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看透了，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他的话像锤子一样一句一句敲砸在我心上，我难过极了，他不知道面对的是何种势力，一旦威胁成真，他会是什么下场？从林立果初次见我到此时，这么长时间他不会不知道我有一个男朋友，这次叫小李转业已是公开挑战，放我之后再要我已是下了最后决心，在强权面前，我和小李只是山林中的一对小羊，而林立果是只虎。

小李的态度越坚定，我内心越惊怕，一旦发生不可测的劣

变，他比我还无辜。而我们的感情一向是那么纯真，许多老演员形容我俩似“办家家”，我们何曾想到这样纯的感情会有那么恶的结局。

我不想做任何解释，以我俩的能力根本没办法解脱，除非玉石俱焚，但就是死也不清不白，心有不甘，理智上明白这条路不可行。

与小李同宿舍的战友吃完晚饭陆陆续续回来了，不能再在宿舍里让人家看着我们的苦样子，我俩携手走出大院，来到梅花山。寒风吹透我们的心，小李紧紧拥住我，久久不说话，双方精神上都沮丧之极：“组织上不讲道理，我们还服从什么！他不批，我们自己决定，豁出去不穿这套军装。”小李激动愤慨地说。

我没有回应，脑海里浮现出当年黄莉阿姨的遭遇，那时小李还未分配到歌舞团。“文革”的政治气氛，一旦发难恐怕我俩不仅仅只是开除军籍和遣返原籍那么简单了事。即使小李仍蒙在鼓里，但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仍不能超越政治环境，就我思想上说，政治上根本没想到反对领袖，只是对这一生活问题极端想不通，多少次在心中自问，革命一定要长得漂亮？中央首长的夫人们没几个长得漂亮，可她们都是中国革命的佼佼者。我的思路局限到只有选择牺牲自己一条路，我不愿小李因我遭到灭顶之灾，那样他不但得不到我，他将比穷光蛋的处境更惨。

小李因我久久沉默不表态而猜疑痛苦，他捶打松树，枯败的松针哗哗落在地上。情绪是某种暗示，小李对我的沉默很伤心，他虽然重感情却也不糊涂，我执意不回答北京之行内幕，他已猜到我思路的基本走向，回去的路上我俩再无话可说。

后几天我们仍然天天在一起，不同的是只要我俩呆在一起不出半小时，就会有领导找借口出现在面前把我们支开。过不了几天，小李被派出去搞外调工作，接下去是不断地派小李出差外

调，领导也找他谈话，许愿发展他入党，转业的事再也不提。我俩就这样心照不宣地分了手，小李体重骤降，面黄肌瘦，他遭受的精神打击深重，人们纷纷议论我们分手的原因。有些人幸灾乐祸地讥讽小李，我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内心麻木冰冷。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痛苦而无处申辩。

叶群迂回战术绕过许夫人

林立果排除小李以后，又听说许夫人插手我婚恋问题，既生气又紧张。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不露痕迹地将我调派到野战部队体验生活，不久又随团迁移至南京郊区驻军营区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在这段时期严密防范外界异性接触我。有些不了解内情的男子接触我稍多些就被领导叫去谈话，一些新调来的男演员奇怪我张宁是何许人，怎么一接触就“触电”，让领导们那么紧张。有一个话剧团男演员被领导叫去“谈思想”，得到警告是“你的党票还想不想要”，这个男演员百思不解，他问领导：“听说张宁运动中表现不错，怎么，她政治上也有问题？”领导答复他：“她身上的事可不是一般政治问题，连我们都不敢沾边，有专人管，少接触为妙。”

我名义上是清查专案组里的骨干，实际上受特殊渠道内控，为防止接触面多，将我分配到小专案组里，只有四位工作人员，连我三名女性，仅有的一位男性是另一女工作人员的丈夫。

作息制度和活动范围很严，除了居住的房子不能到其他专案组去，去食堂打开水也得两人以上，不得独自外出，更不许回南京。

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衍生物，说白了就是“秋后算账”。毛泽东发动全国亿万人民造反，“大乱得到大治”，利用群众整垮了他的政治对立面，再反过来

收拾“乌合之众”。

运动中无人不造反，这是政治态度，掌握不好分寸就成了“动乱根源”，交代思想动机，挖组织背景。全国大串联哪个组织没有纵横交错的关系？其中一个组织有“问题”就瓜连上很多其他组织，瞬间全国都成了“五·一六集团”的势力，很多组织的群众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严酷整肃。我团一些遭到反咬连坐的演员因为实在交代不出所谓的“罪行”，有的上吊自杀，割腕自杀，吞安眠药自杀，甚至被假枪毙吓疯掉。不少演员被逼交代不出问题，不给睡觉不给吃饭。为了“过关”，一些所谓的“反革命骨干”即运动中的造反头头，乱咬人乱交代，丧失做人道德，咬得人人都是“反革命”，就连领导层也受到猜疑，不得不从野战部队抽调大批指战员充实更换领导层。最后连我也被嫉妒心重的人咬上“偷听敌台”，根据是我有一部日本进口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

正当“窝里反”乱得一锅粥之时，江水偷跑到南京来找我。南京有人咬我“偷听敌台”的消息传到北京，林立果很着急，担心我遭到整肃，叶群也怕节外生枝，决定立即调我进京“脱离险境”。江水利用职务之便偷听到叶群与胡敏的电话。他早知我态度，以为我不知北京情况，出于他另一番动机，向组织上谎报家乡父亲病重，请假回乡。但组织上发现他买的是上南京的车票，他在南京一无亲二无友，引起胡敏怀疑。当江水到达南京站，一出站台便被守候的军人逮捕，送往军区第二招待所软禁等候上面来人押回北京。江水至此决心背水一战，利用熟人关系打听到我在郊区的驻地，偷跑到营区要求见我，但岗哨事先已得到命令，拦阻他进营区。直到江水被押走，我一点不知道情况。事后江水告诉我，他不顾一切地来向我通消息，是想叫我拒绝北京调令。他在这件事上也是因为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认为凭着他在运动中邱会作被造反派关押的生死关头，替邱会作送信给林彪，救了

邱会作一命，邱会作一定会出面替他说情，放他一马的。

江水被押回北京后，邱氏夫妇很震怒，邱会作一向视他为亲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处理不好向林家交代。“邱办”在很小的范围内整肃他，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秘密押送四川大山里服苦役，没有刑期。有人不但不同情他，还骂他“虎口拔牙，胆大包天”。

一九七〇年五月，叶群用中央军委名义正式下达调令。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正是田姨，她看到调令很惊讶，“军委要调张宁，事先我怎么不知道，这丫头嘴也特紧。调她回南京见我！”

北京方面就怕田姨阻挡，一条线指示下来，清查班子的领导以很硬的借口拒绝了田姨的命令，说我有政治问题，正接受审查不能见人。田姨大怒，从没有下级敢不听她的，更不相信我有政治问题。她敏感地联想到省革委会神秘的选人班子和传闻中的我两次北京之行，她决定亲自上京摸底，看是谁敢背着她做如此大的动作，挖她的墙脚。

她一进京就摸到胡敏这个主，顺藤摸瓜地进了林家，见到叶群将一肚子恼怒泄到胡敏头上。叶群玩两面派装糊涂，回避田姨提出的实质性问题。田姨见谈不出结果，要求看望林彪，叶群嘴上答应，偷写一条给林彪：“田甫要见你。她对胡敏有意见，说话小心。”让内勤送给林彪。

田姨见到林彪不知怎地改变了主意，问候几句便退了出来。田姨回到南京气愤不已，决定扣下我的干部档案，也以我有政治问题待审查为借口不放人。一南一北两位夫人闹对立，一个是副统帅夫人，一个是“诸侯夫人”，都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不可得罪的人，南京军区无人再敢插手这件事。而我的所谓“政治问题”也因这两方面的背景，没人敢动我。

田姨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叶群不愿得罪她，想出以迂回方法麻痹她，待以时日再作打算。策略既定，便不再提调我之事，此

事一搁便是一年，拖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初。

一天上午，已提升为军区宣传部部长的政委来到营区驻地，传我去办公室个别谈话，所有领导不得入内，我很不安。与小李分手近一年并没见什么动静，虽然感受到被控的内在压力，但没有灾难临头，不禁又产生侥幸心理，毕竟上面没有跟我明确这层关系，说不定他们物色到更好的会放了我呢？此番政委突然来到，我怀着期望“大赦”的心情去见他。

政委的性格很善良，任我团政委之职时间很长，从没对任何人发过脾气，很多演员喜欢跟他开玩笑，群众关系很融洽，就像一个“老妈妈”。（政委主要职责是管思想教育，经常做演员思想工作。）他处理我这件事自觉非常棘手，素知我脾气任性，说不好就顶牛。恐怕他已知道上面那个“主儿”是谁，这成了他精神上的“靠山”，理直气壮起来，当时全国上下对林彪的政治崇拜不容置疑，他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当的事，反觉得是给予我的殊荣。

我一进办公室他便拉长了脸给我来个下马威，以期镇住我可能的“强词夺理”。

“你交了个什么朋友？一点政治警惕性也没有。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

“我没有偷听敌台。如果领导还不相信可以叫那个混蛋来与我对质，我这个半导体可以充公，没什么可惜的。”我不明白他所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就所谓的“政治问题”回答他。

“我不是说这件事。你想隐瞒？上面早察觉你思想不对头，原来是受了那个人的挑唆。他已经交代，还咬上了你，你至今还想包庇他。”

我心里很吃惊，莫非是江水？脱口问道：“你说的是江水吗？他是邱副总长的人，他会有什么问题？”

“你没有一点阶级斗争警惕性，“五·一六”分子钻得很

深，无孔不入，他挑拨你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感情，他居心险恶，你还跟他交朋友，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给你的信里都说了些什么问题，你要老实向组织交代，不能有隐瞒。”

我沉默不语，不相信江水是“五·一六”分子，运动中他负有保卫邱会作的职责，并未参加造反活动，说他是反革命分子简直胡扯。为什么突然提到他，又提到信件与“交朋友”？他是给我来过一些信，每次都免不了谈及对林立果的看法，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给予我的理解与帮助十分感激，在当时我被困在邱家时，所有工作人员都回避我，生怕我向他们提出问题，只他敢向我揭露秘密，我认定他是个正派人，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交这样一个朋友有何不可。自从小李、曾邦元及我周围的男性都被组织排斥以后，江水这个关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我情绪上的一种发泄，你们不让我遂意，我也不让你们安心，至于后果如何我暂时不去考虑，因为只是书信而已，够不上“实际罪行”。

“怎么不说话啊？你还想保他？没有用啦，他已经全部交代，受到严肃处理。”

“谁处理他？怎么处理的？”我紧张道。

“这不是你问的，上面怎么处理是上面的事，他泄露国家机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现在是你要与他划清界限，今后不准再交什么朋友。无产阶级司令部注重培养你，你的感情要有阶级立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不爱，还去爱谁？”

这些词句太熟悉了！我一下明白过来，江水准是因我而遭到迫害，小李躲过的厄运江水没躲过，太不公平！江水只是我的朋友啊！

因我而害了一个无辜的人，我心中的愤忿与自责堵得一口气上不来，满脑子想的是上面会如何处置江水，他的政治前途让我

给毁了。

“你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老老实实听候组织调令。”

“我不想去。我觉得……”还未等我吐出心中的想法，政委就打断道：“到现在你的思想还不开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是党性、立场、感情的大问题，党培养你那么多年，可不希望你落到相反的下场。看见那些受审查的人没有？你想跟他们一样？江水那么高的位子怎么样，触法一样处理。你偷听敌台的事我们替你压着啦，不要辜负了上面对你的期望。”

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一切抗争都无用，组织的大网层层罩住我，即使“鱼死网破”还得连累家人，一个江水就够了，还得拉多少人替我垫背啊！

像以往一样，其他领导见我从办公室出来情绪极坏，但没一人敢上前劝慰打听。我一肚子委屈愤慨无处发泄，跑到宿舍后面的山上放声嚎啕大哭，那里没有人，只有一个据说是给蒋介石修建又废掉的墓穴，那座山名叫方山，荒草凄凄，我哭得情悲心伤。

同专案组的一位老演员丁梅华找到了我，她是听新调来的不知情的孙政委说我情绪不对，听到山上有女子哭声，怕是我发生意外，赶来察看。一见果然是我，披头散发泪痕满面。她劝慰道：“别哭了，你这样子让谁见了都害怕。你的事我们不能问，就更要靠你自己想开点。你不节制点，让专案对象看见听见影响多不好，惊动了战士传出去还不知道会讲些什么。快回去吧，这山上没人不安全，你跑到这里来不害怕呀，走吧。”她一边替我擦泪一边拉我下山，我哭道：“我还害怕什么。”下面的话咽在心里：我跟死了有什么两样！活人被逼到这一步跟做鬼有什么不同。

“快擦泪，把头发整理好，这样下山会引起别人议论。”丁

梅华陪我回到宿舍，让我躺上床休息，蒙着被子不让人看到我哭肿的双眼。我闭着眼睛，心里翻腾不平。入夜也失眠，心想林立果爱我一头乌黑长发，我偏不让他再看见。

第二天我跑到理发室把齐腰长的在运动中也舍不得剪掉的长发剪了，并且把头发剪到耳根，短短的，变成了当时风尚的“革命头”，那是我最不喜欢的“乡下二垛毛”。

不到一星期，老政委又来了，见到我便惊讶道：“你怎么把辫子剪了？谁让你剪的？”

“我自己剪的。”

“胡闹！那么好的辫子剪掉干什么！”

“小意思。我还想剃光头当尼姑呢！”

“胡闹，简直胡说八道。”政委嘟哝着说，见我神情不对，话意颓废，再不多说讨无趣。

他是来传达调令，命我明天离开营区回南京，限令三天之内上北京。

我抗争道：“既然是正式调令，得让我有点准备，不然不走。”

“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军人雷厉风行，三天准备还不够？有这么拖拖拉拉的吗？”

“你说的三天从今天算起，后天走人，中间一天时间我光搬运宿舍的东西回家也来不及呀。谁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南京。”

“好吧，再给你一天，多一天也不行了。”

后来才知道，叶群通过南京军区的“内线”一直在监视田姨的动向，时间久了，田姨也松懈了，没有再控制我的档案。此次田姨去上海开一个星期的会议，便有人向叶群密报：“乘着田部长去上海开会，正是个机会，要调赶快调，等她察觉了再想调就难了，不知要等多久。”这就是限我四天之内离开南京的原因。叶群的迂回战术终于成功了。

求援失败异梦再现

我回到南京即奔家里去，心内像猫爪抓挠，急得六神无主，想求助母亲，又怕她的力量挡不住这股强势，徒增母亲困扰。

母亲听说军委调我上北京工作，感到突然，女儿只是能歌善舞，调去军委能干什么？我两次去北京，她都以为是去外调出差，什么时候跟军委大衙门扯上了关系，怎么一直没听女儿说起过呢。她再三盘问我，我支吾着说曾经见过一些军委首长，她便以为是邱会作和吴法宪这两个江西人关照女儿，女儿人见人爱，又是烈士遗孤，关照提携也是应该的。

但是，母亲对我走的仓促很感意外，她很自然地问我：“你许伯伯、田阿姨知道这事吗？”我摇摇头。母亲再次感到意外，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嘱我走之前，抽空去向他们告别。

我去北京母亲没有意见，反而很高兴，自从我学舞蹈专业，她心里一直很不愉快，多少次想办法找借口想让我改行，都未成功，就此无奈了十一年，女儿出息成主角，母亲也稍安心。未料到“文革”又荒废了女儿，跳舞总不是理想职业，年纪大了怎么办？母亲一直鲠在心里是块心病，这下可好，军委调女儿去，不论什么工作，总比跳舞强。

我又试探地对母亲说在偶然的情况下见到林彪，是在“首长俱乐部”里，此时我仍不知道那就是毛家湾。母亲震动不小，以她官场经验，军委的头就是林彪，军委怎会无来由地下调令，恐怕女儿今后的工作范围层次不会低。她马上打电话请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来家。

周伯伯是江西人，与父亲同期入伍，时任南京高级步兵学院院长。他听了母亲的诉说以后也估摸不出军委调我去干什么。他

在长征时曾任林彪的警卫排排长，很熟悉林彪，对我说：“宁生，到军委去工作一定会见到不少首长。林副主席是个非常好的人。不多话，我跟他那么长时间从没见他对下级人员发过火。好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做出成绩，做出贡献，不要辜负你爸爸对你的期望，为你父母争光。如果能见到林副主席，代我问候一声。”

我心里庆幸没有亮出“底牌”。从战争年代过来的同一辈老人，对感情处理方式与年轻人有差距。而我与同一代的年轻人又有某些差距。十岁会阅读文学作品开始，侠肝义胆，忠孝仁慈，善良纯美，人间美好的品质深深感动着我。我自小生长在优越的官家，却交了一帮穷苦的小朋友，尽管十岁入伍后政治教育严格，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早已铭刻了抹不掉的人类美好的朴实的东西。

我深知在林立果这件事上我很孤立，若真跟母亲说白了，万一意见相左，母亲太了解我性格，去到北京后还不让母亲担心死！自父亲去世后，她受的打击磨难太多，她那有病的心脏还能承受多少压力？我最后决定不向母亲吐露实情。

这个时候我必须去见许氏夫妇。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直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林家没有明确这件事，我又担着“泄露国家机密”的威胁，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何必自找麻烦又惊动别人。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一切成真有根有据，我得去求助许伯伯田阿姨，请他们为我说句话。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们。该我命中有此一劫，许伯伯上北京开政治局会议，田阿姨去上海开会。失望之下返回团里，蒋司令正等着我。

他是最后做我思想工作，算是送别。他精神饱满，喜悦之中带着严肃，他告诫我去北京以后“一切听从上面安排，再不可任性不听话”，说我第二次上北京“不服从组织命令，把全盘计划

都打乱了”，是指当时林立果想速战速决完成婚事，因察觉我有抵触情绪，只得暂且放下。蒋司令提及此事就生气，训斥我“别的女孩想都想不到的好事你却不愿意，真是不知好歹！”他再一次强调：“你调去北京就不是南京军区的人了，出了问题我们可管不了你，不为自己也得为家里人想想，不要为个人问题让整个家庭为你背政治黑锅。”

我听出蒋司令不但很了解情况而且很赞成此事，由原来的谨慎害怕变成积极促成，他以长辈和上级的双重身分、以他的标准尽了双重责任。

我一直沉默不语听他说完，问道：“我碰到问题该找谁？”

他未料到我思想仍搁浅没有一点进步，生气道：“你怎么不开窍？！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该找谁？是你想的吗？一切由不得你做主，听组织的。”

我直视着他，毫不回避，心中仅有的一点长辈观念荡然无存。在这最后关键时刻向他求教一点护身的主意，他竟拒绝，如果我是他的女儿，他做何想？！突然悲从心涌，如果父亲还活着，你们敢这样欺负我吗！

他或许是窥见了我的心声，不自然地干咳两声不再说话，我与他没有道别就走出屋子。

屋外阳光明媚，花草盎然，我的视觉突然出现异常，花草阳光皆无颜色；一片光白，与我先前所见不一样，眼前浮现出林立果高大魁梧的身影，脸色苍白，紧紧地盯视我，我感到浑身一股寒气直透心里，不禁打了个寒颤。寒颤一过，一切又恢复正常。

入夜做了一梦：新街口一家书店门口围聚许多人，向店里张望，我诧异他们为何不进去。挤到跟前察看，原来墙上挂着一副美丽的图画：左边剔透的冰崖上悬空斜伸出一株粉色梅花，雪花飘坠在花朵上；右边一丛碧竹，枝叶上的露珠映着朝阳显得五彩缤纷，竹根下一棵兰草花发出沁人肺腑的芳香。从门口到画之间

的地板上铺满贵重的象牙玉石雕刻的器皿，人们无法进门。我用脚尖功夫利用空隙低头寻路至画跟前，想仔细看看这幅似真境般的好画。抬头再看，竟吓得双手捂脸“哇”地一声背转身去，正撞入一个军人怀中，他拍拍我背脊说：“没什么可怕的，这幅画本来就这样，你再仔细瞧瞧。”我心有余悸地转身看：漫天黄沙之中一座大荒坟，坟上的枯草被凛烈的西北风吹得摇曳不停，阴黑的坟上显出两行绿荧荧的小隶字：×××生于×年×月；卒于×年×月。没有墓碑名号，我从没见过这样大的墓，小隶字中的名字和具体年月数字都用×代替。我想让身后的那个军人给我解释为何这幅画“本来就这样”，因我先前看的并不是这样呀。回头一看，根本没有军人，四周黑暗，我恍若置身在一个黑洞中，惧骇中惊醒。

后来在中央专案组里，专案人员拿了出事现场照片给我们看，我觉得那一片沙漠地形很熟，似曾在哪见过，回想起这个梦，竟与林家父子最终的归宿吻合，真不知道如何解释。小时候，父亲病危前一段时间，我见到他身边有东西，幼小的心灵被阴暗的恐惧笼罩着；怕大人斥骂不敢说，现在人长大了还遇这类怪事。

昏昏沉沉地到了离别南京的第四天，团里派了一部车静悄悄地将我送到火车站，全团都在郊区营地，没人知道我走。

火车启动时，我憋了很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望着母亲哭起来。母亲十分不舍，再三叮咛：“多来信，想家就回来看看。我有空一定会去看你。”

我哭得更伤心，这火车轮一转，从此命运不再由我支配，我已失去了自主，“侯门深似海”，一入皇苑禁地，不知何年何月在何种情况下才能重返故乡。

改行学医

六月初的南方田野花团锦簇，油菜花、荞麦花、萝卜花、紫云英、槐花等等处处盛开，每到这个季节，我都跟兄弟们到田野里放蜂采蜜、上山采茶、摘蘑菇木耳。从车窗看着一片片田野快速往后逝去，我的心好似一点一点被削去，空旷、孤寂与恐惧的感觉随着车轮的前进越来越深，我面临实际的威胁越来越近，如何处置？该怎么办？北京虽然有许多熟悉的长辈，但我不会再有自由，不可能得到他们帮助。我将独立面对一切。

六月四日下午我到达北京，胡敏与吴秘书已在站台等候。见面无语，胡敏神情上略显出尴尬。上了车，胡敏微叹，说我瘦了，为何剪掉头发，她说话很小心，双方心中都有“病”，这话说多了也乏味。一路无语到了东郊七机部招待所。

我单独住二楼，两边走道封死，走廊上放一张乒乓球桌供我活动，一天三餐由招待所所长负责送上来，服务员及闲杂人等不得上楼。

胡敏安置妥当后又交代我：“不要到外面去，随时会有人来看你，需要什么告诉所长，他会替你办。”我知道自己又进入软禁状态。

胡敏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后你不能再搞文艺工作。我们考虑你改行学医，今后不管做什么，掌握一些医学知识很有用。很多首长的夫人都学过医，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懂医，照顾起来方便。”她见我无什么表示，又接着说：“现在有三个地方供你选择，一个是总后的七医大，在重庆，太远；一个是河北石家庄护士学校；还有一个就在北京三〇一医训班，你看哪个好？选择一个。”

我未料到此生还有机会重履父亲遗愿，也未料到她根本不提

林立果之事，喜悦下感到有了一线暂时摆脱的希望，我很快答复道：“既然学医，就要正规，我想去重庆七医大或者石家庄护校。”这两个单位的学制起码在三年以上才可毕业，我便可以既学到技术又可躲避三年。

胡敏不禁又笑又叹，指着我说：“就知道你会这样。重庆和石家庄离北京太远，照顾你不方便。三〇一的医训班不错，就在北京，你和立果接触也方便，不接触怎么培养感情呢？”

胡敏成功地探明了我的态度，将我“冷却”在招待所里一个多星期，每天除了吴秘书来送一些新鲜水果看看情况以外，就是所长陪我打牌下棋打乒乓球。所长严格履行职责，从不问我来龙去脉，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格外开恩把凉台门打开，放我站凉台上看郊区景致。一只喜鹊天天飞到凉台上啄食我喂它的点心，食完朝我喳喳一阵便飞走，望着它飞去的那份自由，心内羡慕不已。

六月中旬我进医训班学习，学员都是三〇一总医院系统下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老护士，以所谓的新教育法快速培训升格为医生，学期两年。教学楼兼宿舍就在三〇一医院后院靠游泳池的地方，与高干病区大楼仅一小路之隔。

胡敏嘱我“不可泄漏身分”，为我改名“张一宁”意即中国只此“一宁”。我笑了，说一宁与张宁没啥区别，我还是叫张宁的好。她说不行，就叫“张力”吧。

“张力”来到医训班，想保密也难，护理待遇与住房格局一眼就让人瞧出来头不小，本来就是“护士”，还要专人负责护理食药，大家住集体宿舍，我却一人独霸一大屋。我那纤纤身材，走路模样，神情气质也让人瞧着不像医路(一路)的人。身体好好的，动不动三天两头由护士长带到高干楼检查身体，那是中央级首长去的地方，吃的保健药也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人们纷纷猜测我的“身价”，不知怎地传出“她是副统帅的儿媳”。偏巧

“林办”的于秘书和李秘书的爱人也来医训班进修，两人守口如瓶，甚至不跟我接触说话，越这样越显出反效果，人们更确定我是林家的人。

一切都是上面安排的，我无需表示什么，以往的经验，表示也没用，随它去。我很注意与大家的关系，相处的也不错，有些人旁敲侧击希望从我嘴里得到身分证实，这正是我不自在的心病，即使没有保密规定约束我，我也不愿扯上这层关系，我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待我，我就不会觉得孤独了。但是无形的等级观念仍将我与大家分开，加上我原本就不爱说话，生活习惯南方化，一点小事上都让人错觉我娇气：人家吃水果不剥皮不洗，擦擦就吃，我要洗了再剥皮方才下肚；吃饭素来食量小，窝窝头几口，照顾的鸡蛋炒饭也是几口，好坏一样。

我的功课很多，因为没有基础，压力很大，新式教育法是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经常去病区以患者病症针对课业讨论，老护士们“轻车熟路”很快贯通，我却要死记硬背消化成理解。课程项目多，进程快速，林立果和叶群三天两头接我出去，我真是分身乏术。精神压力大，常夜里失眠，不得不吃安眠药维持，学业无法正常进行，到后来简直就是混。

我很想当个医生，却学了艺术，未料到林立果为我达成了父亲的遗愿，却又偏偏是他们干扰我认真学医，看来我这命是一生都可能被他人支配，自己想做的事却做不了主。

后来我学习的态度很消极，认清了所谓的学习只是个形式，叶群根本不存心让我学什么，林立果又急着想结婚，我唯一可利用的就是以医训班的学期为借口，拖延林立果的结婚要求。

第四章

在林家的日子里

初进毛家湾

林立果偷越“禁区”

夹缝里生活

见林彪

林彪接见总院院长靳来川

初进毛家湾

叶群对我有如鲠刺在喉，咽下去疼，吐出来难。她为林立果所做的一切，一是迫于林彪的表态，二是为了笼络儿子的心。她对我又忌又恨，唯一报复的方法就是从精神上虐待我，只要有机会，便假以颜色给我看。

林立果盼我到北京却见不到我，叶群吊儿子胃口也是迫儿子今后买她的账，以我做交换条件。林立果不是没有眼色的人，为了我引发父母翻脸，他已占了上风，人既已到手，见好就收，上下大小仍然有序；给叶群一个面子下个台阶，今后的麻烦也会少的，他顾虑叶群会拿我作出气筒，所以他很克制。

我到北京后十天，叶群见林立果很“老实”，没有不顾老娘的面子私会我，这才下了“懿旨”命我去毛家湾见她。

胡敏把我从医训班接到家里，景物依旧，却少了一个因我而遭到迫害的江水，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能向胡敏打听江水下落，她不会正视这件事，我心里虽然很冲动，却也明白不会有结果。

上午十点多钟，林立果开着他的蓝色伏尔加汽车到达胡敏家。我坐在胡敏卧室外间的起居室里，突见林立果快步走来，那股冲劲从脸上绽露的喜色毫不掩饰他的激动，虽然他的笑容带点羞涩，却仍让我内心一阵战栗。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就紧张，我对他的成见太深，自卫的本能太强，我未曾想过试着去理解他适应他。我到后来才明白，是他的行为伤害得我太重。

我缓缓立起身，向他行军礼，低下头不说话。他僵立着望着我，手足失措地不知怎么好。胡敏跟进来见状缓和道：“来来，都坐下，站着不好说话。吃糖、喝茶、随便聊聊，等部长回来，吃顿便饭。”她将我们安置好，笑咪咪地退出起居室。

林立果隔一会干咳一声，隔一会又干咳一声，以期我听到他的咳声抬头望他一眼。我真的上当，心想他干吗老咳？他一咳我便望望他，他就迎着我的眼光发出期待的笑容。我低下头不做回应，不管他什么感受，我不感到有任何情趣。他很尴尬，端起茶喝两口，说：“你喝茶，这是龙井茶。”

“我不喜欢喝茶。”

“你吃糖吧，这是花生糖，很有营养。来，吃一颗。”林立果把一颗剥了糖纸的糖粒往我嘴里送。

我将头侧过一边，从他手上接过糖。“谢谢，我自己来。”

林立果变得局促不安，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见到我总不说话？”见我不吭声，他又问：“医训班的人对你好吗？”我点点头。他又说：“其实我也不爱说话。听说你吃安眠药，能不吃最好不吃，你要锻炼自己的意志，要坚强些。我从不吃安眠药，我的工作很多，每天再忙，到了十点就睡觉，思想上筑起一道堤，再多的事不去想它，睡好一觉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你也要这样，吃安眠药会影响你身体，你照我的办法试试看。”

林立果说完脸上发红。我看着他，他越发显得窘，低下头喝茶。他皮肤像林彪，白皙，腮须挺浓，刮过就显得肤色青白没有血色，出现红潮就很明显。他眼睛不小，像叶群，配上他父亲的那道浓眉高鼻，相貌不算丑。只是想问题和生气时喜欢斜视，他父母没有这个习惯，不知他心中崇拜哪个偶像学得这副丑模样，厉害的时候连脖子都歪了。

我们僵坐着，他喝茶我吃糖，我很想坦率地向他谈出一些想法和看法，我认为所有的问题根源出在他身上，与他直接谈不管出现何种状况，都是最有效果的，其他人为他服务，我与别人谈，只能增加麻烦而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心中一直期待与他见一面。但眼下的场合不适合，我不愿意事态再恶化，这种事很敏感，不能让他觉得太丢面子而恼羞成怒，我想和平地解决这层关

系。

邱会作到家了，胡敏进来一见我俩的模样就明白这次接触又没“来电”。她请我们去餐厅用午餐。席间邱会作仍是一副长辈样子，问问林彪身体状况再无多话，林立果回答完邱会作的问题也不说话。他不喜食中餐。吃两口就停筷，我精神不爽也吃不下，不到二十分钟应个景就结束饭局，桌上的四菜一汤几乎没有动。

胡敏圆场道：“立果今天有空过来坐坐，我招待得不好。吃了饭不要坐着，出去消消食。立果，你带张宁先走，我后面走。”又笑对我说：“立果今天给你当车夫。”

林立果根本不懂客套应酬，站起来就往门外车边跑，为我开了后座门，胡敏跟出来叮咛他：“你开慢点，别吓着小张。”林立果驾车技术很好，常跑飞车，转弯不减速，有时猛冲猛煞车轮迸出火星。他到家“林办”的人只要听车声就知道是他回来，其他司机不敢像他这般开车，都说他“开匪车”。

林立果以中速行驶，一路不断从后视镜瞧我，双方一路无话到达毛家湾。进了大院觉得好熟，心想他领我到“首长俱乐部”来做什么？迈进客厅乍见叶群和林立衡坐在沙发上，身边军人都是那晚见过的，才觉悟这里是林立果的家。

叶群见我进门，笑容可掬地从沙发中立起，身穿一套特制合身的哗叽军装，一头精心修理好像自然卷曲的短发，脚上一双棕黄坡底皮鞋，迎上前拉住我手向我脸上左瞧右看，说：“气色不错。怎么把那么好的辫子剪了？你豆豆姐就喜欢你的辫子，真可惜，不过短发也挺精神。来，跟我过去坐坐。”我注意到她说话时眼睛刹间冷峻地朝我背后望一眼，那位置站的是林立果，等我坐到她身边再抬眼已看不见林立果，他已从客厅里消失。

林立衡在我坐下后也落座在旁边沙发上，微笑地看着我不说话，叶群温言细语，状极可亲，问遍了我在医训班里的生活学习

与身体情况，叮咛我要注意保密原则，要注意健康不要生病，因为今后会经常接我“到家里来”，我的健康关系到林彪的安全和健康。

说话间胡敏进了客厅，叶群拉住她手再三言谢，说：“你辛苦啦，我还得谢谢你呀。”我知道她在做给我看，因为她那双眼不住地瞟我。

李处长走进客厅伏在叶群耳旁悄语，叶群立起身说：“今天首长身体还可以，我领你们去见见首长。”

熟悉的灯光幽暗的长廊，那间“乒乓球室”的对面，绿色帷幕拉起敞开像一座门，大客厅沿墙四周放一圈沙发。林彪一身银灰色中山装、黑色布鞋、头戴银灰色帽子端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他见我们进来，微笑地直视着我们，又望望叶群，意思是等她介绍。我和胡敏被叶群领到林彪跟前——介绍握手，他坐着没有起身。近距离观看接触，我不禁从内心感到惊异，他竟然如此衰弱，手冰凉单薄没有劲，我相信以我这样的体力轻轻推他一把他肯定会跌倒。战功赫赫威扬四海的副统帅身体如此差，出乎我意料。电影上看他虽然瘦，亿万人民祝他永远健康，实际上他却是个生命烛光摇曳暗淡的老人。我内心突然涌上一阵莫名的哀伤，我仍然笼罩在政治信仰中，这种感情自己一时辨不清楚。

后来我知道林彪装假得很痛苦。坊间盛传他吸食毒品，他自己并不知道吃什么“药”。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毛泽东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下令医生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说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到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的“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人们可能还记得他每次上天安门讲话的腔调拖的又长又亢奋，却没底气，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气，每次下了天安门回到毛家湾便大病一场，数次连番用药，险折林彪性

命，叶群曾为此嚎啕大哭过，自责道：“首长这么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林彪接见我们约十多分钟，叶群对他褒扬胡敏：“胡主任为孩子们的事操了不少心，孩子们的事得好好谢她，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胡敏谦道：“哪里，首长、主任都为国家大事繁忙，这是我们该做的。”

叶群又对林彪说了安排我学习的情况，林彪自始至终微笑着听她说，该点头的地方点个头。直到我们要出去了，林彪发话问陪坐的林立衡：“你好不好？”

未等立衡开口，叶群代答道：“豆豆不错，最近忙些，今天是胡主任和张宁过来，豆豆来陪陪。”林彪和立衡对望着，父女俩都不再说话，大家退出。

直到我离开毛家湾，林立果都没露面，这以后成了规律。叶群代替儿子跟我“谈恋爱”、“培养感情”，只要林立果露一下面，叶群就不高兴，林立果在家里也失去了与我接触的机会。

林立果偷越“禁区”

从毛家湾回来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到医院将我接走。怕我不走，谎称是叶群安排我们到周宇驰家去作客。我想既然是周宇驰家，一定有家属在，放下心跟他们走。

行车途中林立果情绪很好，周宇驰驾驶，林立果坐我身侧，不住侧脸瞧看我神情，双眼常看我的手。我看那神情是想接触我的手，便将双手放在腿上握成拳交叠着，不让他有机会碰我手指。

林立果见我这样，突然无声地笑起来，对周宇驰说：“老周，把音乐开开，轻松轻松。”说毕又朝我笑，我明白他在说

我，反倒不好意思。

我非常惊奇，以为耳朵听错，音响里传出的竟是西方摇滚乐，在当时红透天的文化革命中，听这种音乐即是反动，在基层准被政治收审。林立果欣赏我惊疑的神情，问是什么音乐，什么音响，我说是立体声摇滚乐，轮到他惊奇了。周宇驰哈哈笑道：

“嗨，看不出小张挺懂音响，还听出是立体声。”林立果摆弄的东西都是进口渠道得来，在当时社会上是稀罕物，我懂得这些得赐于两次出国见了世面。

林立果高兴地问道：“你喜欢吗？”我点点头。他更加得意地说：“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周宇驰从后视镜中看到我神色不对，忙打岔说道：“别扯远了，莫谈国事。哈哈。”林立果不服气地嘴里“哼”一声不再言语，我却沉思到他的话意里，“旗手”不就是江青嘛，“四荤”（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八素”（八个样板戏），百姓们确实早已看腻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成了江青独家“峥嵘”，谁敢说一点反对意见？林立果说的话我是不敢说，但他确实说到了点上，让人感到既惊悸又痛快。我内心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与众多高干子弟有些不同。但很快又被他父亲的地位解释了，并未察觉他内心政治上的叛逆。

车子驶进西郊空军学院，在一片不成林的小树林里有一幢灰砖两层小楼，周围房舍不多，挺安静，汽车鸣笛后，楼里跑出一个高大不说话的士兵，为我们开门，送茶倒水。我以为他是哑巴，哑巴怎会当兵？可他的神情简直与哑巴一般无二。林立果和周宇驰即使跟他说话，他只做事不回应。后来得知这个战士很老实极不喜说话。林立果很喜欢他，也信任他，平时就把小楼托付他照管。

这小楼从外面看是两层，实际上有三层，一楼士兵住着，一个车库和摆放东西的杂间；二楼客厅，一圈官式沙发，有乒乓球桌和一幕映布，可以看电影；三楼是林立果办公室，桌上放着保密电话，靠墙的“柜子”实际上是多个铝制手提箱摞在一起，每个手提箱内分类装着林立果的文件，出差时需用哪个拎起就走，省了整理时间。办公室隔壁是连带洗漱间的卧室，一张军用双人木板床，上面铺着草席，一顶白色尼龙蚊帐，被褥是部队发的，陈设很简单。我看了这里不像周宇驰的家，周宇驰不再隐瞒，告诉我这是“林副部长在空军学院的宿舍”。

林立果约我出来是想向我“交底”，他有心理准备，我却无数，一见周宇驰退出去我立刻紧张起来，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忐忑不安，额上不禁冒出汗来。林立果从沙发边一箱汽水中拎出一瓶开了盖递给我，我吸吮两口觉得太刺激，摇头不喝。林立果接过一口气灌下肚，见我冒汗便趋前动手要替我脱衣服。其实他是想以关心示好，我却更加紧张，忙避开他自己脱了军装外衣，内穿淡苹果绿衬衣，他竟看得眼发直。我知道自己皮肤白，配上这件衬衣更显得亮，可我压根儿不想引诱他，也没别处躲，只得低头坐着。

林立果看好久，不禁叹口气说：“你为什么总把我们的距离拉那么大？”他知道我不会回答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我出来一次不容易，这次出来时间也不能呆得太久。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们的事，叶主任有意见……”

我反应极快接口道：“主任有意见，你应该听她的，她国事繁忙，再为我的事操心太不应该了。”

林立果不睬我的话意，接下去说：“不过她已有了一些改变，在这件事上我们各作一半主。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告诉你的是让你知道她的真实态度……”

“在终身大事上你应该遵从你妈妈意见的……”

“不，”林立果打断我说，“我和立衡从不叫她妈妈，只叫她主任。你以后也要这样。”

就是官场表面文章也不至于不认妈啊！他们母子之间怎么回事？我不理解地望着他，他表情冷淡，谈及母亲会有这种毫无亲情的感觉，实在令我吃惊。

林立果见我很不安，进一步说道：“我们的事，主任是孤立的，现在是三比一。主任对你有意见，你心中有数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我平时工作忙，很少回家，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你要忍耐一段时间，等机会我想办法把你调到空军，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但是现在还不行。”

我仍然没有表示，他突然问道：“你看我们现在结婚怎么样？”

我惊得抬头望着他连连摇头道：“不行。医训班刚开课，学习期间结婚影响不好，两年以后毕业了再说吧。”

林立果似有准备，但仍显出一丝失望，沉默好一会儿低沉地说：“人是有感情的，你老这样，我也受不了，今后我的工作会经常外出，你要理解我。”

这下触到我的心病，心里恨道：“早料到你婚后家里摆设一个，外面养上几个，随你去，反正我早看透了，我这一生婚姻徒有虚表而已。”我对他的成见使我竟然完全不理会他的感受，反把他往坏处想。以后才知道他在生活问题上还是挺认真，叶群看上要控制的女孩他看不上；他自组的空军选人班子为他选在身边的女孩他不染指，因为他自组的班子是为了对抗叶群做给叶群看的，反而他身边人受惠，几个像样的女孩介绍给他们做老婆或恋人。直到九月十日晚上，他因强烈的精神挫折而寻求小张的安慰。他对小袁有好感，却不去碰她，就像对我一样，始终不强求。

林立果很烦闷，脱掉军外套，说我：“你就不能跟我说几句吗？怎么老是跟我没话说？”

我想我的态度他是清楚了，只不过不愿正视罢了，谈也无益，最重要的是为江水开脱，便问他：“江水的事你知道吗？处理得不公平，你要说句话。”

“江水？！哦，你是说那个警卫参谋。他的事后来听说了点，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替你问问。”林立果说的是真话。他心里有气，也反击我一个下不了台的问题：“听说你跟曾邦元谈恋爱，有这回事吗？”

“你为什么不说我跟小李谈恋爱？我和曾邦元只是朋友，根本没谈恋爱！你听谁胡诌？”

“看你，生啥气，我也是听人说的，我在江苏的耳目很多啊，你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我瞪大眼瞧他，他虽有点不好意思，但神情和笑容显示调侃的味道，再认真下去恐怕落他的圈套，扯不清楚的事不谈了。

我又想到离开南京时，新任孙政委与我告别的一段话：“小张，你走了我们不能送。我虽然不知道你身上的事，但你上去见到首长的机会不会少。如果有可能，向首长问问落实‘五·一六’分子的政策。运动这么搞下去，揪出的人越来越多，将来怎么落实政策是个大问题，我心里不踏实啊，我就这一件事拜托你，一定别忘喽，有消息给个信。”当时我已听出孙政委对运动有看法，与我内心想法不谋而合，我一直不相信与我朝夕共处多年的战友们一夜之间会变成反革命，不就是造反过头了嘛，认识错了就算了，干吗非要打成反革命？！

我很认真地问林立果：“基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我团二百多号人有近二百人是‘五·一六’，这也太玄了。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涉及到落实政策，运动搞到什么时候算个了？”

林立果初时睁着“刮目相看”的眼神看着我，瞬间哈哈笑起来，不假思索地道：“我不相信有‘五·一六’。江苏搞出那么多，上海就没一个？都是张春桥和许世友在争夺势力范围。那个张春桥就怕掌握不了军权。”

我脑袋好似挨了一重击，他的话和语气超然，与时政格格不入。我不理解地驳斥他：“清查‘五·一六’集团是毛主席下的指示，你爸爸也说过，全国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打倒‘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你怎么这样说？”

林立果不屑地一笑，说：“你刚上来，很多事不懂，以后你就知道。怎么给你解释呢，你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名言吗？他说政治斗争是最肮脏的，无实话可言。”

我傻愣着，思路完全转不过弯，我再次强烈感到他与很多高干子弟不同，他的思想与我们这一代受着同一教育模式的青年人不同。他很敏感，知道我想什么，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教育正规、条件优越、潜力很大，但没有出息。文化大革命都起来造反，革命者都成了反革命者，‘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好啦，我看你对我的观点一时不会理解，不说这些了，谈点别的吧。”

他的观点我想都不敢想，在基层他应该是进政治大牢的人，但他是林副主席的儿子，他的背景给予他特殊的政治待遇，可我觉得除了这些客观条件以外，他确实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个异数。

林立果主动介绍他的爱好和生活，言谈中不时让我感到他缺乏母爱和孤独的情怀。他坦承对选美有看法，我知道了他在这一问题上和林立衡是统一战线，叶群对他的控制简直不像是一个母亲。他说：“我忍受不了，我常下部队。只要回北京，到哪里她都派人盯着，我汽车上也被她安电话，常打电话找我，走在路上她也知道我在哪里。我今天约你来这里，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再有

机会，我知道我们之间有距离，但你为什么还要人为地拉大我们的距离？人的感情是珍贵的，你不要再有心理上的隔阂，好不好？”

他的神情和语气很坦白，我受到感动，但小李和江水的事在我精神上是块阴影，我忍不住哽咽道：“我知道，但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

林立果替我擦眼泪，我没有再回避，内心委屈和无奈，又添了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对林立果的同情，眼泪竟不听话地流个不停。

林立果真的尊重我的意思，没有在我表示出软弱的时候乘虚而入，他的温情止到替我擦眼泪。我不由地多了一份安心。

客厅外面有人敲门，周宇驰捧着半个西瓜进来笑道：“喂，大热天说那么多话，吃块西瓜解解暑。”

我摇头道：“谢谢，我不吃凉东西。”

林立果一听，立即对愣在那里的周宇驰说：“去把西瓜用开水烫烫。”

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他一脸正经，不是开玩笑。周宇驰真的将西瓜切成块装在碗里用开水温好端给我，我不得不吃。微温的西瓜吃在嘴里忍不住觉得好笑，这林立果做事违逆常理，亏他想得出，怪不得他父母常说他“邪端异说”、“标新立异”，看来说的是真话。

林立果问我：“好不好吃？”看他那副“傻”样，我真不知说什么，因为温吞的西瓜一点不好吃。

周宇驰在一旁见状凑热闹“打边鼓”说：“副部长要人侍候，今天倒侍候起你来。我们副部长是个天才，他搞的东西我们不懂，他搞技术革新，我们都得向他学习。来，我拿几样东西给你看看。”说罢跑进一小屋搬出几架摄影机、收录机、报话机、高焦距相机之类的东西，这些在当时是民间看不到的甚至被认为

是“特务工具”。周宇驰介绍说，林立果正改造它们。我听着很乏味，因为我根本不懂。林立果见我不感兴趣，叫周宇驰收回去并传中午饭。

午饭很丰盛，七八样菜摆满餐桌，周宇驰说林立果不吃中餐，今天特意陪我。没吃两口我就胃疼，停筷不食。林立果想重做，周宇驰问我想吃什么，其实我是心里堵得慌，食欲全无，吃了两口反而引发胃病。

坐回沙发不久，胃里剧烈绞痛，疼得虚汗淋漓喘不上气。林立果发现时我已是忍不住痛苦上脸，紧皱眉头，脸色苍白，舌头渐渐发麻。我过去犯有这种诊不明的病，一旦舌头发麻，离休克就不远了，我心里紧张极了。

林立果见状，立即架扶我进卧室躺下，转身跑下楼，隔不一会儿端着一碗烧开的桔子水来到床前。他从不喝白水，渴了就喝饮料。他劝我喝口桔水暖暖胃，我担心甜水下肚更糟糕，不肯喝。他便蹲下靠着床头用小勺强喂我几口，将碗放床头柜上，叫我躺一会儿休息，他退了出去。周宇驰怕出事，劝他快送我回医院，他不肯，要等等看发展再说。

我调匀呼吸，静静地躺着，竭力让思想平静，我知道发病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太紧张，林立果向我交底，无意中让我知道叶群的态度，今后面对这个强势女人，我如何自处？很可能将来她就是我的婆婆，我将在她面前怎样生活？这种地位的女人对我有意见，放在任何一个女子身上都经受不起啊！林立果的关心反增添了我更重的精神负担，竟当他面险些发病，我也真是太软弱了。而林立果至死都不知道这场病是他吓出来的。

躺下不一会儿，气顺了，舌头发麻的感觉消退，除了胃部仍胀痛，其余感觉都渐好。林立果进来蹲在床头凝神呆呆地看我，我不好意思坐起来，说要回去好好休息。他把我一只手放在他双手里紧紧握着贴在额上呆了一会儿，答应了。

正在此时，周宇驰推门进来，神色紧张地说：“主任正在找你，快送小张回去，你也快回去。”

下午近五点我回到医院，像来时一样，林立果不敢把车开进大院，怕人认出。以后来接我的车都这样，离医训班很远，就像做贼似的怕人见到。

夹缝里生活

林立果大学时期一位同学正是胡敏的大儿媳，父亲是国务院煤炭部部长，“文革”初期惨被斗死。一天，她来约我去毛家湾玩，一路上向我介绍林立果的为人。同辈的人容易说话，我听得进去是因为她说的与我感受到的一样，她和胡敏不知道林立果自己的行动比旁人做多少次工作都有用。

叶群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拉着我靠着她坐下，又问饮食又问睡眠，亲热地说：“到家啦，随便点，以后你要常来陪陪我。”要不是林立果向我交了底，真会让她灌迷糊了。

闲聊间，叶群突然斜睨我背后，表情骤然冷却，就像做戏一样把我吓了一跳。忙回头看，林立果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立在我背后。叶群耷拉着长眼皮声调平板地对他说：“你工作忙，走吧。你忙工作我支持你。”她分明是赶林立果，我垂下头，耳里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再好的会客气氛也会被叶群这种毫不掩饰的不近情理的态度破坏。可是叶群转眼之间又笑容灿烂，好像刚才走的不是她的儿子，面前坐着的也不是她未来的媳妇。我深切感受到林立果为什么不叫她妈妈，她根本没有一点母亲的味道，称呼她“主任”一点不冤她。

胡敏随后也到了。内勤端出茶水和水果，东北出产的紫皮大樱桃南方从未见过，我拿一颗品尝，抬头见叶群正不高兴地盯着我，想起林立果的话：“主任迫于压力妥协了，她对你有意见，

内冷外热，你要注意。”立即收敛。叶群移开视线与胡敏说笑，又说我：“你是家里人，还不快招待胡阿姨。”

我实在是没有准备这么快就成为她的“家里人”，她刚才对我和林立果的态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的人。

胡敏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很了解叶群对我的态度，但她不能说什么，她以客人和下属的身分恭谨地应酬着叶群。

直到出门叶群没再与我说一句话，好似我不存在。林立果从客厅外的走廊上两次经过，瞬间瞄我一眼，却不进门。想到今后夹在他母子之间我的日子怎么过，心里很不是滋味。

以后，叶群常在晚上派车接我上毛家湾看电影，她作息时间黑白颠倒，明知我白天要上课，却次次搞到深夜两点多才放我回去。说是让我“陪她”，却十有八九丢下我独坐放映室。她不准林立果进放映室。我也不能自作主张早走，我清楚她是对我们还以“颜色”，既入了“笼子”，只得由她摆布，每次都弄得我精疲力尽。不敢偷睡，她会中途突然进来，问我电影情节，我如果讲不上就是对她的“关爱”不恭。每次回去在车上我就睡着，抵达医训班还醒不来，负责送我的内勤警卫参谋小刘说我：“再把你拉回毛家湾你都不知道。”

更恶作剧的是叶群故意弄一些战争恐怖片让我看，一晚看两部，火把人烧得像鬼一样还爬起来挣扎喊叫，更加重了我的精神衰弱，失眠症越来越重。她忌讳儿子与我约会，把白天和晚上时间排满，没有多余时间让林立果钻空子。

林立果知道叶群折磨我，向她提意见：“张宁本来就睡眠不好，体质很弱，不能再让她看恐怖片，也不要每次都搞那么晚。”

叶群再见到我，脸上虽笑咪咪的，话却带刺：“听说你看了电影晚上睡不好觉？立果说你休息不好心疼你呀。好啦，既然不喜欢，我叫他们换掉，不然立果要怪我不让你睡好觉啦。”

有一次叶群心血来潮，召集胡敏和林立果及他空军的一帮同事们到毛家湾玩儿，难得的一次聚会，叶群还差一点跟林立果闹翻脸。

起因是叶群要大家出节目，她“哪壶不开提哪壶”，首先点林立果的名，林立果腼腆不肯，叶群当众变脸，冷冷地盯视林立果，不说一句话，全场人惊得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见。林立果没料到叶群当众叫他难堪，也动了火，不示弱地斜睨叶群，一脸煞气。母子对峙的场面真叫人害怕。我想解围，搞文艺的出个节目并不难，但立即敏感到叶群是使气，故意当众煞林立果锐气，这不但是让我看，也是让林立果那班“弟兄”看，我若出头可能更糟，不定说出什么难听刺耳的话呢。

周宇驰挺灵活，找的借口也恰当：“立果是我们空军的人（他故意不提林立果副部长职称），我来做个代表出个节目，不会唱跳，说个笑话。”他说的是丈夫怕老婆打，钻床肚里不敢出来，还对老婆理直气壮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故事讲完了，叶群有了笑容，大家松了口气，气氛稍缓。林立果却仍然阴着脸不高兴，叶群也不理他。

胡敏为不使僵场也来一段“山西人爱吃醋”。一个人出差到山西，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有醋缸，大小餐馆落座先上醋。离开山西上火车，车头启动发出“哧呢，哧呢”的声音恰似“吃醋”，这人说山西人爱吃醋连山西火车也吃醋。胡敏嘴里模仿火车启动声维妙维肖，逗得大家满堂笑，叶群乐得直拍胡敏肩膀说：“你真会说笑话，看来你还是个能手，有空常来，给首长说说，逗他乐乐。”

胡敏不好意思道：“不会说，凑凑趣吧。”

林立果情绪也好转，对胡敏儿媳说：“老同学来一个。”

大家不约而同向她那八个多月身孕的大肚子，我想林立果太不照顾人，难为个孕妇干什么。胡敏的儿媳倒很爽快，立起身

笑道：“献丑了，没什么节目，给大家弹个曲。”她手上没乐器，弹什么曲？大家不解地望着她。她转过身去背向大家，右手捏鼻，左手食指揪点鼻翼，顿时发出一种极似吉它的音色，悠扬地“弹奏”一曲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歌《老朋友再见》，模样实在滑稽绝顶，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众人笑声不止。叶群笑出眼泪，掏出手帕揩拭，上气不接下气地连说：“绝了！绝了！她怎么弹出来的。”胡敏怜爱地望着她的媳妇，微笑不语。她很喜欢这个既有知识又通达世态的媳妇。两个月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她正生产做月子，公公婆婆和丈夫相继被捕，精神上遭受很大刺激。出了月子自己又被审查，大家小家全毁了。直到改革开放，她赤手空拳只身闯深圳创业，凭能力才干当上蛇口工业开发区组织部部长。我去见到她时，完全是一副女强人的架势。后又去日本创业，是个很能干的人。

她“弹”的歌曲一点不走调，隔房听真以为是吉它，恐怕专业演员也未必能练就这份绝技。曲终，她转身还报林立果一箭：

“立果，刚才你点我，现在该我点了，请张宁为大家跳舞。”周宇驰带头起哄，又鼓掌又叫：“好，好！该小张出节目。”

我早有心理准备，临到头还是有点怵，我忌的是林立果，见叶群期待地望着我，林立果装得若无其事漫顾众人，我立起身感觉与前番想硬出头的心情不同，跳了一段新疆舞《牧羊女》，是出国时向东方歌舞团维族舞蹈家阿依吐拉学的，也是我出国时的保留独舞节目。

舞毕，众人鼓掌，叶群笑呵呵地说：“到底是专业舞蹈演员，感觉就是与众不同。”林立果虽不说话，得意之色溢于脸上，我对他的冷淡和回避都让舞姿填补了，我的沉默也让身段表演打破了，这身体线条的扭动比跟他讲话还令他快活。林立果的眼睛盯在我脸上，我感到脸上发烧。胡敏的儿媳朝林立果叫道：

“立果，你刚才就该点张宁，想护她我就偏点她，怎么样，没点

错吧？”林立果经她这一嚷嚷，不好意思起来，脸上微微发红。

叶群笑眯眯地招呼我：“过来，把糖和水果分给大家吃，你是家里人，要学会待客。”看她神情似乎是真诚的，我便上前拿起她茶几上的糖果碟子逐一给众人分糖。慌乱中有人分到，有人分不到，因为我还分不太清哪些是“林办”的“自家人”，哪些是客人，当我跳舞时，陪客的工作人员也在场。给林立果递糖时，他不动声色地轻轻捏了一下我手指，我慌得不再分下去，退到叶群身边。

叶群兴致很高，站起身拉着胡敏去见林彪，叫我和胡敏儿媳陪同，众人退去。

胡敏在林彪面前显得有点局促不好意思，她婆媳俩在叶群的催促下重演故伎，林彪破例张嘴嘿嘿笑出声。我已多次见他，发现这是他高兴的极限，手动了动，身子也随着笑声挪了两挪，不像一般人高兴时身体动作那么大。叶群仍是前仰后合笑出眼泪，向林彪说：“胡主任是个活宝，笑话可多啦，以后让她常来给你讲讲。”林彪不置可否地微笑不语。叶群又点我跳舞。“把刚才那舞给你林伯伯看看。”我不好意思起来，眼望着林彪。林彪看着我，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动作，便对叶群说：“小孩子和老人是反比。”叶群马上解释说：“首长是说小孩子不好意思，我们老啦，就不一样了。”言罢不满地瞟我一眼，但林彪仍然温和地微笑着望着我，我便安心地坐着不动。

林彪问我：“你爸爸哪里人？”

“江西兴国县人。”我回答。

“啊，与邱部长和吴司令是同乡啊。”叶群说道。其实她早知道，是在林彪面前凑兴。

林彪又问我：“他哪一年参的军？”

“一九二九年，长征时是四方面军。”我很快答道。

林彪思索自言道：“江西的，二九年，是一方面军，不是四

方面军。”

我不自觉地纠正道：“不是一方面军，是四方面军。”我自信没有记错，因为爸爸自传上这么写的。

林彪初时一愣，随即微笑不语。叶群向我解释：“你林伯伯没有说错，当年你林伯伯经过江西，带出那批兵，编在红一军里。长征开始后，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又把这批江西兵拨给了张国焘。你爸爸是红一军的人，是你林伯伯带出来的。这段历史你林伯伯最清楚。”

我觉得很新奇，爸爸初时是红一军的人？怪不得同期出来的周伯伯会给林彪当警卫排排长。

党史怎么写，百姓不知道。亲身经历的人说的事，不由得我不信。望着林彪，心中突发一感想，如果爸爸仍然是红一军的人，如果爸爸在一九四七年支援东北成功（当年胶东军区奉中央命令调派一部分优秀干部支援东北，爸爸走到大连被敌军阻隔，又折返胶东），爸爸的历史和命运又不一样，也不会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去世。长征，尤其是四方面军的艰苦，把他原来挺结实的身体彻底摧垮了，又经长期的抗战，积劳成疾，身体再也没有恢复。

望着林彪瘦弱的身型，脑海里浮现出我记忆中的父亲，临终的最后那两年，也是这般单薄苍白，个子高矮也一样，他们在外型上的某些相似令我感到奇怪。想到林立果对我这段解不开的情愫，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林彪一直注视着我，可能是我想问题的神情引起他的注意。我对自己刚才的唐突对话感到不好意思。叶群对林彪说：“张宁怕死尸，上解剖课昏过去啦。我看解剖课不用让她上了，改上英语课吧。今后不但要搞中国革命，也要搞世界革命啊。你同意不？”

我吃了一惊，她明知我是福尔马林过敏加上夜里休息不好造

成的体虚，哪是怕死尸？怎么讲出来又变了呢？不上解剖课算什么学医？

林彪略显讶异，对叶群说：“好吧。”又问我：“学医不上解剖课行不行？”

我下意识地摇头，突然惊悟忙看叶群，大概是林彪和胡敏在场的缘故，叶群表情很温和，没有因我逆她话意而变脸。

离开林彪客厅，叶群嘱胡敏送我回医院，胡敏却把我接到她家，林立果正等在那里。

坐下聊天，林立果开口就问：“你怕死尸？”口气和神情流露出一不相信与可笑。

我叹口气，误会太深无从说起。我告诉林立果开始时我确实怕，一个人睡就是不关灯也觉得床底下躺个死人。解剖室十几张停尸床，男女老少各式各样，不看人光是那浓烈的福尔马林味就令我窒息。毛家湾的人常来接我，不是旷课就是得不到休息，若再减去一门主课没法继续学习，影响也不好。

林立果表示理解道：“不管主任怎么安排，你要有意识锻炼自己。现在一切都得听主任的，再坚持一段时间吧。你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家里有什么困难，我能办的都会替你办，告诉我。”

“快放暑假了，我想回家看看。”我很想家，对这里的一切不习惯，不管叶群放不放我回去，只就林立果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是否真心体谅我，还我公平待遇。

林立果避而不答笑道：“我这个人事情多，老觉得时间不够用。今天约你来主任不知道。我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我走后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主任会常接你去家里，我不在你要注意点。联络地址留给你，给我写信。不要打电话，可能有监听。”

我很心灰意冷，“软禁”我到何时？处在这种处境下，怎么谈感情？无论对我表示何种关怀都缺乏信任基础，直到现在，林

家仍规定我不许对任何人透露身分，包括对自己的家人。强烈的不平等感和不安全感深深笼罩着我。林立果有意无意地触碰我的手，我木讷着不作回应。在他一方面，多少次勉为其难作出感情方面的暗示，我无法将感情升温到他需要的热点，他也一直不好意思大胆超越界限。曾有一个年龄比我小的老演员的儿子对我说过：“宁姐，你的神态让人不敢亵渎冒犯。”也许林立果也有这种感觉，凭我的直觉感到他在内心不是没有一点愧疚，据接近他的女人们说，在她们面前林立果是个会说笑而喜怒不加掩饰的人，在我面前的克制与收敛，相信他与我一样不舒服。

后来我真的在假期间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直诉我的怨言：“在我俩的事上，我一直没有选择余地。”他没有给我回信，较长时间(一个多月)竟音讯全无，直到突然将我接去北戴河。

我明白我的信很伤他的面子，但我心理上怎么也平衡不了，处在心不甘、情不愿之下。林立果也很可怜，他是自找的，他若肯还我自由，也许我们的关系从性质上就会改变了。

见林彪

一天中午，叶群接我回毛家湾，她神情似乎不大欢愉，对我说：“你也常来，该见见首长。他身体不好不能多说话。立衡和立果也很少见首长，我领你去让他看看。”

我觉得她说话很勉强，情绪也不高，我已不是第一次见林彪，她的话真让我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

林彪静静地坐在四壁皆空的大客厅里，东南面是一排德国进口的防紫外线玻璃窗。他除了政治活动以外(他从不接见迎送外宾)，绝少户外活动。人可以不吹风但不能没有阳光，他的神经又受不住阳光直射，就靠这排玻璃窗给他一点活力。

叶群领我进去时，林彪正抬头张目望向门口，看来他知道我

要来。我与他目光接触，他微笑着，神态安祥，像个家常老人。

叶群进门之前就换了姿势，牵住我手备显亲热，走近林彪身边轻声细语道：“小张来看你。”

我问候他：“林伯伯好。”

他点着头微笑不语，右手微微抬了一下又放回原来姿态。叶群见状，吩咐我：“你靠着首长坐。”我便在林彪右边落座。叶群在左边坐下。

林彪侧过身来望望我，如此近地贴着他坐还是第一次，详观之下越发觉得他衰弱，声息全无，像一副衣架，脸色苍白发青，稀疏的须桩根根可见，当天一定是没给他刮胡须。

林彪见我静坐着不说话，便对叶群说：“这孩子很拘谨。”

叶群回道：“她不爱说话。”又带问带说地对我讲：“首长关心你。听说你来啦，要见见你。你吃饭睡觉好不好哇？”

我向林彪点头作为回答。心里分析我常来毛家湾他可能不知道。果然，叶群对他说：“我常接她回来。她害怕战争片，晚上睡不好觉。”

林彪应声道：“害怕就不要看。晚上不要搞得太晚，影响她学习、休息。”

叶群急速朝我瞟一眼，嘴里答应着说：“我叫他们以后每晚放一个片子。睡不好，以后就不安排她看电影，可以搞些其他活动。”

我心想主任干吗这样讲，首长打了一辈子仗，我的表现不引他反感吗？再看林彪正微笑地看我，并对叶群后面的安排连连点头，我才坦然了些。可是叶群的脸色并不好看，她欺林彪背对着她看不见，她的好话是说给林彪听的，脸色是做给我看的。

隔了两天，叶群又领我去见林彪。内勤送进一盘四川天府花生，叶群剥了两颗四粒递给林彪，他吃得津津有味，一粒粒细嚼慢咽。我见他吃完，又吃得那么香，这么高位的首长吃起东西来

也像民间老人一样让我觉得可怜又同情，更兼对他的尊敬与崇拜，便不加思索地也剥了一颗两粒，送到他掌心里。

林彪看看我，笑了，捡起一粒放嘴里嚼。

叶群马上对林彪说：“你不能多吃，虽喜欢吃，但一次少吃点。”

林彪将剩下一粒吃完，一共六粒小花生米，便停下不再吃。可是又伸手从盘中拿起一颗花生看看，那样子好像意犹未尽，犹豫着又放下了。我真想再替他剥几粒，六粒花生仁怎会吃坏肚子？可是见叶群直用眼角瞟我，脸色阴冷，我便不敢擅自动作。

林彪似乎也不怎么高兴，目光一直盯着那盆花生不言不语，直到我们退出，他都不抬头。

我当时并不清楚叶群在生活上控制林彪制定的种种怪规矩，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很多了解林彪的老同志不理解原来很精明的林彪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恐怕是解放后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和他中枢神经受伤造成的后果，竟让叶群十分得逞。我哥哥幼年时（五十年代）在南京见过林彪，他那时还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文革”开始，他的身体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走廊上，叶群披着军装闷头走在前面。当时江青喜欢披着衣服或披件斗篷，有地位的首长夫人多数跟着仿效，除了斗篷不敢模仿以外，都在本装外面再披件军衣，象征风度派头。我每次见叶群，没一次利索过，总是在肩上拉拉挂挂披件外套，有时便衣外面披军衣，有时军装外面披便衣，不军不民，在基层是严重的军容风纪不整，在她是党军融于一身，没人敢非议。

我跟着她进入小客厅，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翘起二郎腿，一脸不高兴地说：“接你到家里来，你要注意卫生。外边细菌多，首长身体不好，怕感染，吃得不好会坏肚子。你打过丙种球蛋白没有？”我摇头。“回头我交代医院定期给你打，那是防止

感冒的。首长身体差，你带病菌回来会影响首长身体健康。”

我气噤羞辱得一时不知如何应答。医院方面被她支使得三天两头给我检查身体，身边又陪着一个护士长，我打个喷嚏就得“上楼”（高干楼二楼，林家专用病区），保健药一大堆，定时定量监督服食。外边的水果不准自己买着吃，身边的水果吃前先得用PP水浸泡再剥皮进口，这样卫生了还嫌我带有病菌。不就是两粒花生米嘛，嫌忌林彪吃了我手上的东西，我无意中侵犯了她的“专利”权，一口邪气又发泄到我身上。

对她的无理专横，我只有忍耐。秘书被她看不顺眼，拉下脸训斥还会留点余地，我只不过是个“内定”的还没“明媒正娶”的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伦不类，要是别家首长的女儿来作客，她绝不会左右不是地对待人家。她嫉妒我“夺”她的儿子，难道还忌讳我“夺”她的老公？她不喜欢我，而林立果不肯放我又无法保护，我心下只有暗自叹苦。

叶群精神状态经常变化起伏，有的秘书说她到了更年期，有的秘书很实际客观地看待她的情绪变化。林彪因性格内敛，她从做新娘子起就得不到一般女人都期望的热情与温暖。从政以后的倾轧与角斗更增她对待人事感情上的畸变，以发泄多年积压的抑郁，有时竟变得不可理喻。秘书们一方面公认她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一方面也善意地去理解体谅她。外界说她和黄永胜有段情，其实她不敢也不会这么做，无非是调情借以消遣。她的地位官职虽大，就像江青上面还有毛一样，她有个依作靠山的林彪，老头子们没死之前，这两个女人绝不敢做武则天。

叶群非常敏感，任何一件事都要究根清楚，“林办”的人做任何事她都容不得眼里落一颗沙，“林办”的人之所以怕她，一部分是因为她这种性格，余下的便是她刁钻难缠的脾气。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遭暗杀事件震惊中央，叶群很紧张，她老说杀谭甫仁的凶手是身边人串谋，背景来历不简单。这件事让叶群不安

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身边人都怀有戒心，态度也变得一反常态的好。谭甫仁是夜间被杀的，叶群一到晚上就害怕，那段时间司机大杨的老婆小王来探亲，叶群见她老实不识几个字，暂把她留下充做内勤，她认为初来乍到的乡下女人最可靠，连跟了她多年的王老太太她都不用。一到晚上叶群就让小王“陪睡”，小王坐沙发上，叶群说黑暗中有个人影吓了她。小王躺到床边地毯上，她又说黑暗中听到人呼吸睡不着。小王只好爬到床底下，她还说床底下有人翻身更令她不安。折腾得小王坐到床尾看不见的地方，彻夜不能睡觉，出去小解还得蹑手蹑脚爬着出去，怕站起来万一她正醒着又吓着她。秘书们说，也就是欺负小王老实，作贱人家。

叶群为什么这么敏感害怕？自解放后，秘书换了好几批，警卫人员挑了又挑，李处长的出现才令林彪满意，大家都是一个忠心，却出现差异。就这样叶群仍不放心，这夫妇俩防谁呢？林彪一直认为谭甫仁死的背景没搞清楚，凶手在被捕前一刻“自杀”，活口死去，此案不了了之。

我想我的出现，在叶群心目中一定被视为“乱根”，自己的儿女都被她作贱得在家中立不了足，对我这个外来“异数”，一定会防范得更紧。林立果嘱我小心，不是没有道理。

林彪接见总院院长靳来川

约在七月初，林彪接见了三〇一总医院院长靳来川和曹政委。那天晚上，我先到毛家湾，叶群说稍后首长要接见院长和政委，要我作陪。我感到很突然，林彪为何要接见医院的领导，放着那么多国家要人不见，却要见医院的人。

晚上八点过后，靳院长和曹政委准时到达毛家湾，由我陪同他们先到客厅等候。靳院长和曹政委面容肃穆，端坐沙发上一言

不发。靳院长不时望望我，似想询问我接见的內容，因我也不知为何，故不言语。曹政委显得很拘束不安，我在医院只知其人并无接触，看去是个胆小老实的人。

约八点半钟，林彪在叶群陪同下走进客厅，靳院长和曹政委立即起身向林彪行军礼，林彪与他们握手时，叶群一旁介绍靳来川和曹政委的身分，林彪微笑点头在他们对面沙发上落座。

开场白仍是叶群，谦恭有礼笑态可亲地夸赞院长和政委治院有方，很自然地把话引到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上，林彪便开口说道：“医院的政治思想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技术要首先抓政治思想，用毛主席对医疗战线的指示教育医护人员，更好地为军队服务。”

靳与曹肃穆地聆听，不断点头。林彪又说：“医疗战线要注重培养自己的高技术人员，同时普及医疗技术。各行各业都‘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要走在前面。中国人口多，你们要搞出自己的特点，给全军医疗战线做个好榜样。”

靳院长向林彪汇报：“我院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面向军队，面向基层，全院床位收治率百分之百；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到偏远地区普及医疗卫生知识，为贫下中农免费治病。我们一定遵照林副主席指示，按照毛主席关于医疗方针的最高指示管理好医院工作，请林副主席放心。”

林彪微笑地点头，又问：“你们医院办了个医训班？”

靳院长答道：“刚开学一个多月，学员都是有临床经验的护士，进修学习后准备晋升做医生，弥补医生人手不足。这是暂时的措施。”

林彪点头不语，叶群插话道：“上海、重庆都有几所军医大学，要三到四年才能毕业。搞运动学生都不正常上课，靳院长在有经验的老护士中培养人材，短期收效，这也符合毛主席的普及教育方针嘛。”

靳院长面色凝重不再言语，曹政委不知怎的竟面露惶恐之色，不住地瞧林彪又看看叶群，我真替他那紧张模样出汗。

林彪听叶群说完便不再说什么，叶群特意叫曹政委“你喝点茶水”，大概她也看出曹政委的紧张情绪。曹政委遵命端起茶杯，又忙放下，举止失措的样子引来叶群的微笑。

林彪向曹政委送去一个和蔼的微笑，便不再看他，这是最好的安定他的办法。林彪继续问靳院长：“医训班学期多长？”

“两年。”靳院长回道。

“两年，能不能再短点？”林彪问。

“不能，两年是最基本的期限。”靳院长说，并不解地望望叶群。

叶群笑道：“学制两年不算长。”又对靳院长和曹政委说：“张宁在你们那里学习，要你们关心照顾啦，我在这里谢谢你们。”

轮到我“受宠若惊”了，让我“陪坐”已经够了，现在她又谢人家，靳与曹虽已知道我的身分，但叶群这一表白岂不敲定了我的确实地位？这与她三番五次要求我做到的保密原则相违背。果然，靳与曹不约而同地望住我，因为他们原来还不确定我最后是否真的进林家。我忙避开他们的目光垂下头。

叶群又问靳院长：“张宁在你们那里学习怎么样？别人知道她是谁吗？”

靳院长答道：“张宁虽然没有基础，但她年轻聪明记忆力好，课程基本上都跟得上。别人不清楚她身分，有些议论猜测，难免的。她不爱说话，群众关系不错，有分寸。”

“你看她能学成吗？”叶群又问。

“只要坚持下去，能学成。”靳说。

叶群对靳院长说：“她怕死尸，晚上休息不好。我和首长商量是不是解剖课不上了，改上英语课，今后不光搞中国革命，还

要搞世界革命嘛，你看着给她重新安排一下吧。”

靳院长甚感意外地瞧着我，那神色分明是“不上解剖课还学什么医”，我真是有言难语，这下误会可大了，他准认为是在背后说什么。靳院长犹豫地对叶群说：“不上解剖课影响比较大。不过我们一定考虑安排英语课。”

整个接见时间约二十分钟，我与靳、曹一起回到医院。下了车我便被靳院长留住谈话，他毫不掩饰他的为难：“你到医训班来已经够特殊的，再不上解剖课影响很不好。你为什么怕死尸？学医，解剖是最基本的，你没有基础，从实物上能帮助你深化理解，除非你将来不搞医务工作。”

我委屈地嘟囔道：“本来就不想让我搞医嘛，我是福尔马林过敏，原先是怕，后来好了。我也认为不上解剖课不好。”

“为你一个人开英语课太特殊，教职人员本来就紧，再为你一个人请英语教员，唉，叶主任真给我出难题。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尽量安排一堂英语课，让大家都学一点英语。”

回想当年医训班的情景，学员们都那么友善，从一些人的神情里，我估计自己的身分已不是秘密，但我从不认为她们的友善是冲着势力而来。医训班的党支部主动找我谈话，要求我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人们把入党看成是政治上的归宿，写入党申请书是光荣的事。我当兵很多年，不是没有写过，在新的环境和政治背景下，再次要求我写，我明白只是个形式，很多大首长的子女，因为特殊家世背景而受到组织关照，所谓的入党，一半是“送”的，比起一般要求入党的群众那份刻苦磨炼和“考验期”的漫长，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对于党委对我的关照，我很敏感是沾了林家的光，心里终归不大自在，难以“心安理得”。

党支部会议上，个别支委提了意见，因不了解我，相处时间太短，应该多考验一段时间，在当时这种思想水平的人不多。

“九·一三事件”以后，来自医训班的所谓揭发令我大感意外，

利用我本身的弱点大作文章。医训班每星期吃一顿“忆苦饭”，所谓的“忆苦饭”就是玉米粉做的窝窝头，做的比一般乡村百姓家的窝窝头滋味好很多，不但软，还有油掺合在里面。我从小随母亲口味吃惯了山东杂粮，这窝窝头对我根本算不上“苦饭”。我一向食量小，饭无论好坏都是几口，有些学员出于关心我瘦弱的身体，又是南方人，不知是谁叫厨房做了一顿蛋炒饭，记忆中这顿蛋炒饭我并未动一口，就放在桌子上随它去了。厨房自此再没为我做过“特灶”。可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也成我“搞特殊化”的罪状，真令我感慨。

在三〇一医院期间，在知情者里面，真正同情帮助我给过我精神支持的，恰恰是被诬陷为“林彪死党”的靳院长。当他察觉到我真实思想以后，对我非常尊重。我受到控制不准擅自外出，星期天他常把孤寂的我请到家中，与他小孙子玩耍。林彪和叶群去北戴河以后，星期天他家去郊游也请我去跟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视我为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他看不惯叶群作风，曾在我检查身体的事上说过：“动不动就要我们给你检查身体，你除了瘦弱一点，哪有什么病？兴师动众，她一句话，我就得去请专家，影响多不好，好好的一个人也折腾坏了。”他性情耿直，叶群送他一个退掉的女子当儿媳，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不喜欢。”不久他把这个重庆来的女子打发到上海军医大学习，以后又找借口退掉了这名特权搞来的女子。

像靳院长这种政治地位和职务的人，接触层面很敏感，而服务对象都是中央高层首长，政治色彩很浓，我敬重他就在于他处在这种“政治夹缝”中尚能坚持职业道德。国内曾有一篇报道，说及林彪接见靳院长一事，与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完全不一样，描写得面目全非。

靳院长是河南人，出身穷苦，十一岁当煤矿童工，十三岁当泥瓦匠，都是人小力微不胜负荷的重活。后来当了军阀冯玉祥的

兵，因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二十岁参加红军，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战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军第三后方医院院长。抗战时期领导过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三位外籍医生的工作，思想受其影响因而比较开明，重视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我们这些人当官太早，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解放后，他担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兼三〇一总院院长，先后又收并三〇二、三〇四、三〇九等军队医院，摊子大、职责重。“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医院工作因造反陷入瘫痪，周恩来和叶剑英先后亲自找他谈话，托付他收留照管中央首长和高级民主人士，负责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当时，这份工作很具政治敏感，对立面就是江青及其同伙，搞不好就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但是靳院长毅然接下重担，借着军队系统做蔽障，救了很多。

“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定为“林邱”线上的人，江青把迫害贺龙和陈毅两元帅的治疗方案强加在靳院长身上，制造骇人听闻的“医疗杀人事件”。靳院长遭到诬陷被关押审查达十六年之久。七十六岁的老将军临终前对自己的一生和遭遇感慨万千，交代长子靳乐：“你们一定要找到张宁。这个人正直，顶着压力不诬陷我。她吃了大苦。我生不能见她，如果你们找到她，一定好好待她。”

十七年后，靳乐从报纸上得到我的消息，与我联系上。读着他的信，知道老院长临终前还记挂着我，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靳院长白发苍苍威武慈祥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却黄泉永隔不再复相见了。

直到如今，三〇一总院的很多老医务人员和管理干部，还很怀念靳院长，说他是“忠于职守，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人道主义和正派热忱的领导”。

第五章

在北戴河的日子

九月七日

九月八日

九月九日

九月十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二日

九月七日

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这天上午十点半钟，于秘书和内勤警卫参谋大刘送林立衡、张青霖和我从毛家湾出发到西郊三十四师专机机场，我们上了二五六号飞机。

我第一次见到张青霖，他原是广州军区总医院外科大夫，经黄永胜的夫人项惠芳介绍，与林立衡谈了恋爱。张青霖对“选美”很反感，最初也不同意跟林立衡，后来知道了林立衡的处境，很同情她。而林立衡呢，为了杜绝叶群漫无止境挑选下去，接纳了张青霖，两人在接触中相互了解了对方。当时，他们之间是一种友谊，而不是爱情。张青霖籍贯湖南，长得高大帅气。从上飞机到北戴河，我们三人之间几乎不说话。林立衡很沉默，她常常这样，让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到北戴河莲花峰林彪住地后，我们三人被安排住在一幢黄色小楼里，楼号五十六。他们住东面，由空司保卫部杨副处长负责他们的警卫工作。我住西面，由临时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借调来的护士小王、小朱陪同。

五十六号与林立果住的五十七号相距五十米左右，出了这个院跨过一条小柏油马路就进了那个院。离林彪住的九十六号相距四百米左右，出了院子上个斜坡就到了，若是坐车，就十几秒钟的工夫。

我刚把随行东西放好，林立果便闯进门来，他见有小王护士在侧，腼腆地悄声问候我：“你身体好不好？”我点头作答。乍一见面，无话可说，便陪着我们一起上去见叶群。

李处长从九十六号楼里出来领我们去见林、叶。九十六楼其实是座工字型青砖平房，林彪住东，叶群住西，中间长廊是工作人员办公室、内勤值班室、膳房、休息室等等，与毛家湾住宅很

相似。

叶群的内勤小克、小斌正在值班室门口聊天，见我们走来，立即迎上来从李处长那里接下我们，说：“主任等你们很久了。这就进去见主任吧！”

长廊里白天也亮着壁灯，照在红地毯上反出暗红色紫光，四壁不见窗户，像走在地道里。

小克在长廊尽头一间门口止步，示意我们进去。进门便见一排高大书橱，摆满了书，像一座屏风，挡住通往里面的视线。我们从书橱和墙壁形成的一条通道里转进屋内。

眼前豁然明亮。东面两扇宽敞的大窗遮着一层白纱，厚重的紫色丝绒窗帘已拉向两边。窗外林木花草透过白纱帘清晰可见，东南墙角立着一人高的地球仪。南面墙上挂着巨幅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南向再往前走几步，是一扇门，通往叶群卧室。西墙下正中摆放了两张蓝色沙发，从高背后各伸出一支高悬着的绿色吊灯，中间茶几上堆满了文件书籍。

叶群正跷个二郎腿陷在一张沙发里看文件，上身穿着紫红色高领紧身棉毛衫，下身穿一条军色哗叽呢裤，脚穿米黄色半高跟皮凉鞋，跷着的那一只脚光着，鞋子掉在地毯上。

叶群一见我们进来，立即从沙发上拔起身，笑咪咪地望住我们说：“啊！你们到啦，好，首长这几天正想你们。你们平时工作忙，北京天气热，趁着首长在这里休息，接你们来松弛松弛。休息好了，回去好好工作学习。”

我站在林立衡身侧，见她做女儿的不问候自己的母亲，我也不吭气。张青霖见叶群有点不悦，只得打圆场问候一声：“主任好！”

叶群脸上的不悦立即消失，仍旧一张和蔼可亲的模样继续说着：“过几天，首长要到大连去住一段时间。把首长身体搞好，国庆节回北京去天安门讲话。你们也陪首长去大连。”

我望望仍不说话的林立衡，我不理解林立衡的表情：恭敬小心地望着她妈，一言不发，脸上似笑非笑，说不上是谨慎还是害怕，那模样给人的感觉好像她们不是母女俩。当时我还不知道母女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程度。林立衡曾三次自杀，为躲避叶群，独自带上王老太太长期住在养蜂夹道，我到毛家湾时，几乎见不到她。

叶群看一眼林立衡，微皱眉头。又笑眯眯地对张青霖和我说：“这两天首长身体不好，什么时候动，看他身体情况再定吧。”

叶群再次看看呆立在原地不讲一句话的林立衡，然后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放下手中文件，向门口走去，扭头招呼道：“去见见首长吧，首长想你们，见到你们一定高兴。”

我们随叶群沿着长而暗的长廊走向另一头，叶群轻轻推开一扇门，我站在门外，觉得里面好像爱克斯光室，比走廊上的光线还暗。

进去才知道是间大客厅，四壁皆空。林彪坐在一张紫红色双人沙发里，一身淡青色凡立丁中山装，同色帽子，黑布鞋，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微阖着面对着茶几，茶几上没有任何东西。

乍看见林彪，心下惊怵，他的气色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差，在暗红色灯光下，苍白的脸色变成青色，更显瘦削，深陷的眼眶像两个洞，满脸胡楂碴碴，心里疑惑：小张和小陈为什么不替他刮刮？

我们走到林彪跟前，叶群轻言细语地说：“首长啊，孩子们都来啦，你看看吧。”

林彪缓缓抬头，定睛瞧看我们，脸上现出一丝微笑，视线逐个在我们三个身上移动。

林立衡叫了一声“爸爸”，声音有点颤抖，眼圈也红了。

张青霖问候林彪：“首长好。”

我叫了声：“林伯伯好。”

林立果早在进叶群办公室之前就离开了。

林彪微笑地看我们，一一点头应着我们的问候。

我注意到叶群从进门始，一直察看林彪脸色。此刻见林彪高兴，便叫我们围着林彪坐下。

林彪问立衡：“你身体好不好？”

林立衡点头，正要开口说话，叶群抢先说：“豆豆身体不错，王跟着她。豆豆平时工作忙，不常回来，对自己要求严格，群众反映很好。”

林彪和立衡两人对望着，都不再说话。

我正觉得这父女俩的表情不可思议，林彪转向我问道：“你学习跟得上吗？”我点头，刚想说“我跟得上”，话还没出口，叶群速度极快，又代答道：“小张脑筋好、记忆力强，虽然没有基础，还跟得上。我已交代医训班给她开英文课，要搞中国革命，还要搞世界革命嘛。这次来好好休息，回去以后好好学习。”

林彪和蔼地望着我点点头，又转而问起张青霖：“你工作搞些什么呀？”

张青霖眼尖心明，回答之前先看看叶群，果不出他所料，叶又抢着说：“青霖工作安排好啦，他原来搞医，更上一层楼嘛，搞些研究工作，已逐步熟悉新环境，能正常工作了。有点时间就陪陪豆豆。”

林彪愣愣地望着叶群，叶群的话匣子戛然中止，直着眼察看林彪脸色。弄得我和张青霖这两个“外来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立衡却不动声色静静地看着她的父母。

叶群很快地调整了气氛，问林彪：“首长啊，你对这两个孩子满意不满意呀？”语调极其温柔讨趣。

林彪看看我和张青霖，竟像小孩似地拍起双手，又似鼓掌，连连点头说：“满意，我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坐了约有二十分钟左右，叶群带领我们退出来。林彪每天中午睡两个小时，当时已到他午休时间。

据李处长说：“这一天是首长到北戴河以后说话最多的一天，最高兴的一天。你们来了，让他见见，比吃什么药都灵。”

下午三点，我午休起床，请小王护士去东边看看林立衡起来没有，我想与她们结伴去海边玩儿。

护士回来告诉我：“杨处长讲，副部长(林立果)刚把立衡接走。”

“他接姐姐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休息的时候副部长来过，没有进屋。我问他要不要叫醒你，他说不要，杨处长也不知道他把立衡带哪里去了。”

我心想：立果接姐姐，为什么不接青霖又不见我？肯定不是主任传他们，说不定又是谈论我。我和立果关系一直僵持着，让他把心里话向姐姐说说也好。

用晚餐时，五十六楼餐厅只有林立衡、张青霖和我。林立果给小王护士留下话，晚上夜泳不回来吃饭。

林立衡坐餐桌首位，一下午没见，像生了一场大病，蔫乎乎的吃几口便停筷，吞下一大把药。我吓一跳，我自幼体弱，也是个药篓子，可从没见过这么吃药的，当饭吃呢！

立衡要回卧室休息，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摇头不语，一副无精打采懒得说话的样子。心下疑惑，是不是与青霖闹别扭了？看看青霖，他也是一脸猜疑。看来不是病，否则青霖早忙开了。

我心里惊疑不定，出了餐厅悄声问小王：“立果送姐姐回来的时候，他俩的情绪怎么样？”

“看不出什么呀，只是副部长没有下车，立衡下车后也没跟他打招呼，两人谁也没说话，副部长开了车就走了。”

多年以后，林立衡和我劫后重逢，才亲口向我讲述了九月七日下午的情况：

下午三点前，林立果接林立衡到五十七楼单独谈话，立果对立衡说：“自从庐山会议以后，一组（毛泽东代号）揪住主任不放，几次检讨通不过，现在又趁首长到北戴河休养，跑到南方巡视，到处公开接见讲话，放风，最终目的是要打倒首长。首长身体差，一旦有什么事，怎么吃得消？刘少奇、彭德怀的例子摆着。首长又不肯服个软、认个错。一组已经摆开阵势，绝不会放过首长。与其等死，不如孤注一掷，做一次拚搏！”

林立衡因不住在毛家湾，对庐山会议以后的形势变化不太清楚，乍一听林立果的介绍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又听林立果说要拚，更是心惊。

她问林立果：“你准备怎么拚搏？主席威望高，稍有不慎，首长更被动。”

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

林立衡觉得林立果的念头很危险，劝道：“你可千万不要什么事都听主任的，她说话不准，又爱在首长面前说谎，你可不能头脑不冷静，给首长造成错觉。”

林立果根本听不进林立衡的话。林立衡觉得这个弟弟自从当了副部长以后，变化不小，与叶群越走越近。虽然母子俩仍有感情隔阂，但在政治上，林立果也学到了叶群那一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原来姐弟俩关系很好，共同抗衡叶群，立果无话不对姐姐说，但到后来，林立衡觉得林立果在一些问题上对她有不少保留。林立衡一直深深地担心叶群会把林立果带坏，林彪的日

子就更难过了。

林立衡急于摸清叶群和林立果的真实底细，问林立果：“形势真的那么糟？首长的态度怎么样？他知道吗？”

林立果说：“首长还不知道，事情没考虑成熟前，不能跟他说。”

林立衡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帮着主任欺骗首长！什么事不经首长点头，谁也不准轻举妄动，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话，惹出事你也跑不掉，首长不会原谅你。”

林立果冲撞立衡道：“依你办法，坐着等死啊！”

林立衡坚决制止他的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整谁就整，别人不敢反，我就反！你就甘心眼睁睁看首长挨整？！”

“我明天就回北京。”林立果绝断地说。

林立衡明白林立果这种情绪，这种时候回北京一定没好事，万一弄出事来，林彪什么还不知道，处境更糟更说不清了。她劝林立果什么地方都别去，避免招惹是非才是最好的避祸办法。她不相信毛泽东做事会那么绝。

林立衡告诉我：“当时立果见我跟他意见不和，不再跟我谈了。他说回北京是看牙齿，我不太相信他的话，他后来学得跟叶群一样会说谎，虚虚实实的。我很担心他回北京去会对首长有什么不利的行动，可又阻止不了他，只得叫他看完牙齿早点回来。”

我原以为林立衡早已知道叶群和林立果的计划，她当时竟然也不知道。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追问他回北京去干什么？”

林立衡说：“我没有精神准备，谈没几句就暴露我们意见分歧，立果不会再跟我讲真话，怕我万一不同意，把情况告诉首长。”

我又问：“你最了解立果，以你分析，当时立果的那些想法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计划?”

林立衡摇头说：“当时立果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从他神态和话意里也看得出来。但是他那种念头和企图已经很危险。所以我阻止他回北京，只要阻止他出去活动，就是最安全保险的办法。”

我疑惑地说：“当时你为什么 not 将立果的想法告诉你爸爸?”

劫后的林立衡神情十分伤痛，说道：“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弟弟。当时情况不明，光有想法，没有行动。向首长说了徒惹他生气，他那种身体，再经不起刺激，准得大病一场。再说，口说无凭的事，首长真追查起来，立果和主任不承认，反而是我挑拨离间了。”

“你可以先跟几个秘书商量对策。”

“这种性质的事怎可随便说?就是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传到主任耳朵里，让她有了防备，真要是有那么回事，对首长更不利。”

晚上八点，叶群传我们上九十六楼看电影《英雄儿女》、《红鹰》。“林办”六七个工作人员也在场。林立果夜泳未到场。

约九点多，李处长走到叶群身侧附耳低语，我坐叶群身边，听到一句：“×××来电话。”李处长随叶群一同进了房间。我脑子里闪了个疑问：叶群的电话怎么是李处长报?小克、小斌呢?当时他们俩都不在场。叶群招待人看电影一般都不允许两边内勤观看。

不到十分钟，叶群出来，笑容可掬的模样，身后跟着小克，拿着三条毛巾毯。叶群很关心地对林立衡和我说：“夜里凉，把毛巾毯盖腿上。我的腿怕凉，盖上还挡蚊子。”十二点不到，电影结束。我们回五十六楼休息。

这是我到北戴河的第一个夜晚。海风吹得波涛从远处传来“哗哗”声；莲花峰的松林里有很多斑鸠，彻夜不时发出“咕咕”鸣叫。夜，显得安详而宁静，我睡得很香。

九月八日

昨夜睡得好，今晨起得早，小王护士陪我外出散步。

出了院子便是小马路，五十六楼与五十七楼院外各有几个流动哨兵，见到我的瞬间，都往树后隐去。那是他们值勤时的规矩，不让被保护人瞧见。上了山，树林里的警戒哨远远瞧见我们，也闪避到树后，那模样挺像刺客。

六点整，九十六楼驶出一辆保险防弹红旗轿车，从我身旁擦过驶向莲花峰外，司机杨振钢旁边坐着李处长，林彪端坐在后座中间位置上。这是林彪的生活规律，每天清晨准六点去海边转车，十五至二十分钟返回。

林彪的体质不适应大运动量。战争时代遛马，骑在马背上走走跑跑。现代改为转车，一般不下车，身体好的时候，在没人的地方，偶尔也下来走走。有时念及骑马，由战士在前面牵着马绳拢稳马首，他骑在马背上，林立果在马侧扶着他，前后左右簇拥数名警卫，在树林里遛遛。

所有“林办”的人都知道林彪有三个习惯：他只坐保险防弹红旗车；司机不是杨振钢，他不上车；内勤警卫李处长不先上车，他不上车。所以，林彪不管到哪里，这两个人和这一部车总是跟着的，每次到外地，都有专机运送这辆车。

李处长组织关系隶属中央警卫局。解放后林彪曾换过多批警卫干部，自李处长调来后，甚得林彪赏识。李处长工作上精明能干，无人能替代他。李处长形体瘦高，少言寡语；患有胃疾，犯病时几天不能吃东西，瘦成一把骨头走路都困难，但他从来不因

病下岗，林家人对他的忠心十分赏识。他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林办”，只是在“林办”过党组织生活。在“林办”，李处长的地位很特殊，因他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的人，叶群也敬让他几分。

九点钟，我去东边看林立衡，她正在客厅里做理疗，感冒嗓子痛。

正与她聊着，小朱护士领着一名战士抱着两个装在玻璃盒里的大蛋糕走进来，又返身再从停在院中的汽车里抱进四个新疆运来的无籽西瓜，堆在门边。小朱说道：“这是主任让我们送来的。两个蛋糕，立衡、青霖一个，张宁、立果一个；四个西瓜一边两个。主任交代要你们好好休息，需要什么告诉她，想吃什么叫厨房做。主任说来北戴河的任务是好好恢复身体，和和睦睦、快快乐乐。”

小朱鹦鹉学舌般地说完，睁着大眼笑嘻嘻地望着我们，等回话。

林立衡淡淡地对小朱说：“噢，主任这么有心。你去替我们谢谢她。”

小朱原是分配给我的护士，只陪了我一夜，被叶群看上，早晨上去替我拿早餐时，就被叶群留下来，上午再返回时就不是我的人。小王护士想见她都难，叶群不准小朱自由走动。凡是到了叶群身边的人，都成了“小鬼”。

吃中餐时，林立衡精神上似乎好了些，见菜上得太多：冬笋火腿鲜菇、海米拌黄瓜、鸡蓉片、芙蓉肉、焖斑鸠、烹海虾、清蒸海蟹、鸡丝青笋汤。吩咐小王：“你去告诉厨房，不要再上菜，吃不了浪费，以后每餐四个菜就够了。”小王答应一声跑出去。

林立衡笑对我和张青霖说：“四菜一汤有讲究，你们知道吗？”

我和青霖听她说古。立衡说：“这是主席定下的菜式，叫‘四星照月’。一顿饭四个菜一个汤足够了。”

一九八八年初，我回爸爸祖籍江西兴国县祭祖，当晚就宿在县委招待所当年毛泽东住的套间，是间极一般的平房。县委招待吃饭时介绍了“四菜一汤”的来历：五十年代毛泽东视察到了江西兴国县城，县委为一顿“皇膳”伤透脑筋。布满一桌佳肴，毛泽东只钟意一道油炸小鲫鱼和一盘爆炒辣鳝丝。毛批评县委铺张浪费，规定今后待客最高规格为四菜一汤，赐名“四星照月”。

我母亲是胶东半岛人，我从小爱吃海鲜，家乡常年寄海鲜干从未断过。林立衡见我连吃两个一斤重的海蟹，笑道：“吃两个就打饱嗝，立果吃六个还不够。”

“六个?!怎么吃的?”我惊讶道。

“光吃蟹身呗。他怕麻烦，爪子不吃。”

“怪不得这么胖。我才见他的时候还是个瘦高个，一年不见胖成这样。年轻人过早发胖不是好现象。”张青霖评论道。

林立果那健硕高大的身形显现在我眼前。“他夜泳就是为了减肥?”我问林立衡。

“他哪会想到减肥，什么好吃就吃什么。你们搞文艺的，讲究苗条体形，他可不忌嘴，饿了他就吃。”林立衡笑说。

空军杨处长进来，见我们说笑，问我：“你爱吃螃蟹?好办，每顿给你吃，不过青虾这东西吃多了上火，没几天你就不肯吃啦，哈哈。”

李处长这时候也走进来，问：“哟，挺热闹的，说什么呢?”

“这虾和蟹多少钱一斤呀?”我问。因为这两样海鲜在当时市场上根本见不到。

李处长以他惯有的漫不经心的腔调说：“只要你想吃，就能搞得到。这东西好搞，我们到海边上去，渔民捕鱼一网中带着一

些螃蟹大虾，上岸几毛钱就卖给我们。天天有，吃新鲜的，明天再买给你吃。”

几毛钱？我差点笑出声，心想那些渔民可能额头上有眼，知道这些人来头大，讨个吉利罢了。

我后来才明白，林立衡在这顿饭时的“轻松”情绪是障人眼目。她深知叶群在林立果找她谈话以后，一定会从各种人嘴里探听她的动态。我则是叶群主要的利用对象。林立衡还怀疑我可能是林立果和叶群安插在她身边的监视人。

下午两点，叶群传我一个人上去。

她的办公室里，内勤小克、小斌等候着我，各人手中拿块夹板，里面是爱克斯光胶片。叶群从卧室出来，穿一件紧身衣，叫我与她一起照胸片，正好三〇一总医院胸科高主任晚上要返回北京，让他带回去做检查。

内勤们退出去后，我静立着等叶群吩咐。

她走向前来，很亲密地挽住我手臂，小声道：“你陪我去看看首长。近来他身体不好。可别对外人说啊，首长的身体状况是国家机密，让敌人知道了可要大做文章啦。”

我挺纳闷的，她是首长夫人、“林办”主任，论公论私，想什么时候去看都可以，怎么说让我“陪”她去？

在走廊里，叶群边走边唠叨不休地说：“首长感冒啦，胡子也不敢给他刮，怕他受凉。首长喜欢你，过几天到大连去，你也陪首长去，把首长身体搞好，‘十·一’好上天安门讲话呀。每年都是首长上去讲话，今年又得上啦。”

我隐约觉得叶群把林彪上天安门讲话看得负担很重。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林彪身体的原因。林彪仍像昨天一样，静静地独坐沙发上。

叶群靠近他身边，他才抬起头瞧我们，神情像是询问：你们来干什么？

叶群叫我上前，说：“你近前看看，首长的气色是不是比昨天好？”

叶群心理专断，凡事无论大小都得听她的，就连林彪身体的好坏、感觉上的差异，都得听她一句话定性。她往往不喜欢一个地方，就编出各种理由骗林彪：水喝多了会拉稀；气候不好会感冒；食物不合适会拉不出屎；水土不好会得过敏症等等，整天在林彪耳旁叨叨，令林彪坐卧不安，住不上两天准得移动。林彪生活上只听叶群、林立果、李处长三个人的话。林立果常不在家，李处长为避免叶群纠缠，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着叶群去摆布林彪。林彪中枢神经受伤，对外界产生病态反应，再加叶群经常蓄意作怪，林彪动辄受制，在很多事情上被叶群牵着鼻子走。

我来林家时间虽不长，但说话做事先得揣摩叶群的意思，不能逆了她，这一点，我早已不止一次领教过她的厉害。

林彪脸色仍然苍白，甚至更添一层青色(胡子又长了点)，但我不敢说，胡诌一句：“脸色比昨天好。”

林彪望着我，微笑着不作声。

叶群高兴了，注意地观察林彪脸色，慢慢地挨着林彪坐下，又用眼神示意我坐到林彪另一侧。

“首长啊，小张要来看你，(我心下一惊，明明是她叫我陪来的，怎地说成我要来?)你的感觉好吧？”叶群一边温言细语地说着话，一双眼却谨慎地注视着林彪的表情变化，还瞟我一眼。我立即收敛因吃惊睁大的注视着她的眼睛，改看林彪。

又令我纳闷，林彪对她的说话毫无理睬的意思，却侧过脸问我：“你吃饭好不好？”我刚点头说声“好”，叶群插上说：

“她们吃饭在我那里做，爱吃什么做什么。”

林彪仍不理睬她而问我：“睡觉好不好？”

我说：“好。”叶群又插话：“她吃安眠药，不吃睡不着。”

林彪仔细看我一眼，摇头道：“小孩子，吃安眠药不好，要自己睡。”

叶群马上附和着说：“是呀，是呀，年纪轻轻的要少用药，多吃饭、多睡觉，来这里就是休息。睡不着可以看书，山上走走，海边转转，累了再睡，身体养好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工作嘛。”叶群一边说着一边看林彪脸色。

林彪仍然不看她，又问我：“你学舞蹈，芭蕾舞与古典舞有什么区别？”

林彪突来这一句，顿时问住我。心想糟了，我只学舞蹈，从未注重舞蹈研究。一时答不上来，尴尬害羞地望着他。

叶群马上指挥说：“你跳几个动作给首长看看。”

林彪微笑地看着我，再坐着不动实在不像话，我鼓起勇气走向客厅中间，跳一段芭蕾组合，再跳一段民族舞片段，以形体表现芭蕾舞和民族舞在风格上的区别。至于古典舞，我更莫衷一是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跳过。

跳完舞，我羞怯怯地站在原地望着林彪。

林彪高兴地动了动身子，叶群赶忙扶住他。他侧脸望望叶群，那神态好像刚发现她的存在，靠得还那么近，身子又动了动，像是嫌叶群碰触了他。场面很僵，刚泛起的一点轻松气氛立即消失，我傻愣在原处不知所措。

叶群自找台阶下，对林彪温言细语道：“你休息吧，我们走了。”嘴里虽如此说，屁股仍坐在沙发上没有移动，目光一直注视着林彪。

我见林彪木然地垂下眼皮，望着自己的脚，对叶群的话没有任何表示。

走在长廊上，叶群驼着背低着头，神情很阴郁，说道：“首长身体不好，我也不敢多劳累他。多去打扰他不好，你闲着没事好好休息，让小王陪你玩玩吧。”

我真觉得冤枉，我怎敢去打扰首长？不是你叫我去的吗？此刻又怪罪我。我闷着头不吭声。事事小心谨慎，仍免不了让她说闲话。

“林办”的人每遇林彪情绪不好时，虽着急担心，最焦急害怕的就数叶群，因为多数事情都是她惹起的。林彪礼待工作人员，他们有错，自有党委管束，他从不过问，唯有叶群，背他干的事偶被察觉，或某件事意见分歧不听他的话，林彪生气，轻则大骂，或动粗武教；重则禁止叶群见他。遇上后种情况，叶群就像“打入冷宫的娘娘”（秘书语），想见林彪一面，还得请示李处长，如果林彪仍不想见，李处长也无法调解。碰上这种情况，全“林办”的人都高兴，上至林立衡姐弟，下至大小人等心里都有默契：叶群少去见林彪，林彪就少受一些骗，工作人员日子也就清静得多。叶群也乖，每遇此种劣境，对工作人员态度尤其好。

我跟随叶群回到她办公室，她进门就掀铃叫小克传林立果上来。她则一屁股坐沙发上，闷头喝茶。

不一会儿，林立果气喘吁吁跑进来，静立一旁不说话，叶群耷拉着长眼皮看他一眼，（叶群上眼皮特长，看人很没精神，又显得阴沉沉。）叫林立果坐在我旁边。

叶群冷冰冰地问他：“吃过没有？”

林立果摇摇头，脸色跟他爸一样，木然没表情。

当时已下午三点多，我奇怪他怎么这时候还没有吃饭，我们对望一眼，他见叶群正盯着我们，便低下头不再看我。

叶群传饭上来，是她中午正餐，叫林立果搬张小沙发过来放在她身边，叫我靠她坐下，却让林立果站一边，冷冷地看着林立果尴尬难堪的样子。

我内心一直觉得母子俩为了我伤感情很不值得，曾多次请求林立果放弃我，我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生活，更主要的是我对林立果从未产生过爱情。直到我来北戴河前，临出发时，我

们的关系介绍人邱夫人还在电话里做说服工作：“你要去（我不想去北戴河见林立果），是林立衡请你去作客，你和林立果总是要接触的，不接触怎么产生感情呢？要培养感情。一个星期以后回来学习。”

从我调北京以后，叶群严密控制林立果和我约会，我成了她手里一张控制林立果的筹码。林立果为反控制，早已在空军自组“选人”小组。这母子俩虚虚实实，相互掣肘。

林立果脸色微微发红，叶群欣赏儿子窘状当娱乐。我很不喜欢这个场面，如实地告诉叶群我已用过饭，起身让座给林立果。

“你坐下，陪我吃饭。”叶群说，又转对儿子慢腔慢调地说：“你也一块吃吧。”她似乎也觉得无趣。

小克替林立果上了西餐。林立果闷头吃自己的饭。

“给张宁留点鱼籽酱，别只顾自己吃。”

林立果马上放下正欲挖鱼籽酱的匙子，放下手中面包，不吃了。

“我怕腥，不爱吃这东西。”我想制止叶群再为难自己的儿子，又同情而不理解地瞟一眼林立果，心想：他在自己母亲面前为何这般拘谨？

叶群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你看，立果对你多好，吃饭还给你搬沙发，我这个做妈的还比不上你啊！”

她准是有气没处出，拿我俩消遣。我窘得满脸通红，大气不敢出。偷瞧一眼林立果，他正看我，四目相遇，随即双双低下头。

叶群满足地笑咪咪地看着我俩。我真不理解，把我们搞得这样窘迫干什么。

见我们都停下不吃了，她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聊开了，又换成一副慈母善婆婆的面孔，谆谆教诲地说：“以后你们办婚事，要讲勤俭节约。全国都响应毛主席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

俗。副统帅家办喜事，别人都看着呢，要做个好榜样带个头，做个表率，不办喜宴，不请客送礼。新房布置要革命化，不搞花花绿绿，床上铺张白床单，放两床军被就行啦。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我和林立果对望一眼，都不吭声。

叶群又笑道：“就这样吧，我跟首长说过了，他也同意。”（这是她的口头禅，在此话掩护下，她曾欺骗秘书干了不少鱼目混珠的事情。）

转而向我说：“人家儿女成群，孙子都抱上啦。我和首长就这么两个儿女，提倡晚婚嘛，要带个头，大家都拿眼盯着我们呢，我们的一举一动影响大着啦，稍不注意，人家好讲闲话啦。首长对他们要求严格，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你不要觉得委屈，是爱护你们啊。结婚时要做做样子，以后你们想搞什么样的小家庭，由着你们吧。”

我对叶群的言谈表情产生一种强烈感觉：她好装假，好耍语言游戏。

所谓不送礼是假话，早在六月份就已放出儿女办婚事的风声。林家的事外面知道的很少，只要是外面知道的事，准是叶群自己泄露出去的。

底下人哪有不送礼的？叶群收到的名贵贺礼不在少数，自己藏起来。她是国家第二夫人，政治局委员，身居高位，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手却很紧。夫妻两人每月工资合计近八百元人民币，当时普通人民工薪只有三十元左右，军队基层干部五十元左右。林立衡、林立果每月工资只有五十二元。她每月交几元党费，余数全部用化名存入银行，吃穿住行都是国家的，一年四季全国各地送给中央的土特产、新鲜水果，少不了林家一份，花不到她一分钱。但她还讲“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担心王老太太浪费她的东西，交代王老太太说：“你替我掌管这个家，别

以为花的不是我的钱。什么都要爱惜，一根针一条线都得给我收好。”王老太太曾对我说过：“她浪费的东西的价值何止一根针一条线，不过那都是公家的。”

叶群虽然吝啬，对工作人员的限制很不近情理，但有时又显得很有人情味：仓库里的水果吃不了，分送给工作人员；个别秘书家庭困难，她也掏出几十元送给人家；有时发脾气拿秘书当泄气筒，冷静后又主动向秘书赔礼道歉；她常爱借参观针织厂的名义拿回很多喜欢又不花钱的针织品，在家闲着时又自己织毛衣。了解她过去的王老太太不否认她好的一面，曾说过：“叶群没介入政治以前，是个温文尔雅的主妇，自从介入政治就完全变了。变得像泼妇不可理喻，对自己的丈夫儿女都不好。”

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不变的人很少，小小老百姓都变得难以自制，成天喊打喊杀，幻想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叶群从无所事事的主妇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岂有不变之理？从上到下统统是那个怪异暴戾时代的产物。

叶群吃饱了，兴致很好，站起身叫我和林立果陪她到海边转车消食。

叶群专车是一辆黑色美国凯迪拉克，是一外国使节离任后留下的。没人敢用，叶群喜欢，要来自己用。

林彪喜欢三样东西：骏马、枪、汽车。因为长期身体不好，不能玩，虽然喜欢，但不收集。他的名字写入党章后，投其所好的人自然为他准备多多。就凭他夫妇两人正职和兼职的职务，兼一职配一车，有关部门为他们配备了许多辆车，总数十六辆，而实用的只有防弹红旗和凯迪拉克两辆。余下的车躺在库房里睡大觉，每月定期放出去跑一圈，怕长期不用机件出毛病。林彪曾多次说过：“不要这许多车。”可是没人敢要他的车。

防弹红旗原是车辆厂专为毛泽东设计制造的，毛泽东只信任他的苏制大吉斯防弹车，防弹红旗便转送给林彪。林彪专用此车

而弃它车，他要防的人只有他心里清楚。他曾说过：“值得永远信任的只有自己。”

林立果说得更白：“政治斗争是最肮脏的，无实话可言。”

凯迪拉克沿海边行驶，马路上静寂无人。当年北戴河是专供中央首长和中央各部委疗养休憩的“圣地”，划为禁区，难见到闲杂游人。经过中央首长专用浴场，门可罗雀，不见人影。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毛泽东、江青、林彪这三个人，各有常爱去的地方：江青爱去广州、海南岛；毛泽东喜欢上海、杭州、武汉；林彪常在苏州、大连。毛、林互不“侵犯”对方地盘。毛、江是夫妇，之间干涉是常有的事。北戴河则是公共地盘，谁先到属谁，不论哪个住下，所有已下榻的中央的人皆得陆续回避离开。眼下，北戴河只住着林彪一家。

叶群坐后排中间，我和林立果两边坐着，长时间没人说话，气氛很沉闷。

我看着窗外蔚蓝的大海，心忖这避暑胜地怎么如此冷清。耳边响起叶群声音：“立果常到海里夜泳，一次能游上千米，立衡也能来回八百米。你没事也来游水吧。过几天，等立果没事了，陪你好好玩玩。”

叶群说完又转向林立果问道：“准备好没有？”一双长眼皮耷拉着毫无表情地盯视她儿子。

“嗯。”林立果头不抬眼不睁地应了一声。

我瞧着纳闷，这母子俩的问与答都无头无尾的，搞啥名堂？防我？那还带我出来干什么。

叶群瞧见我一脸疑惑，解释说：“立果的牙病犯了，长了一个龋齿，常常痛。他自己不重视，龋齿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不检查一下，怕引起败血症。这里医疗条件不全，我叫他回北京去检查治疗一下，今晚就走。”说着，跷起一只脚搁在司机小慕驾驶座背上，差点就要跷到小慕头上去。我吃惊地愣了一下，被她

察觉，不高兴地斜睨我一眼，我赶快转脸望向大海。

“回去吧，不转了！”叶群情绪陡然变得烦躁，命令小慕回去。路面狭，一时转不过车头，又往前开出一小段路。叶群拉长声调：“不转啦，往回开！”小慕终于掉过了车头，回到九十六楼院中停下。叶群披着西装外套，不高兴地闷着头往办公室走。司机小慕和警卫员小徐站在车旁，吓得大气不敢出。

我和林立果跟在后面进了办公室，叶群自顾自地坐下，喝着小斌送进来的茶水，把我们晾在一边站着。她喝了两口，“嘭”一声放下茶杯，突然换了一副笑脸站起身，说：“我去休息，你们谈谈吧，我可不在当中夹萝卜干。哈哈……”走进卧室，“嘭”地一声摔上门。

办公室里剩下我和林立果，站在原地对望着，林立果不时眼瞟叶群卧室门，好像担心她突然又跑出来。我却一直对叶群那句“夹萝卜干”的话缓不过神来，这哪像是一个大首长兼母亲的人说的话！

等了一会儿没见动静，林立果拉我坐到长沙发上，小声问道：“你吃饭睡觉都好吗？”我点点头。

林立果又说：“主任在这里，我不好照顾你，你多跟姐姐在一起，缺什么跟小王说，她会替你办。”我又点点头。

我心里想：你们母子俩不和，一个当面给难堪，一个背后表关心，把我挤在夹缝中真难做人。

林立果问：“今晚我要回北京，你刚来我又要走，你不会有意见吧？”

我明白他又在搞感情试探，我仍像以往一样，不给予明确的回答，说道：“你回去看牙齿，还有什么事？几天回来？我一个星期以后就得回北京，学校开学不去上课影响不好。”

林立果犹豫着不答话，只盯着我看。

“你怎么了，犯啥呆？”我问他。

他眼神晃了晃，支吾着低下头，又抬头犹豫地望住我，欲言又止，复而垂下头沉思。

我定睛望着他，觉得他比以往更闷。他再次抬起头时，神情似乎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道：“我四天就回来。你在这里休息，什么也别想，我回来就来看你。我看牙齿，顺便办点事。最近中央斗争激烈尖锐，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下降。我回去了解一下情况。”

他说完后，紧紧盯视我，好像是观察我的表情变化，又似期望我问些什么。

我听他说“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下降”，心里确实挺吃惊，脸上也显露出来；他说回去了解情况，我又一脸的疑惑，他能了解到什么？叶群是政治局委员，是他妈妈，他可以对其母进行议论，我的身分岂可乱问，岂可招嫌惹火烧身。

我当时并不知道庐山会议那场巨变，更不知道毛泽东此刻已巡视到南方向“各路诸侯”（毛泽东语）发表讲话，影射林彪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通常被毛泽东冠以此种罪名的党政军首脑，最终被打倒是肯定的。

叶群明令过我：“到家里来，不该知道的不准打听；不该说的不准乱说；不该去的地方不准擅行；对外不准暴露身分；不准对外人说家里的事；不准跟工作人员随便接触说话。”所以我心里尽管对林立果的话产生很重疑问，却一句不敢问。

我在思索：主任政治地位不稳可不是小事。整到主任不就是想整林副主席吗？整林副主席不就是针对毛主席吗？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我这种思维逻辑在当时毛、林政治连体论盛行的年代里并不奇怪，碰到谁都会这么去想问题，所以越想越糊涂，越不明所以然。

脑中忽然闪过一念：林立果恶作剧，故意吓我？抬眼看他，神情严肃，不像开玩笑，我茫然地望着他。

林立果看出我的神情，缓了口气反倒安慰我：“不过，事情还未发展到那么严重，我只是回去看看，几天就回来，陪你玩，好吗？”神情口气显得很轻松。

见我缓过神来，他又问：“你带的衣服够不够？我看你穿得太单薄，你体质差，要多穿点衣服，把房间钥匙给我，我给你带点衣服回来。”

“不就是到大连嘛。北戴河和大连气候差不多，国庆节之前回北京不会冷到哪里去。不要麻烦了。”我拒绝了。

林立果仍顺着自己的意思说：“那我从天窗爬进去替你拿。”

我心烦他又出怪招，逗乐也不能这么逗法，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反让我觉得咄咄逼人，怪烦人的。

我望着他再次摇头，却发现他神情诡异，又想说什么而开不了口。

“你今天怎么了？”我询问他。

他低头默思，双手揉搓，好一会儿才抬头专注地望着我说：“万一北京被占领了，你留在家里的东西不要可不可以？”

我真的被吓住了，一时不及回答他，脑中急速转念：首都被占领的威胁来自何方？黄永胜的大儿子任职北空防空办主任（防范苏联突袭侵犯中国），若是这方面的突变，内部消息渠道我们应该知道得最早，不像呀；中央出现新的路线斗争？叶主任政治地位要下降？啊！可能就是这件事，北京被占领不就是有人要搞政变吗？事态这么严重，毛主席、林副主席知道吗？

我急切地问林立果：“毛主席知道吗？”

林立果犹疑了一下，说：“知道一点。”

我立即肯定地说：“只要主席知道了，任何人想搞政变都不会成功的！”

林立果神情大变，愣神好一会儿，长时间不再说话，也不看

我。我做梦也没想到竟是身边这个人正考虑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林立果试图与我沟通的念头到此中止。

但他仍然催促我拿衣服：“如果再往北边走，你这点衣服不够，你会冷的，拿点衣服来吧。”

我心想这人又犯傻气，我不愿意的事他偏要干。便说他：“好啦，我说不要就不要嘛！再往北边走不就是到大连吗？就几天，带多衣服累赘。”

正说着，叶群的文书小孙进来，传林立果到林彪办公室去。林立果叫我等他，说马上就回来，起身随小孙出门。

大约十分钟，林立果返回，见我立在南墙下看地图，便走上前，正遇我听到声音回头，他突张双臂紧紧拥住我，在我脸上头发上狂吻，又紧紧吻住我的唇，令我透不过气。

他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我惊慌失措，挣脱他的拥抱跑回沙发上坐下，下意识地赶紧理头发整衣服，生怕叶群此时出来撞见。

林立果伫立原地不动，我涨红了脸望他一眼，心怨他今天怎么如此缺乏理智。他追求我两年，也控制我两年，从没有违我意强迫过我，凭这一点，我慢慢对他产生了一点同情。可今天他是怎么了？说话怪怪的，举止也变得唐突，弄得双方都窘迫。

他走到我身旁，动作有些急促地脱下军帽和军上衣，甩到沙发背上，挨着我坐下，捧起我一双手，长长出口气，语气不连贯地对我说：“万一……出了事……我不连累你……你什么都不要说，听我的话。”

我越听越糊涂，觉得他语焉不详，着急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哇！”

他凝望着我，终于摇摇头，安慰道：“没什么。我走以后，你好好休息。跟你说的话不要对一般工作人员说，他们什么都不

知道。主任问你什么，你也不要告诉她。什么都不要想，等我回来。”

见他不肯说，我又想不通是什么事，只好点头答应他守口如瓶，不对任何人说及我们之间的谈话。

叶群卧室里传出动静，林立果立即站起身离开我，保持一段距离，摆出一副漫不经心冷漠的神情。我也立起身面向卧室门口，等候叶群出现。

叶群走出卧室后看我们一眼，脸色愠愠地说：“还像竹竿似地立着，什么话谈那么长时间，说完了没有。”

我和林立果都不吭声。

叶望住我：“你回去吧。立果今晚回北京，你得给他一点准备时间，我还有事交代他。”

我如释重负地离开叶群办公室，走出九十六楼。院子里，“林办”的内外勤、警卫、秘书，沿途三三两两碰到不少，神情并无异常。回想林立果的谈话，简直莫名其妙。林彪和叶群曾不止一次批评他“邪端异说”、“标新立异”的思想，今天恐怕又是犯神经病。

回到五十六楼，已是下午五点钟。

我感到很意外，立衡迎候在门口，见到我便问：“你上去的时间挺长，主任和立果跟你谈些什么？”

我真想把林立果讲的那些话告诉林立衡，终因顾虑种种后果又咽了下去。如果我明白了林立果的意思，绝不会对立衡隐瞒，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明白。

林立衡见我支支吾吾，更加疑心。她怀疑我与立果、叶群之间的关系，怀疑我知道情况，怀疑我是立果、叶群派来监视她的。自此后，她便回避我，常把自己和张青霖关在屋子里，由老杨守在门口，不让我见他们。

晚上七点多钟，林立果来五十六楼与林立衡单独谈了二十多

分钟。院外停着林立果的专车、叶群的专车、中南海值班警卫车。叶群在车内命司机小慕不断地按喇叭催，林立果一直在屋内不理叶群的催促。叶群又派警卫员小徐上门催，说是快到八点了，飞机要起飞，叶主任等急了。林立果这才从屋内匆匆跑向院外上车去机场。

按以往情况，叶群不会等人，林立果车到五十六楼院外，自行决定停车，又跑去找林立衡。据林立衡后来对我说，这次谈话是林立衡要求的，并要林立果瞒着叶群。但林立果直到出发，叶群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林立果只有中途停车去见林立衡。这次谈话，是林立衡最后一次争取阻止林立果回北京。林立衡说破了嘴，林立果始终不开口，但神情上却流露出一丝犹豫。

林立衡从当晚与林立果谈话后，情绪再没振作起来，一病不起，第二天一点水米未进。林立衡受到这样大的打击，是因为林立果不听她的劝，他完全被叶群拉过去了。叶群送林立果走前去向林彪告别，都对林彪说是回北京看牙齿。林立衡说：“以往日的经验，她们口径一致，说明一定是串谋好了欺骗首长。光是叶群一个人并不可怕，如果立果也跟主任在一起，事情就严重了。”

北京方面，据留守毛家湾的于秘书说，林立果当晚九点半以后就到了毛家湾，挂电话到北戴河向叶群报平安，说第二天就去三〇一医院看牙齿。

又据于秘书回忆，林立果当晚睡得很早，第二天确实去看牙齿，检查、拍片、验血，等检验报告出来还得要两天。

九月九日

晨起与小王去林间散步，回来仍不见林立衡露面，杨处长在东边凉台通往客厅的门口打太极拳。我向他打招呼：“杨处长，

姐姐起床没有？叫上面送早餐来吧。”

杨处长答道：“你先用吧，不用等你姐姐。”声调既冷又硬。

我惊疑地望了杨处长几眼，见他不理不睬地只顾打自己的太极拳，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回到起居室内问小王：

“姐姐昨晚吃饭没有？”

“没有哇，直到夜里也没见传饭进去。要不要我再去看看？”

我马上制止小王，心想立衡那边有张青霖照顾，她们在谈恋爱，我多管闲事岂不难堪？转念一想又不对劲儿，哪有谈恋爱谈得两顿不吃饭的？而且很不像立衡稳重的性格。我当时哪想得到立衡和青霖两人整夜未眠，连与青霖住同一屋子的杨处长也卷了进去，立衡首先向他俩打了招呼，这两人是“林办”中最先知道情况的人。照他俩的意思，立即要通知北京方面逮捕林立果，但当时还有许多情况不明，又没有直接证据，既不便向林彪报告，又不好下手抓人，三人整夜商量不出好对策。

快十点钟了，小王见我闲着无事，提议去五浴场转转，找不到李处长，我自作主张要了中南海值班车，带上小王出去玩儿。

五浴场里除了一群警卫干部再无他人。离岸不到一百米围着防鲨网，九月初的海水已有一些凉，我不敢下水，沿岸边散步。

不一会儿，门口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回头张望，见一群警卫簇拥着一位健壮的老太太进来，她一眼看见我，一副询问的神情。一个警卫忙凑上前低语，她立刻笑咪咪地向我走来。小王赶紧向我悄语：“这是朱德夫人康克清。”我忙接住她伸过来的双手，恭敬地望着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前辈。

朱夫人拉着我双手上下打量，问道：“你就是那个前线歌舞团的张宁？”

她突来这一问，我不知如何回答。叶群曾交代过：“你的身

分对外要保密。我对谁也没说过，一露口，怕人家打听呀、问呀，麻烦事就多啦。你对外可不能说。”可是朱夫人一下就点出了我的出处，林家的事除了叶群自己漏嘴以外，其他人是不敢乱泄露的。我心疑准是叶群自己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朱夫人，却又不敢违了叶群的规矩，慌忙下撒了个谎：“不是的，我姓丁。”

朱夫人咯咯笑起来道：“还不好意思说实话。叶主任都告诉我啦，说立果找个对象叫张宁，是前线歌舞的主要演员，爸爸也是红军，说你和立衡这几天要来。立衡和青霖好不好哇？立果哪去啦？怎么不跟你一起来？”

我涨红了脸逐一回答朱夫人的问话。从来不会撒谎的人，当着不该撒谎的人面前撒了谎，内心愧疚难当。她的孙儿站在她身后，是一个魁梧的青年军官，正盯着我看。我曾听林立果说起过他，曾与林立果一起夜泳。他看我的那种眼神，是所有初见我的男性看我时都有的。

我问候朱夫人和朱总：“您身体好吗？朱总身体好吗？”

“嗯，我身体很好。你朱伯伯的身体不行啦，上了年纪，脑血管硬化，常得跟他聊聊，几分钟不说话他就睡过去了。你游泳不？换衣服跟我下水吧。”

见我不游泳要离开浴场，她交代我说：“回去向叶主任和首长问好，就说我和朱德问候他们，明天我们回北京。”

离开五浴场又驶向东山。靠海的一个悬崖峭壁顶上有一座像土地庙那样小的灰砖平房，所谓院子就是房子前面余下的一小块平地，只够一辆轿车掉个头。三面临海的峭壁边缘上有几棵自然生长的小松树，不熟悉地形的如果晚上乱走，准能一脚踏空跌落海里。

林立果常到这座小平房里来，海边沙滩上停着试验用的水陆两用汽车。林彪重视提高现代军事机械装备，那时中国与外国不交流，林立果瞒着林彪、叶群偷偷从广州方面经香港买回一些科

学书籍与设备，他常常与张青霖谈及美国、日本、西欧、南朝鲜等国家地区的科技进步，他认为张青霖是搞医学的，脑子里没有太多冥顽不化的教条，搞医是承认科学的。张青霖经常与林立果聊天，发现林立果脑子里装的东西完全与同时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他叹惜道：“难怪首长和主任批评他邪端异说，他是个很有思想的年轻人。”林立果把买回来的一些设备拆拆装装，搞些改良发明，不管上不上路子，忙得挺认真。水陆两用汽车正是他当时热衷的一门技术革新。

小平房里有两位值班护士，与我身边的小王一样同是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临时借调来执行护理任务的。她们领我参观平房内的布置，告诉我林立果日常来这里开水陆汽车，不在此过夜。小平房里只有两间房间，一间卧室，小的只能摆放一张双人木板床，床头柜上放一架手提式理疗机，林立果有鼻炎，受点凉就发，窗户上没有窗帘。外间屋是客厅，摆两张军人沙发，沿窗一排长条桌，摆放十几瓶海洋植物。这间小平房在“九·一三事件”后，被中央列为“黑据点”，水陆两用汽车也列为林立果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军事武器。

回到五十六楼已近中午十二点，没想到出去两个多小时，家里找急了我。杨处长见到我就叫：“上面打几次电话传你，你到哪去了？快给上面回个电话。”

林立衡也脸色憔悴地出屋迎着我问：“你到哪去了？怎么不跟李处长说一声。叶主任找你，你回个电话吧。”

我心下惶恐，不知叶群会怎样申斥我擅自外出。正要打电话，李处长来了，说道：“刚才见到你的车回来，过来看看。上午找你也没什么事，主任叫我问问你，要不要拿衣服，让立果给你带回来。”

我征求他意见：“你说我要不要带？”

“那还不是看你自己呗。”

“大连比北戴河冷?”

“差不多。”

“那我不带了，反正几天就回去了。”

“随你便，我去回话了。”

李处长上去不久，叶群传我上去。内勤小克早已站在院中等候，一见我便催我赶快进去，神色焦急而紧张。我心中一紧，从内勤们神色上往往能看出叶群的“状况”。

果然，叶群一见我劈头就问：“听说你在五浴场碰到康克清啦，都说些什么?”

消息好快，一路上冷清清，小王寸步不离我，小平房里的护士接触不到九十六楼，谁传的?

我三言两语汇报完浴场见康克清的情况，隐去了康老一大段话，当面揭叶群的“漏嘴”毛病岂不惹她恼羞成怒，转达了朱总夫妇向她和林彪的问候。

“哦，他们还没走呀?你看怎么好，你们几个孩子到这来是保密的呀。”边说边用眼角瞟我，很埋怨我的样子。偏又是她叫我“没事出去玩玩，到海边转转”的，真去了，又兴师动众地怪罪下来。

“你看，她问候我和首长，我现在不好回话呀。首长住这里外边还不知道，是你告诉她的?”倒打一耙，神情毫无愧色地阴阴地盯住我。

我摇摇头，默不做声，任凭她撒谎编造发泄心头不满。

“不回话吧，他们要是知道首长住这里，提出要来看望怎么办?首长那身体怎么好见人?得罪就得罪这一次吧。唉!”说罢不满地斜睨我一眼，好像是我让她难做人。

“你以后不要到处乱走，对外就说姓田，随母姓嘛，不要说姓丁，丁姓正好是我的亲戚，别人又好乱猜啦。在我这里挑几本书，闲着看看书，学着写诗，我经常看小说，读唐诗宋词，充实

自己，你也要学学。”

“林办”的人都说叶群惯会说谎，撒谎从不脸红。我初入林家门，便领教了她这一手。当时心里惊讶这么大个首长，怎么跟个市井妇人一般又赖又不讲理，她不会不想到康克清直言问询，也料到我不敢多嘴掀了她漏嘴的底，公然倒打一耙，仗着她的威令我今后无条件地驯服于她。想到这里，我的神经又凉又麻，有这样一个婆婆，跟下地狱有何区别？

“听到没有？今后你就姓田吧！”

我只好点点头。顺口给我改姓，今日她说姓田，说不定日后忘了又说我乱讲。嘴上说不好给朱总夫妇回电话，背后一定回电话，嘴巴准会抹了蜜似的甜，朱总虽然不管事，军心民望甚高，叶群不会不出于自身利益维持其良好关系，所谓的“得罪”不过是借词怪罪我罢了。

书架上很多书，古今中外名著、诗词、俄文版诗集。我盯着书架发愣，怕选择不好又给她借题发挥。凭经验，在她面前不能显出自主爱好，要处处听她指使安排来显出她高人一筹，她才高兴。见我久不下手拿书，她果然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俄文版普希金诗集问道：“学过俄文吗？”我摇摇头。她笑说：“这本书你看不懂，立果跟我学些俄文，你们年轻人要学点外语，增长知识，我们老啦，还不断学习。”她自卖自夸地说着，精神上似乎得到一种满足，可我又觉得她神情上显得那么无聊。

叶群沿着书架慢慢地踱步，顺手抽出三本书，曹禺的《日出》、杜甫和李白诗选，递给我说：“看过没有？先看这三本吧。”这三本书早已看过，我仍然接下了。其实，我很想看《斯巴达克斯》和《基度山恩仇记》，这两本遭到江青批判，书店里早已买不到。当时很多人心里对江青有看法，吹毛求疵神经过敏形成她这个人的特质，这一特质乘着她的权势，风雨都得听她调遣。在人们心目中，她糟蹋了中华民族许多好东西，所以，她要

批判打倒的人与物，人们在心里都存有很大的保留。这两本世界名著遭江青封杀，外边没有的东西里面一定有。在江青、叶群之流来说，她们看这类书是“批判研究”，就像所有的电影是“封资修糟粕”一样，被封杀存库，连每年从有文化协定国家进口的外国片也库存起来，上万部新老中外影片只供江青一人“研究”，全国亿万人民只配看她“研究”的结晶成果——八个样板戏。

我真想看那两本“黑书”，我磨蹭了好一会儿，却开不了口。叶群又生新花样，笑咪咪地说：“青霖写了一首诗送我，你看完诗选也写一首来看看。”青霖是写了一首诗送她，不过是为了林立衡的处境逢场作戏哄哄叶群罢了，我不得已地点头敷衍她。

我刚走到门口，叶群又叫回，问道：“豆豆和青霖这两天怎么样？你常过去看他们不？”

我回道：“姐姐身体不好，已有几顿没跟我一起吃饭，我也见不到他们。”

叶群在我回话时注视着我的脸，听完后脸色阴沉地低低地“嗯”了一声，旋即脸色一变，和蔼可亲地笑着交代：“你是江西人，听孙师傅说你爱吃辣椒，爱吃就叫孙师傅给你做。不过，我痔疮病常犯，不能碰辛辣东西，叫孙师傅把锅刷干净。”

空送人情，她这一表白，我就是辣椒虫也不敢沾用她的锅，她真要犯了痔疮病，我和孙师傅都说不清楚。孙师傅每顿只给我备辣酱，从不敢炒辣菜，真炒了，哪怕一次，让叶群知道，准会骂孙师傅故意害她，“天天炒辣椒”给她吃。

叶群的痔疮病多数是因情绪发作，情绪不好准发病。自己疼就算了，工作人员也跟着倒霉。尤其是秘书念文件的规定时间一到，碰巧叶群正做治疗，也得硬着头皮进去。那模样可古怪，叶群光着屁股趴床上，边治疗边听文件，秘书低着头坐在地毯上，

或背朝她，离得远了她说听不见，离得近了，念文件总要时不时地抬头征询她的意见，便吓出一身冷汗。碰上她高兴，会自嘲自己“我已是老太婆啦”；不顺意时，会无名火爆发大吼一声：

“出去！”哪个秘书不怕担个“流氓”的帽子？

每遇她做治疗时，轮到读文件的秘书就头大，有的秘书从进门就背向她走路，到地毯中间一屁股坐下面向窗外大声念文件，叶群早已走掉还不知道，仍叽哩呱啦念得辛苦。

我再次向门口走去，叶群在后面笑嘻嘻地递话说：“你不要多去打扰豆豆，她和青霖谈得正热乎呢，你多去了影响她们，她会不高兴。”

我心里微微诧异，她怎么这样贬毁立衡，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看得那样庸俗。

见我点头不语，叶群又问：“立果走时跟你谈了什么？”

我摇摇头低声答道：“没谈什么。”

她不相信地盯视我追问：“你们在一起时间不短，立果什么也没跟你说？”

我下意识地避重就轻答道：“立果说回北京看牙齿的事，说四天就回来，叫我好好休息，其他没说什么。”

叶群神色微露惊讶，问：“他告诉你四天就回来？他把回来的时间都告诉你了。嗯，还谈些什么？”

“真的没再说什么。我们坐着，他还去了首长那里。”

“哦，去的时间长吗？”

“不长，一会儿就回来了，是小孙通知的。”

叶群见套不出什么话，便说：“立果关心你，你就好好休息，不要跟工作人员多接触，都是男同志，立果知道了会不高兴，他会吃醋！哈哈哈……”

我难堪地低下头，瞬间瞥见叶群的脸色在笑声中陡然沉下来，我明白，她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从她的话意里隐约听出林

立果似乎与她通了气，但是我不能说出那些敏感而又不明白的话题，我的身分和对林立果的承诺都不允许我那么做。但我实在想不通林立果既然让我不要对叶群泄露谈话内容，为何又自己向叶群说，岂不自相矛盾令我难做人？

我犹如芒刺在背般地出了门，因为她毫不掩饰地冷冷盯视着我。

林立衡又迎在五十六楼门口，问道：“主任传你上去了？”

“是的。”我边点头边观察她的气色，一双眼怎么那样忧郁？眼窝四周青黑，没睡好觉？

“姐姐，你要注意身体。刚才主任还问到你呢。”

“哦，她问什么？”

“她问我你和青霖哥怎么样。这两天没见你们出门，我说有杨处长陪你们。她叫我带话给你们，想吃什么叫孙师傅做。”

“你去浴场的事都告诉主任啦？她没有说什么吗？”

“告诉她了，她叫我以后对外姓田，给我三本书，叫我在家看书。”

林立衡一双大眼定定地望着我，半天才缓缓地说道：“你早晨起床以后，可以叫小王陪你去海边散散步，从那条小路走过去，十分钟就到了。”她指着屋后树林里的一条小路。

我像发现了秘密似地惊喜地问她：“你们每天早晨去散步？我怎么没有看见你们？”

“嗨，你姐姐去散步的时候，你还在睡大头觉呢！嘿嘿嘿。”杨处长走过来插话，随即请立衡回屋休息。

以后我知道了林立衡晨起散步是有目的的，一是寻觅林彪晨起转车的方位；二是将一天的活动量集中在早晨，不叫车，不带随员，不惊动叶群，然后闭门一天，佯称不舒服，避见叶群。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叶群生疑心，生出更歹毒的点子危及林彪。林立衡生性忠厚善良，在叶群面前长期处于势弱受欺的境况，她出

现在叶群面前的时间越长，受虐待的机会就越多。而每次受虐待后，林立衡都因顾虑林彪的身体而对父亲隐瞒不吐实情，全“林办”的人没一个人敢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直到死都不知道叶群虐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林立衡搬离毛家湾长期住在养蜂夹道，王老太太如影随形地跟着她，时刻提防着叶群加害由她一手带大的林立衡。所以林立衡不见叶群便少生事端，大家都安静，这已是一条定律。在北戴河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林立衡更加小心谨慎。

晚上九点多，我已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在起居室里值班的小王接到叶群传我和林立衡、张青霖的电话。这么晚还传我们，又不知叶群搞什么新花样，一般八点以后不传就没事的，今晚有点特别。刚吃下安眠药，心里有点紧张，不去又担心叶群怪罪，小王说安眠药剂量不大，可以挺一挺，不挺怎办？

张青霖和林立衡先走一步，到了叶群办公室见她坐在沙发上看小说《高老头》。她们闲聊之中我进了办公室，林立衡轻声说道：“今晚主任请我们看电影《日出》。”叶群兴致很高，问道：“白杨饰演的陈白露演得可好啦，看过没有？”我点点头，心里很感慨，外面在批判这些老艺术家，里面却说着实话，这政治真是愚弄百姓的。

内勤小克、小斌张罗着摆沙发送茶水，小孙忙着架放映机，一切都忙妥了，三人退出去。叶群拉我在她身边坐下，不时地问东问西，安眠药的作用渐渐发挥，又在紧张应对之中渐渐退掉。

十点左右，林立果从北京来电话，叶群接完电话继续看电影，有说有笑的。

据后来在毛家湾的秘书反映，林立果当晚仍在毛家湾住宿。留守毛家湾的王老太太曾到他屋内看过，一进门见满地散乱地摆放着各式各样拆卸的零件，无处下脚，林立果坐在地上组装，催王老太太出去，说太乱没地方给她坐。

电影结束已深夜十二点多钟，叶群留下我，叫林立衡、张青霖先回去。立衡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我心中叹苦叶群为何要折磨我，这么晚了，留我下来做什么。

立衡、青霖走后，我昏昏沉沉地低头站在沙发旁静候叶群吩咐，她躺在沙发上望着我，悠悠地说：“今晚你别回去了，陪我聊聊天。”

我很紧张，陪她聊天不是件轻松事，我打定主意少说话，在她旁边一张沙发坐下。

叶群懒洋洋地说：“你刚来立果就走，撇下你一个人冷清清的，不会有意见吧？他工作忙，你要体谅他。这几天我来陪你好不好？”

我心里不以为然，这个“陪”字我可担当不起，我便望着她不作声。

叶群问道：“昨天你俩谈什么？跟我说说。”

见我又不吭声，她催促道：“说说嘛，害什么羞。立果欺负你啦？告诉我，我给你作主！”

激将法挺有用，我只好开口：“立果没有欺负我。他叫我注意身体好好休息，真的没再说什么。”心里直打鼓，叶群厉害刁钻，岂能信我，可当面讲出她忌讳的事，不又招嫌？

叶群微笑不语，似乎欣赏我那种入套后又不敢直言的窘状。此时我也横下一条心，论理我这个未过门的准媳妇也不该论及婆婆的是非，反正她对我原本就存有忌心，随她怎么去看好了，总之是她和她儿子之间的事。

叶群不再追问，换了话题信口开河地说起来：“你和立果的事拖得时间很长，事情不简单啊，有很多事你还不知道。追立果、立衡的人很多。人家儿女成群，我就这么两个儿女，小的时候不觉得怎样，现在大了就觉得难办啦。介绍的人很多，这家想介绍，那家也想介绍，得罪哪家都不好，人家总是一片好心嘛。

后来介绍的人多啦，我们老不要，人家好说我们架子大啦、门第高啦、看不起人家啦，引人家说闲话。只好保密，封封口，压一压，就说立果和立衡不想过早考虑这个问题。还不敢说有了，说有了，人家更关心呀，问是哪个呀，什么时候办婚事呀，要送东西啦。首长对儿女要求严格，结婚要做个表率，不铺张浪费，床上不搞花花绿绿，一张白床单，两床军被就行，副统帅家不带头破旧立新，怎能说服别人呢，你说是不是呀？”

我点点头，心里却万分否定，什么人家介绍、保密、怕送东西，全是谎话。我这个经过千挑万选，动用组织行政命令强逼来的人早已尝够了不服从命令的苦头，领教过她的厉害，现在竟又当着深受其害的我大言不惭地说谎，叶群被权势骄纵得完全蔑视他人的感觉。她极力摹仿江青已到了可憎愚蠢的程度。至于结婚与否，新房如何布置，都不是我的意志能够决定的，我心中有谱，虽然眼下进了林家大门，外边还不知道我的存在，“秀女”仍不断从全国各地往上送，好中求好、精益求精，在这一方面叶群是不厌其烦的。在她来说是一种享乐，因为我们这些不幸的女孩子在她眼里只是件“贡品”。

叶群又继续说道：“立果还是个孩子呀，怕羞，见了女孩子就躲，只好我出来挡一挡啦。有个外地十六岁的女孩，不知怎么见着了立果，害了单相思不肯回家啦，没办法，好说好哄，送给她很多纪念章，才把她骗走。什么样的都送上门，为了立果我可得罪不少人。”

叶群把自己说的很可怜，谁都知道叶群当年“准皇后”的地位，任何人不经她传唤是见不着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落选后精神上是受了些刺激，一个单纯的少女被你引诱得发了病，反倒推卸自己的责任，当笑话奚落人，叶群身为人母，其心如此狠。我当时便联想到她以后不要我时，又将怎样对别人说我了。

至于她替林立果“挡一挡”更是无稽之谈。林立果性格腼

腆，对选美很反感，这歪招是叶群出的，又是她最积极，叶群的心思是想借着由自己一手挑选的女婿和媳妇，进一步控制不听话的儿女。林立果和林立衡联合反抗她，两人都虚与应付，甚至不见应选对象。他们母子之间的抗争，客观上伤害了许多无辜青年男女，就是对他们自己和林彪的声誉也造成严重损害。叶群所谓“挡一挡”还有另外一段话，应选的人首先得过她这一关，她满意了，再让立果、立衡看，立果、立衡不同意她便打发掉再挑。后来挑花了眼，上了欣赏俊男美女的瘾，送的人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引得叶群一发不可收拾，恨不得选尽天下所有标致人儿。林立衡曾讥刺叶群：“这哪是为我们选对象，是给她自己挑对象呢！”

我低着头听她胡诌，心里很不是滋味。耳旁又响起她津津乐道的声音：“有个上海姑娘皮肤很白，辫子又黑又长，立果看了一次就不愿再看。有个四川姑娘很漂亮，还上了《中国妇女》，会弹琴、唱歌、跳舞，立果也不要，让我为难啊，怎么回人家。立果可喜欢你了，见了你就迷上啦。可是知道你的人多，影响大，为了保密我只好把你放一放，先送回南京。立果急啦，吵嚷着要自己去南京找你，我搬出许世友吓他，说让许和尚知道了把他扣在南京，他才不敢去，哈哈。”

叶群不打自招，从我离开北京后，为了遏制林立果鲁莽行事，叶群布置人手突击，按照我的模样四处寻觅替身“秀女”，天下难找一模一样的人，就是身体、发肤、技艺有某处相似，上天赋予的气质再难对号入座。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我父亲临终托孤之人，他看着我长大，他生性忠耿仗义，最见不得歪风邪气，叶群和林立果很忌惮他的虎威。

叶群胡诌到这里突然横插一杆：“立果走时没向你流露什么吗？”

我还没到被她说昏的程度，抬起头望着她再次摇头。

“你们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啦？告诉我。”

难启口，又摇头。其实我不说她也清楚，林立果身边密布她的眼线，一举一动都会传到她的耳朵里。

“都说你不爱讲话，嗯，缄默文静好，女孩子就要稳重。”嘴上虽如此夸赞，脸上神情却是冷冷的。我知道她言不由衷，她对我的嫉恨因林彪那记耳光已产生不正常的心理，由不喜欢发展到诋毁：“人长得太美不吉祥，眼神会勾魂。”我的双眸很明亮，顾盼之间闪烁的光芒被她说成“勾魂”。在当时的中国，一个女人具有这样的“本事”是不正派的，可我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老实单纯的女孩子。

她慢慢吸吮着茶水，细细打量着我，好久，点点头，“嗯”了一声，说：“立果说画上的美人不是现实中的美人，他蛮有眼光。”说完，“嘭”地一声放下手中茶杯，起身上厕所。

我被她讽刺得浑身燥热，又受到她重放茶杯的惊吓，头脑昏昏沉沉，巴望着赶快离开，不知下面她还要怎样折腾我。

叶群重又躺回沙发上拉长声调问：“累了吧？想吃点什么？”

引我往陷阱里跳呢，她不吃不睡，我若表示又累又饿，马上给你难堪的滋味不是好受的。再者，我已被她那些话“喂”得饱饱的，心里既委屈又难过，精神上很不舒畅，哪还吃得下东西。我赶紧摇摇头。

她倒真的按铃传夜点。小克送进两个剥了皮的大水蜜桃，叽哩咕噜几大口，啃得剩两颗桃核。她的吃相很不好，又怕胖，偏好零食和水果。我心想，幸好没要东西，如果小克准备得不足，分给我一份，叶群真会让我窝在心里几天消不了食。

吃饱了，精神十足，又聊开了：“立果独立工作以后我就放手让他去锻炼。时间长了我也想他们。有时晚上想去看看他们，又怕影响他们休息，我就在门上贴张条子，让他们起床以后来看看我，不想办法见不着他们呀。”

又撒谎。立衡、立果的作息时间与叶群不同，叶群白天睡觉，夜里工作，她睡觉时谁也不许打扰，立果、立衡怎会去犯她的禁？立衡被逼三次自杀，只有远离毛家湾避开她；立果忍受不了她的控制，被逼得到处跑，回到北京连汽车上都被装上电话，人到哪儿，电话追到哪儿。说是让林立果单独行动，身边从未少过人，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等人，明是林立果的人，实际上是叶群安插的亲信，就连林立果与我约会，也在他们监视之中。立果、立衡不常见到林彪，是叶群从中作梗，她怕儿女们将外面的真实情况告知林彪，这样一来，她欺上瞒下的一些事就会露馅。林彪要见儿女也一样难，叶群随便找个借口就搪塞了，林彪真以为儿女工作忙，或是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

立衡、立果都曾提醒过秘书们，请他们注意叶群传送给林彪的情况的准确性，要把好关，尽量让林彪少受叶群欺骗。秘书们也难，弄不好就扣个政治错误和挑拨离间的帽子，叶群的手腕和说谎的本事大家都领教过，谁也不敢在他们夫妻间插一脚。

送到“林办”的文件一般都由叶群处理，重要的部分选出来，由叶群和秘书们讲或读给林彪听，遇到林彪身体不好时，不但不听讲读，连必须的签字都免了，由专人摹仿笔迹代替。叶群虽然处心积虑想控制林彪，林彪却十分讨厌她有事没事在面前唠叨不休，叶群阻挠林彪见儿女，可她自己在林彪面前也不吃香。

有一次，立衡和立果分别从部队体验生活回到北京，向林彪汇报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军事素质、生活待遇、组织纪律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林彪听后非常高兴，带兵出身的人，心系的就是军队。

叶群知道后，立即派秘书去准备自己下部队的地点。但她是公众人物，目标太大，一张老上电影、报刊的脸到哪里人家都认得。野战正规部队离京城大老远，“林办”又离不开她，好不容易在北京郊区安排了某部，去走一趟。一下车，指战员们就认出

了她，在人们的眼里她就是林彪的化身，指战员们口号喊得震天响，叶群被前呼后拥地转了一圈。回到毛家湾便跑去向林彪汇报，把从儿女那里听来的情况加油加酱地如法演绎一番，听得林彪眉开眼笑，表扬她“能与广大指战员打成一片，有进步。”

叶群尝到了甜头，找到了讨好林彪的诀窍。但下部队多有不便，叶群后来就跟秘书规定，凡是立果立衡下部队回来，首先通知她，向她做汇报，再由她去向林彪说。林彪哪知真假，以为叶群真的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叶群一箭双雕，既阻止了儿女见林彪，又不劳而获。“林办”上下都知道叶群弄虚作假，反正你汇报他汇报都一样，谁也不去跟叶群的争宠意识计较，自找麻烦。

叶群越聊越有劲，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叙说林立果的笑话和延安时期跟林彪谈恋爱的往事。她不觉中流露了林彪对她的淡薄之情和两人不同的待人态度。她说和林彪谈恋爱时，身边总有警卫员跟着，她觉得很不自在，便把林彪引到民房后面躲起来，让警卫员看不见着急到处找，林彪过意不去要出来，她就拉着不让走。从谈恋爱到婚后生活，林彪因军务繁忙，与叶群聚少离多，叶群把部分原因说成是对她的严格要求，她认为应该牺牲儿女情长不拖林彪后腿，支持林彪“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但叶群是渴望爱情的女人，有一次林彪开完会回家，虽已夜深，叶群仍坐等他回来，见林彪冷冰冰地只顾看文件不理睬她，她便向林彪撒娇要水喝，叫林彪给她倒水。林彪头也没抬说，“要喝自己倒！”其实叶群不是真的想喝水，只是借口想讨点林彪的温存。“哎呀，我当时差点哭出来，最后还是我自己倒来喝了，那时我还年轻不懂事，以后就习惯啦，你想想，我要是拖他的后腿，他光想到我，还能打好仗吗？”

“你困啦？”

我一下惊醒过来，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我觉得自己一直看

着她说话，耳朵里也清楚听到她的声音，眼睛怎么会合上的？我向她摇摇头，表示自己没睡着。

叶群笑出声，倒没什么恶意。

“立果工作忙，你要支持他，做好他的助手，帮他抄抄写写整理文件书籍。这几天我陪你玩，等他回来再陪你到海边玩玩，照照像。以后生活在一起要互相体贴照顾。他事情多，可能照顾你少些，你要理解他。”

我真想睡觉，忍不住揉眼睛，一个大哈欠刚到嘴边，硬憋回肚子里。

“立果对你很关心呀，走时还叮咛你好好休息，吃饭还给你搬沙发，知道你喜欢吃鱼籽酱还给你留着，我这个做母亲的还不如你呀。”

话里又露出芒刺，我的瞌睡虫一下惊飞了，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生的那一幕，叶群又信口胡诌起来。

李处长进来报电话，叶群进卧室接听，没几分钟便出来对我说：“是胡主任（邱会作夫人）电话，问候我和首长，问你和立果发展怎么样。她可关心你啦，她是你们的大媒人，将来可别忘了谢人家。”

我心想，胡主任为了我和林立果，受了叶群不少气，也得罪了许世友夫人，连我也不理解她，里外不是人，这个大媒做得太不值，不都是你叶群在里面折腾的嘛。

叶群见我没表示，也知道这个话题谈下去没意思，越谈越会露出她两面整人的伎俩，便说道：“我听孙师傅说了，你吃得太少，像猫食嘛。要多吃多睡，你太单薄，要胖些才好。等会儿我送你一盒福州桔饼，开胃。我不能再开胃啦，上了年纪，太胖不好。”说罢起身真的进卧室捧出一盒桔饼。

我拿一颗尝尝，闻名全国的福州桔饼啥滋味？蜜甜涩苦。准是她不爱吃的，好吃的东西几天就不见影，别看她年纪大，挺爱

吃零食，都说她像只老鼠，吃东西喜欢偷偷摸摸，怕人看见掉了身价。有时东西吃得太快，想再买又怕人说她嘴馋，抱着空点心盒问王老太太：“谁吃了我的东西？”哪个敢吃她的东西？又哪个敢讲“是你自己吃的”？总之明白她要再买就是了，她却总不明着讲。

叶群看我嘴里含着桔饼皱起眉，忙推销她的滞货：“是有点苦，这东西非常开胃，我吃了几颗就老觉得肚子饿，再不敢吃啦，你带回去慢慢吃吧。”

当她面推不掉，扔掉也浪费，毕竟是上等贡品，心里打定主意送人，说声谢谢，收下了。

“你身边带着爸爸妈妈的照片没有？拿给我看看。”

我从随身小皮夹里拿出一张爸爸的照片递给她。

叶群拿在手上细瞧：“你长得有点像爸爸。听说你妈妈年轻时是南京军区里的大美人，你多数还像你妈妈喽？”

见我不回答，又问：“有妈妈照片吗？”

“没有小的，有大的，放在北京。”

“你怎么不带在身边，从母亲看女儿，可以看出你将来的模样。我把你爸爸照片送回北京翻拍放大，今后为国家工作，回去看看的时间不多，为革命嘛，总要做点牺牲，想家了就看看爸爸照片吧！”

我觉得她说话古怪，爸爸早已去世十多年，跟想家有什么关系？听她话意，这一辈子都难得回家了，心里不寒而栗。

叶群按铃传小克进来，叫他把照片托咐明天的飞机送回北京放大再送回来，转告家里将她和林彪本月工资拿来，再叫老王整理一些衣服送来。小克一一记下退了出去。

“哦，对了，你也带些衣服来吧，叫立果去给你拿。”

“不用了，我带了羊毛衫和毛背心，去大连够了。”

“恐怕会冷吧，你是不是没有衣服？出来休息别老穿着军

装，我送你两套衣服。嗯，还有鞋子，你不能老穿布鞋，我送你一双皮鞋。”

又把小克叫来交代：“告诉老王多拿些衣服来，再拿两双皮鞋。”

我一直不表示什么，她那一米五六的矮个子，六码小脚，怎么套得上我一米六九的高个子，八码的大脚？热情但对不上号。我心想：要那么多衣服鞋子干什么，我又穿不上。

小克走后，叶群又继续胡扯：“立果可想你啦，到南方去体验生活还带了红豆给你，《相思》那首诗你读过吧？‘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林立果从没送我红豆，自己摘几颗玩玩有可能，叶群借题发挥又栽在儿子头上。要真的理解自己的儿子，就不会只在嘴上翻甜心，有很多次林立果想见我，她都从中阻挠，把儿子撇一边，自己跟我热乎，林立果当她的面从来不敢有亲热的表示，不然她不高兴更监视得紧。秘书们都说她有点心理变态，我觉得他们所说不无道理。

凌晨四点多，叶群打哈欠伸个大懒腰，问：“见过主席吗？”

“见过。全军汇演和《东方红》大歌舞时，毛主席接见过我们。”

“那么多人怎么看得清。回北京我带你去见见主席。好啦，我该睡觉啦。”

内勤们进来，各人手上捧块白毛巾，听候叶群吩咐。叶群起身拉住我手走向卧室，我心里一阵紧张，还不放我走，又搞什么名堂？

卧室里摆放很多制作精巧的假花，叶群笑问：“闻到香味没有？”我说假花没有香味，她咯咯笑出声。她喜欢花，当时中国鲜花很少，尤其不到花季难得见到大批鲜花，叶群搞很多假花装

饰房子，但摆得太滥，反显得俗气。

叶群换上白丝睡衣裤，由内勤挽扶着趴上榻榻米床，内勤一边一个替她做全身按摩。由于长期重手按摩，身上到处是青紫斑。

“你也来做做按摩吧？睡前按摩好催眠。”

“不用，我不习惯。”好好的，谁忍心去折腾陪着熬夜的内勤们。

“过来，让我亲亲。”叶群亲热地向我伸出一条胳膊。

我依从走近身边弯下腰，让她在腮上吻了一下，她喜孜孜地说道：“以后你就叫我妈妈吧。”

升得好快，还未过门就让喊妈妈，内勤们一齐望着我，叶群等待着，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还是在前面加上了姓氏，叫声“叶妈妈”。

“喂。”叶群笑咪咪地答应着，说：“你回去休息吧，上午我不传你，睡到什么时候起床都可以，想吃什么，叫孙师傅给你做。”

出了门，凌晨的空气清新凉爽，我深深吐出一口长气，伸伸酸软的身子，一眼瞥见司机小郭和小王护士站车旁等候，一问才知道里面没有传话出来，他们不敢走，竟在外面等了一夜。九十六楼与五十六楼之间距离只有十几秒钟车程，我走回去就可以，叶群却一直叫他们在外等着。夜里挺凉，蚊虫又多，我怀疑叶群故意惩罚他们白天自作主张领我外出。我实在于心不忍，心里闪过一念：在极权面前，这些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人太微不足道，联想自己在叶群面前的可怜处境，心里更加郁闷黑暗。

这一夜长谈，以后成了我政治问题上的悬疑，专案组和一些人都认为正当叶群阴谋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她哪来的闲情逸致跟我聊天？我也一直在想叶群与我聊天的真正用意，无非两点：一是借我驱散她焦虑不安的心；二是培养感情为今后孤家寡人处境

下多个人陪伴。她想得很多，从空疗临时借调来小王和小朱，也在她算计之列，她说：“身边内勤都是男性，不带几个女的，好不安心啦。”她的如意算盘打到了每个人的头上，虽然当时没确定去的方向，但她需要人侍候，准备把在北戴河的整个“林办”都带走。当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到去大连的通知，从这一点上分析，叶群还没有出逃外国的打算。

九月十日

睡到下午两点起床后，上面派出一辆苏联制吉姆车送林立衡、张青霖和我去山海关、秦皇岛游玩。

在车上，立衡谨慎地问我：“昨晚你们聊得很晚吧？”

“嗯。凌晨四点多主任才让我回来休息。”

“哦，聊那么长时间，聊些什么呢？”

“主任讲些生活上的事。”

我确实无法把叶群四个多小时里拉拉杂杂的内容一下归结清楚，只好简单回答立衡。她又误以为我防她，便不问了。

登上山海关城楼，遥望塞外，一片秋色，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还未收割。

“你读过历史吗？”立衡问我。

“没有读完。看过一些历史小说。”

“清兵从哪里入关？”

“就是从这里。”

“知道背景吗？”

“吴三桂卖国。”

立衡不置可否，沉默良久，摇头叹息道：“历史上多少悲剧都是在误会中产生，相互不信任，导致一个国家败亡。通观历史各朝，都离不开这一轨迹。”

我和青霖接不上话。我根本就没听懂她的弦外音。

城楼上风很大，立衡感冒未好，青霖催促我们下楼到一个小院里休息，葡萄架上硕果累累，激发人联想新疆葡萄园。立衡神情抑郁不言不语，青霖和杨处长站立一旁也闷声不响，我也只好陪着枯坐。

还是杨处长提醒在外时间不要呆得太长，防止叶主任有事找我们，遛一圈赶紧回去。我们上车到了秦皇岛海员俱乐部。立衡分派我给叶群买一份“礼”，她和青霖给林彪买一份。立衡买了一个机械玩具兵，我买了一只黄鹂鸟标本。

下午近五点，我们走进叶群办公室，她手上拿一份文件正要到林彪办公室去，见到我们，匆匆看一下礼品，连声夸赞，催我们带上礼品跟她去见林彪。她以往见到花和画也总要欣赏一会儿，今天为何火烧屁股似的坐不住？原来当天中央送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议程。林彪自从到北戴河后就拒绝过问一切中央的事务，“林办”工作实际上是叶群顶着。据秘书说，林彪只注意尼克松访华问题，指示秘书“一有消息直接报我”，并几次向秘书提到“我要见尼克松”。

秘书们说这是罕见的事，因为林彪最厌烦接见外宾。毛泽东也知道这一点，认为他身体不好，也不勉强他。“文革”期间有一个典型例子：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很重视，认为是东欧共产党阵营中敢于对抗苏联的强硬派，是个值得拉拢团结的大党，中方应以最高阵容接待他。因为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也一同随访，毛泽东决定他与林彪同时携自己的夫人出面接见。毛做林彪的工作：“兄弟党的主席来访，意义重大，你不出来不好。”林彪托病不肯出面，毛泽东催了两次，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叶群急了，竟向林彪下跪哭求诉说利害，林彪才勉强携同叶群随毛泽东夫妇和国家领导人一道接见齐奥塞斯库。

叶群领我们走进林彪办公室，他独坐着，脸上的胡子刮了，

白皙瘦弱，见到我们，脸上绽出笑容。

“首长呀，孩子们出去玩，还给我们带了礼物，你看看吧。”叶群温言细语地说着，招呼我们近前。

茶几上放着小鸟和机械兵，林彪伏身看一眼小鸟，抬眼望我笑笑，便盯住那机械兵再也不动。立衡忙给机械兵上足发条，小兵便做起扛枪、匍匐、瞄准射击动作。林彪微笑着很开心，我当时产生很深刻的感想，觉得他那模样跟普通百姓家的老人没两样。林彪笑起来很含蓄，从来不见他开怀放声大笑，更谈不上狂笑，他高兴起来也是温吞吞的，就是对叶群发脾气动拳脚，也不是外人所想象的力大气粗的表现，他的体质太弱是个不争的事实。

发条松了，林彪托起机械兵左瞧右看，问立衡：“他怎么动的？”立衡在他身旁蹲下做示范给他看。林彪此时的神态就像一个刚启蒙的孩子，当机械兵再次爬动时，他弯下腰兴致勃勃地观赏着。

林彪性情恬淡，足不出户，他不认识人民币，一个国家副统帅不认识国币是很少见的事。他生活规律，每天按时三餐，按时睡觉；除听听文件，从不爱听身边人杂事，不像毛泽东兴趣广泛，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林彪也不看报纸和政治书籍，他脑中想到的问题会很简要地向秘书提示，秘书按类查找，编辑小读书卡片。林彪喜欢看医书，自己开处方配药吃，精神好些时也练练毛笔字，更多的时间是闭目养神，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生活习惯，并不是当了副主席以后才有的。

叶群见他高兴，趁机问道：“感觉好些吗？”

林彪置若罔闻，面无表情地坐着，连玩的兴致也没了。到北戴河这几天，我见到的林彪与叶群的关系，极冷淡疏远，叶群极尽讨好凑趣之能事，林彪总也没有回应。虽然他们以前的夫妻关系也属平平，但这段日子尤其差，据秘书们说，连他们都处处小

心翼翼，因为林彪的情绪和身体状况在那段日子处于最不好的状态。

李处长从起居室的那扇门探出头，被叶群瞧见，忙叫住他：“你去拿相机，给我们照张相。”就此下台阶。

照完相，叶群一边观察林彪神情一边向我们摆手示意退出去，说：“你们到我办公室去吧。我和首长还有点事。”手中的文件摆到了茶几上。

约十分钟，叶群兴冲冲归来，我们等她以为还有什么事交代，她却又说了一遍去大连的事：“等那边安排好了，首长身体好些能动了就走。这两天你们好好玩玩。”当天上午，外勤警卫刘处长已出发去大连布置保卫工作，并且看大连的水能否喝。经化验可以喝，林彪不会腹泻。林彪在九月七日就说要去大连。刘处长去大连一切布置妥了，叶群又改变主意，一直拖着不动身，她心里担心林彪到大连去会被毛远新控制。毛远新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大连是他的辖区。

晚上八点，仍然传我们上去陪叶群看电影，直到十二点结束。

留守毛家湾的于书记得林立果十日的白天就离开了毛家湾去了空军学院他自己的宿舍，一直到十二日离开北京，再也没回过毛家湾。

九月十一日

上午十点多钟，叶群传我上去。

叶群情绪焦虑不安，在办公室里“转磨”。她来来回回走，一会儿拿起文件，一会儿又放下文件拿起一支笔，一会儿又放下笔端茶喝，那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知她正思虑些什么，好一会儿她才发现我站一旁，上前拉住我的手往门外走，说：“去看看首

长，他老一人坐着寂寞，你去陪陪他吧。”

我心里很为难，又拿我当“挡箭牌”，无奈地让她牵着手走到林彪办公室门口，我停下脚步望着叶群，她轻声叫我推门，并用手势做着推门的动作。我依言轻轻推开办公室门，突然传来林彪颤抖抖的长腔：“谁呀?!”

吓得我浑身一哆嗦，因我从未听过林彪用这种声调说话，好似受到了惊吓，反把我唬了一跳，忙回头望叶群。

叶群抢上一步推开门，快步上前轻声细语地说：“是我是我，张宁来看你啦。”

林彪两眼直视前方，似看非看地瞪着我，像在幻觉状态中，我心里好纳闷，他身体怎么差到这种程度？叶群叫我坐在林彪右边，她坐在林彪左边，把木愣愣的林彪夹在中间。

林彪侧头望叶群，突然抬起右手摸摸叶群手臂，关心地问道：“你穿这么少冷不冷呀？”叶群当天穿一件半透明的确纱衬衣，丰满的肌肤隔衣可见。

叶群忙凑过上半身，几乎是伏在林彪胸前，温言轻语道：“我不冷。你要多穿些，别受凉罗。”那声调神态，就像慈母对孩子说话。

我傻傻地坐一旁竟看得呆了，林彪的神威和叶群往日那种傲横刁蛮，此刻荡然无存，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俩像夫妻一样的气氛。

但情形马上变了。林彪的手仍然停留在叶群手臂上，眼睛直视叶群，不言不语，表情呆滞。

叶群望着他，微皱眉头，抬手抹去林彪手的同时，身子往后略微闪避，脸上的表情显出一丝淡淡的嫌意。

林彪木讷地坐直身子，目视前方，又好像要入定了。

我很惊讶，这夫妇俩真让人捉摸不透，平时叶群表现得很体贴林彪，为什么林彪碰碰她都不行？而林彪对她的冷淡也很古

怪，夫妻俩像有什么隔阂似的。我心想，上层人物的夫妻关系都这么隐晦吗？他们是国家领袖，隔阂矛盾的事总不会小了，是什么事？

叶群眼尖，一眼瞧见我正一头雾水地望着他俩，忙圆场笑道：“你说几句英语给首长听听。”

医训班开英语课没几天，中国的教育注重政治灌输，英文课也跟中文课一样，别的不学，先得学会呼政治口号，我用英语说了当时最盛行时髦的政治口头禅“毛主席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并用中文解释出来。

林彪突然从沉寂转变成一种神经质的哑笑，笑容很古怪，又把我吓一跳。

叶群忙解释：“在外面说说不要紧，那是政治需要，在家里不要这样讲，首长很谦虚，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关于这种口号的确立，我曾听知情人提起过，林彪政治地位写进“九大”党章之后，“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便成为正式确定的政治口号，林彪很反感，不高兴人们这样喊，毛泽东说不要打击人民的愿望，自己不也被人民喊万岁嘛。还听知情人说过，林彪被写进党章定为毛泽东接班人以后，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流泪，这种时候，只有最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我曾听他身边人说过：“首长明白他被永远钉在十字架上。”

林彪缓缓抬头，低声清楚地说：“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来永远健康。”

说完，见我惊吓害怕的样子，微笑着对叶群说：“这孩子老实。不爱说话。”缓和了气氛。

叶群见此机会，忙对我说：“你先回我办公室去，我跟首长还有些事。”

三十分钟左右，叶群闷着头阴着脸走进办公室，心不在焉地对我说道：“首长要休息，我给他哼个小曲，等他睡着了了我才能

出来。”

好新鲜，林彪睡觉还听催眠曲，叶群讲话都沙哑着嗓子，唱曲能好听？当时是上午十一点多钟，还不到林彪午休时间，瞧她那神情，准又是为什么事在林彪面前碰了壁。反正我们都已听惯了她说假话。

后来听林彪内勤说当天这一段林叶相处，挺有蹊跷。自我走后，叶群一直在林彪身旁干坐着，看着内勤端上来午餐（一碗杂面粥），叶群说烹斑鸠很好吃，意思想让林彪尝尝，林彪没理她，吃几口粥便停筷叫端走。内勤听到叶群对林彪说起到大连的事，说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带上，林彪没有一句应答的话。后来林彪起身往卧室，叶群跟进去，看着内勤们给林彪脱了衣服，服侍他躺下，静立一旁看着他入睡，始终没有再说一句话。

下午，叶群没再传我。

林立衡和张青霖一整天关在屋子里没有露面，杨处长搬张椅子坐在门口像尊守门神，谁也不让进。事后才从他口中得知，林立衡和张青霖当天已开始策划应对措施。

叶群上午那么焦虑不安，事后才从秘书那里得知，十一日凌晨叶群接过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以后，情绪上就出现明显的反常。

下午的反常言行更叫工作人员不理解，以往每天下午叶群的日程安排是：听文史教官老张讲历史；马列教官老萧讲哲学史；军事情报官老倪讲国际形势。这三个人在军内的职务和级别都不低，借到叶群身边都改行依各自所长暂时当了教官。今天下午叶群取消了所有课程，要内勤们整理去大连携带的物品。

文书小孙问叶群：“主任，除了文件、书籍、卡片（阅读提示卡）以外，还需要什么？”

据叶群的内勤们回忆所说：“叶群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出出进进，心思不知道放在哪里。”她当时回答小孙的问话也让内勤

们奇怪：“你们看着办吧，能用上的都带上。”

小孙很纳闷：叶群那么多东西没一样不能用，能带得了吗？过去一地移一地从没有这般交代过，每个地方都留有基本要用的东西，叫都搬带上，怎么带嘛？小孙眼望着叶群，见她往门外走，说是到林彪那儿看看，可刚出门又转回来，坐不一会儿又往外走。小孙见她心思重重，话到嘴边，又不敢再请示，便按照她的意思，捡自认为重要的物品整理起来。

林彪那边的内勤说：叶群到了林彪办公室，林彪起床不久，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叶群问候他睡得好不好，他也不理，叶群在他身边站了几分钟便离开了，走时还说：“唉，首长身体不好，不能动呀。”（指移动搬迁别地。）可是她离开没多久又跑回来，站几分钟不说一句话又走。林、叶两边内勤只见叶群不断进进出出，五个内勤们都有同感：“主任今天是怎么了？”谁都摸不着头脑，却又不敢问。

东西整理得差不多了，小孙拿着几本笔记本问叶群：“主任，这些笔记本带不带？”

“都带上。”

“工作人员都跟着走呀？”小孙又请示。

“都走。通知大家做准备。”

“小朱、小王是从空疗借来的，她们怎么安排？还有小雷（从人民大会堂带来的服务员），是叫她回北京还是跟着走？”

“跟着走。你们都是男同志，没有几个女同志你们好不安心啦。”

“莫名其妙！叶群胡说些什么我们当时完全听不懂。”几个内勤回忆时说道。

小孙、小克、小斌三人望着又想出门的叶群，叶群说：“你们收拾东西，注意别漏掉主席和江青写给我和首长的字条，特别是主席签字指示过的文件和交代我和首长替他办事的那些条子，

整理好另放，都是证据啊！”三个内勤懵懂不解，噤若寒蝉地望着边走边说的叶群。叶群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头也未回地自语叹息：“唉，用过我们啦，想不要我们啦，要甩我们啦。”语罢，缓缓移动脚步出了门。内勤们瞪大双眼，迷茫地望着叶群背影，以往雌威不再，眼前是一位极度沮丧、佝偻着背的老太婆。

叶群虽然说了这些话，一无所知的内勤们仍然不敢往坏处想，除了不理解还是不理解，都觉得今天叶群情绪很反常，没头没脑讲这些话什么意思。

林彪的内勤们说，林彪那里一点反常迹象也没有。叶群多次出出进进，不管叶群说话还是不说话，林彪都没有反应，甚至后来叶群进去时，林彪连眼睛都不睁开。

据秘书们说，林彪每次到外地休养，事先都向中央办公厅请假，他的行踪属于机密，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

晚上八点，叶群仍然传我们上去看电影。我由小王陪着先到，这次我学精了，悄悄叫小王先回去休息，不要等我。进了叶群办公室，她拉住我要去外面散步。院子里有棵大树，底下放置一张乒乓球桌，叶群突发兴致说要打球。小斌、小克忙将球拍和球送上。我陪她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她陡然沉下脸将手中球拍摔到球桌上，说道：“不打了，回去！”谁也不理地走进门。小斌、小克手足无措地望着我，我也搞不清叶群为何突发脾气。叶群突发无名火不是第一次，每次发无名火，身边人都不敢多问，等她自消自解。

我随叶群进入办公室，立衡和青霖已等在里面。影片是东德进口的《街头五少年》。约九点半钟，李处长报林立果从北京来电话，叶群进卧室听电话再也没出来。

从南方传到北京的消息，林立果都及时报给北戴河的叶群：毛泽东公开对各地党政军高层干部斥责：“四个伟大讨厌！”

“闹宗派山头主义的人是改不了的。”“想炸平庐山，意图何

为?”“陈伯达是过河小卒，他有后台。”等等，不点名地把矛头指向林彪。林立果对我说的“回北京看看情况”，实际上是回北京探听毛泽东去南方所做的动作，因为北戴河是禁区，一般人进不去，传递消息有困难。毛泽东对林彪封锁消息，林立果派出打探消息的人和自发地跑到北京传递消息的人，事件后都被关押收审。

毛泽东不但言论上向“各路诸侯”打招呼做工作，还使出杀手锏：召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问他：“如果有人搞军变，你准备怎么办?”

许世友表态：“我带兵北伐!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

毛泽东大赞：“好!”

九月十二日

叶群一整天没有传我。

秘书们回忆，上午林彪曾传秘书询问尼克松访华日程方面的进展。秘书和内勤都未见林彪情绪上有何异常。秘书说，自林彪到北戴河以后，林彪从未亲自接听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电话给北京方面的任何一个人。

反常的倒是林彪专车司机杨振钢，他是北方人，性格忠厚，人缘不错，“林办”的人都习惯叫他“大杨”。自从九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李处长找他谈话以后，大杨的情绪陡然变化，老躲着大家独自沉思，职责严格规定不准喝酒，从不怎么喝酒的他，却喝得醉醺醺，不论谁问他原因，他都不理睬，情绪显得烦躁暴怒。大杨组织系统归“林办”党委，工作隶属李处长直线领导，其他人管不了他。大家见大杨情绪不正常，纷纷猜测各种原因，并向李处长打听。李处长说：“我也不清楚。”

大杨连续躲避大家三天，直到十二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

冲过警卫部队的防线，进机场并协助林彪上飞机，一同死在外蒙，整个过程非常沉默，始终没说一句话。

没有大杨，林彪走不成，林彪有“三不”，其中之一就是“不是大杨开的车他不坐”。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的？因为只有李处长接触过他，所有“林办”的人都怀疑李处长。

当天中午，林立衡和张青霖得知林立果晚上回到北戴河。林立衡分析林立果回来后一定有所动作。张青霖非常焦急，因为不掌握底细，深恐飞机一旦真的上了天，不知道往哪飞（林立果七日曾向林立衡流露过去广州），建议向中央报告。林立衡认为情况还不明朗，向中央报告怎么说？万一林立果回来什么动作也没有，怎么向中央解释？怎么向林彪交代？岂不是置自己于被动？今后真的再有什么事，连中央也不会再相信她说的话。权衡利弊，为了防止万一，张青霖提出四条防卫措施：

- 一、调动警卫部队砍树拦车，防备叶群突然出走；
- 二、派人去机场破坏飞机；
- 三、林立果一回来，借谈话之机先绑架林立果；
- 四、等林彪清晨出来转车，把林彪救走。

四条措施都被林立衡否定，她认为情况未明之下先自行动一定会遭叶群反制，说不定会被栽上“杀人”、“企图谋害首长”的罪名。最不利于己方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警卫干部敢执行这四条，虽然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弟弟，但在职务上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岂可没有证据乱动他们？搞不好所有的人反会认为林立衡是“谋反”。

张青霖责问林立衡：“难道听凭首长安全受到威胁？干脆你把情况去向首长捅开来吧！”

林立衡又否定说：“只听立果口说无凭，对首长讲了恐怕他不相信。若要认真追查，主任和立果肯定否认。又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计划，要是让他们有了戒备，我们就更难掌握证据了，以后

说话，首长再不会相信我们。”

“首长有没有可能已经知道立果的想法？”

“看样子不知道。立果跟我谈话时自己都拿不定主意，不可能跟首长商量过。”

张青霖急得在屋内踱步，空有办法却行施不了，他叹口气对林立衡说道：“现在的形势，立果最危险，叶群最荒唐，首长最痛苦，你最难办！”林立衡沉默很久说不出话。

最后两人取得共识：由林立衡出面先找少数主要工作人员秘密打招呼，让他们知道叶群和林立果对林彪安全造成威胁，要他们注意林立果回来后的动向，保护林彪。

下午被召来谈话的人有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值班秘书老宋，内勤警卫处长老李，还有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四人（当天老刘已从大连布置完警卫工作返回北戴河）。

众人听到林立衡当面叙说林彪安全有危险，威胁来自叶群和林立果，十分震惊。不约而同对林立衡提出质疑：“你有什么证据？这不是你家庭闹矛盾开玩笑的事。”

林立衡一时无法说明白，只得强调：“主任说是去大连，不一定是去大连。最好让首长别动，哪里都不去最保险。”

众人更不理解，老刘问道：“我刚从大连布置完工作回来，首长和主任不去大连会去哪里？”

林立衡无奈地说：“现在情况还不清楚，你们负有保护首长的责任，主任和立果可能要把首长弄到别的地方去。”

众人才吃一惊，一起转向李处长问道：“你察觉有什么反常。”

李处长摇头道：“没有。哪有什么反常，我一点没看出。”

众人疑惑地看看林立衡，又望望李处长，好像是想找出谁是说谎者，但这两人的身分和对林彪的感情都毋庸置疑，众人傻愣着，不知该相信谁。

林立衡当机立断，向四个人具体交代任务，尤其盯紧李处长：“首长的安全你负主要责任，你要把住关。主任和立果要带首长走，你一定不能上车，你不上车，首长就不会上车，你一定不能让她们带走首长。如果首长出了事，唯你是问。”众人齐声附和林立衡意见，认为李处长这一关卡住，林彪就不会出问题。

李处长反驳说：“你又没证据，我怎么好擅自做主？如果主任叫出车，我不出车，首长诘问起来，责任谁负？现在关键的是要证据，有证据，什么都好说，甚至抓人我都敢！”李处长态度很强硬，说得也有理。

林立衡自知没有充分证据指挥不动李处长，再次叮咛他：

“我们分工，首长那边的安全你负责。”又交代另三人：“必要的时候发动所有工作人员，密切注意立果回来后的动向，特别是主任和立果到首长那里去的情况，想办法摸清主任和立果对首长说些什么，首长是什么态度。有情况马上报我，不准擅自对外泄露这里的情况，现在情况不明，别给首长造成被动。”

“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实际上在当天下午已投入戒备状态，大家虽然觉得林立衡说的情况与眼下感受到的平静气氛风马牛不相干，却一致认为一向稳重不多话的林立衡不会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空穴来风，心中交织着震惊、疑惑和不安。

北京方面，林立果准备回北戴河。正当此时，林立果得到急报：毛泽东突然返京已到西山落脚，不见任何人，行动反常。林立果怀疑有人泄露他这方面动态，又认为毛泽东行事诡异多变，秘密返京必定对林彪有不利的行动。他留下周宇驰等人处理北京善后工作，再去北戴河会合，自己匆忙起程先回北戴河。他发给小张、小袁每人一把手枪，说：“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时刻到了！”他不知道这两个当兵不久的女孩子只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根本不会放枪，后来因为这两把倒霉的枪，逮捕她们的时候还以为是“重量级”人物。

傍晚，我正站在凉台上看警卫战士上树掏斑鸠窝，见林立果的车冲过林间小路直驶九十六楼，心里默算来回正好四天，奇怪他竟这样准时。

内勤们说，林立果到达九十六楼以后，并没有去林彪那里，而是直奔叶群办公室，两人密谈了一阵，立即传林立衡和张青霖上去。

林立衡和张青霖到达后，叶群叫她们举行订婚仪式。立衡和青霖意识到叶群突发奇招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行动，当场便表态拒绝。叶群不妥协，硬拉住她俩到林彪办公室，对林彪说：

“豆豆年纪大啦，恋爱也谈成熟啦，她和青霖今天订婚，你看，立果也赶回来祝贺，我们都老了，看着孩子们订婚，也高兴高兴。”

林彪微笑地看着立衡和青霖。叶群既编且导，指挥立衡和青霖向做父母的三鞠躬，又向被传来参加订婚仪式的秘书内勤们致谢，拍了照片，林立果还献了花，叶群说是立果特意买的花，她任何时候都改不掉说谎毛病，其实是她自己屋子里的花临时凑来应景的。

一场临时拼凑的闹剧约半小时结束，三方人员：叶群林立果，立衡青霖，工作人员，都各怀沉重心思离开林彪办公室。

叶群自认算计周密，但她此时万没想到她和林立果已处在“林办”所有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林立衡从林彪办公室出来后，就问林立果：“你下面打算怎么办？”

林立果说：“走！”

“往哪走？”

“去大连。再不行就去广州。到哪都行。看情况吧。”如果有人向叶群通报了林立衡组织的监视，林立果一定不会再向他姐姐说这些话，叶群也不会白耗精神搞什么假订婚，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反制林立衡和工作人员。

林立衡看着林立果又到叶群办公室去，便带上张青霖直奔八三四一警卫部队找姜队长，要求用他们的电话直拨中央。接电话的是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张耀祠师长，林立衡说：“首长要动，可能安全上有问题，请你马上向中央报告。”

张耀祠很吃惊，叫林立衡说清楚，因为对林彪的安全他负有责任。

林立衡说：“叶主任和林立果有些反常，恐怕对首长安全不利，请中央制止首长行动。”

张耀祠认为事关重大，问林立衡：“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不可以乱讲。”

林立衡一时语塞。张青霖一旁着急：“干脆明说了吧！”

林立衡犹豫，林彪态度没摸清，怎么能讲？叶群和林立果是林彪妻儿，说出去会给林彪造成很大被动。直到此时，林立衡原则上还想在内部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她认为，只要中央不许林彪离开北戴河，叶群和林立果的计划就得逞不了，所以林立衡没有向张耀祠说出真情，只催促张耀祠向中央报告林彪不能动。

张耀祠答应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但放下电话以后很久没有回复，据说是找不到周恩来。

据内勤们说，订婚仪式结束不久，叶群带着林立果又返回林彪办公室，秘书们虽然进行监视，但不能进办公室，只有小张、小陈借着服侍林彪的理由进去，但这次谈话关着门，小张、小陈又不能做得太过分露出破绽，所以无法听清他们完整的谈话。小张和小陈贴在门缝上听，只听到叶群几句断断续续的话：“……不行，去广州怎么样？……”据小张和小陈说叶群那语调像是劝说做林彪的工作。但是他俩始终听不到林彪开口说话。摸不清林彪态度。几十分钟后，叶群带着林立果离开，林彪仍像往常一样，静坐沙发上一言不发。

林立果带同刘沛丰离开山海关机场回北戴河时，交代机场人

员给飞机加满油，并命令机上所有人员留在机上待命，晚上不准下机休息，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以为晚上不会再有任务，下飞机吃晚饭、睡觉，也没有给飞机加油。

晚上九时(比以往迟了一小时)，叶群传我和林立衡、张青霖上去看电影，影片是《甜甜蜜蜜》、《假少爷》两部香港片，场地先是放在九十六楼院中，叶群说风大怕我们着凉，又搬到叶群办公室，她又说堵塞了她进出通道，最后定在她与林彪办公室之间的走廊里。今晚被邀请来看电影的人几乎是“林办”在北戴河的全部人员，除了林、叶的两个专车司机和两位厨师没来。叶群说是为了庆贺林立衡订婚。所有的人都被叶群“封死”在走廊里，很难再监视她们的行动。叶群和林立果到林彪那里去，只需经过室外屋后的一条小路，谁也看不见他们。

长廊里，我坐第一排，林立衡、张青霖坐第二排，后面几排坐“林办”工作人员，最后一排有个小侧门通向九十六楼院子。

约九点半，叶群领着林立果从林彪办公室出来，迎面走向我们，小孙立即开灯卷起银幕下角让我们过来，大家站起身迎接。

林立果捧着一束塑料花面无表情地站在叶群身侧。叶群笑咪咪地向大家宣布：“今晚立衡和青霖订婚，立果专程从北京赶回来祝贺。呐，还送的花。立衡，过来接花呀！”

我好惊诧，订婚？专程赶回来祝贺？就眼前这么简单的仪式？再看立衡和立果的神情，冷冰冰的毫无喜色，尤其立果，阴沉着脸斜着白眼盯视立衡，像仇人似的。我茫然地看着双方，隐约感到气氛不对头，叶群表情也那么古怪，连工作人员也反常，听不到一句祝贺声，全场鸦雀无声。我不解地望一眼林立果，他正偷眼瞟我，铁青着脸，我忙低头不再看他。

瞬间的僵场后，听到叶群“哦”地一声，像刚想起似的说：“立果还送立衡和青霖两支钢笔。来，立果，拿出来给立衡。”

林立果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精装笔盒，递到立衡手上，

双方仍不说话。

“啊，张宁，这是立果送你的两方手帕，喜不喜欢呀。”叶群边说边递给我一白一绿两块绣花丝帕。

我受气氛感染，“谢谢”两字噎在嗓眼里，怎么也发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叶群说道：“好啦！大家继续看电影吧，看完以后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去大连。”说罢领着林立果回办公室。内勤小克偷偷尾随其后，不见他们说什么，进办公室也未停留，直进卧室关上门再没出来。办公室沙发上坐着怀抱黑皮公文包的刘沛丰，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以这个姿态一直坐着不动。

叶群走后不久，立衡和青霖离开座位往外走，我回头张望，立衡说：“我去上厕所，你去不去？”我摇摇头，回转身继续看电影。

他们是去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值班室再次向中央报告，时间是十点过后。

林立衡向张耀祠报告：“首长明天早晨去大连，你们千万不要让首长动！”

张耀祠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不说清楚怎么向中央报？”

林立衡和张青霖丢下电话回到九十六楼，重又坐下看电影，以应付叶群的突然出现。

但是其他人又陆陆续续走动起来，他们再次得到林立衡指令，分头监视叶和林立果，特别要探听她们到林彪那里说些什么，林彪讲些什么或有什么表示。

快十一点了，所有放出去的人一无所获。

我总感到身后异动不断，偶尔回头望望，后座皆空，一会儿又坐满，一会儿又空，搞什么名堂？都上厕所？不像呀。唯有秘书老李，坐在位子上不动，后来才知道，他是专门监视我的，到后来，竟连他也跑掉了。

北京方面周恩来查问二五六号专机下落，三十四师参谋长胡

萍报告说在山海关机场停降。二五六号三叉戟是林彪专机，林彪外出行动都乘坐它，周恩来查问此机并未引起胡萍特别注意，他还向周恩来报告这架飞机有故障。当天傍晚回山海关，林立果带了四个机械师，最后有三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后来曾听幸存的机组人员讲过，他们跟机的任务就是因为飞机有点小毛病要加以维修。

周恩来查问二五六号专机的情况立即由山海关机场通报给林立果，林立果指示机场：“再有人查问，就说飞机出故障，在机场修理。”

在这种情况下，北戴河方面仍不见叶群和林立果有什么大动作。“林办”工作人员仍按第二天一早去大连的日程做准备。

事件以后，我从一位秘书那里听到一个当时的情况：周恩来知道北戴河情况以后，除了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还向毛泽东请求让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谈话，摸清他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毛泽东不批准周恩来去北戴河见林彪。

据林彪的两个内勤说，这一段时间只见叶群和林立果不断往林彪办公室跑，有时围着林彪嘀嘀咕咕，有时站在林彪身旁一句话不说，站一会儿就走，隔一会儿又来，不管叶和林立果说话或不说话，林彪始终不开口。

十一点多了，林彪始终沉默，林立衡摸不到她爸爸的真实态度，非常焦急。直到此时，她还寄希望于中央，认为中央能够保护林彪，因为即使是她把情况告诉了工作人员，大家虽然执行监视任务，但人们受精神崇拜的桎梏束缚，仍然不相信的居多。张青霖再一次提醒林立衡去向林彪说明，立衡却顾虑林彪生活上长期受叶群控制，没有叶群的直接罪证，恐怕说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叶群已向林彪做工作去广州，林彪并未理睬叶群。她自己再去说，恐更增林彪烦恼，反而摸不着林彪真实态度。

电影情节逗得我笑出声，背后没响应，回头望，空空如也，

连一直坐着不动的李秘书，也正矮着身子蹑手蹑脚往外溜。

我再也忍不住好奇心，起身贴着墙从小侧门探出头察看。院中，月光下站着不少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心中正纳闷，见林立衡推搡林彪的内勤小陈：“你快去听听他们说什么！”

小陈说：“听不清！我和小张贴着门缝听，主任和立果说话声音太小。首长根本不说话。”

立衡说：“想办法啊！”

小张说：“我们已经想办法了，林立果好像有察觉，连门外都不让我们站。”

立衡说：“你们可借送茶水进去吗？”

小陈说：“试过，小张端着茶刚进去，还没走到沙发旁边，就被立果发现，抓住小张衣领往外推，说‘出去出去！不听到传唤不准进来！’凶得很，茶杯差点砸了，开水把小张的手也烫了。”

立衡说：“小陈，你再进去试试。”

小陈为难地说：“再进去，不找骂嘛。”

立衡说：“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你轻轻进去，听到一点是一点，赶快去！”

小陈推小张去，小张说：“我已经进去两次，不好再进，你去吧。”

小陈迟疑地走出两步，又回头对林立衡说：“首长的脾气你知道，如果有个什么事，你可要替我担待着点呀。”

立衡挥着手催促小陈：“什么时候了，还顾忌这些，快去快去！”

眼前的一幕把我彻底搞糊涂了，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们在搞些什么名堂。

月光下，院中的人们泥塑般站着，翘首林彪住的方向。

不一会儿，小陈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

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月光下，众人的身影骚动起来，不知是谁问道：“首长看到你是什么表情？有没有说话？”

小陈说：“跟平常一样，看我一眼就回过头去了。立果把我推出门外，把门嘭地一声甩上，凶得很。”

林彪那边走廊小侧门里伸出一颗头，小声朝大家喊：“主任出来了！”

所有人朝我跑来，我赶紧转身跑回自己的位置，背后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大家各坐各位，我再不回头，心里惊疑至极，琢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群和林立果并未从走廊经过，从屋后小路回叶群办公室。

小孙跟进去看，见叶群和林立果进了卧室，刘沛丰跟个木头人似的，抱着公文包坐沙发上动也不动。

小陈和小张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睡觉，时间约十一点半左右。

李处长此时接到周恩来打给叶群的电话，李处长向叶群报电话后，站在叶群身侧，据他后来在专案初期与大家排查日程时所说，他听到周恩来问叶群：“最近首长身体怎么样？”

叶群说：“首长最近感冒啦，还没有恢复。”

周恩来：“还准备动一动吗？”

叶群：“准备去大连。首长身体不好，暂时不准备动。”

周恩来：“你不是准备明天早晨走吗？”

叶群支吾道：“啊，啊，想去大连转转，还没有确定。”

周恩来：“是去大连吗？还准备去哪里？”

叶群一时无语。

周恩来：“二五六号机现在哪里？”

叶群：“啊，——不知道哇。”

周恩来突然挂了电话。叶群像遭雷击，僵在原地，刹那间缓过神来，问李处长：“首长现在做什么？”

李处长回答：“首长已经睡下了。”

“快叫他起来！”

“干什么？”

“明天早晨的日程改成现在走，你去叫首长马上起床。”

“首长已睡下，不好叫。”

据其他秘书和内勤回忆，从李处长向叶群报电话，到谈话结束，足有半个时辰。叶群真正紧张起来改变行动时间，是在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周恩来到底对叶群说了些什么促使叶群那样慌张？知情人透露，因林彪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的师生关系，林彪一直很佩服周恩来，“文革”中林、叶和周恩来接触较多，叶群也比较听周恩来的话。叶群接了周恩来的电话后，立即有了行动，恶性结局很快就发生了。

也有不少人觉得，二五六号三叉戟本就是林彪专用机，隔三差五往来北京与北戴河之间送人员、文件和物品，停在山海关也是正常事，周恩来为什么还查问，叶群又为什么无必要地说谎，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林立果正进来，叶群急急对他说：“总理知道情况啦！查问二五六号飞机，你快打电话通知机场做准备，叫内勤带上东西马上走。”

李处长和叶群是在秘书值班室接的电话，林立果当即用值班电话通知机场给飞机加油，做起飞准备。

我们正看电影，叶群领着林立果从林彪办公室方向跑来，叶

群一边跑一边摇晃着手，仓促惶急地嚷叫着：“不看了！不看了！首长性子急（林彪当时已休息，不知叶群向他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躺着未起身，据内勤说，这是他刚服下安眠药的时候发生的事），今晚就要走，你们回去准备东西，车子马上去接你们。”说完，人已跑到我和立衡、青霖面前，往我们三人当中一插，把我挡在背后，好像她的话只是冲着立衡、青霖两人说的。

我惊骇地望着歪斜着帽子头发散乱极度失态的叶群，再看看对面而立的立衡和青霖，她俩与众人愣愣地站着，直盯着叶群、立果和我，一时之间，全场没有一个人动作。我好奇怪，叶群叫我们回去准备东西，干吗把我拦在背后？再扭头看身侧的林立果，他盯视立衡的目光好凶狠。我既茫然又害怕，本能地想离开他，不自禁轻声问道：那我呢？

叶群愣了一下，“哦”地一声回头望望我，说：“你也回去准备。”我立即跟随立衡和青霖出门上车。车子滑下一个陡坡，十几秒钟到了五十六楼。我直奔西边卧室，几分钟便整理好简单行装。小王听说马上要走，说去通知小朱，因为叶群早已通知她俩跟着一起走。她一跑出去就发现情况异常，留在外边打探情况再没回来。

林立衡和张青霖下车佯装回东边房间，见我进了西边房，她俩立即借夜幕的掩护直奔离五十六楼只几十米远的警卫部队值班室，急电中央找周恩来。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指示姜队长命令林立衡、张青霖和我三人随同林彪、叶群一起上飞机。姜队长传达中央指示后，林立衡急得哭，张青霖大怒，欲夺姜队长的手枪自行解决问题，差点酿成火拚事件。

自此，林立衡和张青霖才醒悟我不知情。在婚姻选择问题上，林立衡一直很同情我，却心有余力不足，一直解脱不了我的困境。此时，她和张青霖有一共同想法，怕告诉我真情吓住我，又担心林立果对我下手危及我的安全。两人立即跑回五十六楼先

安置我。

我整理好东西，跑去东边看看立衡准备好没有。一进客厅，没有一点动静，我边喊边推开立衡卧室门，见她的旅行包及衣物散乱地堆在床上，再推开青霖和杨处长卧室门，地上丢放着林立果送的塑料花，衣物、鞋子、书籍，乱七八糟。我真糊涂了，他们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返回西边凉台，茫然地望着黑幽幽的树林，正不知该怎么办，林立衡从外向着我急步走来，我惊喜地喊一声：“姐姐，你怎么从外边回来？”立衡拉我进卧室，递给我两片安眠药，说：

“计划又改变了，今晚不走，你先吃药睡觉吧，什么时候走再通知你。”

我心中奇怪立衡怎么关心我吃安眠药啦，我自己床头药瓶里不有的是嘛，干吗还拿给我？转念又想，管那么多呢，她亲自拿给我，我不好不吃，反正今晚不走了。立衡看着我吞下安眠药，又替我放下蚊帐，出去把门关上，又听得她把起居室的门也关上，突然，室内室外一片黑暗。后来才知道，张青霖把电源总闸拉掉，整个五十六楼陷于黑暗中。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安置好我以后，又跑回警卫部队值班室等周恩来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不来。

九十六楼，据小陈、小张说，叶群在我们走后，领着林立果又来到林彪卧室，李处长随后也跟进来，他们母子俩默默地站在床头望着入睡的林彪，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又离开了。看得出，叶群对下一步关键性行动仍有犹豫忌讳。

据叶群内勤说，他们母子从林彪那里回来后，叶群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林立果愤激大骂林立衡走漏消息，要甩掉立衡，叶群带着哭腔说：“不行啊！少了立衡，怎么向首长交代？你去看看他们准备好没有，带他们一起走。”

林立果气呼呼地说：“他妈的，不走，老子拿枪毙了她！”

内勤们见林立果腰上有枪，瞧他那一副凶狠模样，如果林立衡不肯走，林立果说不定真向他姐姐下手。他们立即分出一人悄悄抢在林立果之前赶到警卫部队值班室，通知林立衡不要回五十六楼，赶紧躲起来，因为林立果不敢到警卫部队值班室去。

我正感到头脑昏沉药性发挥作用时，院中突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这是林立果开“匪车”的特点，猛冲猛刹。接着传来林立果特有的沉重拖拉的脚步声，从东边跑向西边来，听到外间起居室门被撞开来，沉寂了一会儿，卧室门猛地被打开，门外透进微弱月光映出林立果高大的身影，左手握门把，右手提枪，向黑暗的屋内张望。

我静静地躺在黑暗中，鬼使神差地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心想这么晚了他还乱闯什么？到处是警卫，自己还提把枪，神经病！

我正琢磨他这副怪模样，他突然转身快步跑出屋子，发动车子冲出院子。慌乱中，他绝想不到我独自一个睡在床上。

后来在中央专案组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你要想开点，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如果时间来得及，让林立果找到了你，温都尔汗就要多一具女尸喽，死了就说不清喽！”

再说林立衡和张青霖安置好我以后，跑回警卫部队值班室，周恩来仍然没有接电话，林立衡急得嚎啕大哭，对张耀祠说：“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

张青霖抢过电话，擂着桌子大骂：“你们都是混蛋！早向你们报告了情况，为什么迟迟不采取行动！叶主任马上就要走。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首长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张耀祠说：“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张青霖情急之下又骂道：“封锁机场有个屁用！机场都是林

立果的人，你们要采取切实有用的办法，赶快调派部队去机场，阻止飞机起飞！命令部队立即把莲花峰出口沿路两边树木伐倒拦车！”

姜队长接到电话里上级的命令，急得直跺脚：“一时到哪去找那么多斧头呀！”

张青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排人墙拦车！”

仓促之间决定用人墙堵车出行。又命令两个排的武装战士立即赶赴机场，把飞机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靠近，不准飞机起飞。

再说九十六楼。林立果上去后对叶群说找不到我们，一定是躲起来了。叶群急得大哭，说道：“不见了立衡怎么向首长解释啊！立衡不走不行啊！”催着内勤们快去找，内勤佯装出门，站在院子里继续监视他们。

这时林立果接到山海关机场急报：总理电话指示，没有他和李作鹏、吴法宪、李德生四人共同签字，任何飞机不得从山海关起飞。

周恩来亲自下令封锁机场，林立果得报后丢下电话报叶群，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处长从门外探进头观看动静，叶群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杨！通知他备车！”李处长转身跑出去。

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叶群离开自己办公室时交代内勤马上通知专车司机小慕去五十六楼接我们直接去机场，她只随身拎了一个小皮包，内勤们以为她还会转回来拿东西，便守住一堆准备好的行李，以为守住了东西，就守住了人，叶群不可能不带东西就走。

叶群的专车司机小慕是安徽人，当时他妻子怀了孕正巧来探

亲，叶群见她是个老实勤快不识字的妇女，便把她带到北戴河顶替王老太太服侍自己，把不太听话而又体弱多病的王老太太留在北京。林立衡来北戴河后，王老太太便留守毛家湾。

当天下午林立衡通知“林办”工作人员监视叶群以及晚上九十六楼发生情况。小慕与妻子另住他处而一无所知，当内勤去通知他出车，他已睡觉，仓促中听传叶群出车去机场，他也是做早晨出发的准备，临变之下，拎上牙具袋，顾不得妻子及行装，立即发车去九十六楼。

小慕赶到九十六楼，还未下车，就听内勤喊：“主任叫你去五十六楼接林立衡他们直接去机场！”小慕掉转车头驶向五十六楼，见五十六楼一片黑暗，以为我们已走，在院中驶一圈车未停又开回九十六楼。

直通林彪卧室的地下车库，杨振钢发动了防弹红旗车，李处长坐准了车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生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后座，刘沛丰提着公文包也挤了进去。小陈和小张见李处长也在车上，一时不知如何动作，眼巴巴地看着车子开走，时间已是深夜零点以后。

当时场面很混乱，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忙着协助指挥八三四一警卫战士在林间小道上排人墙，不知九十六楼里面的情况。

叶群的内勤们还守着一堆行李等她回来，想不到她直接从林彪那里走了。

秘书们有的在院中守着，有的在走廊里监视，有的在林彪办公室门口望风。

林彪专车从地下车库悄悄开走，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没有人准确知道林彪出走的时间。

小陈和小张看着李处长同林彪一起走了，一时懵掉，好一会儿缓过神来，哭丧着脸出现在门口，向秘书们说：“首长走了。”

宋秘书问：“李处长呢？”

“跟着一起走了。”

宋秘书不相信，奔进去搜查，旋即跑出来大喊：“首长走了！”

九十六楼里里外外慌乱不堪，有人问：“去哪里了？”

“去大连。”

“去大连为什么不带上我们？”

宋秘书大喊：“快！快！快调值班车，往机场追！”

小慕开着车冲到九十六楼院中，跳下车跑到门口对文书小孙说：“请你告诉主任，五十六楼没有人，怎么办？”

小孙慌乱中答非所问地说：“他们早走了！”

小慕一听吓慌了，他是叶群专车司机，迟到了又得挨叶群骂，转身跳上车，慌慌张张驾着空车向机场尾追而去。

再说林彪专车开出车库沿途的情况：

九十六楼直通莲花峰山外的林间小路上，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从坡底到转弯口的警卫值班队部二百米左右的距离堵了两排人墙。战士们接到的命令是拦截车辆，但并没有向他们说明拦截什么车辆。当时，在所有干部思想认识上，“林副统帅”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敢明说拦截副统帅的车辆，当时中央根本就没有下达拦截车辆的明确指示，而是张青霖等人自做主张临时采取的措施。

当战士们看清迎头冲下来的竟是林彪的座驾，都吓傻了，不及细想，自动向两边分开，让出通道，行注目礼让它过去。

第二道人墙同样如此，甚至有人如是想：谁下的命令拦截副统帅专车？想谋反？！

也有相反的行动，当车子驶过第二道人墙不到十几米，战士队伍中跑出一名排长，斗胆朝天放一枪，命令停车。

专车在几十米以外减速，林立果从车窗里探出头向后面喊

话：“八三四一的战士是忠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话音未停，车子又急速向前冲去。

战士们听到林立果喊话，震骇地呆若木鸡，那名排长吓得浑身颤抖，手抖得连枪都插不进枪套里去（事后本人语），向副统帅开枪是极大的政治罪名，是杀头的罪。

车子继续向莲花峰出口急驶。下面一段是李处长在专案组里所说的情况：

李处长突然命令大杨：“停车！”

大杨刚刹住车，李处长迅速开门跃出，返身问车内人：“你们想到哪里去？”

车内一时无人答腔。

瞬间后，听到林彪说：“到伊尔库茨克！”

李处长说：“当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处长开了一枪。

李处长负伤，拔枪还击一枪，然后倒地，车子门从里面关上急速开走。

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和八三四一的医生共同进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会同八三四一姜队长，以及其他保卫干部再次验伤，确定张青霖诊断。

大家再查验林彪专车和李处长的手枪，发现在前门内壁有一弹孔，是林立果从里往外打的；李处长的枪显示只发一弹，车厢前后排都找不到弹孔，也找不到弹头。

李处长为什么命令大杨备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己先行上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伤？

李处长以谁的名义做大杨的工作？

周恩来的电话是李处长报给叶群的，为什么要隐瞒说话时

间？

“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事后得知都被李处长监控。

当夜，叶群的情绪变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及时清楚，“适时添火架柴”，九十六楼里的“内线”是谁？

据林彪的内勤们回忆，林彪在北戴河那段时间，并未频繁地传召李处长，仍然是老规矩老习惯，不是坐着闭目养神就是睡觉，极少传人。

林彪的专车高速行驶，到达机场后直冲到二五六号专机前停下。

八三四一部队两个排的战士才赶到机场不久，围住飞机形成一个包围圈。他们见林彪专车驶到，从车内走下被叶群和林立果挽扶着的林彪，战士们不知所措，抱着枪瞧着他们上飞机，没一人敢上前阻拦。

来不及搭舷梯，从机头驾驶舱里放下一个软梯，叶群第一个，林彪第二个，身子还软软的，由第三个大杨从下面扛顶着往上送，叶群在上面拉，刘沛丰第四个，林立果提着手枪断后。

当晚二五六号飞机上的人都下来吃晚饭，饭后有四人返回机上，一个是驾驶员潘景寅，他是空军三十四师副师长，几十年飞行经验，上过朝鲜战场，是中国著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空中五号”之一；另三人是特级机械师邵起良、机械师张延奎、副机械师李平。因飞机有故障，他们上去检修，其他人都留在机场宿舍睡觉。林彪坐驾赶到时，那些人都来不及通知，他们是副驾驶、无线报务员、领航员、空勤小姐、小张和小袁等人。虽然林立果事先已打电话给机场做起飞准备，但大家都未料到事起如此仓促，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从这点上看，包括已上机的四个人，都不是林立果的人，他们只是例行执行飞行任务的空勤人员。

林彪五人上机后，连同机舱里四人，共是九人。飞机发动时，加油车斜停跑道上，本来加油车停在飞机前面，可以拦阻飞

机起飞，不知是谁，却命令加油车开到一边去。

飞机强行起飞，机翼撞到油罐车顶，毁了机翼上一盏灯。

当时中国从巴基斯坦转手买进三架三叉戟飞机，其中两架因故障较大未启用，因毛泽东不喜欢坐飞机，剩下的一架三叉戟就成了林彪专机。因其性能是当时中国空中机种最好的，因此这架专机有时周恩来、江青、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沈阳军区副司令）也用。这些人是当时中国“国家级”人物，所以驾驶员的挑选非常严格，还常在执行任务间隙飞行训练，确保安全。

北戴河方面，拦截林彪专车失败以后，“林办”和警卫部队乱成一团，急调中南海三部值班车和警卫部队车辆组织追击。

四个内勤夺过警卫战士的枪与秘书们向机场追赶，如梦方醒的“林办”工作人员不再相信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因为林立衡和张青霖的努力失败了；一切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挽救。

不久，第一部出发的车追上了小慕的车，李秘书见小慕的车在前方高速行驶，对内勤小张说：“好了，追上叶群的车了，里面一定是叶群，开枪打！”

小张从车窗探出上半身举起冲锋枪就要射，一向稳重精细的宋秘书急忙制止说：“慢着！万一里面还有林立衡他们呢！打错人怎么办！”当时全乱了，很多人不知道林立衡、张青霖和我在混乱中到哪里去了。幸亏小张听从了宋秘书的话，脑筋还转转记得叶群是同乘林彪的车走的，他是神射手，真要是一梭子打出去，小慕准没命。

黑夜开车，后面尾追的汽车一长溜车灯小慕看见了，但他以为是“林办”的人赶往机场上飞机的，后面赶得越急，他开得越快，他见众人这样着急（不要命地开快车），他更怕迟到挨叶群骂。所以事后当众人责问他为什么看到后面有追车还拚命“逃”，他讲出这番心理，众人啼笑皆非，才缓过神来想起他根本不知道情况。

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有一段火车轨道，前面两部车刚过，驶来一列货车，夜幕中，宋、李两秘书只顾盯着前方追，离铁路十几米才猛然发现火车驶来，车子急刹车掉头，车轮擦出一片火花，栽进路旁草丛里，就差那么一点，宋、李、张三人险些命丧火车轮下。

货车又长又慢，追赶的几部车被堵住，众人急得直跳脚，等到货车驶过，前面两部车已不见踪影。事后众人叹道：“林彪该命绝，不是这辆货车，他也走不掉啊！”

小慕的车与林彪的车前后差一分钟驶进机场，他跳下车就向飞机跑去。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由自主地刹住脚，呆站一旁看着林彪等人往飞机上爬。事后众人问他：“如果他们叫你上，你上不上？”小慕憨憨地说：“那还不跟着上呗。”小慕要是事先知情，说不定能起点作用，偏偏“林办”中及时赶到现场的唯一一个人是不知情的小慕！

等到“林办”的车赶到机场，飞机飞上天空，刘处长愤怒大骂八三四一警卫战士：“你们都是死人！为什么不拦截他们！不是命令你们不准飞机起飞吗？你们等着挨整吧！”

战士们还未从刚才一幕的迷茫震惊中清醒过来，又听到从刘处长嘴里喷出更令他们骇怵的话，都似木人般僵立着。一名排长耷拉着脑袋嘟哝着说：“命令中并没有说明拦截林副主席呀。”

现场所有人都抬头望着空中的飞机向东南向飞去。刘处长颓丧地连连自语：“完了，完了，真走了，到哪里去呢。”

大家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林办”的人心情更复杂，直到看不见飞机，还不肯离开机场，巴望奇迹出现，飞机再回来降落。

有人猛然想起，问道：“你们都肯定他们全上飞机了？”

战士们和小慕异口同声地证实林彪等人全上了飞机。

“林办”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还不死心，有人提醒说：“赶

快回去看看，是不是都走了！”

“林办”的人立即赶回北戴河搜索。

转回来说一说追截林彪的车队出发后，留在九十六楼“林办”人员的情况及亲眼见到的飞机在空中的奇怪现象。

九十六楼院中三三两两坐着失魂落魄的人们，原来不相信的事，眼下成了事实，怎么向中央交代，利害关系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株连无辜家小，人人在心里祷告：但愿追上！但愿追上！

叶群的厨师当晚事发后才知道情况，还不相信地说：“丢下我们走了？往哪去？不要我们了？谁给他们做饭吃？”

只有一个既定日程——去大连，但准备的所有东西都没带走，工作人员一个没跟去，谁也猜不出他们去向。

空中传来飞机声，所有人的心往下沉，跑向坡顶向空中眺望，林立衡和张青霖也从警卫部队值班室跑向九十六楼，大家都看见飞机往东南方向飞去。

我躺在床上，昏睡中觉得有人推搡我，睁眼一看，室内灯光通明，小王坐在床沿上，见我醒来，问道：“你听到枪声没有？”

“枪声？什么枪声？”我迷迷糊糊地反问小王。

“你没听到？”

“没有呀。你听错了吧？这里谁敢乱放枪？”

“听到飞机声没有？”

“听到啦，怎么啦？”

此时空中真的传来飞机声，小王掉头跑出去，我觉得她怎么这样古怪，北戴河哪一天听不到飞机声，林家用飞机就像普通百姓骑自行车一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事后才知道，这是飞机飞走后又返回的声音，离第一次起飞时间相隔二十多分钟。

九十六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这一情况是由执行封锁任务的战士回来后所说。

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九十六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大家解不开飞机为何在空中划问号的谜，后来得知机场关闭的消息，不但山海关机场关闭，当时相关的机场也关闭，其后两天全国机场实行禁空令，任何飞机不得起飞降落。

空军司令吴法宪，十二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要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第六章

政 云 突 变

从北戴河押送回北京

中办副主任传达五十七号文件

自 杀

暂囚毛家湾

从北戴河押送回北京

一九七一年初秋的北戴河，这块中央首长避暑的海滨胜地，从我九月七日到达那一天起，沿海几处浴场就冷冷清清的，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礁石和海滩，声音单调沉闷，带着一股寒意，给人一种苍凉感。

九月十二日以后，压抑的环境、诡谲的气氛令人窒息，处处显突出莫名的古怪：“林办”所有工作人员突然杳无音讯，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青霖也失去踪影，他们全都在一夜之间从我身边消失。我孤单地留在五十六号楼，形同软禁，不准外出。每天晨起，站在阳台上翘首院外，希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或听见一点说话的声音，但是除了风吹松涛声和林中斑鸠的“咕咕”声，我再也听不到我希望听到的声音。

那些原来对我亲切恭敬的卫士们变得冷漠无情，小院门口和路上增设的流动武装哨兵，只要我一出现在阳台上，监视的目光就不时地扫瞄着我。我曾试探着想走出小院，但一迈出院门，哨兵立即伸出胳膊拦阻道：“请回去，外面不安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监禁我？

从九月十三日算起，这种莫名其妙遭受软禁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

北戴河的深秋很冷，海风和山风吹透了我单薄的衣着，冻得我瑟瑟发抖。我向身边的护士发牢骚，既然不让我回北京，为什么不增加点衣服和被褥给我。护士传话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八三四一警卫师副师长张宏，一个是在北戴河林家驻地担任值班警卫的八三四一警卫师X中队的姜队长。

张宏对我解释：“克服点困难吧，不但你冷，我们也冷。现在中央有事，我们谁也不能离开北戴河。我回去看看，弄一条被

子给你。”

姜队长接口说：“是呀，你看，我们张师长也只穿一件毛背心，我连背心还没有呢。”

我好奇地打量他们，见他们一脸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不像装假，心里反倒发笑：中央出了什么事，连累你们也这般狼狈。

终于熬到十月下旬。一天，护士从外面跑进屋通知：“快收拾东西，今天回北京。”

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丢下手中正看着的书，整理起行装。所谓的行装很简单，只几件换洗内衣裤，往挎包里一塞，拎上就出了门。

站在院中等候，接我的专车却迟迟不到。

听得院外一个陌生的嗓音喊叫：“上车！”我曾经在野战部队训练过，这一嗓子就跟正规军喊口令似的干脆利落。我正疑惑地踮起足尖向院外瞧，护士从背后轻揉我一把：“去院外上车，等你呢。”我恍然大悟，立即奔向院外。

刚跑出院子，就惊愕地愣住了：小路上，“失踪”了一个多月的“林办”二十几位秘书、内勤和内外勤警卫们一排地站在路旁，手上拎着简单的行囊，个个垂着头，神情沮丧。

这些往日很精神的人怎么变成了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李处长在哪里？不知怎的，心念一动想起了他，忙向队伍中搜寻。他站在队尾，我的目光一接触到他，心头顿时突突猛跳，他负伤了！一只胳膊缠满绷带吊在脖子上。林彪的贴身警卫处长负伤了！怎么回事？！

李处长目光与我碰触的刹那，情绪激动双目陡然发红溢出泪光，我惊疑地急步向他走去。在我心目中，他是林家“总管”，林彪夫妇身边事无巨细都经他过“筛子”。换句话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要向他问个究竟，林彪夫妇在哪里？林立衡和张青霖在哪里？林立果又在哪里？为什么软禁我？这一切都要他给我答

案。

“请你站到队伍里去。”

叫我站队？你凭什么命令我？我望着向我下命令的战士，没错，起先那声喊叫和这一声命令确是冲着我来的。再看“林办”的人，他们沉默地望着我，都不说话，我心中一片茫然。

走到李处长跟前，未及开口，他却先摆出一副互不相识的样子，冷漠地转身避开我，那张脸和情绪的一百八十度突然变化，弄得我张皇失措。我不理解地望向众人，“林办”所有的人都移开了停留在我身上的视线，或背身，或转头，一个个神情怪怪的，像是都怕我向他们问什么，都以明显的回避姿态对着我。

心中疑惑更加深重。举目四望，四周站着的那些荷枪实弹的八三四一战士，陌生的面孔严肃冷漠，他们的枪口和视线竟都是对着我们这一小队人。

我随着“林办”的人向一辆军用大卡车走去，以往“林办”凡有行动都是轿车出动，现在却是一辆破旧的卡车。我直觉上已感到我们像被押解的军事囚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林办”的人怎会这么平静地接受这种待遇。

卡车驶进秦皇岛火车站，而不是山海关飞机场。我又纳闷，“林办”是林彪和叶群的工作班底，走哪跟哪，同步行动。林彪和叶群各有一架专机，怎会一改常例坐普通列车？

翘首四望，车站里根本没有林彪和叶群的专车，难道林彪一家在天上飞，甩下“林办”一大堆人在地上跑，还包括我这个被他们千挑万选弄来的准儿媳？我怀着满腔疑问上了列车。列车并不长，只有七八个车厢，警卫森严，到处是哨兵。中间一节车厢留给“林办”人员乘坐，又上来一批士兵，封锁这一节车厢前后门，人数超过“林办”人员二三倍。

在车上，“林办”的人仍然回避我，我独自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眼望窗外，所有的疑问既然得不到答案，干脆不去想它。

一路上只听得车轮磨擦铁轨发出的隆隆声响，车厢内没人说话，连咳嗽声都听不到，气氛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

傍晚到北京，列车好像不是停靠在北京站台内，周围静悄悄的，站台上布满哨兵。总算到了北京，一个多月里天天盼望的，真的盼到了，可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又带给我深深的恐惧和不安。

“林办”的人全数坐进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情绪上没有一点到家的喜悦。驶近西单马路，离林彪住宅毛家湾还隔两条马路，路旁出现了武装哨兵，气氛显得异常。进入毛家湾巷道，武装士兵更多，院墙下五步一岗，三步一哨，一派森严肃杀之气。心里不禁嘀咕：今天怎么的了，这些哨兵跑到院子外面站岗？林彪个性内敛，怎会让士兵到外面耀武扬威？

毛家湾大铁门隆隆启开，汽车驶进大院停在秘书楼前，“林办”的人顺序下车，都站在院坪上。

到了家还像客人似的站着，往日那种快手快脚的劲哪去了？还等人家招呼进屋呀？心里这么想着，抬头一看，院中候着的竟都是冰冷的新面孔，严肃的气氛令我也为之敛容驻足。

过来一个从来未见过面的警卫干部，示意我们往内院里去，神情极像办丧事的接待者，怪怪的。我坠入极度的茫然中，随着人群进入内院里的林彪正宅。

中办副主任传达五十七号文件

进入林彪内宅后门小客厅，这原是秘书们值班接待“工作关系”客人用的。客厅里的沙发陈旧，样式不一，是叶群提倡“林办”勤俭节约做全军表率的模式。

“林办”人员默默依次坐下。我选了靠内门边上的一把大椅子，将自己的身子深深地陷进去，不断地窥视众人神色表情。

门口出现留守毛家湾的“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大秘书老杨、老于，机要秘书小李。

北戴河与毛家湾两处秘书见面，彼此点头不语，表情谨慎沮丧。老于没有坐到沙发上去，他就近选择了我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下去，双手习惯性地交叉在胸腹前，他也与众人一样，不与我打招呼，就像不认识。

我默数一遍，秘书、内勤、外勤、警卫、膳房师傅、花匠、水暖工、图表文书、外借来临时帮助工作的几位文史哲和军事教官，七七八八三十多人，一个不漏，全“林办”的人都到齐了。

通往正宅的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出现在客厅门口。身后跟着几名军官，见到我们这群人，神色严肃中带几分好奇，直着眼瞧我们。

我暗自诧异，外人怎可以随便进出正宅？林彪一家住的正宅规矩森严似禁宫，平日除了秘书、内勤、内勤警卫可以走动外，外勤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不经传唤和允许绝不准跨入正宅一步。一般警卫战士更不用说了，连内小院都是禁区，只能在内院外面的大院里执勤。许多警卫和勤杂人员在毛家湾工作多年，外面人以为他们是林彪身边人，其实在院内工作期间连林彪的面也没见过。

王良恩是我的老上级领导，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衔少将。一九六二年调总政治部任职，“文革”前期才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职。主任是汪东兴。

王良恩身材魁梧，多年不见，微显发胖。他走进客厅，逐一与大家握手，没有任何寒暄。走到我跟前时，大秘书老阳趋前向他介绍：“她就是张宁，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

“嗯，认识，我认识她。”王良恩握住我的手，脸上露出微笑，对我又似对在座的所有人说道：“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的话令我大惑不解，直到此刻，我对发生的事变仍浑然不知，绝想不到什么事会牵涉到我的前途，背什么思想包袱？在当今千千万万中国人眼中，我的前途好得不能再好——林彪未来的儿媳妇，政治地位一步登天，红得发紫，虽然这门亲事不是我自愿的，但现实地位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面对“林办”工作人员——这些从全国部队里经过筛选，政治出身查过祖宗八代，业务水平一流的军队精英——王良恩“唉”地叹息一声，走向中间沙发上坐下后，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皮包，拿出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准备宣读。

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我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

“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中发第五十七号文件”，念到此，王良恩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然后缓缓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

我没有再听下去，因为从开始对林彪改变称呼起，我的脑袋就如巨雷轰顶，恰似那晴天霹雳，一下就把我原本很脆弱的神经击垮了，我几乎昏过去，幸有那把大椅子为我遮掩，深深地陷在里面，没有人察觉我有太大的变化。

我垂下的头无力地埋在胸前，王良恩的声音遥远得似蚊子哼哼，房子在旋转，地在摇晃，眼前一片昏黑，我靠潜意识支配着自己的躯壳不要从椅子里滑到地上。

我渐渐地看清了眼前的人影，他们正向门外走，像一个个幽灵，没有一点声息。大秘书老于轻轻地帮扶着我站起身，我就势靠住他的胳膊走了几步，适应着脚下初生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不要倒下去！不许倒下去！心里默念着，拖着沉重的身子机械地随着人移动。

“于秘书，文件说林彪逃跑了？叶群烧伤了？立果被捕了？”

于秘书对我每句问话都轻轻地附和着，不作任何纠正。

“立衡姐和青霖哥呢？他们一家人都关在一起吗？”

老于没有应声，却吩咐我身旁的林家老工作人员王老太太好好照顾我回房间休息。

王老太太陪我走进一幢新建的楼房，正是这幢楼，据说是准备给林立果和我置办新婚启用的新房。莫大的讥讽！我终究住进来了，而林立果呢……

自 杀

夜深了。从进门躺下就一直没有丝毫外界感应，脑中一片空白。所有思维支离破碎，像一摊摊尖利的玻璃渣，碰上就鲜血四溅。

万籁寂静。窗下，院中，哨兵流动的身影在月光中清晰可见。意识渐渐清醒，想到自己已变成了阶下囚，窗外哨兵的职责已从保护我变成监视我。

王老太太也没睡着，从她嘴里我清楚地知道了林彪、叶群、林立果早在九月十二日深夜就已机毁人亡在蒙古荒漠里，顶着一个“叛国投敌”的大罪名。

我应当高兴才是，可为什么我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效果？我多年来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恐惧，终于跟眼前的结果统一起来——不论我怎样躲避，怎样妥协，最终仍是逃不脱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毁灭下场！

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因跟林家的这种关系，今后会遭到的整肃和不可言状的惨境。

政治斗争中，受株连者一向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残酷打击。我虽然还年轻，但我看到的事例已太多。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一大批人，死去的像狗一样死去，活着的不管是

本人或亲属，都成了政治“贱民”，失去了做人的一切尊严，生活潦倒，动辄受辱。我牵连进这么大的政治事件，活着就要步入这种痛苦羞辱黑暗无边的境地。从小到大，因模样长得好，享尽人间赞美，被林家兴师动众从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筛选进京，名声远布。一向自尊心极强、特别看重声誉的我，一夜之间遭到政治上和婚姻上双重的突变，年轻脆弱的心灵无法承受也无法平衡，向更加黑暗的一边倾斜下去。

一夜不眠，思维凝结在一个“死”字上。

清晨，王老太太出门散步前叮咛道：“千万不要想不开。以后的日子远着呢，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就回来。”

目送她出门，人间最后一丝温暖被她带出了门。

起身四望，房间里空无一物，茶杯也被拿走，随身有点危险的药品杂物早被搜走，看来有关方面对我这个特殊人物早有防备。

发现房间里唯一坚硬的突出物是三角形的门把手，中间凸出一个铜顶。

拢拢散乱的长发，抽泣着向南方在心里呼唤着生我养我的母亲：“妈妈，我去了！这世上已没有生存的空间，只当您没有过我，原谅我的不孝，妈妈，我走了。”

对准那冷硬的门把手，擦着委屈不甘心的总也止不住的眼泪，心中明白这一撞上去，将与尘世缘尽，却是我这短短一生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擦干眼泪，冲跑上前，一头猛撞向铜顶尖。

觉得自己像一片轻叶落在地上，向黝黑的深渊飘坠，飘坠，总也不见底；又好似在夜空中飘腾，金色小星星在黑空中闪烁，静寂得没一点杂音；空空的躯壳似乎与广垠的宇宙空间融为一体，一种心旷神怡的滋味在人间从未有体会过。

脑袋一阵剧痛，耳旁传来似天边滚雷般嗡嗡的杂音，又仿佛在遥远的山谷里引起回音，好远，好远。

声音渐渐大了，就在身旁嘈杂。吃力地睁开眼，先是黑乎乎一片，突然光亮得刺眼。看清身旁围一大群人，正七手八脚抬我上床。想抗拒，四肢强烈痉挛，浑身颤抖不已，一阵冰冷寒彻骨髓。

“快叫医生！别乱，让她安静！”

“轻点，当心她的头！”

已经能听清楚这是外勤警卫处长老刘的声音。他一边指挥众人一边责备王老太太：“你怎么搞的，一点警惕性没有！这种时候还散什么步！”

“我以为出去一会儿没事，哪想到这么一会儿就出事了呢。”王老太太不知所措地嘀咕一句。

“医生来了！大家让开！”一名警卫干部领着一个手提急救箱的军人走近床边，对我说：“这位是八三四一警卫中队的医生，让他临时替你包扎一下伤口好不好？”

我不耐烦地挥手制止医生正凑上来的双手，医生呆愣在床边，不敢再动作。

我铁了心要赴黄泉，未料到原本纤弱的体质经过强烈刺激、食眠俱废的一天，变得更加虚弱，竟致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彻底送走，又活转来了。一口气拗不过，羞恨交加，任凭鲜血浸湿枕巾，不准医生近身。

负责临时监管任务的八三四一警卫中队牛指导员闻讯赶来，见状焦急地向秘书们求主意：“不让靠近，这可怎么办呢！”

“林办”的人见牛指导员主动开口求援，才提议请蒋医生替我处理伤口。

蒋医生是林彪的专职保健医生。他趋前坐在我床头一张椅子上，回头示意大家先退出去，然后静静地仔细观察我的神情。他这个人，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四十多岁，白净皮肤，少言寡语，医术精湛。他虽然在上层服务，却从不涉问本职以外的事。

林彪身体之差，叶群乖戾性格及制定的规矩、怪习之多，常令他左右为难，远不是正常医疗护理方式所能应付的。举例说：一条毯子在没有盖到人身上之前是没有温度的，但叶群偏要测量一条毯子有多少温度，几条加在一起才适合林彪的体温不致受凉或过热，还不能压着林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很多，但蒋医生缄默着年复一年地遵守着自己的工作原则，在“林办”中获得好评，到后来，连不好侍候的叶群也礼让他三分。

他的目光和善，透着理解与同情，轻声问道：“我来给你处理伤口好不好？”

我未吭声。

他又说：“你心里难过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不要憋着。”

虽然事件前因叶群的严格规定，我与“林办”诸多工作人员没有过多的接触，甚至因为地位身分的差别，相互间的距离拉得很大，在这种劣境下，他竟在精神上起到了一种让我感受来自亲人的温暖，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眼眶，滚滚而下。

他很灵巧地为我剪去头发，止住流血，缝扎创口，没有麻药，那一阵阵刺痛比起内心的创痛就像蚂蚁啃咬一样轻微。

牛指导员踮足走近，小声问蒋医生：“我已把车子准备好，送她去医院吧！”

蒋医生淡淡地回道：“她是重度脑震荡，不能移动，需要卧床休息。”

牛指导员不放心地问：“不送医院行吗？你保证她不会发生其他问题吗？”

蒋医生结束包扎，站起身慎重地对牛指导员说：“只要不动她，让她休息。这段时间你们最好不要问她敏感的问题，她安静地躺着，就不会有问题。”说完，离开了房间。

牛指导员站在床边，望着纱布缠满头脸，只露出眼睛和嘴鼻

的我，我也望着他，心里存着敌意与戒防。

他感觉到了，喟然叹息道：“这段时间，我临时负责你们的安全监护工作。你的身分重啊，出了什么事我怎么承担得起。”

一方是监押对象，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现场目击者、知情者；一方是奉命监管人员，双方利害冲突，但我已从他的口气里听出一种同情与无奈。

牛指导员犹豫了一下，又问道：“你需要什么？想吃什么？告诉我，部队食堂的饭虽然差点，做个病号饭还不成问题。眼下这境况只好委屈点你了。”

见我毫无表示，他又估摸着说出另一条：“你要是嫌别人吵扰你，我可以天天来，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讲吧。”

从他的谈话中，明显地听出他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也明显地看出还没有从林彪的影响中走出来。他不是孤立的个人，全国党政军民在精神和思想认识上，还不能立即接受和适应林彪叛逃的事实。

后几天，“林办”的人三三两两陆续过来探望我。因为林彪事件，我们之间曾有的等级隔阂消弥了，在大家眼里，我已不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林家要明媒正娶的儿媳，而是一个年轻不懂政治风险寻死未遂的弱女子。大家处境都一样，担忧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劣变，见面无多话，彼此点下头，默默地望几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带给我些许精神安慰，起码在今后监押审查我的艰难岁月里，身边的这些人不会歧视我。

一天，房里没人时，李处长来了。胳膊仍然吊着，以他惯有的那种万事难不倒的口吻对我说：“想开点，什么大不了的事都会过去。想多了有啥用？吃好睡好，自己的身体要紧。”

瞧他那无所谓的样子，我知道他内心并不像他嘴上说的那么轻松。林彪出走，李处长第一个承担天塌下来的重责，我相信他是最吃不香睡不稳的人，他是事件的重要关键知情人，今后准没

他乐观的日子，他却在我面前装得很乐观。我感谢他鼓励我的好意，但我隐约觉得他好像受到孤立，是他刻意回避众人，还是众人不睬他？我感到他对我这种似有似无的关心，似乎与我在事件中的位置有点关系。我所知道的情况会影响他？或是他怕我知道什么事？我与林立果的关系，在众人眼里是一团谜。甚至最贴近林立果的三个人：叶群、林立衡、王老太太，也不怎么了解真相。这是因为林立果长期以来一直不放松对我的控制和追求所给大家造成的一种错觉。大家都认为我是林立果的人，知道林立果的很多活动情况。这回的自杀带来的反效应是我始料不及的，更引发众人的疑虑。我起死回生反倒清醒了，打定主意不承认是自杀，在中国政治中，自杀的定义是“畏罪”，“畏罪”不死罪加一等。好在不知什么原因，负责临时监管的干部们并没有追究这个问题的性质，他们只求所有知情者在移交中央专案之前，个个活得好好的，不要给他们添什么麻烦。

牛指导员果真天天来，不言不语地帮我清洁室内卫生，倒茶端水的，偶尔聊几句家常话。叫他别干这些杂务，让我自己来，他不让，说：“你身体还没恢复，别多动。过去，我们负责大院警卫，没机会见到你，现在帮你扫扫地，日后你还会记得有个人为你扫过地吗？”

我诧异地望望牛指导员，见他一脸灰气，情绪不振，没一点调谑的意思，便苦笑着漫应道：“不要这样说，不知今后怎样处理我呢。再好，也比不上你们做个正常的人。”

“哪里话呢！林彪出事，我这个中队正在北戴河值班警卫，我们失职的责任大啊！今后不知会被处理到什么地方。嗨！人都是党的，什么都由党安排吧，我是做了充分思想准备，解职回家种田。现在临时监管你们，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把你们移交了，我们也该卷铺盖走了。”

他心里原来也这么悲观，一个外围警卫中队指导员也面临遭

整肃的处境。我立即想起那些在北戴河山林里冒着风雨，挨着蚊叮虫咬的警卫战士们，他们连林彪叶群的面也见不着呀，竟在整肃之内。原以为自己无辜，想不到还有比我更无辜的一大批人。早听说历次路线斗争倒台的人，里外三层扫倒一大片，受株连的不仅是家属，今番果见真章。

八三四一警卫师，凡是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是专职警卫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首长安全的，重点是警卫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及其常涉足的范围设施。师长张耀祠，实际控制权在汪东兴手上，大陆上的人都公认这个队伍是“御林军”。由于这个部队的性质，所以指战员要求绝对精纯，政治上不能出一点差错。

精神上的震撼，引发身体内分泌系统严重失调，也许是脑部受到重创的原因，女性每月的生理特征消失了。王老太太看在眼里，焦急起来，罗罗嗦嗦吐出一大堆关心的话：“你要是怀上了，千万不能留下，让孩子出世，说起来爷爷是林彪，奶奶是叶群，爸爸是林立果，孩子一定会遭到歧视，永无出头之日啊！”

我心中原本就无好气，乍听她说出这种话，睁眼细瞧她，怎的变化这般大？政治这东西太可怕，它可以迅速地扭曲人们的心灵。

说起王老太太这人，真有点戏剧性：叶群从解放战争时起，就没用过合适的保姆，直到一九五三年左右，叶群途经江苏，在安全部门帮助下，从镇江市物色到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寡妇，这人就是后来的王老太太。叶群常年陪同林彪到外地疗养，将抚育儿女的责任和全部家务交给了王老太太。林立衡和林立果对她的感情超越了主仆关系，许多事情愿意向她说而不愿意对叶群说。两姐弟都曾向王老太太许过愿，要养她终老。甚至林彪也点头允许儿女们叫她“王妈妈”。叶群对王老太太既忌又离不开，因为她再没有时间去考验别的女人。在“林办”中，王老太太是公认林家老五，即排行第五位，林彪前妻生育的大女儿林

小琳却没有位置。其实王老太太年纪并不大，我到林家的那段日子，她不过四十多岁，瘦弱的体质，深度近视眼，镜片像酒瓶底一样厚，鬓角过早地发白，大家习惯这样称呼她，我也这么跟着叫。事件以后，都叫她老王。

王老太太见我只管睁大眼瞧她，大概也觉得自己说话不妥，眼光便有些闪避。我往好处想她，是希望我不要再延续林家的苦难。但我仍忍不住发火：“别人不了解我和立果的关系，难道你也不了解？果真有那回事，孩子无罪。”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说出这些话，只觉得满腔怨气无处发泄：现在关心我，早干什么来着？林立果困住我的时候，你们谁为我仗义说过一句解脱的话？

王老太太无话可答，悻悻地离开了房间。

不一会儿，牛指导员带着两名警卫干部走进屋，动员我去医院做检查，说：“你还年青，要考虑政治后果。”

解释是徒劳的。羞愤难以容忍。坚决不上医院。

“林办”几位主要秘书得知情况后陆续进屋，众口一词劝我“明智些”。我明白他们这么做，与其说是关心我，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事件前，我是一件“贡品”；事件后，我是一件牺牲品。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一个摆在桌子上供人们来表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蒋医生进屋来缓和道：“现在情况还不清楚，不要催逼她，过些时候看看再说吧。”他以公正科学的态度再次帮了我。

大家散去后，我将一腔气恼宣泄到王老太太头上，无论她怎么解释，都平衡不了我的情绪，因为我受到的伤害不仅仅只这一件。

暂囚毛家湾

毛家湾这个地方，清朝时期是座不太大的小王府。解放后曾

是“东北王”高岗的住宅。“文革”初期，林彪从哈尔滨搬迁来京，不愿住进中南海，选择了这块住宅，经过初步修理搬了进去。随着地位升高，安全部门从警卫格局考虑，拆迁了靠住宅的一家小医院和部分民宅，扩建了毛家湾，同时在住宅底下修建了防原子弹的防空设备，直通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西山等中央重要驻地。这一连线系统的防空设施平时不能随便启用，由八三四一专职警卫。据“林办”人员说，林彪对住宅底下的防空设施并不感兴趣，除了叶群下去视察过以外，林彪没下去过一次。从林立果嘴里，我知道了林彪对修建防空洞的看法：防空洞适合手无寸铁的百姓，是防御性的，不具备攻击性，是耗子洞。

我是林家的“准媳妇”，事件前没在毛家湾住过一天，却常被叶群接到“家”中“休息”、“玩玩”，这都是叶群嘴里的甜词儿。每次去林家，叶群都将我“拴”在眼皮子底下，与她随影随形，不得随便走动。除了内宅院子，外面大院是怎样，我一点不知道。

一星期后，我能起床走动了，头上创口愈合，拆除纱布对着镜子梳理散乱的长发，才明白蒋医生为什么把我的脸包扎起来，我倒地时脸部多处擦伤，蒋医生特别叮咛，暂不要洗脸，以防留下疤痕。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这张让林立果着迷，让林彪夫妇反目吵架的俊脸，已失去了原有的令人惊羡的美艳，苍白消瘦，辛酸的眼泪沿腮落下，又何必要再爱护这张面孔？不就是这张漂亮脸蛋惹来的大祸吗！我不听话地洗脸。至今脸上留下印痕。

拖着虚弱的身子，在王老太太陪同下走到院中透透空气。晴空阳光明媚，久在屋内乍见阳光备觉刺眼。篮球场上，“林办”的几个小内勤正打球活动身子。大门侧面的青砖高墙上画着一幅全国军民声讨林彪的巨幅漫画，一只巨笔对着渺小狼狈的林彪，意即“口诛笔伐”，光辉形象瞬间变质成一堆“粪土”，这是那

个时代的特色。

一名八三四一警卫望着我看漫画的神情，嘴一撇，露出幸灾乐祸的一笑。

另一名战士向我投来毫不掩饰的仇恨目光。我相信，如果他的上级命令他射杀我，他会毫不思索地举枪执行。

第一次看清大院啥样：新楼前左侧是新建的小食堂，小食堂后是警卫战士的大食堂，我们每天三餐去吃那重盐少油的炒大白菜，其实是煮大白菜，难见几根肉丝。红糙米掺合着小米或地瓜丝，粗糙鲠嗓子。我问了炊事员，他们常年吃的就是这样的伙食，每天人民币四角四分的标准，我未想到，“御林军”的伙食竟这样差。

新楼前右侧便是内院正宅。这座曾被中国人民视为神圣之地的大院，如今成了我们临时囚禁地。一墙之隔的“林办”家属院，一个多月里到处打听音讯杳然的亲人，竟不知自己的亲人就囚禁在近在咫尺的眼皮子底下，这种绝妙的藏匿保密措施，谁也没想到。一般人会认为，林彪出事，首先会封锁住宅现场，怎会再让人住进来。

当时中央正在全国党政军内秘密搜捕林彪“党羽”，“大网”还未收拢。因事发突兀，林彪专案如何办，怎样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这一事件，中央要有一个统一口径；最关键重要的是尽快拿出林彪叛党叛国，以及围绕这一罪名的阴谋计划，才可以向全民解释这一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

“林办”的人成了中央搜集证据的对象。

囚禁毛家湾的第三天，牛指导员召集“林办”人员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回忆出事前几天情况，酝酿深入揭发林彪。

这是专案审查的“前奏”。每天上午八点半钟开始，全体“林办”人员集中在一间小屋里，从林彪到北戴河的那一天回忆起，尤其是九月七日林立衡、张青霖、我三人到达北戴河后的几

天日程。大家照指示把九月八日至九月十二日这几天作为重点排查，每个人必须说清楚每天所在的位置和所见所闻，尤其是林彪和叶群，以及林立果的对外联络，重点在林彪的言谈举止有否异常，从中找出林彪策划叛逃的蛛丝马迹。

后来我参加了排查会议。北戴河的秘书和内勤发言不多，从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他们早在九月十四日就被囚禁在五十七号楼里，已经写了很多的“交代材料”，但中央很不满意。留守北京毛家湾的秘书更是“风平浪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更揭发不出什么。

我坐着听，更用眼看，每个人的表情神态都通过我的眼睛进入大脑过筛子。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诚实的。

第七章

真实的一角

中央专案

双重身分的人

石破天惊

中央专案

一个多月后，毛家湾来了几位表情正点的中年军人，为首者姓钟，曾参与贺龙元帅专案，此番则是“林办专案组”组长。

牛指导员领着他们各处走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钟组长背着双手面无表情地听着看着。我发现“林办”不少人暗中注意观察他，在今后吉凶未卜的日子里，他将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父母官”。

第二天，我们被押上车，铁门隆隆启开，众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最后注视大院景物，没人说话，静静地离开了。

车子驶向西山八大处，而不是秦城监狱，我见一些秘书的脸色神态大大地缓松了。

离北京军区大院不到一华里，有座亚洲青年疗养院，简称“亚疗”，我们被关在这里。

四周没有围墙的地方临时拉上了铁丝网，院内岗哨林立，门口新设的两座岗亭像鬼子炮楼。大院里除主楼以外，还有其他的附属楼和一座礼堂，审查林彪的中央专案组就这座大院内。专案组长是张春桥，实际上是纪登奎主持。

这座大院的主楼里，同时期关押收审“黄办”、“吴办”、“李办”、“二五六专机组”、陈伯达的秘书和从外地调回的历任“林办”老秘书。

各办自成一体，分成数个专案组，统治在中央专案下。其余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地方部队及地方政府里牵连到林彪事件的人员，都在各地关押收审。

“林办”的关押区在后院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孤立小楼，外观烟熏火燎，墙壁肮脏，楼前有一小块矮冬青围成的小院。这幢楼有三层，一个连的警卫战士住一楼；二楼住“林办”；三楼启用

一室当食堂，东面充满阳光的两个房间，住着三个审查官员，除老钟外，另两位来自团中央和中组部。新组成的审查班底，除各组组长是军人，副手多数是“文革”初期就受到冲击关进“牛棚”再重新启用的干部。

二楼走廊上唯一的凉台被封闭。楼梯口摆一张值班长条桌，看守二十四小时轮班换勤。在非常时期，大家很自觉遵守纪律，除了吃饭，上厕所，谁也不轻易出屋到走廊上活动。相互之间也不说话，好似不认识。

因我有自杀“前科”，对我的防范升级了。我屋子里的窗子被钉死，再用报纸封住，房间里白天也像黑夜，不点灯看不见。更难堪的是房门不准关上，二十四小时地敞着，睡觉也脱不成衣服。

每天下午四点“放风”半小时。每到“放风”时间，院外便聚集不少围观者。为了专案的保密，中央从外区各个部队抽调政治表现好的干部赴京执行“机密任务”。这些人都是在到达以后才清楚“任务”的性质，为防止内幕情况外泄，中央严格规定他们除监守职责以外不得与被审查人接触谈话，更不准监守人员相互串联询问专案情况。还采取了更严密的保密措施：每隔一段时期，撤换一批看守，防止他们呆久了知道太多内幕。其实这些看守干部根本接触不到专案的实质性问题。

举国盛传林家在全国选美，这一话题演绎得很具传奇色彩，围观者看我的那种神态，令我无地自容。一个看守嘴里啃着大葱卷煎饼，葱里藏着的一条青虫被咀嚼得黄肠淋漓，顺着口涎流淌竟无知觉，只管瞪大眼盯住我瞧。所以，每到“放风”不得出去的时候，我便蹲在地上看蚂蚁，把一小块饼干搓碎了喂它们，埋首地下，直至“放风”时间结束。

二楼有位年轻看守，高大英俊，每天上班，个人卫生搞得很整洁，不长的时间，他变得神情忧郁。我的房门开着，经常背对

门口坐在桌前，听见他在走廊里的踱步声，偶尔回头，有时能见到停立在门口望着的那忧郁闪避的眼神。人的心灵是相通的，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有一颗善良同情的心。我们没有说过话。不知他从哪里搞来一把胡琴，坐在值班椅上悠悠地拉奏起来，是一首中国著名的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他会拉很多曲子，琴艺不错。

在极度沉闷的环境里能听到悠扬的曲调，不少人从屋内探出头张望，这名看守毫不在乎，天天拉。监守人先破戒，“林办”的便有人趋前与他聊琴艺，甚至也拨弄几下琴弦。

另一名小个看守会绘画，用放大尺描绘的照片像，与原照片一模一样。出于好学心，我向他借来放大尺，又请他买来纸张，学画了许多希腊神话故事里的人物。

这两名看守虽然跟我们没有语言上的太多接触，但一个拉琴，一个画画，这两种形式都是很容易在感情上与人沟通的，二楼的气氛不再像刚来时那样紧张。

好景不长，高个看守调走了，小个看守也不再画画，放大尺也不敢再借给我。

新来的看守是个红脸膛的山东人，开朗随和。我房门整天开着，他很随便地就进来，与我这“半个”小山东聊天。

“那个看守为什么调走？”我问他。

“领导讲他情绪有问题，呆久了恐怕出毛病。”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他主动接近我们，休班上街的时候也帮助我们代买点东西。

有一次，他问我们：“你们在林彪身边，真不知道发生的事吗？”

见我们摇头，他自己说开了：“我们在下面听传达中央文件，当场都傻了，政委念文件，不少人怀疑他是反革命，说他念

的是假文件。”

又问道：“林彪好好的，干吗叛逃？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还逃啥？谁都想不通。”

这件事，当初从上到下确有些人认为不合乎常理。

不久，这名山东看守也调走了。

第三个看守脸很长，“牛头马面”，他就像那个“马面”。整天拉长着脸，对待我们的那副神态，就像对阶级敌人，横眉竖眼。

小个看守变得很沉默，尽量避免与我们说话。

有一次放风，走到门口，瞥见院外围聚许多人，我推托说身子不舒服，转身上楼。“马脸”一把拉住我胳膊，一定要我出去，嘴里还嘀咕骂道：“小地主婆！”

我突然发作：“你放手！你干吗碰我！”

他一听这话，吓得立即松手，急切下不知如何动作。

我火冒三丈地瞪视着他。在当时的中国，这类人专门充当打手，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能量我见得太多，俗称“黄鱼脑袋”，空长脑壳没有内容，在政治运动中做些没人性的事情。

我转身上上了三楼，去找专案组长老钟，整天讲政策，倒要问问他，这个看守讲的是什么政策，我是哪号“地主婆”？其实也是逮住机会发泄心头不满。

老钟听我投诉完意见，手中转动着一只红蓝铅笔，四平八稳地说：“这个同志说话不注意，我抽空找他问问情况。”话锋转来针对我：“你要注意，短时期内调换两名看守，影响不好。”

真莫名其妙，挨人骂“地主婆”，又遭他不阴不阳栽赃，心中怒火直冲脑门，冲口说出满腔积怨：“什么影响不好？！睡觉不许关门，放风被人围观，你们做的就对？！撤换看守是你们的事，干我什么事？！真是无处讲道理！”说完站起身就走。

原以为身后会传来一声威严的“站住”声，我也有充分精神

准备，死都不怕，还怕你吼叫训斥吗？反正我没错，看你们拿我怎么办。

身后静悄悄的。

后来我知道了，我虽与“林办”的人关在一起，性质却与他们不同。在专案组眼里，我既是知情者，又是无辜受害者，还有一个当时我不知道的重要潜在因素，即我的出身背景及相貌，被一些想继续利用我的人觊觎着。所以，尽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托人说情释放我，上面仍借口卡住我不放。夹杂在复杂的隐晦的因素中，人人掂量一下“分量”，对付我比较棘手。

自从我据理抗争，待遇反倒改善，房门允许关上，“马脸”态度上对大家也和气得多，我的窗子也打开了，一棵高大的槐树开满花朵的枝条正伸向窗口，我将成串的花朵采摘下来养在茶杯里，房间里才有了点活气。

“林办”的秘书们不大接近我，我明白是因为我与林立果的关系，怕沾上边更说不清。反倒是勤杂人员和外借来的文史哲教官们与我相处得不错。平时开会除了正题，还有闲话的余地。我最有好感的是叶群的文史教官老张，他是从空军临时借调来帮助工作的，叶群把他请到北戴河讲课。这人对中国各朝历史经典、诗词歌赋无一不通，简直就是一部活辞典，还能双手同时并举，左右挥笔，写出很漂亮的字。他是国民党时期某个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解放初期以学生身分参加中共军队。

他很善良，不大说话。我当时情绪很低落，他开导我说：

“你还年轻，要乐观。应该从大的方向看光明前途。林彪事件，你是一个无辜青年，不要背沉重的精神包袱。”

江青曾与叶群讨论过一首诗，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写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江青认为这首诗很隐晦，李商隐当过宫廷官，一定是李商隐爱上了某位妃嫔。江青要叶群谈看法。叶群深入一步，要求老张查出是那位妃嫔。历史秘密，尤其是深宫隐秘，从何查起？老张只能做到查阅李商隐在宫中时期的几位后妃。叶群在这一堆后妃芳名中估摸得很起劲。这两个极权女人对李商隐的《无题》感兴趣，江青还打电话问叶群“查到没有”，可见她们的心态很寂寞无聊。

我很羡慕老张的才华，爱听他说古。我常在空暇时向他请教诗词，从他的记忆宝库里背来几十首我喜欢的诗词。他一身儒气，即兴写了一首诗赠送我：亭亭碧桃滋甘露，自在芳园住。无端被移向权门，苦恨风狂雨横又黄昏，黄昏风雨收拾去，红日开新宇。从今还到芳园来，珍重东风日日向阳开。

我得到的纯正欢乐没有多久，老钟找老张等几个人谈话，批评他们思想不健康。谁也不敢再接近我，我真想不通，在这样共同的劣境下，竟还有人去歪曲别人来表现自己的所谓政治觉悟，这种人的意识深处恐怕是最阴暗不健康的。

我真感到对不起人家，我太单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连累了好人。心下也悲叹，我真像是“祸水”，什么时候都“惹麻烦”。

王老太太发病了，肠梗阻痛得在地上打滚。专案组派车送她去医院。我知道她发病时离不开热水袋，急跑上楼拿了水袋又匆匆下楼，正撞上老钟站在楼梯口张望门外忙乱的人群，匆忙间，他扶了一下我下冲的身势，这一微小的动作与他的身分很不合适。我因有前嫌，很不以为然地下楼奔向门外，竟不知他内心已萌发微妙变化。

情报官老倪是江南人，在总参二部他有一定的身分，分管东欧事务，在外国人眼里，他算得上中国谍报机关的头目。叶群到北戴河以后，调他去讲解东欧形势，并要了中蒙苏边界军事布防

图。林彪是国防部长，中蒙边境正进行战备军事工程，叶群要这类图无可非议，未料到老倪竟为此落上了罪名。

老倪相貌很有南方男子的特征，很俊气。放风时我经常蹲在地上，他也凑过来看“热闹”。小小蚂蚁在我们这两个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中间，产生了共同的兴趣，我们分辨哪些是工蚁，哪些是兵蚁，短暂的欢乐对于渐渐患上精神抑郁症的我，起到有益的作用。他常常会笑着说我：“你真像个孩子。”

老钟在一次与我单独谈话时，竟也脱口而出：“你还是个孩子。”

我的单纯显露出的人性优点，接触我的人都感受到了。

双重身分的人

从到专案组驻地第二天起，每天写交代和揭发。双重身分：犯错误者和知情者。彼此不通气，叫“背靠背”。一间间屋子像“考笼”，写“不好”得打回重写。

秘书们因工作关系，写出来的人与事很有分量。但经过“中央首长”双重标准过筛子，“有用”和“没用”就凭他们认定了。所以秘书们很辛苦，常常不分昼夜地执笔，写呀改呀，焦头烂额，确切地说，不知如何写才能让上面满意。实事求是政策帮了秘书们一点忙，短暂地起到保护作用，但现实的压力仍迫得他们不得不啃“硬骨头”。

勤杂人员各写“本门经”，总之，吃喝拉撒睡，没一样漏得掉。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如何来到林家以及所见所闻，写清楚交帐了事。

有一天放风，一位大秘书经过身边，我出于好奇，问他：“你们怎么写那么长时间还写不完？”

“怎么写得完，没有的叫写，有的不准写，怎么写？”

有个老秘书被逼得没办法，想出一个“障眼法”瞒天过海，材料里凡是提到林彪、叶群名字的地方，都在前面冠一大串头衔：“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叛国贼、卖国贼”，满纸“头衔”，看起来厚厚一摞材料，内容不多。

专案组透露了毛泽东看材料后发表的意见：“哪里来这许多‘家’呀‘贼’呀，都成了‘家贼’，我成了什么啦！林彪就是林彪嘛，有什么讲什么。”

“背靠背”阶段成绩不显，中央下令面对面排查。这种形式，谁也别想隐瞒一点细节，大家都是当事人，又是共事多年彼此了解的同事，谁若说谎，当场就能戳穿。

老钟搞专案有一套经验。他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收获甚微。

他很疑惑，若说“背靠背”有钻空子机会，“面对面”如何这般一致。每个人态度很认真，采取的排查方式很严密，怎么查不出林彪的证据？林彪生活起居寸步离不开人，这些身边的人竟不知道林彪搞政变谋杀毛泽东，难道他有分身术？

老钟极度疑惑的表情吸引住众人的目光，我瞧着，心里泛起一种强烈的希望，指望老钟想出什么绝招，拨开这个令大家都感到迷惑的疑团。说实在的，越是身边人就越想知道真情，不然，这冤大头的帽子不冤死人了嘛。

沉默了很久。老钟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坐下，提示众人说：

“你们都是林彪身边的人，对林彪为人应该很清楚。他有许多假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认识觉悟，站在新角度分析揭发林彪。叶群做的坏事应该算在林彪帐上，没有林彪支持，她做不成事。林彪和叶群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一看法，在了解林家内部事务的这群人面前，并没有启示作用，许多人脸上反倒显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秘书老阳站起来圆场，说道：“老钟提示的有道理。大家可以再深入想想，挖挖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秘书老于说：“林彪身体差，叶群身为他的夫人，又是‘林办’主任，许多事是她出面处理，林彪并不过问，甚至不知道。所有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都经主席审批、政治局讨论，然后林彪签字，我们照章办理。谁也想不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现在全翻个了，叫我们做秘书的怎么说？况且是主席批示过的，更不好讲了。”

老于“胆大包天”一杆子插到底，全场震惊，众人不约而同望向老钟。

老钟再次沉默，避开大家的目光，低下头思考。谁都明白林彪上头就是毛泽东、江青两人，这个禁区不能碰。

林彪的马列秘书老李见场面尴尬，挑个头说：“那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林彪就是背着主席干的。”

几乎同时，秘书老于和“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发问道：“那你就说说看，哪一件事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背着主席干的。”

全场人都看着老李，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老李真尴尬了，他刚才那句话是出于着急，不假思索地冒出来。他习惯性地左右摇摆着头，眼望天花板，他想问题或思索什么事总是这样，然后双手往上撸撸好像总是扣不紧的裤腰带，嘿嘿干笑两声坐下。

老李是个很能读书的人，马列经典背的滚瓜烂熟，就跟王老太太背三字经、女儿经一样，倒着背都不会错。他的专职工作等于是林彪和叶群的马列活字典，专为林叶摘录马列词句和编序读书卡片，整天埋在书堆里，事务性工作不是他的本职。因人本分老实，秘书们友善地称他“书呆子”。

老钟也已掌握了老李的情况，没把他的当回事，眼望大家提示道：“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一定腐败。林彪的生活问题你

们应该揭发。”

全场沉默。

老钟点名叫林彪的两个内勤小陈、小张带头揭发。

小陈、小张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特级和一级战斗英雄，挑选到林彪身边充当贴身护侍。两人都不爱说话，忠厚腼腆，性格相似就像孪生兄弟。林彪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因病极怕噪音喜安静，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小陈、小张变得更加不会说话。

小陈吭哧半天，脸通红，眼望着众人，没说出一句话。

小张先是嗫嚅了一句“我跟小陈一样，没什么说的”，继而也是涨红了脸，望着老钟一个劲摇头。

老钟只好提问：“林彪叫你们俩炼丹，有这回事吗？”

“有，听说××炼丹……”小陈突觉走嘴，后几句话强吞了下去，惶怩地望着老钟傻笑，不敢再讲。

“只说林彪，不要牵涉其他首长。说下去。”老钟命令小陈。

“听说炼丹的事，林彪问我们管不管用，我们哪知道管不管用。林彪说××(又走嘴，小陈吓得停住，定住眼睛望老钟。见老钟无表示，继续说下去)……林彪说他做的事一定有道理，叫我们俩也炼着试试，我们向林立果讨办法，林立果说到哪想办法，又不好去问人家(指××)，自己翻查医书，有些古书也有记载。我们胡搞一气，丹炉烧炸了。亏得上过战场，躲得快，捡了一条命，我的眉毛烧了，小张的头发也烧焦了。林彪知道后，就不再提炼丹的事。叶群还批评我们胡搞，说林彪是个病人，他的话不能听，出了人命不好交代。”

老钟又发话：“林彪生活作风上有什么问题？”

几个秘书七言八语地说道：“林彪生活上真找不出什么茬。贴身的人都是男性，‘林办’从来不用女秘书。平时他又不看演出，不看电影，不游玩，生活起居规律，没有一点娱乐。”

老钟点王老太太的名：“你跟林彪最久，你说说吧。”

王老太太好似有一腔怨气，板着脸一气说道：“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他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他不讲吃不讲穿，不像叶群，讲吃讲穿！”

王老太太讲完还气呼呼的，眼睛不瞧任何人。

“林办”的人哄堂大笑，有人笑说：“王老太太，你这哪叫揭发林彪？还为他歌功颂德啊！”

老钟也低下头闷笑，对于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讲得全是实话，你能拿她怎么办？

“你们不要笑！林彪的衣服是我补的，我怎么不知道！各人摸摸良心，说话要实事求是，党是最讲实事求是政策的，昧着良心讲假话就不是人！”

我诧异她今天怎么啦，好像吞了炸药。我发现她目光直视李秘书，她是不满意李秘书刚才的“放炮”。

老钟见大家嘻嘻哈哈跟王老太太逗乐子，忙转话题问外勤童管理员：“你是负责林家采购的，你谈谈。”

童管理员是四川人，老实巴交，未开口脸先红，忙检讨：

“我真糊涂，一心一意为革命，身在贼窝里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反革命头子服务，说明自己觉悟不高，思想改造太差，以后要加强改造。”

先来一段开场白，话才转入正题：“林家每次采购东西都是叶群先开出条子，由内勤转送到我手里，我严格按照单子上写的去总参三座门（专供点）采买。主要是每天的新鲜蔬菜、食品之类。大多数是叶群要的东西。林彪要的很少，有时一点不要，就是要，也是平常的蔬菜。叶群要的多，还要的精，不满意退回去重买。林立衡、林立果常不在家。我这个采购管理员实际上是为叶群一个人服务的。”

小童讲完后，脸上的红潮还不退，鼻尖上渗出细密汗珠，我坐在他旁边，见他双手不断地揉搓，手心里都是汗，从他表情上看得出他是自觉得自己的“揭发”名不副实，深怕老钟怪罪他，一双眼定在老钟脸上又尴尬又憨厚地傻笑着。

老钟没反应。

林彪的专用厨师老王发言：“林彪的伙食太简单。我替不少中央首长做过饭。调来‘林办’我还担心侍候不好林彪，哪想到林彪的饭最好做，玉米粉、米粉、荞麦粉、大麦粉、豆粉，每次用两三样搅拌成一碗糊糊就对付了。有时做一两样蔬菜，不管合不合胃口，吃几筷，从不提意见。有时买只鸡，喝两口汤，就让我把鸡拿到小食堂给工作人员下鸡汤面吃，不让倒掉浪费。林彪三餐饭很规律，从不额外加餐，我这个厨师当得太轻松。”

叶群的专用厨师老孙开腔了：“王师傅太舒服，我是太麻烦。叶群这婆娘真能折腾人，肉要烧得不塞牙，鱼要烧得没有鱼味，寸把长小菜秧还要剔筋。怕腥就不要吃鱼呗，她那牙缝大，反倒怪我肉烧得不烂。大白菜滚刀切得细细的，还说我切得太粗，夺过菜刀做示范，叫我学，哪能学，一颗大白菜几刀就切了，我要真那么做，还不把菜盘子扣我头上。每顿饭规定四菜一汤，每天得换花样，重复一样也不行，会骂人。每顿饭吃剩下的规定倒掉，就是没碰过的也要倒掉，不许任何人碰，说是养成习惯，底下人会偷吃她的食物。这个婆娘把我们都当贼防着呢！”

他讲的是事实。我曾见到他把我们吃剩的菜和整只的新鲜海蟹、海虾往炉火里倒，我觉得很可惜，他却说想吃下顿再做，并不知道是叶群的规矩约束他。

秘书老阳见大家发言离“揭发”的要求太远，在座的三十多口子人，不论知识高低，身分贵贱，讲出的事实对林彪毫发无伤。要说认识水平，谁都与中央的认识一致，可一接触到现实具体的问题，兔子就变成了马。老阳又把大家拉回到老钟关心的话

题上：“林彪生活上的问题大家如果没什么谈的，就不要扯的太远。近期的没有，看看以前和历史上有没有。”

一位秘书建议：“要有问题，早不会放到现在。从解放到现在，林彪换了几批秘书，以前的事还是到老秘书那里了解。”

老阳说：“林彪两次到苏联治疗期间，苏方派了女护士，叶群会点俄语，常侍左右。平时闲得无事兼职华语广播员，苏联人送她个绰号‘喇叭花’。叶群哪会容得女性在林彪身旁呆久，连那两个苏联女护士跟林彪说话，叶群都不高兴，其实林彪正病重，哪会做风流事。回到中国，更是叶群的天下。从解放后，从来没安排年轻女性在林彪身边工作过，叶群自己身边倒都是男护理员。”

很多人都知道，护理这一行普遍是女性，不少高级干部身边都是女性护理，碰上不检点的主儿，老婆再吃醋也无济于事，倒霉的是那些女护理，身心受摧残，苦水难吐。我曾遇到一个这样的女护士，芳龄二十五岁，丰满标致。她常愁眉深锁，唉声叹气，高血压加心脏病，她不是遗传病因。我曾问她有何难事这般苦叹，她却说：“我们哪像你命好，我是苦命人。”从她那难言的表情，从她那独处一室随叫随走飘忽不定的神秘行踪，我领悟了她想说不敢说的话。难怪秘书们搜肠刮肚翻不出一点有“味道”的东西来。

老阳带头启发大家，自己讲得仍是“枯燥无味”。大家呆坐看老钟。

老钟心犹未甘，提出一个看法：“你们说叶群许多事瞒着林彪，从他们的地位和所做的事，这一点恐怕说不通。他们两个哪一个为主？叶群瞒着林彪能瞒得成吗？叶群没有林彪的支持能办成事吗？”

“林办”党委书记老王打破沉默说道：“叶群没有林彪当后台，是办不成事；重大事情林彪不点头不同意签字，叶群个人也

没那个能耐。但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太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久不发言的李处长说：“叶群干的许多坏事是有后台。林彪推卸不了责任。林彪通不过的事，叶群转着弯来，拿我们顶缸的事多着啦。林彪成天坐在屋里，外面的事知道什么？还不是叶群说什么就是什么！骗林彪就像家常便饭，我们是习以为常。不这么办没有办法，给叶群缠上了那可没完没了，反正上面有人顶着，天塌下来不关我们的事，要是逆着叶群，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于秘书说：“唉，他们夫妻不和，吵架的事，我们不好管，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充其量是个小小的跑腿办事的秘书，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叶群跑钓鱼台（江青住处）为倒杨的事情（打倒杨成武事件）林彪大发脾气，不准她去，我们敢插嘴吗？叶群照样去，叫我们骗林彪她已休息。其实早溜走了，连我们也帮她撒谎，林彪哪知道真假。嘿，很多事不好讲！”

老王书记接口说：“不管他们夫妇之间怎么复杂，林彪是个头不假，做了许多错事不假，我们还是要把矛头指向林彪才是。”

几位资深级别相当于军师级干部的大秘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老钟已听出弦外之音，便说：“好吧，有不便公开场合下讲的事，你们分头写出详细材料，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材料直送中央，我不会看。散会。”

老钟最后一句话，引得我从心里发笑，搞专案搞出精了，怕惹祸上身呢。傻子听不出几位大秘书言外之意指的就是毛泽东夫妇。林彪抗着，叶群缓着骗着，依着毛氏夫妇做后盾有恃无恐，矛盾不就这么引起的嘛。

我眼望着这几位秘书，挺同情他们，敢不敢直书啊！内幕知道太多，恐主儿“犯嫌”，小命搁哪就是未知数了。

石破天惊

果不出所料，材料上送后，秘书们挨批：“中林彪流毒极深，至今未从本质上认清林彪”。李处长和于秘书被单独关押审讯，“林办”的人谁也不知他们去向，对余下的人起到“杀鸡”效果。接下去的揭发材料，有的秘书把周恩来和老师们都捎带上去。没有人敢写江青及其亲信爪牙们，乖巧得越来越让“中央首长”满意。“顺杆爬”已成某些秘书唯一可选择的出路。谁叫林彪叛逃呢，害得身边人没有愿意为他背黑锅。死得不光彩，所有的事，无论大小巨细都顺理成章地不光鲜了。

以后知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几次审讯李处长的情况：第一次，李处长仍不开口。第二次李处长提出三条要求，一为其保密，二保留军籍党籍，三保全家大小不受政治歧视。纪登奎说他个人不能做主，要请示“首长”再做答复。第三次审讯，纪登奎向李处长下了保证，答应三条要求，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消息传出后，“林办”的人疑窦更深。这不是没有原因：一、事件以后近半年，李处长为什么抵死不肯在秘书们面前讲？尤其是在北戴河的秘书们面前。二、李处长为什么会向最高当局提出三条交换条件。三、李处长为什么讲不清详尽的叛逃计划。四、林彪与叶群、林立果母子之间谁是主谋。五、李处长在三人中间是什么角色。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分，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性铁证。

第八章

苦难的延续

毛远新选妃

劳改生活

打击“翻案势力”

中秋异梦

母亲来劳改农场

释 放

毛远新选妃

“红颜薄命”这句话，过去听着总觉得很遥远，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没想到我的遭遇正应了这句话，当头一棒几乎把我敲死。

“九·一三事件”后，我单纯的思想把一切都归咎到林彪身上，认为真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会做这种事。但是，现实又一次沉重地打击到我。

关进专案组一个多月，有一天下午，“林办”在押人员突然被拉到主楼一个房间去开批判林彪大会，房间里已有几名便衣人员正在架设一台摄影机，不见通常惯有的批判大标语，没有一点批判会议的气氛。主持会场的老钟要大家声讨批判林彪，让摄影机录像，说是要放给全国人民看“林办”的工作人员怎样揭批林彪。

谁也没有思想准备，这种性质的大会，事先应该通知大家作准备，却一点不露风声，拉上队伍就坐进来了。要我在当中位置坐定，叫我发言。我不是“林办”工作人员，而且谁都知道我不爱说话，这么严肃的场面却要我充当主角，真叫人疑惑不解。

在摄影机前，迫于无奈，我低着头，声音小得似蚊子哼哼，勉强说了几句。接着发言的人稀稀拉拉不到四五个，三言两语应付，宣布散会。我看出很多人的疑惑，我也稀里糊涂，总感到不大对劲。

这一次的录像，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不是放给一般群众看的。到底谁看，只有做这种事的人明白。

事隔不到半个月，礼堂放电影，凡是这种场合，各“办”在押人员都在“林办”之前进去，结束的时候坐在最后面的“林办”先行离开，以避免各“办”的人与“林办”的人接触“串

供”，这种先后次序已成了每次看电影的规律。

但是这次看电影很特别，通知“林办”先行入场，偏巧我肚子痛，向老钟请假后留家休息，不到二十分钟老钟亲自跑回来，强行命令我去看电影。到礼堂门口，“林办”所有人站雪地上，门口停着几辆吉普车，所有人用很古怪的眼光看着我，其他各“办”还没有到场。

我习惯地往“林办”队尾走去，老钟忙拉我衣角叫我先行进礼堂。礼堂里黑咕隆咚，刚跨进门，黑暗中有人伸手在我背上轻推一把，将我推向墙边走道上，还未等我视觉适应环境，陡然眼前一阵雪亮，窗帘被人掀起一角，有人擦肩而过，我急认这人，只看到一个侧面，是一个方脸中等身材的年轻军人，拉窗帘的另一名军人随即放下帘子尾随那人向门口走去。等他们消失，“林办”的人员才被放进来，我也得到老钟的批准，回房休息去了。

回到房中越想越不对劲，我是个专案对象，要看我可以公开提审，何必用偷偷摸摸的形式，这种方法跟林家选人多么相似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很敏感地意识到选美问题，在这样严肃的政治环境里有谁敢这么做呢！

没隔几天，一天晚上已过了十一点，老钟亲自下楼通知我起床上楼问话。这是很反常的现象，我憋着气上楼。

办公室里灯光明亮，一位壮实的中年妇女坐在办公桌旁，服饰朴素，满脸雀斑，神态平和像个家庭妇女，她身后站着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湑秘书。

我坐下等这女人问话，她不言不语只是上下打量我。站一旁的老钟不时地观察她的脸色，时而提出一些问题叫我回答，不等我答完又岔到别的问题上。我凭着经验觉得她不像是专案审查人员，虽长得土气，但表现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似听非听的架势，来头显然不小。坐了不到二十分钟，这始终不说一句话的女人显出要走的意思，老钟放我下了楼。

这种见面形式很不正常，像是选美的旧招，当然瞒不过我。第二天我决定去问老钟，明显的反常，我有权利去问究竟，我也学得跟秘书们一样，该问的问题一定要问。

老钟一开始装糊涂，实际上他不想多管这件事。但是每个人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必定反映出自己的道德和良知。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他已搞清我的情况，并对我产生同情和怜惜。他终于证实那女人是纪登奎的夫人。

老钟出于同情，又延伸了他的关心，说道：“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审查，你跟林彪政治上没有牵连。你还年轻，出身好，思想单纯，接受教训，以后还是有前途的。今后，如果组织上关心你的个人问题，你就是不同意，也不能顶撞，要注意态度，要考虑自己的处境。”

意思点得太明白了，我不由因感激而顿生信任，向他坦诉思想：“我正因为服从组织才落得今日下场，还要我再听组织的话？今后再不要组织管我的事！不管谁说我都不听！”又气愤地质问老钟：“不正批判林彪腐败的生活方式吗？谁还敢仿效！”

老钟手上转着红蓝铅笔，凝视着我半天没出声。

我思量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眼下可不比从前，此番来头不比林家小，捏在极权人物手心里，又背着林家的黑锅，稍有不慎或反抗，灭顶之灾是逃不过了。惶恐之下莫名其妙地缠住老钟，叙说自己再不愿走老路，好像他这个“林办”专案组的组长能改变我的命运似的。

老钟不由地问道：“当初你为什么不同意到林家？”

我在交代材料中并没有深谈自己的思想，此番面对他这种特殊身分的同情者，我吐出了心里话：“要说觉悟，我当时并没有多么高的觉悟去识破他们。在我知道了林立果是以美色选择爱人以后，我只认为自己将来会老，下场不会好，而且这种高地位的人闹出情变，我这种地位的人一定倒霉，恐怕连自由都没有了。

妈妈早就说过，‘宁愿要个讨饭的娘，不愿要个当官的爹。’什么小轿车、高地位，我又不是没见过没享受过，我才不稀罕呢，凭着自己的专业不求人，不比那整天担惊受怕的夫人生活好得多？”

老钟不由得点头微笑起来，再次仔细地打量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道：“你不要背精神包袱，更不能闹小孩脾气，这些话对我说说不要紧，对别的专案人员可不能讲，对你不利。”

我使性道：“向哪个说去？！有权有势的可以胡作非为，我要回家！你不是说我的问题已经审查清楚了吗？你不好替我讲句话放了我吗？”

老钟摇摇头说：“前段时间，许世友来北京开会，为你的事找过总理，说你是他看着长大的，烈士遗孤，思想单纯，去林家不是自愿的，没有问题就早放，免得孩子精神上背包袱。总理过问了你的事，但上面不放你，我也没有办法呀。你不能急，有机会我试试看吧。”

我愣坐着，心想许伯伯已经为我讲话了，总理出面也帮不了我？心中的压力更沉重了。

老钟安慰道：“只要上面开口放人，我第一批就让你走，你不愿选择高干子弟是对的，不保险。能走，我尽量想办法让你早离开，免生意外，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这样下去。”

回到房间偷偷流了一阵眼泪，心想连许伯伯和总理都保不出我，今后谁还能保护我？

“林办”的人只有王老太太和李处长见过毛远新，她和秘书们对礼堂那一幕都有疑惑，偏她高度近视，看不清远距离的人，听我说出疑问，虽不清楚对手是谁，但也估出来头不小，安慰我：“别胡思乱想，你是林立果的人，哪个还敢要你。”

她说的话很有道理，就凭着“你是林立果的人”，谁还敢沾边？我可不是一般婚变女子，是个“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的

知名女子。想到此，又为自己的清白名誉随着林家一起毁灭而感到无比气恼。

老钟果真履行他的诺言，一个多月后，专案组释放第一批人，都是在林家做基层工作的勤杂人员：两位厨师，一位水暖工，两位裱画人员。我的名字与他们同报上去，只卡下我不放，什么理由也没有，只说是“运动需要”。

在同时期，毛远新以及两个不明身分的“老太婆”也去看过在押的小张和小袁，被同住一楼的专机组人员撞见，认出了毛远新身分，秘密就不成为秘密了。再笨的人也能想到一个问题：他们鬼鬼祟祟来专案组看几个被选女孩子，肯定与专案本身的政治性问题无关。

老钟不但没帮上我的忙，反而因同情我受到连累。不久，老钟被解除专审职务。

这件事震动中央专案组，事后曾听办专案的工作人员议论：“张宁以美色搅得专案组大乱，看守频繁撤换，连重点大组的组长也落了水。”

我升级被迁出小楼转移到主楼单独关押，看守全部换上了女性，四个女看守轮流值班寸步不离。

事态发展在我预料之中，我早就做好了精神准备，事已至此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成天不梳头不洗脸，端来的热饭冷了再端走，有位好心的女看守心里不免着急，私下劝道：“你老不吃饭会饿坏身子，吃点吧。”当时我已没有饥饿感觉，虽然早有心理准备，气愤和羞涩仍把我胸腔填塞得满满的。

一天傍晚，我仍背向门口坐着，听得一群人涌进屋来。一名男看守凶恶地命令道：“转过脸来！没看见首长来嘛！”

我心里哼了一声：“管你什么首长、脚掌，谁稀罕！”无动于衷地坐椅子上目视窗外。

未料到这名男看守借此机会，从背后操着我腋下猛地架起强

扳转我身子，我激怒地瞪视他，真想给他一耳光，他惊愣之下松开手站在原地。一屋子军人，不下七八个，沙发上坐着一位首长模样的人，我连正眼也没瞧他即倔强地扭转身坐回座位，耳中听得有人低声斥责那名强制我的男看守：“不要这样，你出去！”那人如狗般地诺诺而退。

全场静得很，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大吼：“转过脸来！”

我纹丝不动。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心里想：“过去我害怕，现在你再发威我也不怕了，把我逼到这一步，想怎么整，随便！”

背后鸦雀无声，场面非常古怪。

不一会，听到众人离开的脚步声，再没有任何人说话。我心里骂道：“滚！滚！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第二天，那名好心的女看守来换班，悄声问道：“听说昨天许世友来看你，你知道吗？”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轰响，那一声变了调的大吼原来是许伯伯！天哪！怎么没想到是他！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昨天我如果正眼看他一下，我一定控制不了自己，一定会不顾一切扑到他怀里大哭，几年的委屈与压抑使我会求他替我作主。想到一些人为自己的前程而牺牲我，出事后个个像缩头乌龟一样推卸责任，而许伯伯事前并不知道情况，出事后却不忌嫌疑站出来保护我，爸爸临终时真没有托错人。这样一位有胆有义的长辈，我却那么无理地对待他，心里万分懊悔。正当我需要援助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赶走了他，命运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

几个不眠之夜，心中细想不能怪许伯伯继那一声大吼不再说话，他知我性骄气傲，为此他吃过一次“亏”：我十五岁那年刚从国外演出归来，他来家看我，我正在楼上看书看得入迷，妈妈在楼下喊，说：“你许伯伯来看你，快下来吧。”从父亲辈上算，我的伯伯、叔叔、阿姨真多，一时没回过神，回说：“我有事。”妈妈再次喊，我便不耐烦地大叫：“什么伯伯，我不认

识!”我那时真是个很任性的人，搞得老人们很难堪。

许伯伯脾气躁还讲个身分面子，我脾气坏纯粹是小孩子任性，不讲场合，不讲面子。他有了一次经验，在特殊环境下，见我仍像当年一样。他哪知道这次我根本没看见他，更没听出他变了调的声音，他认为我“六亲不认”的老毛病又发作了，生气之下拂袖而去，留给我无限后悔。

许伯伯对这件事一直没忘记。十多年后，他病重从广州军区回南京休养，我去看他。进门他就不认我，田姨以为他病重神志不清，特别提醒他：“是张宁来看你。”许伯伯瞪着混浊的双眼看住我，突然吼道：“你还认识我?!”我心里很难过，田姨却吓了一跳，以为是他的病态反应，忙拉我出屋了。

我真想向他解释向他道歉，但他很快陷入昏迷状态，死神再也没有给我们这两代人留下沟通的机会。

许伯伯去世时，南京市的下放户们放鞭炮，他们怨恨许世友下放了他们，令他们生活困苦。但他们并不知道许伯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他们争生存权益。江青嫉恨许世友，在打倒萧华和杨成武以后，那个没军功的张春桥仍然坐不上总政治部主任的宝座和总参谋长的宝座。上海是南京军区辖区，许世友恰似一只“门内虎”，江青安插张春桥当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企图分权。为打击许世友威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指定南京为下放试点，张春桥代表南京表态支持，许伯伯指着他大骂：“上海比南京人多，要搞到你上海去搞!”但是，江青把持的政治局全数通过提案，许伯伯孤掌难鸣，一气之下抓起茶杯砸在桌上，恨道：“好!你们都支持!责任我承担!”

许伯伯的追悼会，许多官兵部属自发地去参加。说来十分神奇，当天晴空万里，追悼会一开始，晴空突然雷电轰鸣，霎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追悼会结束，雨收天晴。许伯伯一生战功累累，晚年却因刚直不阿得罪一些权贵，去世时竟连军装也不准许

他穿。他的一生传奇又悲壮，很多人都说：苍天也为他在世间遭受到的不公掉眼泪。

毛远新来专案组看过我以后，不知是因为被人发现了身分，怕造成太大影响，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对我的骚扰总算没再持续下去。多年以后，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南下疗养来看望我和母亲，告诉我毛远新已在上海闵行一家工厂里选了一个女工，婚后带到他家做客，人长得高高个子，清秀美丽。但“四人帮”倒台后，毛远新被逮捕入狱，那女子精神受极大刺激，人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当时正怀着孕，产后得个残疾的可怜孩子。

在婚姻问题上，毛远新并不比林立果好多少，他们的婚姻里掺进许多姑娘们的辛酸血泪，他们自己也无幸福可言。

劳改生活

中央专案组里的生活待遇开始一段时间还说得过去，一天伙食费一元二角，在当时是高标准。对这种表面功夫，有的秘书挺满意，认为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一切归于党的那个年代，落难了还不忘感恩党，是一种普遍的自慰情绪。

没出半个月，我们就像被王熙凤骗进大观园里的尤二姐，吃起残羹剩饭。

有一次，大食堂来了个新兵，到开晚饭时间，蹬上三轮车拉着两桶食物往猪圈跑，路过“林办”小楼，被饿得肚子咕咕叫守候在窗前观望的李秘书看见，一眼认出食桶上的标记，忙通知看守：“那个战士把我们的饭拉到猪圈去了，你快去叫他。”

看守往窗外一瞧，嘴里骂一声“我操”，急忙奔下楼。有人说李秘书：“你这个‘眼镜’（李高度近视，绰号之一‘眼镜’）瞎嚷嚷，往猪圈拉的食怎么会是我们的饭，大概是你饿花眼了。”

李秘书犹疑道：“我看那两个桶像似每次给我们送饭的桶。”

被追回的小战士说得更妙：“班长叫我送到后面去，我看这剩饭菜只有后面猪圈里的猪能吃，哪晓得‘后面’是指你们。这不能怪我，是班长没跟我说清楚。”

伙食方面秘书们常提意见，提一次好两天，次数多了，再提也没人理会。其实秘书们并不是争口腹之欲，而是借此分析中央对他们的态度。

生活待遇差大家并不在乎，谁都有吃过苦的生活体验。折磨人的是精神压力，组织系统的政治审查大家虽感有泰山压顶之势，也只得听天由命，日夜煎熬难耐的是对妻儿老小的牵挂。这么大的突发恶性政治事件，社会上对“林办”家属们必然产生的政治歧见，哪个工作人员不担心？没杀过猪也见过死猪，历次政治运动中受牵连遭到残害的人太多，轮到自己头上谁不惊慌害怕。

秘书们多次据理要求中央允许我们通家信，再三争取后终于获准在检查制度下给亲属写信。

几乎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属都遭到牵连，生活和工作上都出现极大困难。中央给我们的答复是：“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局。”大家都明白身陷囹圄，哪有条件奢谈照顾家属，苦苦巴望审查早点结束，有了明确结论就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一年过去，毫无释放迹象，搜肠刮肚一年，再多问题也该说完。不知为什么，秘书们对时间的计算十分“计较”，时间越长危机感越深，有股不安的情绪笼罩着大家。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秘书们不安的原因，允许通家信是让家人知道你还活着，至于几时不活了，天晓得家属是否会知道真相。说白了，怕“卸了磨杀驴”——灭口。

终于熬到一九七二年底，公安部部长李震从政治局开完会赶

到“亚疗”，集合几个“办”及所有受审人员，传达中央政治局对我们的处理决定。

李部长中等个头，小圆脸，满头银发，红光满面，仪态慈祥，一点不像是握有警察武装的首脑。他乐呵呵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你们有指示。”全场人竖起耳朵聆听，生怕漏了一字。

“首先，中央肯定了你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作出了贡献，这说明你们不是没有东西可写嘛。中央肯定了你们的成绩。今后批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开展，林彪的流毒很深很广，残余势力还有待扫清，你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中央希望你们作出新贡献。

“从出事到现在，你们与亲人都没见面，各家都出现不少困难，对于这一点，中央首长不但知道也表示关心，不是允许大家通信了嘛，说明首长还是想到你们关心你们的嘛。

“为了运动继续深入，形势需要你们牺牲个人利益顾全大局，大家也都有这个觉悟。遵照主席指示，政治局研究决定今后一年里，安排你们各处走走看看，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观锻炼。锻炼、学习、揭发、批判、改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脱胎换骨提高觉悟嘛。

“从今天开始，宣布中央专案组结束。你们要到新的地方去，得有个新名称，就叫学习班吧。”

会场静静的，没人鼓掌，等他说下文。李部长却拎起公事包要走。秘书们一阵骚动。我一时还不明白，觉得管他什么学习班，再教育，走出一步是一步，总比关在专案组里强。

“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向李部长提问：“请问李部长，刚才你说主席有指示，能否给我们看看批示原件？或者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念一念？”李部长愕然，那表情，我至今回忆起来，好像他也没有见过原件，似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秘书点醒了

他，还是他意识到什么，忙向大家解释道：“我开完会来得匆忙，忘了带，下一次一定带给你们看。”

老王追问一句：“你能决定得了吗？”

“当然可以。主席批示原就是针对你们的嘛。”

“林办”大秘书老阳又站起来发问：“能不能请部长告诉我们去哪里，由谁负责？”

李部长支吾：“就在北京郊区，不远，不远。新领导会给你们见面介绍。”

后来我们知道，毛泽东并没有对我们作过批示，直到两年以后，“林办”有人想办法请他近身的人通消息，他还甚觉吃惊地说道：“啊？林办的人还被关着？！”在以后的两年里，我们实际上是“黑户”，随时都可能因形势的变化而被“灭口”。

李部长与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到地一看，原来是北京卫戍区在南郊大兴县的劳改农场，我们由公安部接管，暂借了卫戍区的地盘栖身。

我们驻地周围是农场的一片小树林，四面有铁丝网围着，三个出口设有岗哨，院中有流动哨。五排低矮的砖房，周围是菜地和水塘。农场主要种植葡萄，也有瓜果梨桃。

“学员”们以各“办”为基础分为五个班，除了“邱办”在总后大院独立审查以外，林、黄、吴、李、陈(伯达)五“办”都到齐了，外加我们几个女的：王老太太，我，林立果的护士小王，二五六专机组空勤组长小孙、小袁、小张、小徐(林立果送给程洪珍的女人)，黄永胜的护士老邢、小鲁，共是九人，由老邢和小徐担任正副班长，成立女班组。

“陈办”实际上只有一个王秘书，他编进了“李办”组。

新领导班子是公安部、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三家凑人，多数是从“五七干校”抽调上来的老干部，“文革”中挨斗、蹲“牛棚”或闲置进“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再改造)，吃足了苦再

来管教我们。

低矮的砖房潮湿恶臭带有霉腥气，泥地上留有鸭粪猪屎，顶漏墙裂，门和窗变形关不紧实，有的根本关不上或没有门，这些砖房原是牲口圈。

“参观”进了劳改场，“学习”住了畜生圈，恐怕只有这样的“再改造”才能“脱胎换骨”地“提高觉悟”。谁也不敢说首长的“关心”是骗人上当，我敢肯定如果李部长直言是叫我们进劳改农场，站出来提问题的人就不止是老王和老阳两个人了。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政治囚犯，怪不得是公安部长来传达“指示”，而不是中央专案组的在职首长。

几天之内各“办”的人各显其能把房子整修得基本能住人。真得佩服这些秘书、警卫、内勤们，他们跟木工泥石匠行家没什么差别，完全可以成立一个正规建筑队。

特别照顾女班组，分到两间不须大动干戈的房子，漏屋顶由男同胞帮着补上几片瓦，地砖、破门窗都是自己动手修理。劳动过程就是改造思想的过程，谁也不能偷懒，我和小孙、小王、老邢四人是老兵，更得带头。一切整理就绪坐下开小组会，结合劳动体会谈思想改造，批判自身受林彪流毒的影响。当兵十几年，一直受着党的教育培养，时下要反过来说，从头开始做新人。我感触很深，思想改造年年月月日日讲，每天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学习改造了十几年最后进了劳改农场。我嘴里讲着，心里酸甜苦辣别是一番滋味。

负责女班组的有三个女管教，年长的老郭是公安部干部，延安时期参加了革命，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年轻时一定是个漂亮人，资格老，言谈举止便有种老干部味道。另一个叫小郭，中央组织部干部，中年体胖，性格开朗随和，待人接物朴实。还有一个记不清姓氏，较年轻，娇小玲珑，说话举止都挺娇，一点看不出是个公安系统的人；这人不久便调走，只有大小两郭一直陪着

我们过了两年多的劳改生活。

院子里还有两排高大瓦房，第一排住着学习班领导，正职是团中央副书记老王，据说他曾是胡耀邦的副手，“文革”中“靠边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副职老杜是公安部处级干部，带有他那一行浓厚的习气。第二排瓦房住着某军派来的一名师政委，姓魏，瘦高，平时不言不语，很少说话，后来观察发现他是个非常有思想水平的人。另一名是师长，身材矮胖，还有两名连级干部。这四人负责学习班警卫安全工作。余者都是领导们的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炊事班战士们住在大食堂里，警卫战士住在院外其他地方。

适应新窝有个过程，牲口圈老鼠多，每天夜里出来活动。我住的那间屋因顶棚太肮脏，无法打扫干净，索性用连片的报纸以绳子做架，腾空隔起一片“屋顶”，老鼠夜夜在上面奔跑，泥尘纷纷下落。我们自寻其乐，说它是“三架马车”（当时中国对苏联三位领导的讥称）。老鼠常跑到床上寻食，有天夜里我突感鼻尖巨痛惊醒，发现老鼠正啃咬我鼻子，我吓得“啊”的一声立即翻身爬起，床上顿时一片奔逃声，竟是一窝老鼠在我床上肆虐。一夜蒙着头睡不着，此情此景我下乡也没碰到过，落到这般境地不忍也得忍啊！我们这种身分，想毒杀老鼠都弄不到老鼠药。

院子里的菜地按班划分包干，一年四季的菜自种自食，还喂了几头大肥猪。种菜就得积肥，割荒草、挖猪粪、掏厕所，每班挖个大坑蓄绿肥。除了粮油是国家给，余者皆自耕自食。

各季果园里都有活，春天给桃树上肥灌水；初夏疏果（去小留大）；夏天收桃。乍看摘果子是件好玩的事，整天呆在桃园里摘桃、分等级、装筐，混身让桃毛痒得刺刺囊囊，头扎毛巾，带上手套，衣领袖口扎紧，桃毛仍是无缝不钻，沾着汗水粘在身上、脸上难受极了。没有澡洗，每次劳动回来无论多脏，只能以水擦擦，到星期天澡堂开放一次。秋天又是上肥灌水季节，还要

收葡萄。冬天破冰土埋压葡萄枝免受冻伤；给果树剪枝。农场很大，有干不完的活，春夏秋三季还要去附近农村帮着插秧、收麦、收稻。

除了内外体力活，每天要抽出半天时间深入揭发批判林彪，不是写就是开会学习批判；精神体力疲惫到四脚朝天，晚上躺下再听老鼠打架。

可能是我们住进来的原因，周围不见劳改犯的影子。有一次，大队的穿黑囚衣剃光头的劳改犯突然出现在小院里的水塘边上，足有百多人，武装战士看押着他们挖塘泥，挖出许多冬眠的甲鱼，这是很有营养的市场高价鱼，当时的北方人还不兴吃它，都丢在路边冻死。我们自己不能开小灶烧东西，有一次我在废鸭舍里捡到一只新鲜蛋，丢了觉得可惜，拿回来在暖炉上用开水煮熟让小张、小袁吃了，老邢汇报上去，老郭批评我“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小事都能引出政治效果，其实那个蛋烂掉也没人捡，从相反意义说不是浪费吗？政治道理因人而异，你如果犯“政治错误”，人们自然会用“有色眼镜”看待你的一切言行。

跟我们较常见面的是几个留场释放人员，劳教时间长了，已不适应外面环境或是没处去，自愿留下劳动生活。他们在技术上指导我们干果园的活，逐渐混熟了就悄悄跟我们说点话，告诉我们农场里的反映：劳改犯们议论我们是“海陆空民大杂烩”，

“丑的俊的男女老少齐全”，“几个妞特美”，“是不是林彪死党的家属或工作人员”。一个留场工人一次借劳动机会悄问我：

“你是不是张宁？”依此确定我们这群人的确实身分。就是没有保密规定我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身分。我心里既愤慨又伤心，全国选了不少女孩，最后都由我一人“顶缸”。

因为领导规定我们除了劳动以外不许与留场人员说话，很多人还没有从精神上适应环境，总以为自己与劳改犯不同，其实除

了我们的衣着，生活环境和待遇跟劳改犯已无多大差别，所以有些留场人员骂我们：“神气什么？脱了这身‘虎皮’跟我们还不是一样！你们还是政治犯！”谁都知道政治犯比刑事犯还可怕，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代名词。我听到后，沮丧之极，轻歌曼舞中幻想的美好前程，做梦也想不到沦落到“政治犯”过劳改生活的日子。

劳动感受与往日下部队下农村生活锻炼的感觉大不相同，那时再苦再累甘之若饴，这时背负沉重精神压力，苦与累都变得麻木，人像一架机器，不停地干，腰伤复发，气管炎复发咳得不能躺卧，甚至咳出血，没人痛惜。可怕的是同难者中的“二鬼子”，你稍有自护之意，便恶意中伤“缺乏劳动改造的自觉性”，“还想当资产阶级娇小姐哪！”我很厌恶这类人在落难时也不忘踩着别人表现自己，班里有点鸡毛蒜皮的事，马上“二报”上去，搅得大家日子更不好过。

大家由隔离变成汇集，彼此之间由不了解到逐渐地了解。小鲁只有十六岁，因父母问题关进来，她天真无邪，自比“丑小鸭”，把我和小袁、小张比做“天鹅”。

老邢是三〇一总医院的护士，长得龅牙暴眼，满脸横肉，矮小丑陋。黄夫人为克制丈夫的毛病，特意亲自到三〇一去挑选了全院最丑的老邢。

俗话说“人不怕丑就怕心坏”，处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中（小孙、小王也挺俊），老邢心理上很不平衡。身为班长，从一开始就对大家横眉冷对，我发现她一正眼瞧我们，她自己就表现出形秽的神情，强烈的心理意识使得她总是“鬼鬼祟祟”地看我们，像老鼠偷窥东西一样。她牢牢地抓住副班长小徐，女班组被她人为地分成“两派”，她和小徐孤立在群体之外，反说我们不服从她管理，并向领导“二报”说小孙和小王站在我们一边不支持她的工作。领导批评年龄资格较老的小孙，小孙很有党性原

则，如实向领导反映老邢对我们不爱护不友善的管理方式，反驳领导说：“她做班长的没有思想水平，叫别人怎么服她？”小王比较怕事，采取自保策略，哪边都不靠，显得麻木。就是这样，老邢仍拣软的欺。一次小王跟小孙和王老太太闲聊天，评议起我和小袁、小孙，说：“小袁秀丽含蓄，像米兰发出幽幽香气；小张亮丽鲜艳；三人中还是张宁耐看，有股说不出的韵味。”对美的欣赏是自然的，说说闲话并不是原则问题，老邢听见立即大做文章向上加油添醋地汇报：“小王中林彪流毒太深，到现在还对选美那一套津津乐道，助长她们的流毒。”小王为此挨了领导一顿批，变得更加缄默寡言，连散步也不敢与我们为伍。

王老太太年纪大了，平时也不去刺激老邢，求得相安。老邢偏生事，常讥笑讽刺王老太太在林家的身分。一次碰巧王老太太翻晒衣箱，露出珍藏的一张她和林立衡的合影照片，老邢当场恶狠狠地训斥她：“你怎么还保留林立衡的照片！你立场有问题！还不快撕掉！”

王老太太不服道：“林立衡是我带大的，她在林家受尽叶群欺凌，她与她父母兄弟不一样，我为什么不可以留她一张照片？我就不撕，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老邢一副“好啦！看你不撕，我去报告领导，看你敢嘴硬”的神情，幸灾乐祸地跑向办公室。一会老郭和小郭都来了，拿着照片看了看，劝王老太太说：“林立衡与她父母不同，你跟她有特殊感情，这些客观情况我们都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她是林家人，你保留她的照片对其他人起到不良的影响，我们的意见还是请你把照片上缴吧。”

王老太太拗劲不肯交出照片，她用很硬的理由拒绝领导：“等以后中央若是给林立衡定了罪，我再交不迟！”

老邢为此深感“威信”扫地，在领导走后，肆意挖苦王老太太：“你还恋着林家养你老啊！林立衡自身难保，哪还会想着养

你老，你做梦去吧！”

王老太太愤怒斥道：“党的政策区别对待，别说林立衡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也轮不到你这种人说三道四。我靠党，不靠林家，就是林立衡不忘旧情要养我老，也是我们之间的事，要你多嘴！”

这次王老太太是气极了，以牙还牙狠狠训斥老邢，我因事关体弱多病的王老太太被欺负，心中不平一直站在一旁观望，全过程看得清楚。那老邢脸上横肉直跳，发作不得，黄着脸凶狠地望着王老太太。我说老邢：“一张照片算什么，何必大惊小怪。”众人都出来与老王搭讪，故意冷落老邢，未料到老邢因此而对王老太太记仇，生出陷害王老太太的恶念。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大家都去仓库改建的“礼堂”看电影，王老太太正发作急性肠梗阻，吃药打针后卧床休息，我中途回来看她，小鲁陪我一同进出。当天夜里老邢突然肚痛，痛得“死去活来”，惊动领导也过来察看，老邢硬说是喝了窗台上茶杯里的水才有这种反应的。她是护士，自诊说不是病，是有人下毒！这可不得了，全学习班排查，女班组是重点，我幸亏有小鲁作证，唯一重大嫌疑就是留家的王老太太了。可是她从哪弄“毒药”？这“毒药”也怪，喝下去到半夜才“痛”，死不了叫人活受罪，不是“毒药”自己掌握剂量，就是有“下毒能手”自治的奇药。茶杯拿到公安部做侦查检验，毫无下毒痕迹，但是在“阶级斗争弦”崩得很紧的环境下，领导情愿臆想“情况”也不正视科学。老邢借此机会百般表现自己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不满分子”的“打击迫害”，她把矛头直指王老太太，说她“借病故意不去看电影”，“是装病”。谁都知道王老太太的病是真的，发作不止一次，在林家时就有的毛病，怎会是假的？老邢含沙射影用心恶毒，领导也逼迫王老太太承认“犯罪行为”，若成定性，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大靶子。王老

太太抵死不承认，大家都心知肚明，用个半死不活的病人来树立“二狗子”的威望，以期收到弹压全学习班潜伏的不满情绪。效果虽然不完满，全学习班因此事件受到震动，大家处事更小心谨慎。

老邢神色飞扬，好似一个“英雄”，她却不知天良尚未在人们心中泯灭，背后很看不起她，知她底细的“黄办”就有人私议她：“在黄永胜面前她就常搬弄我们的是非，一个护士不安分工作，什么事都想插手，到现在还这样。狗行千里改不了吃屎！”

与她同在三〇一工作的小王护士也愤慨道：“她在医院里就不是个好东西，常打别人的小报告，全院都知道她是个善嫉善使坏心眼的人。她到‘黄办’去工作没人服气，后来知道是黄夫人有意安排的，都背后笑话她，她还把自己当个人似的，每次回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真恶心。”

副班长小徐是林立果自组的空军选美班子在上海选的女子，家境贫困，没有养父，只有一个聋哑的养母，靠给街道小厂糊纸盒为生，她是养母捡来的弃婴。因她初看亮丽，细看嘴和下巴太大，脑后见腮，林立果将她送给秘书程洪珍。贫困环境中长大的小徐有颗向上的心，她以上大学作为交换条件同意与程秘书谈恋爱，为此小张很看不起她，说她是“乌鸦落到凤巢里”，意指林立果选错了人。

小徐为人并不恶，却紧跟老邢说一不二，无非是前程幻想作怪，老邢利用她年轻不懂世事，明知自身难保，还拉她做垫背。女班组有人说小徐有政治野心，其实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无知。有一次开会讨论形势，因毛泽东处处爱说古论今，当时形成一股风尚，人们多多少少都得知道点历史人物及典故，一到开会免不了说些古今花边。会上大家说到隋朝炀帝文广杀父霸母，小徐冷不丁脱口道：“陈夫人多幸运啊，又能当夫人，又能当妃子，改朝换代她哪一朝都享福。”大家不约而同惊愕地望着她，见她一

脸神往的样子，全然不察众人异样的表情，大家忍不住窃笑，她还以为理所当然地翻白眼瞪我们，连旁听会议的两个老郭都有些坐不住了。老邢不满地瞟她一眼忙将话题岔开。我初时因她也是被选女孩，同是受迫害之大，视她为姐妹，可她依附老邢助纣为虐，谁也不喜欢她。

我对看不惯的事会立即反应出来，不免开罪了老邢，老邢借着我跟林家的背景，视我为眼中钉，将我看作女班组一块难理的料，将不满积压在心里，找机会“修理”我，除掉“带头”与她抗衡的人。

打击“翻案势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虽死定案，仍有人不服。邱会作长子就曾寄望领袖的英明，想告“御状”，因中南海进不去，他只得选其次去中央首长办公地“钓鱼台”告状。因警卫森严，正常途径进不去他就翻墙，被警卫人员抓到，江青诬他“意图行刺中央首长”，被定罪下狱。

江青专好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借此提出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即“一股为林彪翻案势力”，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死党家属及其亲信。

这下学习班可有事做了。领导层为此有些意见分歧，正职老王不主张再在学习班搞什么“打击重点”；副职老杜认为“大有问题可抓”，主张把我推出来。

这里面有些龌龊过程。女班组里不平静的根源，领导心知肚明，真正摆上桌面讲理，难看的不是我们，反更突显老邢的不是，也显出领导用人不当，当然他们不会承认此点。比较明显的迹象是我和项阳（黄永胜长子）、小鲁常在一起，因为我们背景差不多，平日大家为避嫌较少与我们接触。而我们三人的聊天内容

有时会扯到一些案件的疑点上，小鲁单纯幼稚，嘴上不“把门”，将话传给小袁和小张，她俩说话也不忌“隔墙有耳”，被老邢、小徐听到，不断地报给领导。年轻人处在大案中，又是发生在与自己有牵连的亲人身上，议论一些看法不足为奇。老王善意地搁置，因为林彪案件中的疑点太多，有头脑的人不会不想，再为难我们没什么意思。甚至小袁、小张、小鲁、小徐议论毛远新到专案组看人一事，我对她们说了“现正批判林彪腐朽没落生活方式，还有人在仿效他，不管他是谁，这样做都是错误的”，被老邢汇报去，老王仍不予追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他的话说：“不希望学习班再出什么事。”看来他是个在自身仕途体验中获得真谛之人。大家对他有好感，认为他是有水平的人。我在相比之下，对小鲁说了“老王有水平；老杜没水平”。此番评议小鲁无意泄漏，让老杜听着十分不满，将我对毛远新的批评及平日“小宗派活动”呈报上去，正迎合了江青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论。学习班本来就是江青注视的焦点，真的有了“情况”，她岂肯放过？谢静宜亲自去审问林立衡，要她揭发我的“罪行”，大有网罗“罪行”给我重新定罪之势。林立衡一口回绝：“张宁什么都不知道，她是无辜受害青年，你们不要再难为她。”

上面指示下来，学习班总动员，把我和项阳、小鲁三人定性“旨在为林彪翻案”的“反党小集团”。因项阳年龄最大，出事前身是北空防空办主任，年龄和资历最老，把他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头，迫令我们三人做检查承认“罪行”。

我的态度十分强硬，以绝食抗议，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任凭领导们轮番做工作，就是不理不睬。老邢按捺不住高兴劲，可又装出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模样，端水端饭地“侍候”，在领导面前装得委委屈屈。别人不敢给我打饭送水，那样做就是“立场”问题。由于我态度“恶劣”，升级当了重点批判对象。

学习班要开大会批斗我的消息传开，据说中央要来人参加，还要扩大到学习班所有勤杂人员都参加的规模，岂不是存心叫我难看?!

领导叫与我相处不错的小孙做我工作，小孙百般不肯，后来禁不住领导说以利害：“张宁如果不改变态度，处理后果会很严重。”

小孙出于权宜之计数番做我工作：“你就忍下这口气，做个检查过了这一关。大家都知道事情真伪，好坏将来自有定论。”

我反复思量：明着恨我的人和暗中嫉妒我的人都希望我出丑，都恨不得我“没好果子吃”。这个世界上怎地这多不与人为善之人?落得这般境地还要“窝里讪”。反正我已是“板上肉”飞不掉跑不了。我平日为人从不亏待大家，工资高拿出来买吃的大家分享。谁有困难我从精神上予以安慰支持。好吧，既然希望我现身说法，干脆来个彻底亮相，看谁不好过，我不相信所有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我一夜写就检讨“认罪”稿，道理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一股寒气从脚冷到头，莫大的讽刺，我批判自己的道理都是令我身陷政治迫害的根源，大家都是知情人，这种政治摧毁人信念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惩罚都刺激人的灵魂。

会场设在“礼堂”里，白纸黑字的大幅政治标语挂满墙壁两侧，上写：“彻底打垮林彪翻案势力!”“坚决打击翻案风!”

“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

各班组和学习班勤杂人员正襟危坐鸦雀无声目送我走上“主席台”，那里有一张破桌子和一条破板凳。我凝神静气扫视台下各班组的人，多数人低下头，少数人碰上我的目光也马上不自然地回避。我心头涌上一股既滑稽又愤怒的感觉，我第一次将自己与他们对立起来：我之所以有今日，不是你们为林家服务的结果?!政治漩涡里捞仕途的人，今日看一个被他们拱手送上去的贡

品美人“做检讨”，天下奇闻奇景，好眼福啊！我强忍着既愤又悲的心情开始照稿宣读，不知不觉心中的不平怨愤充溢胸间，眼前一片昏黑字迹模糊，我索性放下稿子凭嘴直说，所有“过错”揽于一身。眼泪流下沾湿衣襟，这眼泪是血，是我的控诉。虽然我嘴上说的是“正理”，知情人都知道我的经历和思想品格恰与现实相反，我说自己“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靠山林彪的倒台心里不满”等等，偏是我不肯来林家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检查稿经领导审阅“过关”，不闭着眼上纲上线地瞎说，领导不会允许过关，也不准上台“检讨”。

我讲完后退坐一边听各组代表发言批判，我注意到除了老邢之外，各组代表讲话中都尽量避免矛头直指我，批判很“艺术”，气氛很沉闷，有的代表三言两语便坐下。事后他们告诉我：“我们的发言是领导指派的。”抽了筋的人身子站不直，强迫扭曲意志的人不仅仅是我。

会场出现一段时间冷场，我估猜到我的发言和神情很刺痛一些有良知的人的心，包括领导层中的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中挨批斗，尝过我此时的心境，内心滋味不会好受。

大会结束时，老王作了讲话，他是个有“大局观念”的正统之人，“坐上轿子不由得不吹喇叭”，做个姿态在所难免。会后他却告诫我：“你以后说话要小心。女班组很复杂，传话的人很不负责任。政治无情，望你今后再也不要提及毛远新的事。虽然此事不是你先说起，别人都把事情推到你身上，你就说不清了。”

当天晚上以“林办”人员为主，各班派两名代表参加女班组“批判帮助”我的会议。没什么人正正经经发言，老邢却不放过大泼污水的机会，肆意胡说八道。有一次扫卫生垃圾，不小心燃烧的垃圾烧着我手中的条帚，她竟把此事上纲到“心怀不满故意毁坏公物”，龇牙咧嘴在会上狠狠数落我。我面无表情坐着，

任她胡诌。突然“书呆子”李秘书横插一杠：“林立果不要她，她还写信求他！”我懵然地望住李秘书，他很不自然地干笑两声，别的秘书不以为然地望望他，有的投以谴责目光，李秘书再不吭气。我奇怪他怎会看到林立果在空军的信，那是他根本涉足不到的地方，并且说的完全不符事实。林立果那种地位的人，他看不上的人，你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去；他看上的人，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李秘书的“揭发”完全不符他“马列学者”的水准，往一个受伤害的人身上泼污水，不知他图的是什么。

老王发言时，谆谆教育我不要忘了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不能忘本，不能辜负党的培养”等等，这套说教激得我当众忍不住嚎啕大哭，我的失态令全场震惊。我真想破口大骂，但我还是克制下了，让泪水冲刷我心中极大的冤屈。我恨人再讲这样的话，背叛阶级的不是我！忘本的也不是我！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的更不是我！若父亲黄泉有知，泪水也会溢出黄土！

经受了新一轮的精神煎熬后，我更加消沉。这种内在的质变，外人是看不见的，我觉得自己一夜之间真正地长大了，懂得去分辨善恶真伪，虽然我永远不能学会说谎话扮伪君子去阿谀奉承当权者，但我知道今后该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发现大家对我的态度也起了变化，虽然表面上不显露，但私底下有机会便向我传达信息，“林办”一位离任的老秘书利用迎面与我相逢的机会悄声说到：“张宁，你比以前更美了！振作起精神坚持下去。”我知道自己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哪会“更美”，我听出他的言外音。另一些秘书借公开场合说我“改变很大，有进步”。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表扬”，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工作人员中竟出现公开对我表示同情的人，他们说：“我们看得出你与女班的其他几个人不一样。女班组里有几个小人，谁是谁非大家心里透亮着呢。”

有一个信息令我欣慰，正职老王的儿子来学习班看望他爸

爸，他挺注意我，几次之后他偷塞给我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转蓬无意上青天，离壑别谷空悲辛”（转蓬即蒲公英花），诗境美丽凄婉，以古代美人赵飞燕、杨玉环做衬托，把我比作甘愿寂寞的月中嫦娥。他以诗人的惆怅表示他的不平与同情。他是北京外语系的大学生，从写诗的功力看出他才华横溢，没有他父亲那种思想羁绊，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我从他的态度中知道领导层中不少人对我的真实看法。后来我释放在北京暂住，他特意来看望我，他比我小几岁，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以旁人身分悄悄给予了我可贵的精神安慰，我从内心发出姐弟之情。这次公开见面倾谈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被老邢“二报”上去，即使我已是释放的自由人，仍有一条黑线监视着我，连累到不知情的老王向有关方面作检讨。老邢的最后一次“服务”，竟连学习班主要领导都没放过。老邢的可恶之处就是“有奶便是娘”，学习班解散老王就不算领导了，老邢在新环境下投靠的势力，自然不是什么有政策水平的人。

中秋异梦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中秋节，几年离别亲人的生活都是在极度的不愉快和精神压抑下度过，我感到自己消沉变老，没有可信赖的人，没有可亲近的人，寂寞郁闷中尤其想念家人。当天晚饭后，我搬个小凳独坐门前，双手捧腮痴痴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希望一轮圆月早早出现。一点节庆气氛也没有，只有这轮圆月属于我。过去我不相信从月亮中能看见亲人，此时我不但相信还非常渴望通过月亮传递亲人的身影，我将所有的思念和寄托都寄情给月亮。当它出现的时候，我坚信我的母亲和兄弟们一定会像我一样看着月亮。

九点半钟，作息时间已到，我不理睬老邢的催促。十点钟，

流动哨兵过来干涉，我沮丧地回到屋中。一九七四年的中秋节没有月亮。

郁郁躺下，昏昏入睡。我怎么是一只小花牛？被关在一间没有门窗的四四方方的小屋里。我面前有个木槽，装满剥了壳的青蚕豆。我想逃出去，苦于没出路。一名军人拎个铅桶进来为我加食，我发现门随着他的出现而出现，我悄悄尾随他出门，放开四蹄向原野中奔逃。跑着跑着，四蹄的牛变成两脚的我，追兵声四起，我惶恐地跑到一个大湖边。

又是那个形似大海烟波飘渺的大湖，又是巨蟒多次追逐我，阻挡我迷路的那个湖！湖心那座绿岛遥望不可及。走投无路之下，跌坐湖边放声大哭。

天空飘下一片红色枫叶，轻轻落入水中化成一只独木小船，我立身跳入，小舟自行飘向湖心小岛。心中狂喜，这下可有救了，多少次梦见它，今番总算登上这座岛屿。

岛上青松苍柏高耸入云，遮蔽住天空，黑暗不见一丝阳光，盘旋直通岛顶的石阶泛着白光，指引我直上岛顶。岛顶豁然出现一片开阔地，有一座朱红色残墙颓壁的庙宇，大门虚掩，推之吱吱作响。走进大殿，神像彩塑剥落露出泥胎，东倒西歪残缺不堪。殿角檐顶蛛丝网结，地上落着厚厚灰尘。

我大声呼唤：“有人吗？”四壁回音，梁上灰尘沙沙震落。穿过大殿继续往后面跑，天井院里雕花门窗支离破碎，一排寮房里长满凄凄荒草。出了后门，是一块宽阔地，临崖湖边深草中坐着一位道人打扮的老者，一身灰布直衫，高筒白布袜，一双结带圆口麻鞋，一束灰白头发高高盘结头顶，白眉垂至两腮，一撮灰白长须飘逸胸前，闭目垂首坐着打禅。

我靠近他身旁推他右肩问道：“师傅，你是谁？”问几次不回答。再问。

他闭眼回道：“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要问我是

谁。”

瞬间，我脑中万花纷飞，缭乱中隐约间似乎看到一样东西，正恍惚悟到自己是什么，刹那间又模糊不清混浊起来。我大急，摇撼他双肩哭求道：“师傅，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是谁?!”

老者闭目念出一首偈：踏雪而来兮，乘风而归兮，……历尽世间万种情，海崖此处生。一共七句，每句都有画外景衬托。首两句我身披白色长衫裙从天外随雪飘落人间，又乘风飞回天宇；后三句出现血红的巨大无比的太阳、波涛汹涌的大海、龟裂的千里赤地和一棵孤立在天地间的大桑树；最后两句我感到自己的归宿，就是这座天涯海角的小岛。

我似乎大彻大悟，悲从心涌哀哀抽泣，依在老者身边恋恋不舍，他却依旧打坐毫无反应。前殿传来追兵声，我惶恐地揪住老者衣角跪求：“师傅!救救我，救救我!我不跟他们走!”

追兵走近身，七手八脚拖拉我，我被拖在地上拉出门，仍回首大哭哀求：“师傅救救我啊!我不去啊!”老者闭目垂首毫无声息。

我呜呜咽咽几乎窒息，从梦中哭醒，眼泪仍在流，掀起枕巾擦泪，发现枕巾早已湿了一大片。

清醒后回忆梦境十分奇异，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生，属牛，母亲曾说过我出生那天正下大雪，出生日正是农历节气“大雪”。

幼时从南边来一个老太太为我算了一命，说“女大十八变”，我是“十九变”，因此“一变”将成“万花之魁”，而“魁”字带“鬼”，不是好兆头，可惜了我这个姑娘，“十九”的数又正应了林立果选我之年的年龄。

最让我百思不解的是那座多次梦见的大湖与小岛，每次梦见景致一模一样，生活中到过许多地方，从没见过类似的景色，怎地老梦见它?想到偈语中有“历尽世间万种情”之句，心中不寒

而栗，今后还有多少苦难要我去经历？我真不想再受人间煎熬，死了倒比活着安宁，可是理智上明白这条路不可轻易再行；我困扰在冥冥不可知的奇异预示中和现实的失落中，呜呜咽咽不停地抽泣。

我很想开灯把七句偈语记录下来，当时我被批判不久，单独隔离一间房，由老邢和小徐监管。如果我开灯写东西，一定会惊动老邢并搜查上缴所写“天书”，不知又该落个什么罪名。我相信自己特好的记忆力，准备早晨起床后追记，可惜早晨醒来，只记得前两句和后两句，中间三句再也回忆不起来。

母亲来劳改农场

一九七四年底，由于一些秘书不断写信向上边反映家庭实际困难，虽然多次被打回来并斥为“扰乱军心”，但终于有一次路子走对了，信送到周恩来手上，学习班开了“口子”，允许北京本地家属来农场探望。纪律规定：一不准家属对外泄露学习班住址；二不准家属问及专案审查情况；三不准家属携带信件出去；四不准留在农场不走，未批准和指定时间不得自行来农场探望。

记得第一次家属来队是一个星期天，各“办”大部分秘书的家在北京。那天很多秘书起得特别早，打扫院子整理房间，换上干净衣服，脸刮得光亮亮，好长时间没见他们这么精神了。

我家不在北京，可我的心情与马上能见到亲人的那种心情一样，涌动着激动和悲切想哭的那种生离死别后的重逢感。我不知为什么会被周围气氛感染，其实来的并不是我的亲人。头一批来探望的亲属是在早晨七点多钟到的，当她们抱儿携女刚从小路上冒出身影，铁丝网里翘首盼望的秘书们不由地喃喃道：“来了！来了！”他们有的激动的身形摇晃似的站立不住，有的似泥塑般一动不动远远凝视自己的孩子，心想三年多了，孩子长成啥样？

家属们老远看见亲人就已泣不成声，走到跟前个个都是泪人，奔向自己的丈夫，拉住手再也不放，孩子依偎在父母身边哀哀嚎哭。

我站在一棵白桦树下静静观望他们这副“团聚图”，心有所触，一股悲戚涌上心头，眼泪突涌而下，忙转身回屋，等心绪平静后再出来，分享别人的喜悦。

从早晨到中午不断有家属涌来，老邢的丈夫也来了，她向我们介绍他姓郎，小鲁立即窃语“哎呀，老狼！”“郎”与“狼”同音不同字，年少的小鲁真以为他是“一只狼”。老郎一看就是个面善老实之人，我们私议他怎么会看上老邢这个又丑又坏的女人。女班组除了小徐一直陪着他们以外，我们都跑去男班组逗弄小孩，向那些做妻子的问寒问暖。平时男班组的人不敢接近我们，说几句话都会被老邢诬为“思想意识不健康”被“二报”上去，男班组的人都挺“怕”她，谁也不想非常时期招惹“是非”。这回家属来了，我们去看望家属，老邢挑不出刺，但也气得够呛，明摆着冷落了她的丈夫，头一次见面就让丈夫看出问题，叫她太失面子。

小孙的丈夫老齐是飞行员，高大魁梧英俊，带着四岁的漂亮小女儿，他性格开朗豪爽，女班组的人都围着这对夫妇说话。小女儿不认生，我特喜欢小孩，抱着她四处玩，不知多少年了，心情第一次感到快活。

以后，家属在外地的秘书提意见，在一个政策的精神下应该允许外地直系亲属来探望，这就牵扯到住宿问题，农场四周是田野，哪来旅馆住宿，又牵涉保密规定。请示上面，最后定下外地亲属可以在驻地留住不得超过十天。既然外地亲属能住，本地亲属也应该能住。在总政策精神下，老王又网开一面，自行规定每星期本地家属都可以来一次，因住房紧张，各班自行安排家属轮流住宿。

女班组外地亲属首先来队的是小张的哥哥，是个能言善语的英俊青年，长得与小张很像。他说笑话给我们听，社会上关于“选美”轶闻五花八门，有的离奇荒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明白小张哥哥心地善良，他不止关心自己的妹妹，也很同情我们，不会用刺激的传闻消息再造成我们精神上的负担。

第二个来队的是小徐的母亲，白发苍苍的聋哑老太太见到女儿就一个劲地摇头拍胸，嘴里“哇呀哇呀”直喊，混浊的眼泪顺腮滚落，我们惊讶地看着小徐，希望她解释她母亲说什么，小徐皱着眉推搡她母亲进屋。小张原就看不起小徐，说道：“还不是嫌她妈妈丢她的脸。”后来我知道了她母亲的动作是谴责女儿“忘本忘了娘”，叫小徐“扪扪自己的良心”。她的母亲因为贫穷，将所有积蓄拿出作路费，坚持要来北京看小徐，正因为如此，领导决定特殊照顾她较长期地居住，免费供应她伙食。

小徐的母亲是个朴实的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住下后每天替小徐洗衣打扫室内卫生，还抢着要为我们洗衣服。因为聋哑，外界发生的事她都不知道，还以为小徐是正常当兵。她很喜欢我们，见到我们就笑嘻嘻地用双手食指点自己的脸，意思是说：

“你们很漂亮。”有次我们去看她，推门撞见她哭，问她为什么，她做手势说女儿对她不好，要赶她走，她身体有病，没有工作，积蓄用完，回去怎么生活？在这件事上她其实错怪了小徐，外来亲属最多不得超过十五天，她已住了三个月，小徐怕人说闲话便不计后果叫她走。其实不会有人“小肚鸡肠”地说闲话，粮食放开肚吃，田里蔬菜瓜果有的是，从哪不能省下一口给母亲，一件事两头说，权衡轻重选一条可行之路，何苦去让母亲伤心。

我的母亲由大弟陪同终于也来到北京，领导准许我亲自到北京站接车，我很希望小孙和小鲁陪我去，但领导偏让“觉悟高”的老邢和小徐“陪”我去，一件喜事让这两个人陪在身边实在晦气。

从大兴县城乘车沿途转换两趟车，接近傍晚赶到车站，南京来的列车正好进站。我料定母亲一下会带不少东西，尽管我信中再三嘱她不要带什么。从南京到北京一天一夜，母亲一定很辛苦，我想进大厅接母亲，让她少点负担。老邢板着一脸横肉龇着大黄板牙命令似地说：“不要进去！那里人多！”好像我想逃跑似的，监视我的嘴脸全暴露了。小徐倒有点过意不去，望望她又看看我，犹豫着不敢吭声。

我恨声道：“我妈妈身体不好！近前一点帮她拿东西有什么不可以！”说罢自顾自往前走。

到了出口，里面的旅客潮水般往外涌，根本别想“逆流”进去，我守住出口生怕漏了母亲。人越涌越多，推推撞撞挤得我站不住脚。

母亲出现在人群中，被人潮挤得东倒西歪，却昂起头举目四望，大弟在背后紧搀住她。我激动地高举双手大喊：“妈妈！我在这里！”呜咽的声音变了调。

老邢在背后冷斥道：“不要喊！引起别人注意！”

她好像不是人养的，我嘴里狠咒了她一句粗话，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说粗口，说完自己都觉得吃惊，跟这种人计较实在“掉价”。

母亲听到我喊声，像触电一样，立即循声看见了我，那神情至今想起还令我心酸，明明是悲戚欲哭倏地变成“笑脸”。母亲性格刚强，就是她见我哭想安慰我，先自强作镇静。远远的我见她唤我小名“宁生、宁生”，在喧闹嘈杂的声浪中，这声音十分细弱，我却听得非常清晰。

大弟把拖在地上的沉重大旅行袋扛到肩上，一手搀扶着母亲走过来。昏暗路灯下近距离端详母亲，她也细瞧我，母女俩拥抱着在一起，我听到她心酸的叹息，敏感地问她：“我变化大吗？”母亲干涩地笑道：“还好，还好，没有大变化。”

可是母亲变化太大了，短短三年里，乌黑的头发变得两鬓霜白，红白光亮的肤色变得发黄松弛，她苍老许多。

大弟十五岁当装甲兵（“文革”中不少受冲击的干部家庭，因父母被关押，子女们生活无着落，都提前照顾服兵役，由军队保护起来），转眼四年，小伙子越发英俊高大，看到他想到被迫从海军潜艇部队复员的小弟和从坦克九师退役的大哥，三兄弟模样相似，都是部队重点培养的技术尖子，都因为我受到株连。

大弟看着我，叫一声姐姐，低下头转过脸，眼圈发红，他在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同胞四兄妹姐弟从小失去父亲，围着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孝顺，相互间感情很深厚。我从他的神态中察觉到家里一定还有事瞒着我。

老邢换上一副笑脸上前催我们上路。母亲这才注意到我身后还有两人，询问地看住我。我真不愿费口舌作介绍，但我更不愿意让她在住场期间察觉到我的处境，增加她的烦恼与担心。介绍完小徐、老邢，可怜的母亲还以为她俩是我的好友，不然怎会陪我一起来接她？

“嗨，你们在这儿，让我找了一大圈。”

众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学习班领导的小车司机小邹。小邹客气地问候我母亲：“阿姨好！一路辛苦了。”转而向我们说：

“我今天出任务回北京，听说张宁母亲这趟车到，正好我空车回去，阿姨身体不好，大老远的去农场没有车，我顺带捎上你们吧。”

我一阵惊喜，刚想道声谢，老邢抢上皮笑肉不笑地说小邹：“你倒挺有心的哇，谁叫你来的？”态度横得倒像她是领导似的。

小邹仍然笑嘻嘻地说：“我自己来的，反正车空着，空着开回去不如把你们捎上。”

“不要你费心，你回去吧！路又不远，有公共汽车。”老邢

板下脸一口拒绝。

我母亲疑惑地看着这个场面，很快明白过来，向小邹谢道：“小同志，谢谢你，我们自己走回去吧。”

老邢乘此机会讪笑说：“我们正在改造，不能搞特殊化，你是老革命了，这点苦不算什么吧。来，我帮你拿东西。”说着做出一个要拿东西的姿态，大弟鄙视地用手将她挡回去，明摆着那大旅行袋几乎有她半个人高，她那一米五几的小矮子扛得动嘛。我真想骂她，把我母亲也“劳改”了，恨我竟算计起我母亲来，真是一个坏歪掉的胚子。可我又不得不忍，我从未跟小邹说过话，他自作主张的好心如果回去挨领导批评，我就对不住他了，何况老邢那蛇蝎心肠，又不知会捏造出什么来伤害小邹。

小邹很生气，抢上一步一把拉过我弟弟手中大包，扛上肩掉头上车开走了。

我和弟弟一左一右搀扶母亲挤换公共汽车，中国那时人多车少，根本没有座位。途中母亲悄声安慰我：“宁生，不要生气，我走走没关系，别让人说闲话。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不是什么好货，别跟她一般见识。”

从县城步行到农场已是深夜十二点多。母亲没有买到卧铺票，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再换汽车、步行近百多里地，折腾了二十八个小时，累得心脏病差点复发。第二天学习班一些领导得知此事，也觉得老邢人品刻毒，做得实在太过分。

第二天，学习班领导们陆续来看望我母亲，因为我母亲的资历比他们老，言语上对她很尊重。

我分到一间客房，与母亲同住，弟弟则挤到男班组去。

到达农场的当夜，母亲不让我睡，把炉子捅得旺旺的，叫我把衣服脱了。我不解地望着她，她说：“我要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伤。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不相信你，我要亲眼看看才放心。他们要是打你我就告御状，绝不饶他们。”

我知道母亲脾气说一不二，顺从地脱尽衣服让她围着我细细察看有没有伤痕。母亲看后放心了，我却心里酸酸的，她怎会想到我头上被头发密密遮着一寸多长的伤痕和我内心的创伤，如果我那次自杀成功，她能像眼前这样围着我看她的宝贝女儿吗？她连摸也摸不着了啊！

女班组的姐妹们没事就来我屋里玩，母亲是个健谈的人，她生了四个孩子就只有我一个女儿，常感遗憾，如今见了这么多漂亮女孩，欢喜不已，把带来的食物分给大家。大家议论老邢，愤愤不平，母亲劝止道：“算了，大家在一起还要注意团结，我家宁生脾气任性，心肠却好，你们好好相处。”

我直言不讳道：“我们在一起很好，你放心，就那两个，我不爱理！”

母亲劝道：“你还不改脾气，嫉恶如仇，要注意关系。”

劳动空暇时间我领着母亲和弟弟到农场果园里走走看看，时值隆冬，不比春花夏果时节，吃不上看在眼里也赏心悦目。眼下光秃秃的树枝被西北风吹得呼呼响，似吹哨子。我不时咳两声，母亲问怎么了，我搪塞道：“爸爸肺不好，我的肺也不好，可能是遗传吧。”

“你爸爸是肺气肿，哪会遗传给你。你身子骨薄，风大带个口罩，北方的风可不似南方，别搞个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发，咳得受罪。”

“我知道。”我随口应着，她哪想到我咳出血也不让带口罩遮点风。

有一次母亲心酸地数落我：“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固执不说话，这么大一件事为啥不早告诉我？自己一人顶着，顶得过吗？为啥不找你许伯伯？早告诉我们也好替你拿个主意呀。看看你现在折磨成啥样，瘦得没几两肉，还说好，别骗我了，我什么都看得出。”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都是‘马后炮’，听说许伯伯为我的事找过总理。学习班领导还询问我们家与许家的关系。不好讲，谁知又会攀上什么事。”

“傻丫头！你许伯伯早知道这事还不把你拦下来？怎会让你吃这大苦！他向总理求情是我托他的，出了事他才知道林家选的媳妇是你，生我的气，怪我不早打招呼，让你受委屈。我说我也不知道哇，丫头嘴紧向来不爱说话，临走才发现一点情绪异常，到北京就失去音讯，他才不怪我。”

我惊异道：“田阿姨后来知道这事，她没告诉许伯伯？”

“你许伯伯脾气不好，田阿姨又不知道你的态度，你人都走了，说出来还不是惹是非让你许伯伯生田阿姨的气？”

母亲继续说：“林彪出了事社会上传说很多，说南京送去一个姑娘，名叫张宁，跟林彪跑了摔死在蒙古。我急疯啦，你说到军委去工作，怎么跑到林家去了？自从你走后就失去音讯，我不敢相信传闻，去找蒋副司令和王政委，他们躲着不敢见我，我心想这下可是真的了，一急脑子就糊涂了。唉，都过去了，见到面我也放心了。”

我跟弟弟长谈了一次，了解得更详细，弟弟告诉我母亲的病：“出事以后，全南京城都知道你的事，批判大字报从妈妈单位一直贴到新街口市中心，尽胡说八道。妈妈被革职，到处挨人骂，被人指脊梁骨说是卖国贼的亲家母。因为长时间得不到你消息，都说你死了，她疯掉了。我们怕她出事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去。不留神她就偷跑出去，到军区骂，到省委骂，要他们还女儿。当官的都躲着不敢见她，被她撞到都说不知道。妈妈很长一段时间白天疯颠乱跑，晚上整夜在院子里刨地，说你埋在土里，一定要扒出来，双手扒出血不肯停。我们劝她说你不在地底下，她骂我们不让她挖是想害你，认不得我们了。院子里到处是她挖的坑，常对着坑哭喊：‘宁生呀，你快出来啊！’妈妈太可怜

了，我们抱着她哭喊都唤不醒她。

“直到接到你第一封信，她才好转一点，天天把你的信捏手心里谁也不给，怕你再丢了。反正为了你的事全家倒了大霉。我们倒没什么，部队不要，到哪都可以挣口饭吃。我们是担心妈妈出事，我们这个家就完了。那天晚上到北京没休息就直接来农场，妈妈差点犯病，我真想揍那个女王八，真要出事，我饶不了她！本来全家不想让妈妈来，怕她见到你受刺激再发病，大哥做代表准备上路了，被她知道，死活要亲自来。没办法，跟她讲好条件，把身体养好点再来，接到你的信那么长时间没来就是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不能上路。”

听完弟弟的叙述，我像遭雷击一样半天出不了声，妈妈为了我发这种可怕的病，我却想到死，如果真死掉了，妈妈将永远在泥土里翻找我，再不会清醒了！生我养我这个女儿竟让母亲老来受此痛苦，我怎这样不知深浅，不懂道理！

弟弟全然不知我所做之事，见我不吱声，反倒安慰我：“姐姐，我们从没怨过你，就是林彪不出事，将来你飞黄腾达，我们也靠自己本事吃饭，我们在部队很受领导重视。现在林彪出事了，一切都变了，客观上我们是因为有你这个姐姐受到组织上的清理，不能再继续在部队干了，但你放心，我们一点不怪你，只要你以后好好的回来。哥哥给你写了一首打油诗：‘墙外好大风，屋内冷不着，心安体又壮，逍遥度白老。’我们做事问心无愧，照样挺起腰杆子做人！”

我紧紧握住弟弟的手，这个大弟从小就懂得爱护姐姐，走哪跟哪充当“小保镖”。家，这个人生苦海中的温馨岛，让深尝苦涩的我倍感温暖，燃起我重新生活的希望。

母亲和大弟在农场住了十天，一因保密规定，二因她健康状况，北京所有的老关系她都没去走动。临走时她硬要找领导谈话，毕竟受过刺激变得有点“糊涂”，她对领导说：“我的女儿

我了解，她绝不会反党，你们知道是组织上逼她去林家，她没有政治问题为什么关她这么久？不符合政策。放了她！我要领她回去。”

老王很客气地做她工作：“你是老革命，觉悟高。学习班是中央直接管的，有主席指示。你说放女儿，我说好，走吧，能走得成吗？动一个都得中央点头呀。放心吧，到时候一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女儿。”

母亲疑疑惑惑地问我：“他说话算数不？到时候不把你还给我怎么办？”

我安慰她：“你放心，先回去好好养病，你不是看到我这里的环境了吗？不会有什么事了，大不了再蹲一段时间我一定能回去。”

“你可不要再傻啦，再也别听谁说得好看，一放了你马上回家，哪也别去，就是没有工作也不怕，家里养得起你。”

“除了回家，我哪也不去。行了吧？”

“好，好，家里最安全，什么人的话都不要信。我等你来。”

释 放

家属来农场以后，外界消息传递进来，许多消息经过熟悉上层的秘书们分析筛选，嗅出了敏感的政策与人事走向。

“批林”发展到“批林批孔”再深入到“批周公”，圈内人都意识到周恩来也到了困难处境。

不少人知道“林办”里有人表现的“觉悟”特别高，写出周恩来的材料，连老王都不敢过目，直呈中央，这是为整肃周恩来累积材料的工作。一次会议上，老王传达了“中央首长”对这类人的嘉许。

大家议论纷纷。家属来队探亲，拜赐周恩来的努力，他如果有意外，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危，明白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家对这类人从心里瞧不起。

乘着江青失势，不少秘书往上面写申诉信，叫家属找关系转送，希望早日得到释放。但是，没有一次成功。

“林办”的一个人，把写给毛泽东的信叫妻子带出去，交给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们是同系统的好朋友。信中反映各“办”工作人员长期被关押，造成了亲属在各方面无法解决的困难，要求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看完信即指示：林办各下级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易久留学习班。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老王接到指示，先自喜形于色，因为后期的学习班生活几乎无所事事，女班组织毛衣、钩花边、绣枕套、做衣服；男班组下棋打扑克。领导和工作人员长期住农场，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免不了牢骚满腹，说“我们也像劳改一样”。工作人员老叶从外面弄来几只种兔，每班养一对，在房前围栏圈起来，兔属鼠科动物，到处打洞，繁殖又快，打洞打到房间里，又打到食堂去，就像打地道战一样，有的打洞穿出铁丝网跑到果园里成了野兔。

老王看完指示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结束学习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打听是谁“立了大功”。写信者抵死不承认，因为他受到来自“中央”的批评。

每个人都有一份政审结论，并被叫去办公室谈话，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这是官样文章，凡是提不同意见的人都挨一顿批评，上边既定好的政治结论，岂是个人意见能改变得了的。

老邢拿到自己的结论，躲在房间里哭，因为在她的结论上写了与黄永胜的生活错误。女班组没人去安慰她，有人说：“别看她巴结讨好，结果还不是一样，踩人的人自己也没好下场。”我想，此时老邢心里的滋味大概比倒翻了五味瓶还杂味，她既靠不

上领导重温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失去了此生值得交往的患难朋友。

我的政审结论是这样写的：“张宁，女，二十四岁，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是林彪、叶群为林立果选中的对象。‘九·一三’事件中，张宁属于受骗受害青年。

“在学习班期间，一度表现不好，附和散布反动言论。经批评教育，有了一定认识。根据主席批示精神，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这样的结论算是格外“开恩”了。出我意料之外，我便“得寸进尺”，对找我谈话的老朱说：“在学习班期间我没有附和散布反动言论，这一条不符事实。”

老朱说：“对你的结论，上面再三研究过。其实你在林彪事件中并没有什么错误。你的主要错误是在学习班，你对王老太太的言论听之任之，不揭发批判还对别人扩散，就是附和散布。我们对你是爱护的，还没把你攻击中央首长的错误写上去。”（批评毛远新选妃。）

“王老太太？你说什么啦？很多事并不是她说的。”我一头雾水。王老太太年纪大，平时很少跟我们一起聊天，她除了我以外，对其他人都抱有戒心，根本不可能对她们说什么，何况“林办”范围的事都已在专案审查时期说完，何必再在不了解情况的新人面前重提？王老太太有特殊之处，从专审到学习班这四年，她没有写过一份文字交代揭发材料，她有私塾底子，并不是一点文化也没有，但她坚称自己不会写字，就是不落字迹把柄给别人，够硬的。嘴上说的随时可以推翻，反正她知道的事不涉政治核心机密，大家都知道的事可说可不说、可写可不写，审查方面独拿她没办法。我估摸着老朱的话意，准又是老邢过去在王老太太背后捣鬼，编排她什么，怪不得在“放毒”事件那段时期，领导叫王老太太交代问题，她就是不承认，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大的

“内容”，并不单单是个“放毒”事件。老邢双管齐下，政治上刑事上想借领导的手致王老太太于死地，领导上居然一直相信老邢的诬陷，可悲可愤！

果然王老太太拿到结论以后气冲冲地找领导谈话，回来对我透了一句：“反正我没有做亏心事，由他们去说！”老邢害人不浅，如果林彪不倒台，她见到“林家老王”又该是副什么恶心的嘴脸？可想而知的。

离开农场前，老王找我谈了一次话：“你还年轻，今后的道路很长，要处处谨慎，夹着尾巴做人。毛远新的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再提。”

我很明白地说：“今后何止夹着尾巴做人，以后政治运动我就是活靶子，我看透了也想通了，我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人。”

“你的情绪很不对头呀，你应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问题，重新做人。你家庭出身和成长过程与她们不一样，组织上还是爱护你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嘛……”

我麻木地听着，内心对他每一句话生出强烈抵触。

最后那几天，大家心思都已“飞”了，菜地荒废无人整理，各班种的已熟了的向日葵也无人去摘，老邢和小徐放开本事采收，把葵瓜子都剥落晒干，地里的黄瓜、西红柿大筐往屋里搬，她们带头破了纪律，没人跟她们计较，因为没人关心她们。

女班组其余人相互帮着收拾行李，出去合影留念，苦难中相处几年，真要分开实有不舍之意，各自对未来怀着不安的期待。

离开大兴县劳改农场以后，我们暂时滞住西直门总政治部招待所等候分配。有一天我走在院内路上，发现迎面不远站着一位中年军人，正迟疑地注视着我，不敢上前相认。我立即认出他是前线话剧团副团长兼导演老张，自我十岁当兵，他就看着我长大，怎地仅隔四年他就不认识我了？我上前与他打招呼，他惊讶意外道：“哎呀！你真是张宁，我都不敢认你了，怎会变化这么

大?!这几年你一定受大罪了，一定吃了不少苦，哎呀，真没想到把你折磨成这样，脱了形啦!”

我难过得眼圈发红，一时说不出话。他安慰我、鼓励我，并传达了多数善良人们的看法，希望我回到原单位去。我原本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稍稍觉得安定。

后两天，总政干部部来了一位处长和几位干事，我认出他们原都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老同志，一九六四年跟随军区副司令萧望东和政治部主任王良恩上调北京的。他们征求我去向意见，并善意提醒我去广州军区，许世友已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田阿姨也跟着去了。但我记起张副团长的话，我相信熟悉我的老环境和人事会比一个司令的权力更温暖，继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也是父亲同一辈的人，我更记住妈妈的话，哪也不去，只要回家。我选择了回南京军区。

各“办”工作人员原则上原系统再分配。王老太太隶属总参服务局，领导说她年龄大身体又不好，让她回原籍镇江退休。小袁、小张、小徐原是社会待业青年，不是正常入伍，因考虑她们是“上当受骗”性质，安排她们复员回上海，复员军人地方政府要负责安排，但地方上歧视她们的遭遇，只安排她们到收入微薄的街道小厂工作。老邢的人品差，原单位也不喜欢她，借机叫她转业到地方，在一家工厂食堂里卖饭票。小孙、小王都有人缘，在部队留用一段时期按正常转业，到地方的工作也都安排得不错。

第九章

漫漫岁月多坎坷

燕子归旧巢

我的董哨老师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与林立衡夫妇重逢

“太平天国”不太平

姜教授看相

痛失爱儿，皈依佛门

出家变出国

燕子归旧巢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下午，我离开了北京，从一九六八年底第一次被选进京，七年里三进三出北京。第三次进京一关就是四年，加上在南京受控制的两年，整整六年的抑郁苦闷，今次终于挣脱牢笼恢复自由身，回忆心路历程，既悲怆又欣慰，家乡向我招手，亲人等待着我，再多的苦难也暂时抛诸脑后，一心向前。

一路上火车飞奔，风驰电掣，北方原野迅速倒退，我一直坐在窗口，夜不成眠。第二天上午，原野渐渐出现南方韵味，山清水秀，空气中散泛着泥土花草的芬芳。接近下午四点，看到长江了，看到长江南岸一左一右的狮子山和绣球山，心中一股凄楚陡然漫溢胸间，泪水盈眶，急将双手遮额捂眼，闭目控制一会，没让自己在公共场合太失态。

过了长江大桥，南京站终于到了。四年前离开时我就有预感，但预感再不好也想不到我卷入到上层的政治风云中去，去受审查，去当劳改犯，会背着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以观后效”回到家乡。

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出口处站着母亲和兄弟，他们也像我等他们那样地等我。接我的是一辆南京市公安局的座车，我很纳闷母亲为什么惊动公安局的人。后来才知道，在我人未到之前，歌舞团已掀起一场政治动员，从部队调来一名新政委，“左”得屁股发烧，召开全团大会，说：“我们团出了个全国闻名的人，这个名，不是什么好名，是我团的耻辱，她叫张宁，是林彪培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她就要回来了！老同志中有许多人熟悉她，要跟她保持距离划清界线。新同志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她，她与你们不同，是个有待监督改造的分子，对她的一言一行要保持高度警惕！”

这种思想水平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干部队伍中不是少数，我们将这种思想僵化又好当官的人叫“留声机”，上面说什么，他照调哼哼出来。我的重新出现，给这类唯恐没事干的人又有使劲表现的机会了。

有好心的老演员偷偷跑到我家通知母亲：“张宁回来千万不要直接回团，进去又要给圈住挨整，底下的人没什么政策水平，张宁那身体恐怕吃不消，精神上不能再叫她受打击。”

母亲为防意外，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关系，请他们出车接人，必要时“抢人”。

她的预防措施没错，正当我准备上车时，歌舞团副政委赶上前一把拦住我，说：“你先回团报到！”

母亲骂道：“报什么到?!逼她去北京的是你们，出了事不认她的也是你们。巴结讨好上面你们都争先，出了事你们比谁都推的干净!我女儿关了四年，你们有谁关心过她?!”

副政委强词说：“张宁是我们团的人，军人服从纪律有组织管束。总政电话指示我们，张宁不准跟任何人接触，先得到团里去，以后的事再说。”

母亲愤斥他：“哼!现在又承认是你们的人啦?!你少在我面前提什么军纪、组织，压谁去?我的女儿我不能接触，再让你们拉去整!告诉你那个混蛋政委，女儿我领走了，交给你们我不放心!”

副政委理屈，仍不死心，问我：“你的意见呢?”

我看着这个为虎作伥的副政委，不愠不怒地说：“我当然回家!”转身上车喊母亲：“走吧，跟他们没什么好说的。”

副政委盯着车牌，我知道他在记认车牌号码，神经兮兮的，“阶级斗争”这个弦把人害得既不相信自己，也不认识别人了。

果然他回团向政委报告，说我被“不明身分”的人接走了，紧张到谎报军情的程度，我母亲他总该认识，谈何“不明身

分”！

政委慌急，弄不清楚公安局怎地插手此事，背后是哪股势力，急忙向军区保卫部、干部部汇报，说我“失踪”、“下落不明”、“公安局插手”。

政治部的人比他那土疙瘩南瓜脑袋灵，命他先派人去我家看看，人若在，暂时放一放；人若不在，再由政治部出面与公安局联系要人。

当晚，副政委和人保干事小朱来我家。小朱见我坐在客厅里，上前来问候：“四年没见了，你变得好厉害，走在路上我不敢认你，都看不出原来样子了。好好在家休息，哪也别去，外边不少人传说你要回来，社会复杂千万注意安全，出了事我们不好交代。”又附耳悄声递话：“管他那么多呢！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小朱是话剧团演员，我走时他还在“五·一六”学习班里工作，现在都当上人保干事了。人保干事是做人事工作的，直接与政治部打交道，协助团领导工作，他传递给我很重要的信息，我感激地向他点头，但并不说话，怕影响他。

母亲在另一边没好气地说副政委：“你来干什么？！我不欢迎你！告诉那个没水平的政委，我女儿一身病，不养好不回团，谁敢来强行，我跟他拼了，后果你们承担！”

副政委被母亲说得坐立不安很尴尬，起身告辞道：“张宁就交给你了，等她身体恢复再回团报到。复转工作就要开始了，等她回去办手续。”

母亲根本不理他，走去倒茶端来请小朱喝。小朱见副政委脸色不悦，起身向我们告辞，仍说：“叫张宁注意安全，把身体养好，她的身体太差了。”

我很感慨，这个小朱是连队调上来的新演员，与我相处时间不长，却有一份理解同情之心。副政委是歌舞团的老人，看着我

长大，我从未得罪过他，为何对我如此狠心？不但没半句安慰之言，反而提到复转之事，无情地想一脚把我踢开。想当初我生病在床，病得那样他还“铁面无私”地逼我走人。经历了一次大事件之后再看这一类人，觉得他实在可怜，他的社会资历和年龄加起来也不及我那短短四年的收获。我不会再感到伤心，他在我心中已没有分量。

有政治部的人向我传报很重要的消息，张春桥亲自打电话交代南京军区干部部“立即处理张宁复员下地方，她不适于留军队工作”。我想起总政干部部的那位处长和干事们，他们提醒我去广州军区有道理，暗中想帮我想保护我的人不是没有。张春桥身为总政治部主任亲自来电话指示，具体责任落在干部部方副部长头上，他不敢不执行，但他也是老人，两难之下，他含含糊糊地既执行又不抓紧。

母亲抓紧时间频繁地跑军区上层做工作，聂司令亲自打电话交代干部部妥善安排我在团里的工作；政委廖汉生又亲自交代团领导恢复我演员生涯；干部部部长虽是新人，却有同情心，破例给我补调级别，“保护层”发动起来，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实际上架空了。但事情并不顺利，我的工作始终没安排，另一种势力借着张春桥（他仍兼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电话指示当令箭，说我不能上台演出：“张宁要是上台，观众是来看她还是看演出？不乱套了吗？为她一个人全团工作受影响。”聂夫人很同情我的遭遇，说：“你们陆军不要，我空军要，叫张宁到我医院来工作！”可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仍然动不了。

歌舞团很多老领导、老同志同情我，出国时期的老副政委说：“张宁是无辜的，她的舞蹈条件现在的演员也比不上，我们费大功夫培养出来的人为什么不要？恢复她原职是领导的责任。”

折衷派出来为我说话：“张宁身体不好，组织上有责任，既

然不能上台演出，叫她到团部帮忙打打杂也行。”

我心知很多人想帮我，为了不致连累别人，我提出要求先恢复身体，以后的事再说。同情我的领导是多数，新来的政委没想到他准备打的“落水狗”竟有如此深厚的上下保护力量，卖个人情批准我去汤山温泉疗养院治病。

关久了的人对外界很不适应，刚从农场放出来第一次上街，看见车辆不敢过街，反应很迟钝。回到家在院子里试骑自行车，腿肚子直打颤，过去双手脱把骑得遛遛的，怎么如此“退化”？凭着舞训功底的平衡机能，再怎么不适应也不该有如此现象。听到大响动会吓得失声大喊，我过去够胆大的，怎么变胆小了？内分泌一直不正常，人瘦得脱形，脸色蜡黄。母亲遍寻名医，经人介绍找到一位姓伍的七十多岁名中医，把脉后凝神静思，似有不信的神情。再次把脉，下断语道：“你的脉象衰得似老人，弱得似婴儿，你只有二十四岁怎会有这种脉象？你得过什么大病没有？你的精、神之气一次从头泄到脚，去势凶猛，根本没有采取治疗，拖得时日久了，五脏六腑衰竭，人就慢慢枯萎。你的病拖得太久，用药相冲；得慢慢调理呀。”

我看过多少医生了，不是说我神经衰弱，就是说我肠胃功能紊乱，开的药毫无起色，这位老医生说准了我的病症，自杀那次醒来感到浑身冰冷彻骨，一股气直往下泄，以后精神越来越枯槁。我信服地望住他，他一边叹息道“你这年轻姑娘怎得这种病症，行医一辈子没见过这种病”，一边开药方。后来他得知我真实身分，同情之下十分用心替我治疗，长期吃他的药，确见起色。但毕竟是受过重创的人，要想彻底治好谈何容易。

在家期间很多同学来看我，都是干部子弟，说话无顾忌，见我折磨得脱了形，其中一个嚷道：“他妈的，当初哪个不喊万岁、身体永远健康！转眼成阶下囚。摔死了全部翻个了，有本事自己揭盖啊！拉个无辜的人当垫背。”

另一个说：“听说你上了‘天’，我们猜测不是毛家就是林家的公子看上你，卫岗小学出你这么个人我们也觉得了不起。林彪摔死吓我们一跳，最好的一个变成最坏的一个，你也跟着倒霉，真他娘的运气不好。”

又一个说：“人呀，不能太拔尖，你当年的精神，走哪人家都围着看，还记得我们去吃汤包吗？排队的人不排队喽，吃包子的人把包子往鼻子上送。哈哈，那股样真叫绝了，现在可好，跟个老太婆似的。”

有人摇头叹息：“政治上出事，日子不好过；长得好，日子也不好过，这世道说不清。”

一次，许伯伯女儿来看我，她过去就不把林立果放眼里，见我不愉快，安慰道：“这事怎么怪到你？当时谁见到林彪都感到光荣，一般人想见还见不到呢。他调个人去谁敢不去？党政军大干部哪个不听他调？调你个小演员算什么稀奇？林彪死了，见他的都有罪，那天下有罪的人多啦，个个有罪。想开点算了，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军区老副政委的儿子是我哥哥那一班级的，也来看我，他见面嘿嘿笑两声，语调夸张比手划脚地讲：“想那么多干啥，上头看上谁，谁就大祸临头，他捧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死；他捧刘少奇，刘少奇给整死；他捧林彪，林彪又摔死；他捧哪个，哪个准没好下场。他打个喷嚏淹死你，打个哈欠掀得你底朝天。嘿嘿嘿，保住吃饭的家伙（用手指指头）混日子吧。”

哥哥讥笑他：“你哪来那么多话，你这不是现行反革命嘛！骑驴看唱本，走一步唱他一曲，管他那么多，他整谁也跟我們老百姓没关系。”

“整到你妹妹头上你也不放屁？”

“放有啥用，千山万水的他闻到啥味了？该我们倒霉。来，吃饭！喝酒，一醉解千愁嘛。”

哥哥很爱说笑，见我不开心，端起酒杯喝一口酒说：“人生苦乐是常事，凡事自消自解，我给你说个故事怎么样？从前有个结巴子结得很厉害，见到人使出吃奶的劲也挤不出一句话。他找人看病，一天见有个郎中挂个牌，上写‘包治天下百病’，他费半天劲说清楚要治结巴子。那郎中未开口先闭眼，摇了半天头，说：‘我、我、我……也……是、是、结、结……巴子。’”

我“哇”地一声喷出一嘴的饭，开怀大笑，顿觉胸间郁块消解许多。哥哥从小就关爱我，上下学常牵住我的手走路，怕我乱走到马路上被车撞到。我去北京时他还在部队当兵，对我的事全然不知，却受到我的牵连。他当兵较早，十四岁也是未成年就当兵，那时还没有“文革”，他牢记父亲临终遗言“儿子长大扛枪保国”，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他坚决要去当兵，父亲的老战友们拗不过他，只好送他去坦克九师。他年少好胜，师团长又很关爱他，他一洗干部子弟的习气处处争气，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将军视察九师实弹演习，十个炮手表演只他一人百发百中。许光达赞赏他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射，岂不知我哥哥五岁跟着父亲学放枪，十二岁就是南京城里狩猎族的小神射手。他十岁横渡长江，要不是报上登名，谁也不相信他的神勇。

我三个弟兄都是神射手，大弟是准备保送到北京装甲兵总部培训的技术尖子，名单都呈报上去了，却碰上我出事。我真觉得有愧于他们。

我家周围的农民子弟也来看我，我幼年时的一半时间生活在她们中间，建立起可贵的感情。她们不理解：“你不就是漂亮吗？也挨整？林立果看上你也算你的罪？”

我的一个小干姐妹告诉我：“关了你四年，外边的人说你没有罪不会关你四年，一定是有罪。我说才不是呢，你不像一般干部子女清高不理人，你心肠好，不会犯罪的。”

这些最底层的人说出的朴实语言，比那些整天政治说教的人

强千百倍，她们懂得从本质上看人。

我希望见到小李，事情既已过去，也要向他做个清楚的交代，以了前缘。歌舞团的战友来告诉我，小李正新婚，不会来的，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或许他在知道事情真相后根本不再需要我任何的解释，他是聪明人，他不来见我也许是解决前缘的最好办法。

曾邦元和他爱人金叶也来看望我，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夫妻生活美满幸福。曾邦元官升江苏省宣传部部长，不再是当年那副学生模样，说话却还像当年那般幽默。我们不说话的时候相视而笑，脑中都浮现当年兄妹般的情谊。在我劫难以后，他仍不忘那段友情，以夫妻俩的名义共同关心我，常邀我去他们家玩。

我们谈起江苏省“红总”的造反头头们，当年田阿姨为了促进两派大联合，曾请他们吃饭，我也在场坐陪，有一面之交。在我关押的四年中，他们自杀的、枪毙的、判刑的，运动中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青年精英们，尽管有着思想和道德观上的种种瑕疵，轰轰烈烈起家，悲悲惨惨收场，都是那个时代政治的牺牲品。

曾邦元是唯一留下并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幸存者，我感触地说：“你幸好是保军派，不然你今天不知呆在哪处荒山僻野服苦役呢。”

他若有所悟地苦笑道：“一个运动教育许多人。有错的有罪的都死了。我没有反军，不搞打砸抢，武斗最盛行时，我领着工人和学生赶建长江大桥，运动中还算头脑清醒。现在当宣传部长，党分配的工作就要做好。我本意想退出，回到大学里执教，知识分子参政是文化大革命产物。这个运动，我对你说自己的感觉，将来一定会重新评价，当年好的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极端。从造反开始，凭着一腔热情响应毛主席号召，本来就没当官念头，

我倒巴不得放我回大学去。”

曾邦元预感很准，一年后毛泽东去世，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垮台。“文革”定为“浩劫”，新党中央清算“文革”账，以造反起家的领导一律不再录用。曾邦元也在劫难逃。

我和蒋副司令见了最后一面。我到军区总医院看病，蒋副司令穿着病服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身后跟着两名魁梧的军人。他老远认出我，我变化那么大他竟能认出，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他老远就急切地呼唤：“是张宁吗？”见我停足相望，他招手：“等一下，等等我！”车子直向我推来。

我本想掉头离去，但他那股神情令我不由自主地立足凝视他。他比以前更黑，以前黑的光亮，此时暗淡发青浮肿，比以前消瘦许多。他神色凄然，想笑，挤出的却是苦笑，望着我愧疚地叹口气说：“姑娘，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变了，变化太大。”他拉住我的手紧紧握在他的双手中。

一股酸楚，一股委屈，一股过往的愤怒，又一股对忏悔了的长辈的感情，一齐向我袭来。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大家都是极左思想和路线的受害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都没有逃过那一时代的思想麻醉和灭顶浩劫。他的儿子，一个年轻的军官，不久前事故死亡，据了解内情的人说死得非常不应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而蒋副司令本人又得了癌症。是天意？是惩罚？我都不愿这么去咒他，我觉得忏悔了的蒋副司令与我一样可怜，他终于在临终之前找到机会向我承认了错误，他可以装着没看见我，但他没有那么做。

我声音很弱地问候他：“你生病了？你要保重。”

蒋副司令很感慨，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嘴里“哎、哎”地答应着。

不久，他死了，作为长辈，知错能承认，比那些知错透过，千方百计诬陷他人的人不知强多少倍，他仍是一位勇敢的将军。

我原谅了他，他可以安心地去见我的父亲。

我的董哨老师

在我去疗养院之前，遇到了一件使我心灵震撼的事。

一天清晨，我去操场晨练，周围跑道上都是锻炼的人，没有舞蹈演员，舞蹈演员一天的基训量很大，所以很少有舞蹈演员做晨练的。

“小张宁！你在这里？”

背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心里一激动，冲口喊道“董老师！”即回头，见他迎面乐呵呵、笑嘻嘻地站在离我一米开外的地方。

我很吃惊，他那又嘻又哈的开心模样，显得滞呆迟钝，原来很精神英俊的形象荡然无存。啥时候变得这副傻乎乎的样子？

我迎上去呼唤他，他似乎没反应，仍笑嘻嘻地望着我，我顿时明白过来，他精神失常了。

有些精神失常的人，还会记住他脑中的印象最深刻的人与事，我是他和李首珠老师培养大的，我是他掌上的“小孔雀”。

当年全军歌舞团大规模招生，是决心彻底改变军队艺术的落后状况，这一批演员培养的是“生力军”，所以各大军区和兵种歌舞团领导，都认真挑选了政治思想、专业水平、组织能力最优秀的老演员担当培养重任。

董老师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舞台生活和主要演员的地位，管起一大堆娃娃兵，既当“爹”又当“娘”，在我们最初踏入社会的幼稚心灵里注入关爱与温暖。

我上学时，父母给我起学名叫张宁生，考入歌舞团以后，董老师说我：“你的名字像男孩，去掉一个字，叫张宁好不好？”从此我就叫张宁了。古训说“师长如父”，他替我改名，培养我

独立于社会的能力与专长，他关心呵护我，在我的心里，他是我敬重爱戴的师长。

我上前拉住他的手，请他到我房里去坐坐，他嘻嘻地笑着，像个听话的大孩子，一路上不断地侧头望着我嘻嘻地笑，走路一颠一颠的，像喝醉了酒。

到房间坐下，忙沏了一杯茶送上。董老师一双有点混浊的大眼睛看着我，还像看我小时候的那副疼爱表情一样。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声调凄楚地说：“你总算回来啦，你受了多少苦呀。”边说着，边抚摸我的手背，那傻笑脸变成欲哭无泪的模样。

我眼眶湿了。他虽然神经失常，但还记得许多事情，表达也清楚，看来他正处在治疗中的稳定期。但明显地，不管多好的医疗条件，再也不可能彻底治好他精神上的深重创伤。

我把水端到他手上，请他喝口水静一静。见到董老师这副惨状，我心酸地问道：“什么原因造成你这个病？我走了以后，你关在‘五·一六’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事？”

“‘五·一六’？我不是‘五·一六’分子，根本不是，我不知道这个组织，我不是，我不是‘五·一六’。”董老师边说边惶恐气愤地急辩。“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是搞错了。你是为这得的病？”

“他们逼我，打我，要我交代‘五·一六’罪行。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飞鸣镝’战斗队，那都是我培养大的学员啊，我不放心他们，走到哪我都跟着。我又不管事，不是勤务员，（造反头头）内部开会搞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不把我当老师看待，可我还是舍不下他们啊。”

“谁打你的？”

董老师瞪着我，半天不说话，表情木然像是回忆，又好似触及到他内心的痛苦，霎时脸上的肌肉抖动抽搐。见他如此痛苦气

愤，我更想弄清楚到底什么人这样残忍地摧残他，我伸手轻拍他肩要他说话。

董老师嘶哑着嗓子失去控制地喊道：“你不知道你董老师被人折磨得多惨啊！他们把我关了一年，写不出交代材料不让吃不让睡，搞得我筋疲力尽。打我，罚跪，半夜把我拖出去丢麻袋包一样丢到车上，开到荒山野岭把我拖下车，几个人把我拖死狗一样拉在地上拖来拖去。我身体本来很好，关了一年给折磨得路也走不动了。”

我的心在抖，这都是熟人干的，相处那么多年的同事，怎么下得了手？

“晚上拖我出去，两个人把我胳膊扳到背后，一个人按住我的头不让抬起来，一个人拿枪顶住我胸口，副政委拿枪站在我面前，我反抗、挣扎，抬头看见副政委举枪瞄准我，他们又把我头按下去，我听到几声枪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假枪毙！”我难以置信地自语。

董老师愤激地喊：“坏啊！他们坏啊！”

我明白了，董老师在那几声枪声后就疯了。

我送董老师出门，望着他那一颠一颠的蹒跚背影，外人真难以想象他过去是多么英俊帅气，充满朝气。

记得我们学员时期，他就像个“老母鸡”一样，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孩子兵，他或前或后地跑着，照看着我们，不管是学习、上基础课，还是劳动，他都不离左右。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交给你们啦，你们好好努力，不要让老师失望。”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全力呵护、一手培养成长的孩子中，竟有人诬陷他毁了他。

董老师后来在疯颠的反复发作痛苦中去世。他的遗孀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著名一级舞编黄素嘉，与董老师伉俪情深，自董老师去后，她独力抚育教导儿女，使他们健康成长步入社会，

而她至今仍是独自一人。

董老师是我专业技能的启迪者、培养者，我此生忘怀不了董老师。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江青集团被捕后，举国欢庆，人民感受到“改朝换代”的喜悦，“文革”浩劫终到结束的一天，各地集市的螃蟹卖价特好，举国流传一说：“四人帮”好比螃蟹，横行能几时。人民以大啖螃蟹一解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愤。

新形势下，我精神上轻松了些。我慎重地准备好申诉材料寄给中央有关部门，要求修改结论中不实之词，落实政策，还我工作权利。

数次寄出的材料像“泥牛入海”，音讯杳然。当时全国上京告状的人很多，几十年的冤假错案都涌向京城要求解决。我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失望。

我想到一个办法，请组织出面。军区干部部接下了我的材料，呈送北京有关方面。

不久，上头发下一份文件，严厉批评干部部“丧失组织原则”为我呈送材料，斥责“为什么迟迟不处理张宁”，责令限期处理我下地方。

干部部找我谈话，我不禁火冒三丈：“我想不通，我还要上告！我不连累你们，我自己上北京去！”

一名老干事苦笑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江青倒台了，但与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些人，还有权有势得很呢，你能斗倒他们？算了吧，再告，连我们也跟着倒霉哟。”

一名干事叹道：“原来军区还想保你，‘四人帮’倒台是件

大快人心的事，可你也太急了，这下暴露了，再也藏不住你了。这是第二次责令我们处理你，还不让你按干部待遇转业，要你按战士待遇复员，这也太出格了。”

老干事又道：“天下不公平事太多。你的事我们都清楚，你怎么走的我最清楚，你的档案还是从我手上调出去的呢。事到如今，上面等我们处理答复，我们唯一可以擅用职权的就是仍然按照干部待遇安排你。另外，你到地方以后不能再用原名，得改个名字，档案也要换掉，这一切都由组织替你安排，你只需要为自己想个新名字。”

“换档案？换名字？重新伪造一个我？这是违法的。”

“违法不违法看是谁做，这是上面交代的，在权势者眼中没有法。”老干事又嘲讽道：“上面关心你，怕你到地方目标太大，招惹是非。”

“那干脆把我封起来算了。”

“是啊，要是‘四人帮’执了政，你恐怕是第一批掉脑袋的人。你人没到南京，张春桥的电话就打来了，看来他们还挺怕你说话。”

我还是想不通：“档案记载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造假呢？”

“政治需要嘛。一切都由组织负责，你不要管那么多。”

我改名李亭。随奶奶姓李，虽然我从未见过她，但她是一位可敬的劳动妇女。我坚持不要女字旁的“婷”，“女”字红颜薄命在我遭遇中注释太全面，我憎恨自己是个女儿身，取“亭”之“亭亭玉立，入污泥而不染”之意。虽然浩劫已令我蒙受污名，但在精神上，我永远是洁净无瑕的。

我入伍十八年，心灵上带着满满的创伤退伍了。几张纸的假档案代替了厚厚的真档案。光从档案上看，我是个经历单纯的女兵。在现实生活中，我成了“内控监视”对象，精神上背着沉重

的黑十字架，走向另一段漫漫的人生道路。

我正式脱军装是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五年九月释放我回南京。

退伍后的一天清晨，我独自站在大院的草场上，十八年中的朝朝暮暮在眼前闪过：十岁那年在草场上踢球，被歌舞团招生组看中，草场上孩子们嬉戏喧喊声好似犹在耳旁；教导处办公室里招生组问我多大，我清脆地回答：“九岁！”大人们怜爱地看着我；辛苦的训练饱含着眼泪和汗水伴着我长大，在全军汇演和东方红大歌舞中因优秀的演艺素质和美貌而出名；出国演出，大家保护我爱护我，恰似捧在全团手上的一颗明珠。我的生活就像一颗开心果，笑口常开，无忧无虑。一场祸国殃民的“文革”将几代人的美梦一夜之间砸得粉碎，政治时空剥夺了我的一切，我又回到十八年前的这片草场上。立足这片草地，还是这般景致，往事不堪回首，情何以堪！人世间的的天不公，唯有昂首向穹苍浩叹。

与林立衡夫妇重逢

在等待分配期间，接到一封来自河南郑州市的信，是幼年一位女友寄来的，她告诉我林立衡的下落，如想见面，她想办法安排。

我大感意外，多少年里，“林办”不少人寻找她，都得不到音讯。我得到这意外之喜，立即提笔回信，请她持我亲笔信去见林立衡夫妇。

很快的，我收到了张青霖执笔的以夫妇俩名义写来的信，他们和我一样欣慰得到对方的消息，引用一句古诗“一枝红杏出墙来”，我从这句诗里看出了他们的处境。青霖写道：“自从出事后，你姐姐最关心的，最不放心的人就是你，对林家欠你的深感不安。她急于想见到你。”

我以最快的速度做了启程准备。

女友在郑州接候，这次见林立衡夫妇很像地下党的秘密行动，女友将“侦察”情况告诉我：“我拿着你的信装着走错路敲开她家的门，同一楼住的所谓秘书实际上是监视他们的。听到敲门声马上探出头察看，我把你的信塞给张青霖就走。我察看了几次，每天中午秘书都午休，你乘中午去，二楼第一个门，悄声点，别让人看到。”

“林立衡还有秘书？”我不相信地问女友。

“哎呀，什么屁秘书，管他什么职务，反正大家都知道是监视林立衡的。”

正是中午一点多钟，女友将我带到郑州市内一个工厂宿舍区，指点林立衡住处，让我一人上去。我蹑手蹑脚地上楼，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开门的正是张青霖，一见是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双方激动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我一步迈进门，青霖将门轻轻掩上。

林立衡在卧室里听到动静，没等青霖叫她，已出现在卧室门口，我们彼此迎住拉着对方的手，久久地看着，说不出话，眼眶都湿润了。

“姐姐！”我含着泪终于喊出声，一场生离死别的大劫难后，再一次喊出这个称呼，内涵远远超过表面意义。

立衡频频点头，专注地看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体会到她此刻的感慨，不说比说更具深涵。

青霖一旁激动地安慰我们：“真不容易，八年了，你们姐妹终于见面了！坐下休息一会，我去买冰棒。”

买冰棒？我抬眼打量他一身厚实的冬季棉军罩衫，三伏酷暑天还穿这种衣服，既不舒服凉爽也很背时。我忍不住说他：“青霖哥，这大热天，你怎么穿这件衣服？”

他含糊应道：“哪还顾到这些，我穿衣服不讲究。”

我再打量立衡的衣着，她一向很朴素从不穿好衣服，可眼下，她那身洗淡了的空军服里，露出的是一件做工整脚的白的确凉衬衣，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她过去的衣服，她过去的衣料虽不讲究，但做工是不差的。

青霖走后，我问立衡：“姐姐，你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还可以。”她含蓄地说，又问我：“你生活得好不好？”

“不好！不过我跟你们不一样，多少还有些爸爸生前的老战友关心着我。有人敢关心帮助你们吗？”

立衡苦涩地摇着头，说：“很多人都受到‘九·一三事件’的牵连，我们不能再给他们找麻烦。想帮助我们的人也找不到我们。”

“这几年你们关在什么地方？”

“出事的第二天，我和青霖就被原地看管起来，就关在大队部，杨处长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被限制活动，不准回去看你，也不敢告诉你发生的事，怕你精神上受不了打击。”

立衡换个话题问道：“在中央专案组里，他们对你怎么样？”

我听出她是双重意思，回道：“专案组里的人有好有坏。‘林办’里的人也有差别，通过很多事，我看出人品的不同。”

立衡说：“有些人禁不起劣境考验。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连累了很多人。”

“姐姐，你还觉得内疚吗？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呀。我在专案组排查日程时，听秘书们说你已经向他们打过招呼，那时谁相信你？责任根本不在你。”

立衡无语，千头万绪，恶性后果令她无从拾起话题。我被这股情绪迫得也说不出话。在静默中，我深深体会到她的善良与坚强。事件后她是最不幸的人，一夜之间失去父母兄弟，家庭与政治双重骤变，几小时之间便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竟然没有倒

下去，反而还关心着别人，为自己父母的事深觉愧对旧属。

立衡调整情绪后又问道：“专案组没有逼你说什么呀？”

“逼啦。那么多活证人在眼前呢，要栽赃没那么容易，何况我政治上没那么重要，在我身上做文章捞不到油水。”

“谢静宜审问我时叫我揭发你的问题，我说张宁什么都不知道，她是个无辜的青年，不应该关押她。谢静宜不听我的。我想你日子一定不好过。”

青霖见我看着立衡，便问：“你看你姐姐变化大不大？”我无语地点点头，想到她身体先天弱，这种环境万一有病了怎么办？便问道：“姐姐身体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的身体。”青霖说。“立衡原来的身体情况你知道，三〇一医院光是抢救她就是三次。江青这女人毒得很呢，一直找机会想对她下毒手。关押期间住一间小屋子，不让见阳光，不准出屋放风；夏天蚊虫多，不给蚊帐让她给蚊虫叮咬，全身抓得溃烂。立衡给中央写信提抗议，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写了很多信都被退回来，还说她态度不端正，对抗审查。立衡脾气犟，劳改犯还有放风时间，她连劳改犯都不如。她不断往上写申诉信，要求见周恩来，上面就是不答复。江青想出毒主意，不是嫌蚊虫咬吗，拿敌敌畏农药熏，把立衡的房间关上，窗户本来就是封死的，在墙上挖个小洞，从外面烧敌敌畏往洞里灌。毒烟弥漫整个屋子，哪是熏蚊虫，是熏你姐姐！立衡中毒窒息昏倒，再抢救晚点就过去了，亏得有好心人暗中施援手，把她拖出来立即向上面报告。周恩来总算出面，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和立衡住一起。我从周恩来那里知道你姐姐情况。我是学医的，这种时候再不帮你姐姐，就没有人能够保护她了。她的处境十分危险，我明白周恩来找我谈话的意思，立衡身边多个人，就多一点安全系数。就这样，经周恩来特批，把我们安排住到一起，成了事实夫妻，没有任何婚姻手续。她呼吸道中毒以后溃疡

一直溃烂到胃部，吃东西都困难；闻到一点异味，呼吸道就起过敏反应，严重时反复窒息。受中毒的影响，她头发、牙齿都脱落了。你看她瘦弱的，不讲话，讲多了很累。总算保下一条命，你姐姐很坚强。”

我心情起伏难平，原来立衡也在折磨摧残中煎熬了四年，那种精神折磨的滋味不是言语能够形容得了的，刻骨铭心。此时此刻面对立衡，双方都是劫后余生，体会深刻，能见到面就是最大的安慰，不需要再说些什么。

我站起来环顾他们的“窝”，一卧一厅，一卧不足十六平米，一厅不足十平米；一间没有洗漱设备的小厕所，进去关上门一弯腰屁股撞在门上，两平方米恐怕都勉强；一间厨房小得容不下三个人，洗碗、洗菜、洗衣、洗脸、洗拖把，都在那一个小小的黑乎乎的水泥池子里。

家里到处堆放着简陋的大小小木条箱，我这才注意到，“桌子”和“板凳”原来也都是木条箱。没有一样家用电器。“书桌”上放着许多稿纸和翻阅一半的马列书籍。看到这儿才发现这个家简直不像个家，有点像货仓。

“家里放这么多木条箱干什么？拆了它做个家具用用不好吗？”我不解地问立衡。

立衡不语。青霖解说道：“这里面都是书。出事以后，我们没回过一次毛家湾。所有东西都查封，连我们私人的东西也充公，没拿出一件换洗衣服，这几年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当年带到北戴河去的那几件。放我们出来，所谓的落实政策，就是还给立衡一部分书籍。好书和有林叶批语的都挑走了，留下没人要的给立衡。总算是家里曾经用过的东西，不要也不行，花些钱买一批最便宜的木板条，钉成箱子装它们。”

“真没道理，你们私人物品怎么不发还？林彪和叶群有很多东西也是私人的，应该发还给你们。”

“别提了，那些东西不可能再要回来。立衡曾经向中央有关部门提过，没有人肯管这件事。”

我担心地问立衡：“你们就这样生活？不想要个孩子？”余话强咽了下去：立衡再不考虑生育，林家岂不断后？虽是外系，总还有点林家血脉吧。主要是有了一个孩子，或许对立衡精神生活起到一点改善作用。

立衡不语。

青霖深深叹口气，用十分理解和支持的口吻对我说：“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孩子了。我们将尽毕生精力去完成一项既定的艰巨工作，历史需要我们做出这样的牺牲，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所以，为了今后无后顾之忧，我和你姐姐决定不要孩子。”

我感到很凄惨。三人互望着久久无语。

这次郑州之行，“九·一三事件”的三个在场人，也是林家的未亡人，建立了联系。对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曾有人出于关心劝告我：“再也别跟他们联系，离远一点，别再招惹是非，小心再给你罗织新罪名。”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和立衡、青霖在大劫难中互相识别，患难之交一词的注释还嫌太浅，我的命是他们救下的，我们之间无嫌可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社会政治歧见的高压下，我们三人已被挤成一体，不是我们主观愿望可以改变的，不是吗？我走到哪里，都被人指着脊梁骨说：“她是林彪的儿媳妇！”“她就是林立果选的妃子！”人贱我，我不自贱，因为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避什么嫌？再罗织罪名也不过就那么一箩筐子事，所以好事者说到最后也就没了意思。

“太平天国”不太平

我到地方上的工作很难安排。地方政府听说我的政治背景，不敢要，省里推给市里，市里推给省里，各有充足理由，省里说

我原籍南京市，应该回归市里；市里说南京是省府所在地，省辖区大，应由省里接下。两边把我当皮球踢了半年多。军区被总政治部批文压得喘不过气，又被上面三令五申的保密原则闹得头痛，又要我下地方，又不能对外暴露身分，接受单位一不能人多，二不对外接触。难缠的事一拖就是一年。我听说情况乐起来，如果林彪不倒台，我岂不真的成了“全江苏省的光荣”？省市岂不也“沾光”？此话虽然是犯有错误的蒋副司令说的，但以当时人们普遍的政治崇拜心态，谁不这么认为？岂知我这“无意上青天”的人，在大地回春之后，脚下仍是一片冰冷的石头，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见一斑。学习班老王头没说错，“夹着尾巴做人”，他是看出了我心正磊落，不甘屈于人，所以给我忠告。其实我的锐气已被苦难磨平，我以一种“看人间戏”的心态对待一切，无所谓。最后军区终于与市里安置办公室达成交易，这才把我塞进市博物馆系统一个学术研究单位，名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员名副其实的少，二十个大员不到，其中还包括六七个领导。馆务工作对内不对外，朱漆大门成天闭着，上下班从后门进出，市民只见大门上的招牌，从不见大门开启。我进去当了个资料员。

活到二十八岁，真正体验社会生活进入实际状态，过去在部队里总听说社会复杂，怎么个复杂法，并不知道。从十岁当兵，一切循规蹈矩，生活规律，穿着按号发放的军服，训练、演出、出发外地，一切都是领导张罗安排，快到而立之年，反倒要自己一件件从头做起了。什么都得学，最要紧的是重新开始学专业知识。

虽然我持有中专文凭，严格地说，我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五年级没开课就到了歌舞团。领导对我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因为关系到对艺术寓意的理解和贯通体现。但小小年纪精力不够，白天大负荷训练，晚上文化课多数孩子困得趴在课桌上

睡觉，我这个小学时期的“三好生”在学业上也一落千丈，好歹熬出成绩还是个“单打一”语文课，数学、地理、英语都不及格。记得全团大会上，团长拿着学校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宣读时，学员队的孩子们多数低着头，念到谁的名字，谁都好像没听到似的，头不抬眼不睁，耳旁听得老演员们嗤笑窃语“又是个大鸭蛋”。

这下可好，落到一个历史研究部门。当时的制度是组织分配工作，组织不分配工作就意味着饿饭，所以，组织分配的工作，是掏大粪你也得去干。没有专业知识，我被分到书库去管书。

古籍书库阴暗潮湿，一排排高达屋顶的书架上堆满线装书，书和书架上积满灰尘，空气中弥漫刺鼻的霉味。另有一小部分现代书，算是馆里的“图书馆”，供馆员闲阅。我既当资料员，又兼当图书管理员。我自小爱看书，现在有机会静下心来学习，倒也满开心的。

馆员们都叫我“李亭”，除了个别主要领导知道我背景并且严格保密以外，全馆人不知我本来“面目”。

我和大家相处得很好。每天上班后，关在书库里整理书籍，按分册、总册、年代、类别标上号码，重新整理上架；又编写书目表，图片表，谁来提资料或借书，我都能及时清楚地找给他们。有些研究员忙，我就按照他们写出的目录查出资料送到各人办公桌上。有人说：“李亭身上有种气质让人喜欢。”我不知道自己身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气质，林家曾为此气质而优择我；秘书们也因这种气质而说我异于其他姑娘；此时我又受惠于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点，获得众馆员们的好感，兼之工作勤恳，一个脏乱书库整理得井然有序，给大家工作上带来好多方便。

世上事没有不透风的。不久，社会上传闻说我转业到了地方文化单位，很多人开始打听。馆员们也问我：“你们团那个张宁分到哪个单位去了？”

“听说她分的单位很保密，你们同期转业的人也不知道？”

“张宁的分配肯定保密，说不定连名字也要换掉呢。”

“不会。名字怎么换，名字换了档案怎么换？不可能的事。”

我硬着头皮听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推说不知道。

“她长得漂不漂亮？”一人问道。

“以我看，还没你们长得漂亮。”我说。

“那不会，不然怎么会被选上去。你认不认识她？”此人怀疑地问我。

“认识。”我淡淡回答。

“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

“人不错。高个子，瘦瘦的。”我困难地回答。

“有你高吗？”

“差不多吧。”

“听说你们那一批演员就张宁个子最高，她比你还高？”一人问到此，怀疑地盯视我，突又问：“她比你长得怎么样？”

真不知如何回答，再犹豫可要露破绽了，笑道：“我觉得她没你们长得好。你们也都是文艺单位转下来的，也都长得不错啊。她年纪大了，比不上你们了。”

“她今年多大？”一人紧追不放。

“差不多三十岁吧。”我坦然道。

“那你多大？”

“我？我们那一批年龄相当，差不了二三岁。”我打哈哈道。

馆员们出于好奇地打听，我很紧张，真相迟早要暴露，到那时，我如何面对她们？她们又会如何看待我？

有军区干部子弟上博物馆来找张宁，门卫回道：“我们单位没有张宁，有一个歌舞团转业的李亨。”干部子弟犹疑地回去

了。我改名连最要好的同学们都不通知，他们从内部渠道最先得知我分配在这家博物馆，但两边情况却对不上。馆里因军区有人来又议论开：“张宁肯定在博物馆系统，不然人家怎么会找来。”但是市文化局范围有大大小小七八个博物馆、群艺馆，还有几处省属博物馆，一时大家还未怀疑到我身上，按习俗改名不会改姓，谁会把祖宗姓氏都改掉的。

不出半年，馆内一位女职员与军区歌舞团一位男演员谈恋爱，在歌舞团大院里巧遇我。两人同时与我打招呼，喊出的名字却不一样，一时闪避不及，我只得答应。男演员纠正女朋友：

“她是张宁大姐，你刚才喊她什么？”女职员错愕间恍然大悟，禁不住嬉笑道：“原来你就是张宁啊！哎呀呀，看我们傻的，找你打听张宁怎么打听得出呀。怪不得那么长时间找不到你，原来藏在我们馆里！”自此，卫岗大院也传开我已改名。张宁——李亭合而为一，组织上费了一番功夫为我制造的烟幕，就此烟消云散，社会上不少“有心”人很快知道了我藏身之地，引来很多麻烦。

我在馆内公开了身分。百闻不如一见，事前有了共处的感情基础，大家相处得倒也不错。可庆的是邓小平重新执政后，对诸多历史冤案下达落实政策指示，中央成立了“林彪案件遗留问题办公室”，对我结论中的不实之词加以删改纠正，把所谓的“表现不好，附和散布反动言论”及毛泽东指示的“以观后效”统统拿掉，我感到一身“轻”。但是我不可能再重新穿上军装，我的档案也仍然是假的，我生活在一种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诡异气氛中。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盘根错节”的余势仍然在起作用。

林立衡和张青霖落实政策的问题，邓小平曾亲自批示“大胆使用，不要歧视。恢复党组织生活，恢复干部待遇”。但是扣在纪登奎手上，并没有真正落实，阻力很大，只做了些表面文章，连最起码的落实户口都没办，林立衡夫妇在本厂虽都有表面职务

(立衡是厂党委副书记，青霖是厂职工医院院长)，他们的身分已众所周知，却还是“黑户”。积压多年的行政级别也不给调整，低工资直接影响他们生活，按照他们职务应享受的住房待遇一直不兑现，仍然住那一小单元。

不久我感觉到的诡异气氛得到证实。事情起源于文艺界朋友想帮助我脱离困境，重新恢复文艺生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使我振作，对我的精神和身体会大有好处。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准备拍一部反映芭蕾舞演员的电影，合作的还有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试镜工作完成后决定向文化局借调我。得到的答复是：“李亭是内控对象，她不能上银幕，否则安全工作不好做。”理由荒谬，可是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内控对象，意味着永无发展机会，表面上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如果你在关键时刻想动一动，便发现自己是关在笼子里的。

我很生气，也很抑郁。试着调换其他单位，可是不论人际关系怎么熟，我就是调不走，内控就是将我钉死在一地，便于监视。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因为有了我，从此不得安宁。未开放之际，有人来找，门卫还可挡阻。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向钱”看，因为文化局是“清水衙门”，下属单位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捞钱自谋福利。我馆原是南京著名古迹之一，修整调适之后也大门洞开，对外卖票供人参观展览。这下可热闹，一角毛票谁都可进。讲解组女职员都是文艺界转行，没有丑人，有心的游览客在展览厅见一个问一个：“你是不是张宁？”我通常在书库里不往前厅去，遇上这种情况，消息传到后院办公地，我更得躲着不能出去。

馆周围市民，想看我的，一早就守在前后门，总能逮着机会瞧上一眼，对我并没有威胁，但有一些人却让我和领导都感到难堪。我的社会圈子原来不算小，出事后慕名者更多，我住家在郊

外，想找我的人大都乘我白天上班跑到单位里来。熟人不接待，面子上过不去，好在书库是我的“领域”，聊聊天谈个事并不影响别人。可是日子久了，毕竟不合工作制度，更糟的是我不想见的所谓朋友和冒名撞进来的不速之客，严重影响我的工作，这种人很难缠。领导想了个办法，凡是找我的人一定要事先出示证件，但仍然拦不住真正有事找我的人。

而那些难缠的花一角毛票仍然大摇大摆地进来。某些领导气得归罪于我：“到底是参观文物还是参观张宁？”当初安排我的人再也想不到封闭式单位变成任何人都可以进的游览开放单位，并且给工作和我都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的身体因诸多不愉快因素迅速变坏，表面上消瘦并看不出什么，自觉得整天胸闷气喘虚弱疲惫，失眠症又逐渐加重渐渐地不能正常上班。军区当初安排我这个离家乘车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单位，我曾担心身体吃不消，要求离家近一点，有关人员笑道：

“你还想正常工作？算了吧。我们也不打算你能工作，安排个单位，领份工资，在家养着吧。”虽然被他说中，可现实的我就苦了。不能正常上班扣工资，一月病假超过三天扣奖金，事假超过两天扣季度奖，我的工资七扣八扣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没有“困难补助”，没有因我的复转待遇在馆宿舍区内分配住房，我的困难没有得到组织上的一点帮助，应有的待遇都没有我的份，因为我是“内控”对象，政治上仍不言明地受到一些领导歧视甚至欺负。

扣工资扣奖金，经济上的损失导致生活清苦，我并不在乎，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不愉快。我决定找市文化局局长谈话，直接向他反映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反映我现实的困难。

折衷办法终于下达博物馆，允许我长期休病假，拿基本工资。因我工龄长，基本工资加上各项社会福利，也还算过得去。

个别领导对我的离去像“甩包袱”一样感到高兴，他们看不

惯我“不卑不亢”的态度，更对我不向他们巴结讨好感到心理不平衡，我所有客观上的不利因素都曾被他们充分利用对我进行打压。在对我的安排意见上，他们没有表示一点责任，反而是文化局党委做了主，给了我一条生存之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满意的，因为我的离去给他们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留下了一个好空缺。

姜教授看相

南京有一知名星相家，是某学院教授，出身富家子弟，抗战时期避居重庆认识并拜了师傅学艺。他崇尚科学，为什么中途会迷恋星相？因为有一次应验令他折服，并从科学角度开始研究星相，结下不解之缘，一研究就研究了四十余年，颇有获益。

一九八二年初，诸事不顺，一种不甘的心绪，促使我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剖释。经熟人找关系，终于“引”出了这位退休隐居已久的星相家。他听说要求看相的人是一位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对象，答应见我。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九点，我按约定到了一个地方，那是一座民宅小院。书房阳光充沛，姜教授六十开外，银发，清瘦。他不问我的生辰八字，也不问我姓名，只叫我搬过椅子靠近他坐。他不言不语地详观我，经我同意，触摸了我的五官、脑壳和四肢。

他沉吟良久，又拿出放大镜细看我的脸和手掌。我发现他神情有点犹豫，欲言又止。我期待地望着他。

“姑娘，我有两个论断。先说第一个，如果不对请直说，我再给你第二个。你一定脱不掉我其中一个论断。帮助我一块研究，好不好？”

我点头问道：“你不要我的生辰八字？”

“我研究星相，只看骨骼、纹理、肤色。”

“嘿！”他深深叹口气，伸出一只手拍拍我肩膀：“你太可惜，要不是耳朵长反，我不可能坐在这里跟你说话，你是国家第一夫人，要见你都困难哇！”

我不解地问道：“我耳朵不长得好好的吗？怎么是反的？”

“你说的反与我说的反不一样。我所说的反不是耳朵长颠倒，是指一左一右该换个位置，如果这样，你一切都会很顺利，你将是中国的皇后。”

我愣愣地听着，好像那是很遥远的事，与我无关，却又很滑稽荒诞地在我身上显出它的印迹。

“你出身的家庭，古时称为官宦；你幼年丧父，母亲再醮；同胞兄妹只你一女，母亲再醮后还有一男一女。”

我缄默不语，心中暗惊他算得确实精密。

“你自小离家自谋生路，自给自足，小小年纪便享七品待遇，抵个县长父母官啊！”

“请停一下，你说我从小离家，几岁？”

“十岁。”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在专业上出类拔萃。人物出众，不是凡花品数。十六岁你在异国他乡有一次飞黄腾达之机，可惜没有冲上去，不然，你现在在国外是一位荣华富贵之人。”

我心内又是一惊，印尼险遭绑架那一幕，事后领导守口如瓶，就是“文革”最乱的时候也没掀这个秘密，他怎么算出来的？

“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龙虎凤三魁聚首，平地一声炸雷，可惜你又没冲上去，否则，不论是虎是龙，你这凤都是第一夫人。”

我内心更加震惊，林立果的事已公开，全国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毛远新的事可没人知道哇，我肚里装的秘密也被他算出来且

不说，一九六八年正是我十七岁，第一次进京；一九六九年十八岁，第二次进京；一九七一年二十岁，林彪出事，我关进专案组又遇毛远新，难道世上真有神算科学？我默思不语。

“你二十四五岁际遇最糟，从‘天’上掉下来，掉得还不是个地方，落在烂泥沼里，浑身陷在泥巴里，遮住了你本来面目，人们以为你是块石头，其实你是一块美玉。”

一九七五年九月我被释放回到南京，正是实足二十四、虚岁二十五的年龄。

“你蒙尘一段时期，备尝人间冷暖，受尽欺凌，凡眼不识真质，没人看出你是一块暂被泥巴掩盖的美玉。但是你相含贵格，蒙尘受难遭受欺凌侮辱的日子不会太长。有那么一天，有人从泥沼地经过，一眼就看出你是一块玉，他会带走你，这人就是你此生的本命夫。”

我心中酸楚，眼眶湿润，低声纠正姜教授：“我已有婚姻。”

“不，你现在的婚姻不出今年底，一定会解除，你此生有三次婚姻。”

“不，不可能！”我下意识地制止反对道。

姜教授停顿下来，看着我微笑道：“你失败的婚姻是第二次。没有结婚就死掉的那个人才是你第一个丈夫，有缘无分。你离婚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围着你，你的贵格与这些人不相符，没有一个是你的本命夫。好自为之，不要随便选择。等到你三十八九岁，至迟四十岁，你的“红鸾”星一定大动，东南方向来人，你坐家中自会有人登门向你求婚，这是你本命夫，他独具慧眼，你将随他飘洋过海。到那时，你会恢复本来面目，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这朵被关置在暗室里的花，就会重见阳光天日。”

我沉思自己婚姻出现的危机，儿子已四岁，我并不想离婚，

虽然这桩婚姻一点基础也没有。姜教授说本年底之前一定会解除婚约，结果到底如何，自己心中无数，姑妄听之。今后发展真会如姜教授所说？我对夫妻生活有厌倦之心，四十岁再嫁简直荒谬可笑，我自信今后不会走这条路，便对姜教授说：“四十岁人已老了，真如所说，我也不会再嫁，这一辈子生死都不会离开故土。我对出国不感兴趣，这条路不是我这种人能走的。”

“人各有命，时运一到，机缘出现，要躲也躲不过。我只看出你七八年后“红鸾”星大动，还有一股客观的势推动你，到时环境逼迫你不走也得走。”

我心内感到一种不安，急问：“能看出是一种什么势吗？”

“说不准，很奇怪。此势很凶猛，逼得你非走不可。以我看，你应该走，也必须走。走，则‘柳暗花明’，一切霉运就此扫净，这是你后半生的大转机，失之可惜。相格里不会让你独身，一定要好自珍惜。”

“这几年里，追求你的人中有品格很坏的人，你很善良，不易识破，要处处留意小心。”姜教授补充道。

姜教授说我的后半生语气很认真慎重。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还不怎么信。对我前半生说得如此准确，的确令人信服。姜教授问：“你看我说得还有哪些遗漏？如果没有，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

我将自己的名字报给他，他喟然长叹道：“传闻遐迩的人竟就是你，怪不得你会有如此相格。初时看你，我心里还纳闷，这样看，我是看准了。我有两点不明白，第一，你十五六岁那年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第二，龙虎凤三魁，那龙是谁？”

我告诉了他。姜教授连连点头说道：“星相学不是没有道理，是门深奥的科学，还有待研究。”

我好奇地问：“你认为是科学吗？”

“应该说是一项人们还未认识到的科学。打个浅显易懂的比

方：一棵树，要知道它经历了自然界多少灾难，它年龄有多长，把它锯开，从树轮上分析树龄，从树质中的疤痕和树皮、树枝躯干的形状分析它经历过自然界多少灾难。一切东西都有痕迹，有它自然发展的轨道。人也一样。我的祖师爷从小是个孤儿，他去印度学骨相，去英国学肤色，去日本学纹理，综合中国的《周易》，毕其一生研究星相学。”

我对姜教授的祖师爷和师傅的故事发生兴趣，与姜教授聊起天。祖师爷学成归国，扛个看相招子到处跑。一天，走到广西紫荆山下一个小镇上，看出满街贩夫走卒都是有品位的“红翎子”（清朝官员的帽子）。祖爷心想，若是两三个得中举人、进士倒也罢了，怎地大街小巷到处是“红翎子”，岂不是自欺欺人的骗人招术？祖爷砸了看相招子，跑到一个药材铺去当学徒。一年后，洪秀全在紫荆山揭竿造反，成立太平军，方圆百里百姓参加义军，也就是太平天国称为“老营”的那班人马，定都南京后，个个是有品位的大小官员。祖爷这才恍然彻悟，重操旧业，收了个关门弟子，就是姜教授的师傅。

师傅继续祖师衣钵，言无不中，定居南京后，负有盛名，天谴他变成瞎子，曾在夫子庙摆摊。蒋经国听坊间传说夫子庙有一奇人，他不信，视为迷信骗术。一天，亲自寻去站在他面前，说：“你如果看不准我，我就拆掉你的摊子，不准你在这里骗人。”

师傅把蒋经国从头摸起，刚摸到他胸口便停住不摸，说：“你这人龙头狗身子，君不君，臣不臣。”

隔了一段时间，蒋经国再去试他，师傅一摸他头，生气道：“你干吗还来，我不说过是龙头狗身子嘛，不要再看了。”

蒋经国不信此道，若信，或许能讨教一二。自蒋经国第二次去看相，师傅便离开夫子庙走了。

聊天中，我发现姜教授一只眼近乎失明，向他介绍眼科专家

劝他去做手术。他解释说不是眼疾问题。他认识的医学专家不少，治不好他的眼“病”。他的祖爷和师傅眼睛都无疾而瞎，他自己的视力左零点一，右还不到零点一，身体各部很好。他料定自己将来一定失明。祖师爷到他三代瞎子，泄露天机的报应。听来很玄乎，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旁人无可非议。

“听说你以前差点因看相的事送命？”

“唉，‘文革’期间，那些大人物都是典型的相格。我闲着没事，技痒，看不到真人看纪录片，不是有大人物上电影接见外宾吗？那江青呀，就一张嘴长坏了，相学上叫‘覆船口’，嘴一张，扣死一船人；她的上唇还有两道横纹，叫‘蛇口’，很毒。毛泽东闰八月去世，嘿，不小心说漏嘴，都在喊‘万岁’，我却‘咒’领袖人物死。这本来是自然规律嘛，但是不能讲啊！判我‘恶攻罪’，还说要判死刑。我曾替省市委关进‘牛棚’的一些领导看过，他们后来都东山再起，应验了。所以有人帮我讲话。在牢里，我应看守要求替他们看，都佩服我，也帮我说话。万幸‘四人帮’倒台，放出我，保住一条命。老伴怕了，不准我再替人看相，我已经好久不看了，要不是听说你是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人，我还不来呢。刚才进屋，你正与人说话，看你神态自如，神情潇洒，完全不像个落难之人。可是你的声音特别，激起我兴趣，想看看你这个人究竟什么来历，不虚此行呀，你的经历为我的研究又多了一个佐证。”

我告诉姜教授诸多工作上的不顺，希望他指教一二。姜教授不屑地摇头道：“你新单位的领导身边有小人，你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但是不要紧，你‘玉柱’通天，任何恶势力害不了你。你不会在单位呆久，不出两年，你必定经商。”

“经商？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不会，不会。”

“我现在说的，你不一定要信。过两年再看吧。”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姜教授的预言一件一件应验。

首先，同年十一月份，我与丈夫办妥了离婚手续。长期以来，夫妻闹离婚，只要一方不同意，就是冤家对头，死也要死在徒有虚名的夫妻名分上。巧在当年中央公布新婚姻法，对离婚一项制定新政策，我终于摆脱了令我厌烦透顶的婚姻。

第二件，领导身边的小人，出自晦暗心理，极尽其能制造各种口实，想借公安之手，再次陷我于牢狱之中。真是“玉柱”通天，冥冥之中鬼神相助，公道自在人心，公安不受所惑，据实还我清白。

第三件，两年后，实施开放政策，各类公司、贸易商行纷纷成立，国家允许百姓自由经商，我不在“行”而言商，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社会关系，自有人找上门来求我。人情难却，帮个忙，解人之难，是我的心性。随之，酬谢送上门，推辞不掉，因为还想用你。可谓身不由己，好在不犯法，又解决我和儿子的经济困难，终于应了姜教授“经商”预言。单位给了长期病假以后，在身体好点的时候，广州、深圳、珠海、北京，到处跑，俨然一副“商界忙人”的样子，居然也当起了“副总经理”，还配有一部进口车。

我心里一直没有真正愉快过，走到哪里，心头只有一个儿子。我不喜欢经商的那种奢侈的应酬忙碌，为了生活，为了应付日渐高涨的物价，为了独立抚养幼儿，我不得不卷到俗气而危险的商业漩涡里，与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因为性格坦诚，处事老实，在知交的关系以外，我这个徒有虚名的“女强人”常常被人骗。有人说我没有真正的经商本能，我明白这种人口中的“本能”是指什么，是欺诈、行骗。在这种日趋恶化的经商环境中，我心中的厌烦与不开心日渐沉重。我常常自闭家中足不出户，不接任何业务，也不见任何人，与儿子、父母、兄弟在自家的独门小院里安静地生活。

痛失爱儿，皈依佛门

一九七六年元月初，我跟江水结婚了，这桩婚姻是在江水强烈要求下，近乎于“逼婚”的情况下达成的。当时我就劝过他：

“我们只可以做朋友，甚至可以做异姓兄妹，但不能做夫妻。”最后，在怜悯心驱使下，做了他妻子。婚后不到一年，产下儿子，因是早晨生的，取单名“晨”，平日唤他“晨儿”。

月子里，我做一梦，一位头上有光环的披着红袈裟的老和尚对我说：“你儿子三至五是大关”，言毕消失，我也醒了。一九七七年一月份，南京下了一场罕见大雪，粗大的树枝被压断，全南京城交通停顿，人们徒步上班，大雪持续下了一星期。紫金山上的狼下山寻食，我的儿子险遭狼噬，幸而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躲过一险。算算时间正是儿子四个月的时候。

儿子三岁时，我又做一梦，梦中我去排练，把儿子交给一位姓谢的女演员，她把我儿子丢了，我哭着到处寻找，又上了那座小岛。岛上那座破败的寺庙焕然一新，朱红围墙、白石山门。我欲进庙，山门里走出一位拿着锡杖身披红袈裟、头带帽子的和尚，我心异这唐僧怎么满脸络腮？他问我：“你来何事？”我说找儿子。他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你儿已死，不可再回。你回去吧。”我伤心急辩：“不可能！我要见我儿子！”和尚道：“院墙外左边有六棵松树，第五棵树下是你儿子。”说毕消失。我奔左边去，果然有六棵松树，前五棵树下都有一个小摇篮，里面睡着婴儿，只有第六棵空着。我的儿子睡在第五个摇篮里，裹着紫色包被，睡得很香甜，小脸粉红白嫩，哪像死掉的孩子？可是，不管我怎么呼唤他，他就是不醒。我恸哭而醒。但是我对这类怪异的梦并没放心上。

我和江水的感情非常不投缘，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和范围，我

将全部的爱给了儿子。

儿子六岁时，我和江水离婚，他要了全部家财，我要了儿子。搬家那一天，他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只给我和儿子留下一副吃饭的碗筷。在他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做人信条下，他的虚伪在和我共同生活的六年中，暴露得很彻底，连他在邱家“帮助”我的动机，都是很卑鄙的。他利用我的婚姻和社会关系改变他的处境。我是个演员，突然间发现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演“人戏”的高手，这份感情再也无法凑合下去。而他最后给我的恶劣印象，是他指斥我：“生孩子是给我找麻烦！”

正如姜教授预言，离婚后，形形色色的人围绕着我。我明白不少人是冲着我这块“名牌”而来，心理畸形黑暗，拒绝他们，就遭到诬蔑中伤，就像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名女人的日子不好过，我的特殊背景又不同于其他名女人，日子更不好过。

我的精神世界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我讨厌这个复杂的社会，与儿子相处温馨而安全。我每月工资一百零八元，虽然生活得清苦些，好在我素来对物质要求不高，儿子随我素食，倒也简单。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兴起跳交际舞、迪斯科，我利用晚上时间办舞训班，一星期两堂课，半月一期，每期五六十名学员，经济效益不错，扣除租用场地的费用和分成，剩下的用来补贴儿子的生活和学习所需，日子在自己的辛苦下过得不求人。

儿子在我身边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听到的和看到的都在他小小心灵中留下印记，知道妈妈的辛苦和委屈，因为这里面也渗透着他自己的眼泪和体会。

他六岁上学前班，小朋友骂他“你是妃子的儿子”！孩子初涉世面本就胆怯，虽听不懂“妃子”的意思，只看小朋友那股“骂劲”就够他害怕的，他常常低着头摆弄自己的小手不知所措地抽泣。小朋友们玩耍，他很知趣地站一旁看着。他的爸爸更不

明智，在下学的路上拦住他，孩子跟他没有感情，他就狠心地刺激儿子：“你妈妈是坏女人！都上报纸啦！小狼崽子！”

儿子有一次回到家伤心地哭泣，问我：“妈妈，小朋友骂我是妃子的儿子，什么是妃子呀？爸爸也说你是坏女人，你为什么上报纸呀？”

我胸中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社会对我的歧视偏见落在了我无辜的幼儿身上。我搂住儿子，将他抱坐在腿上，安慰他：“晨儿，不要理他们，小朋友不懂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想知道什么，妈妈都告诉你，好吗？”晨儿含着眼泪点头。

“晨儿，妈妈好不好？”

晨儿张着泪眼，一双小手抚摸我的脸：“妈妈好。”我紧紧搂住他，将他的脸埋在怀里，不让他看见我流下的眼泪。

第二天，我找到儿子的老师，请她教育小朋友不要再伤害我可怜的儿子。又找到一些小朋友的家长，请她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更找到江水，谴责他：“你既然不想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就没有权利辱骂儿子。我们的事不要再波及无辜的儿子，等到他大了，你爱说什么都可以，他自己会分辨是非！”

我们母子的处境令我心中愤愤难平，但我又如何去填平社会上无数张嘴？“文革”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身受政治奇侮，她的名字被一些无知的人们拿来用做贬义词的代用语。我曾听到一个妇女教训她那不听话的小女儿：“你这个杀千刀的小王光美！”这样的民众素质，虽然令人嗟叹，却又能怎么办？

我唯一保护儿子的办法，就是把他关在家里。六岁正是天真烂漫接受启蒙知识的年纪，别人家的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天空下玩耍，我的儿子只能关在屋子里。我弥补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领他去我小时候常涉足的环境——紫金山玩。我们母子俩常常留连

在大自然中，松树林里、翠竹丛中、梅花山上、紫霞湖畔，一去一整天。尤其在山里，很少见到游人，我陪着儿子重拾童年的欢乐，虽有一点孤寂感，但也觉得比那社会上的人心险恶为好。

我自小娇生惯养，失去先父庇荫后，虽懂得自尊自爱，但天生气质中那脱不掉的娇质感，常常给人很大的错觉。舞台生涯中不能扮演工农兵形象，虽穿上破衣烂衫，仍遮不住那股娇柔。

“文革”开始后，跳那些拳打脚踢、撸袖子挽裤腿的造反舞蹈，编导都不要我参加。以后生活的坎坷，仍减不去我与生俱有的气质。虽然我学会了家务粗活，在晨儿的眼里，仍然是“好漂亮的妈妈”、“可爱的小妈妈”。一次，一位女演员上我家，正碰上我在炒菜，笑说：“真难想象你也会烧菜。”我奇怪道：“炒菜有什么难，你尝尝我烧的菜”，顺手拎出一点菜叫她尝，她吃后夸道：“味道真不错。可看你这个样，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还有一次，博物馆小食堂缺人手，我临时帮忙烧了一大锅菜，全馆人吃了都夸赞好，一听说是我烧的，脸上都显出新鲜好奇的模样，竟有人说：“你会烧菜？哈哈哈，看你这样子，不像是做这种事的人。”我的娇质感居然让人那么不容易接受我能干活的现实。

儿子八岁时，有一天我下班归家，进门丢下包就准备淘米，却找不见饭锅，它竟然放在门后的炉子上，揭开盖，满满一锅米饭煮得不生不硬，恰到好处，比我老煮糊饭强过多少倍。我问儿子：“是哪个阿姨帮忙烧的饭？”

儿子笑眯眯地说：“是我煮的。”

我不相信：“你煮的？我没教你，你怎么知道水和米的比例？”

儿子满不在乎地说：“看看就会了，这有什么难的。”

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儿子长大了，居然会做大人的事。艰苦的环境锻炼人早熟，想我八岁时的情景真不能与此时的儿子相

比。我刚转业到博物馆工作，在蒸饭时还出洋相，生米下盒不放水，别人都吃上嘴了，我还看着那盒生米发愣，同事们笑我连起码的常识都搞不清。

我望着儿子，内心既欣慰又酸楚，我这个做娘的，既不能带给儿子幸福快乐，更谈不上物资丰厚的享受，反倒拖累儿子小小年纪为我分担生活的重荷，感慨中禁不住眼泪又流了下来。

“妈妈，你不要老哭嘛。”

我什么时候养成了掉眼泪的习惯？我在外面那么犟强，怎么回到家却在儿子面前显得那么软弱？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由寄托潜变成依托！儿子是我唯一的精神财富，我竟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内心的弱点暴露在儿子面前。儿子的安慰让我感受到他的孝顺和懂事，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妈妈，我不要再结婚，别人会欺负你，等我长大了，我会干活，我会挣钱养活你。”那一脸稚气的坚强与认真，至今令我不能忘怀。

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中，儿子是我生活的目的，我不能再让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不愉快，我要他摆脱我的阴影，生活得更加愉快才对。从此，我不再在他面前掉泪。

儿子十岁时，出落得很有模样，不少人称他是“小白马王子”，不但形象清纯可爱，连说话那种轻声慢语的腔调也像极了，性格敦厚，待人诚恳又不失儿童的天真单纯。他每个学班的老师给他的学品评语中，总有这么两条：聪明、学习认真，敬师爱劳动；而不足之处也总是那么一条：不够活泼。这也是我这个做娘的悲苦身世和周围的环境对他起到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他秉承了我大部分的性格与气质，与孩童们在一起便显出很大的差别。有演员说：“张宁生的孩子嘛，就是与众不同。”我内心无比欣慰喜悦，盼望儿子将来有出息，弥补我前半生的遗憾。

可是命运对我是那么的残酷，一些不为人理解、不为别人所

遇的事偏都发生在我身上。

一九八七年夏天，一个自称姓孙、绰号“小棋子”的年轻人以我学员队时期的一名战友的名义找到我，就此纠缠上，非要认我做干姐姐。瞧他那油头滑脑模样，尤其那双斜视人的眼睛，正应了“目不正心必邪”的古训，他有四个姐姐，为何非要认我？但他比我小九岁，岂会有非分之想？

想找战友核对了解他的情况，遍寻多次找不到这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皆结交的战友。而“小棋子”已缠上身，就是找到战友也于事无补。

“小棋子”自摸上门的第二天起，天天不请自到，比上班打“考勤表”还准时，家务事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家人都觉得他的不单纯，我也不断地琢磨这个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怪人，他到底想干什么？

多少次撵他走，他翻斜着白眼好像听不懂。话说得激烈了，他便跟我要贫嘴：“你们这种人就是看不起人，我不跟你计较。俗话说‘礼多人不怪’，看你身体不好，我反正闲着没事来帮帮你，你倒不识好人心，我比你小，你是我姐姐，不是欺负人嘛……”

我常气得说不出话，哪来的歪理硬上门来塞给我，跟这种无教养知识的人说话，简直是自讨其辱。

曾考虑请公安局出面抓人，但他又没犯法。

去找派出所，他们也不能二十四小时为我守大门。

院墙矮，不给开大门他攀墙跳进来。

开口骂不得，动手打不得，他一口一声“姐姐”，人前人后喊得欢，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决定家访，请他家人管教。城南一条小巷子里，一间低矮的砖房，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头为我开门，他是“小棋子”的父亲，一个江湖上的“老码头”。

我把来意告诉他，请他管教儿子不要再上我家骚扰我。孙老头竟然喜眉笑眼地开腔道：“原来我家‘小棋子’是上你家去，怪不得这段时间成天丢了魂一样，大清早跑出去，不到夜里不归家，我还担心他又在外面交上坏朋友。你是有知识的人，‘小棋子’上你家去玩我放心，你多帮助他，他喜欢你就会听你的话。他能干，心肠又好，花几个钱孝敬你这个干姐姐也是应该的，这点上，我家‘小棋子’不小气。”

我瞅着这老头，暗自思忖，这父子俩神经上都有毛病？怎么都“听不懂”我的意思？

老头又开腔：“我家‘小棋子’有四个姐姐，都跟他合不来。他离婚以后精神上受刺激，单位上又搞不好，他性子躁，你再看不起他，他会出事的。我老来就这么个儿子，你做姐姐的要好好开导开导他。”

他的话意很明确，四个亲姐姐都跟他搞不好，可见这人的品性。若真在我家出个什么差错，俗话说小市民难缠，这老头还不上我家揭房顶？我又到哪去赔他一个歪儿子？

家访失败了，老头将儿子一脚踢给我，也是有意帮他儿子忙。

“小棋子”自此更加肆无忌惮，俨然成了我家一分子。来个客人，他烧水送茶，手脚勤快嘴又甜，客人和朋友以为他是我家亲戚，我又碍于面子不便说穿，用土话说：“认栽”了。

有一天，一位自小结伴长大的女朋友来我家，神情异常，几次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她怯怯地说：“我讲了你别生气，是‘小棋子’求我来的，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不帮他，他会不断地找我。我知道你不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你。”

原来是“小棋子”托她说媒向我求婚！

我勃然大怒，斥道：“你怎么可以答应帮他做这件事？！简直

异想天开，不要说我这辈子不会嫁人，就是嫁人也绝轮不到他头上！”

正说着，“小棋子”进门，我怒骂道：“我早看出你这人心术不正，什么认干姐姐，你给我滚出去！别再让我看到你！”

“小棋子”翻着白眼，冷冷地看我发火，讥笑道：“哎哟喂，讲完没有？娘娘发火罗。人嘛，要讲个教养，你发火算哪出？我‘小棋子’尽管没得文化，还有自知之明，你这把年纪，老糊涂了。我比你小，你好意思说出这种话。好了，算我尊重你，不跟你计较，我有这种心，不叫人笑话嘛，你不要做人，我还要做人呢。算了算了，没得工夫跟你们罗嗦，我还要做饭呢。”

“你滚！”我怒不可遏地斥道。女朋友在一旁气得说不出话。

“小棋子”嬉皮笑脸地说：“你不吃嘛，你娃儿下学回家还要吃饭呢。”竟然不理睬我，自行进厨房动手做饭。

弟媳妇下班回来见状，几乎是求他：“姐姐身体不好。你不要再上我们家来。我们家有人做饭，不要你忙，你走吧，好不好？”

“小棋子”说出一段比喻：“野鸡到处飞，家鸡再赶不离窝。”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无赖，他千方百计赖在我家的动机的确令人费解。

晨儿下学回家知道情况，气得掀翻一桌饭菜，指着“小棋子”呵斥：“你这个狗东西！我不要吃你的饭菜，你滚！滚！你不要脸！”

“小棋子”阴沉着脸，狠声说道：“我反正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社会谁都瞧不起我，连你娃儿也敢骂我，好啊，等我不想活的时候，得罪我的人都别想脱掉关系！”边说边翻着白眼瞧我家三个年幼的子侄，令我突感一股寒气从头冷到脚，那意思太可怕

了。

自这次以后，我与弟媳一起去找他父亲，见“小棋子”枕头底下摆着一把利斧，他父亲说是“小棋子”防身用的。我们没见过这种阵势，联想他说的话，家中小孩那么多，兄弟们都是双职工，真要发生什么突然变故，真是防不胜防。

我考虑再三，单相思还是个思想问题，只要做工作的方法得当，或许能化解矛盾的激化，假以时日，等待摆脱他的机会。

我确没有料到，这种恶人不会因我的善良和牺牲忍耐而改变邪恶本性的。

当我再一次断然拒绝他露骨的要求时，他恨极说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要叫你精神上痛苦一辈子，不信你等着瞧，只当我这话没说过。”

事隔一星期，有一天早晨，我外出购买去南方的机票，打算带着儿子远走高飞，摆脱他的威胁。晨儿正熟睡，我不忍心唤醒他，把他独自留在家中。

下午回到家，全家找不到晨儿踪迹，直到晚上寻遍所有亲戚朋友家和他常去的几个同学家，都不见他踪影，这是很反常的现象。有邻居和路人指称晨儿中午时分跟随一个常上我家来的男子进城了，我立即意识到“小棋子”骗走了我的儿子。我与弟兄们立即开摩托车赶到他家，“小棋子”却说他整天都呆在家里，他的父亲和在场的三姐也为他作伪证，说他在家睡觉没有出过门。但种种迹象都显示出我儿子的失踪一定与“小棋子”有关，而“小棋子”一口否认，态度冷酷异常。

发动所有亲友彻夜搜寻住家周围的湖泊池塘和紫金山晨儿曾涉足的地方，都没有结果。

夜空响起阵阵滚雷，久旱高温的南京突然降下倾盆大雨，城南上空雷电交加，从住家的城东望去，城南上空电闪雷鸣，一片火红。我心知有异，晨儿凶多吉少，我哭红了双眼，家人连夜向

派出所报案。

第二天火葬场火化了一具赤裸的无名男孩尸体，经照片验证，正是我可怜的晨儿。未通过家属认领，没有验尸报告，就匆忙地处理了。

我经受不起这沉重打击，一口气上不来，晕厥过去。醒来恸哭，我一生的遭遇走到这一步，人在精神上对痛苦的承受力已到了极限，我不再有生的欲望，一病不起，短短几天形销骨立，家人朋友彻夜守护着，担心我再发生意外。

痛定思痛，恨极了“小棋子”，也恨极了自己。说到底，晨儿的被害诱因竟起源于我这个做娘的，我就是毁了自己也对不住爱儿，躺在床上，心里如冰一样寒彻，觉得床不是床，而是冰冷的泥土，我溶化在泥土中，静静地躺在大地上，任车轮碾压毫无知觉。我剩下的一丝坚定而顽固的信念就是为儿报仇，一定要让凶手伏法，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兄弟们第二天就上南京市公安局五处(刑侦处)报案，之后，兄弟们又亲赴城南出事现场节制闸水库实地调查。发现孩子尸体的人说，孩子赤身裸体飘浮在水面上，脖子上有勒痕，岸边寻不着孩子的衣物鞋袜。一位打鱼的老人说：“这孩子看来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长得很好，发现他尸体以后，晚上下起雷暴雨，雷电一个劲地在水库上空翻滚，久久不去。我打一辈子鱼，没见过这样的雷，我就跟人家说，这孩子一定死得冤！那个造孽的人一定不得好报。”更可贵的是——一位目击证人，指证凶手有两个男子，其中有个人的相貌体态衣着描绘得与“小棋子”一模一样。

市五处有经验的侦察员们立即展开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他杀”，锁定了重大凶嫌“小棋子”。

本来案情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却突然发生异变。新上任的一个副处长被授命全权处理此案，调走了得力办案干警，全盘否认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现场诸多重大凶杀疑点。硬是罔顾事实，下

了个“意外溺水死亡”的结论。

我们不服提出上诉，得到江苏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的支持，认为此案他杀疑点重大，责令并派刑侦专家督察重新侦办。

市五处的副处长恼羞成怒，采用软硬兼施的拖延手段就是不办案，不但自己不办，还严令其他干警不准插手和过问此案。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凶手“小棋子”竟然知道侦办案情的全部内情，何来如此大神通？联想他违反常情的纠缠住我不放，与害我儿的状况岂不大相径庭？

回想一件事，或许是巧合吧，张青霖唯一的一个视为家庭宝贝的八岁侄儿，也是被人溺死在水中，凶手至今查不到，出于什么动机目的？

我要彻底追查凶手。我到处奔走呼号申诉儿子的冤情，得到省、市委和南京军区某些首长甚至中顾委委员的同情和帮助，他们分别打电话或找当事人疏通关节，五处压力虽大，可就是压着不办。

我接回儿子的骨灰盒，放在枕边，多少个以泪洗面的不眠之夜，对着骨灰盒忆念晨儿生前可爱的音容笑貌。

一天早晨，发现晨儿骨灰盒的两边框架上，一边一条对称地僵卧着两条寸把长的小蜈蚣，近在枕边它们居然没有咬我，时至夏天，它们怎会僵卧而死？我唤来哥哥看这一奇怪现象，哥哥安慰我：“晨儿是天龙，天龙走了，地龙（蜈蚣俗称‘地龙’）跟着去服侍。你放心吧，晨儿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得很好，不会再受委屈了。”我感到一丝安慰，更感到极度的心酸。

我回想起一九七四年中秋节晚上做的那个怪异的梦，我的食槽里装的是剥了壳的蚕豆，“蚕”字，上“天”下“虫”，我晨儿一九七六年生，属相龙，岂不应了“天虫”二字，去世时正是十二岁，十二岁为一轮，他在世间转了一轮就走了，走时为久旱的南京带来一场雷暴雨。这些尽管都是巧合，却巧合得令人伤心

难解。

冥冥之中真有命运？老道说的偈语是真的？“历尽世间万种情”，我还能再承受多少苦难和打击？一个人的苦难经历，莫过于我这般痛苦吧，我何时才能到“海涯此处生”的解脱时候呢？人间，我已不感到一点温暖，我再没有什么希求。我要搞清楚那些怪异的梦，为什么都应验了？寺庙，我要进寺庙寻求人间得不到的答案。

经友人介绍，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夜晚，我走进山林里的棲霞寺，向觉顺法师问缘。他静听我泣叙，一字一泪，要求他开示。

我不懂他说什么，我这个信奉唯物论教育的人，混了三十八年混得一塌糊涂的人，听他口吐梵音，只知流泪心又不甘。但是他说我有很深的慧根，梦中所见是地藏王菩萨，我不大听懂，似信似疑。他领我进入大殿去看地藏王菩萨，在一座大铜钟下面，地藏王菩萨的坐像果然与我梦中所见一样，只是缺少一根锡杖。觉顺法师破格领我深夜去叩见他的师傅、佛教界高僧、棲霞寺老住持本振大法师。

本振法师少年出家，时已半个多世纪，正闭目坐禅，我一旁静静观察他，果真罗汉相，长眉长耳，印堂泛出一缕红光。稍顷，他睁开眼，不说话，静听徒弟介绍，再看我时，不知怎的，我有一种想下跪叩拜的冲动。他微微摇手制止道：“阿弥陀佛，不要多礼，不可拜我，要拜就拜观音菩萨吧。”言罢起身让位，陪我一道在观音大士座下跪拜。

法师陪我入座，说道：“不要悲伤，你和你儿子与菩萨有缘。你梦中所见果真是地藏菩萨，不是唐僧。地藏菩萨是冥府教主，他那一根锡杖‘金锡一蹶，威镇十殿阎王’。你的儿子乘愿而来还愿而去，他本就不是你的儿子，只是尘幻一梦给你留下的假象，渡你一劫，也是前世欠你，还你一债。你宿根很深，与佛有缘。以我看，你的苦难是入世渡劫。阿弥陀佛。”

“什么？我不懂你的话，我造了什么孽要受这样的惩罚？我儿子还是个孩子，有什么罪要遭横死？现在凶手逍遥法外，公安机关不但不惩治他，他还继续在威胁我的人身安全，人间不公道，菩萨是不是讲公道的呀？”

“菩萨是讲惩恶扬善的，不然就没有轮回六道。这次死的本应该不是你，但是你的儿子替了你。你儿子小小年纪夭折，地藏菩萨早有警示，一定是乘愿而来。人已去，不可回，（这两句竟与梦中地藏菩萨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极乐比人间好，不要再悲伤萦怀。公安局的态度你不可焦急。凶手果报未到，孽障满盈，必有果报。静观两年，若再不报，天理不公。”

法师一番话令我心情平和许多，按自己俗家标准，认为这才符合道理，圣僧唐玄奘在鬼怪要食他时还知道逃命呢，信佛如果一味地毫无善恶之分的讲悲悯，我宿根再深也不会去信仰。

法师给我开示人间造业种种及其因果循环，我听得心畅神通，悟出一些滋味。告辞时，我要拜法师为师，要求他出面荐我出家为尼。

法师连诵佛号，说道：“不可，不可，你尘缘未了，不可出家。”

我急辩道：“我对尘事再无欲念，为什么不要我？求师傅慈悲，一定要收我。”

“不是不要你，是不能收你。若你的事放在其他人身上，我可以收，但是你不行。尘缘未了，好自珍重。”

我心中转念，大概是儿仇未报，怕我带一身怨气、杀气进佛界扰乱清静，也罢，等我报了儿仇再说。便向法师再次请求：“收我当弟子吧。”

法师点头道：“你就做我在家弟子吧，法名择日再起。”

自爱儿的案子拖延下来以后，我除了不断地寻求一些领导人诉说冤情以外，余下的时间只有两个地方是我经常去的，一是父

亲的墓地，一是庙里。到父亲墓地一坐大半天，荒草凄凄渺无人迹，精神痛苦麻木得已不知什么叫害怕，我向爸爸哭诉苦难与冤屈，祈求爸爸在天之灵与冥冥中的正义鬼神庇佑我为儿报仇成功。进庙里看望法师，与其他居士一起听师傅说法，增长知识兼打发时日。到了夜晚，搂着儿子的骨灰盒伴着心裂的痛苦和思念含着眼泪入睡。短短时日，人已被折磨得像个骷髅架子。

珠海朋友在事发后即知道情况，直等到年底，请我去珠海散心调理精神和身体。临行前向师傅拜别，师傅说：“你此去南方必遇人助，去吧，去吧。”

等机票那两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到处寻找儿子，走到一座山下，沿弯弯曲曲的石阶上山，沿途竹林中有许多石条板凳围着的石坑，石坑里黑漆漆的，不知做什么用途。上了山，有一座石桥，桥尽头高坡上有一座小亭，里面坐着两个老妇和一个老头儿，亭子旁有两块大圆石，我儿子和一个小姑娘在圆石上蹦蹦跳跳玩得正高兴。我大呼一声“晨儿！”跑上去抱住他，恸哭道：

“你把妈妈想死了！妈妈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边说边紧紧搂住他，生怕他再跑掉。晨儿只是望着我笑而不语，那两个老妇人见状喊道：“龙儿回来吧，我们走啦。”晨儿留恋地望我一眼，很听话地跑回亭子。我心异晨儿怎么改了名字，愣愣间手一松让晨儿跑走了。我大哭道：“晨儿，你为什么认妈妈！”从梦中哭醒。

到了珠海，朋友小马等人想尽办法让我释怀一些，开车带我出去游玩、购物。自我信佛后，到一地都要进庙礼佛，也向友人打听珠海有无寺庙尼庵。小马说珠海只有一座莲花山，上面有个白莲洞，供的观音菩萨。

他们送我到了海边。莲花山上郁郁葱葱，沿山石阶弯弯曲曲，沿途渐现竹林，越走越茂密。我心中一动，好眼熟啊！向山上紧跑，竹林中出现石板凳、石坑，我指着那些石凳、石坑，问

友人们：“这是干什么的？”

小马答道：“这些石坑是烧烤炉，郊游的人在这儿烧烤东西吃。”

我神思恍惚地继续向上走，到山顶了，石桥、小亭子、两块圆石，竟与梦中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圆石下有个龙头，正从口中喷出水，石桥下方有个圆型的莲花池。

我颓坐桥栏杆上控制不住自己，悲从心涌，眼泪似那龙口喷出的水，涓涓流淌，小马和他的女友惊问缘故，我告诉他们这个不可思议的梦。

神灵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回答得了，我不求世人惊异，但求对自己有个解释，我已到了无需自欺来安慰自己的地步，我只希望有人能解释我亲身经历的这些奇事。

友人们完全相信我的话。安慰已无济于事，他们建议我到白莲洞里去向老和尚问卜，据说白莲洞里问的卜很灵。

南方的庙不像中原地区院阔僧多，白莲洞里只有一位法师，他说的南腔我还听不懂，由小马等人当翻译。

我首先说了这个与现实吻合的梦，法师问：“你梦中有没有见到红围墙？”

我答：“这个梦中没有见到。”

法师“哦”了一声说道：“你梦见这里说明你与这里有缘。你有什么事要问？”

“我儿子冤死，卜问凶手伏法之日。再问凶手有几人。”因为那个五处副处长一直否认两人参与犯案。

法师抽了一根签，那上面词我已记不住，晦涩难懂，法师说道：“两年之后凶手落网。凶手不止一人。你有异动之兆，远离故土，遇草皆助。”

远离故土，我当时以为指暂时离开南京而言，心忖：“儿仇未报，岂会离开南京，不准。”便问道：“遇草皆助，什么意

思？”

“凡遇草字姓氏，一定帮你。”

姑妄听之。

出洞后，在石桥、小亭旁流连不忍离去，拍了几张照片，经小马等人一再劝慰，才哭着离开。

过了两天，朋友告诉我香港《镜报》老板徐四民先生要来蛇口讲学，问我去不去听。我心中思忖推动儿子的案情侦破，能否借助他一臂之力？都说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我决定试一试。

我托人去相约，徐四民先生立即给予答复，约定第二天晚上见面。

不巧的是第二天晚上徐先生有要事，下午就赶回香港。缘慊一面，我没有见到他。留下等我的是《镜报》编辑徐可仁先生，他转给我一张徐四民先生签了名的名片，真是一位诚信之人，令人感动。

一个月后，《镜报》刊出专访我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揭出南京市公安局五处副处长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纵容凶手逍遥法外的行为，并指出此案可疑的政治背景。《镜报》是国内上层和内部阅读刊物，消息传播广泛，国内记者也追踪报道，社会舆论谴责那些利用职权包庇罪犯的人和机构，给市公安局和当事人很大触动。正应了本振法师的预言。

回到南京，我首先去见师傅，将梦境和莲花山所见告诉他，请他开示。师傅说：“不要心存异念。你的魂魄已先你去那地方，已见到凡人见不到的事，你的儿子很好，你可以放心了。你要静下心来好好省悟自己的前身，你有很大的愿才托生这个世界。”

厚厚的尘埃已封闭了我的心窍，我实在悟不出我有何愿来到这世界上，恐怕只有等到“海涯此处生”的那一刻才会大彻大悟吧！

出家变出国

天地间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听过很多神奇的传说，可没有谁见到过，就是潜心修行的道德高僧也未必因苦修而得其境，而得其境的一些高僧又深藏不泄，这也许就是“缘”。一九八九年的大年初一的清晨，我见到了奇境，师傅嘱我不可说泄，因为现在的大众世界里，许多造业者仍不相信佛说，对无知者叙说，是对菩萨的亵渎。

因我所见到的奇境，师傅为我起法名“妙境”。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所见的真实无法用科学两字来解释。悟念下，自觉尘孽深重，佛祖造就我朝露般的纯洁、赋予我大自然的灵气，却要在红尘中翻滚，时至今日岂不是果报？

我再一次向师傅要求削发出家，以迟暮的觉悟去赎我的业果。

师傅只是摇头，一再说“你尘缘未了”，嘱我上九华山见大师伯，听听他的意见再做定夺。

开春后，我在觉顺法师陪同下，上了地藏王菩萨的升天祖地安徽省九华山。师伯佛职有四：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祇园寺方丈。大师伯法名“仁德”，众比丘尼和善男信女皆称他“仁德大和尚”。

仁德大和尚竹节般的体形，双目炯炯有神，皮肤白皙，显得清风佛骨，更兼他挥洒墨宝，佛气融于诗、画、狂草之中，令我惊叹深山佛林里竟有这般儒雅和尚，更突显他修行的高层次。

仁德大和尚初见我第一面，就好似将我的一切洞穿。每天中餐他必陪我进食，众比丘尼说，大和尚很少以这种礼遇待人。我心中窃喜，以为师伯一定会接纳我出家为尼。

我等了几十天不见师伯提及出家之事，忍不住约他长谈。师伯

双目微合，静听我叙说，不时亮眸看看我。令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也不赞成我出家，并附和师傅“尘缘未了”之说。我万分失望。他向我解释：“不进佛门，不等于与佛无缘。不是说你贪恋红尘，我观你对红尘也已死心。各人命运不同，修行道路不同，人做方外居士或许比你出家起到更大护法作用。你好自为之，我看你过不多久一定有变数。”

无论我怎样求他，他只是摇头，说道：“不是我不收你，这九华山山前山后上百座庙宇尼庵，岂容不下你一人？只是你与其他比丘尼不同，逆命而行，你就是有了出家形式，也修行不好的。”

我心中翻腾种种尘世遭遇，坚信自己出家的决心，难不成真应了孤岛上老道偈语“历尽世间万种情”才放我脱苦难吗？我不甘心！俗间普遍认为出家人都是逃避现实，而我不这样认识自己，我很多次的异梦（还有很多没有说到）与亲眼所见奇境，令我觉悟，这世上确有佛的信仰，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不管是“乘愿来世”也好，“佛缘重”也好，“慧根深”也好，我没有那么样深的功力去认识自己，我只明白自己是以一种新的信仰虔诚地投身佛门，去净化自己受尘埃蒙蔽的身心，到那里，我才能明白所有的一切，为自己找到答案。

可是我的想法和决心再次被师伯婉拒。师傅和师伯坚持认为我“尘缘未了”。我不禁激发出一丝好奇，无奈又不甘心之下等着瞧到底是哪种“尘缘”令我不能了却出家心愿。

在祇园寺为晨儿隆重地做了一场超度法事，祈求佛祖将这个纯洁无瑕的小生命带往西方极乐净土。

下山回到南京已是五月下旬，我去单位领几个月未拿的工资。同办公室的同事们见到我都说：“哎呀，你终于来了！”我奇怪她们为何急切地盼我归来。老孙交给我一封来自美国的大卡式信封，信封面上有只黑白双色的美国鹰，她告诉我：“你再不

来，这封信就要退回去了。因为是国际挂号，邮局非要本人凭证件去领，你又不在这，邮局压了近两个月，催了好几次。新领导很负责任，开了单位介绍信说你出差不在，叫我去替你拿回来的。快拆开看看是什么，怎么要这样大个信封。”

我对众人自语道：“我没有熟人在美国呀。”拿着信犹豫着怕拆错了别人的信，因为信封上写的地址是“南京市博物馆”，而不是“太平天国博物馆”，但隶属南京市文化局的博物馆、群艺馆不下七八个，只有我一人叫张宁，这要拜赐建康路邮电总局，自从报刊媒体登载我的部分经历以后，各地不少人来信，经过几次错投，弄清楚了我在“太平天国博物馆”。想到此，不管那许多，先拆开看看再说，反正是一封差点退回去的信。

大信封里掉出一个中等信封，是“富尔登集团有限公司”的专用信封，拆开先看信尾签名：林赛圃。这名字一点不熟悉。

看完信，才知他是一位纽约美籍华裔。他从美国华文报刊上得知我的情况，同情我的不幸，不赞成我的消极。他认为出家不如出国，他愿意帮助我在新环境下重新起步。

对他的好意，我很不以为然，儿子在世时，也有海外人向我求婚，儿子过世后，《镜报》的小徐先生也曾问过我想不想出国，香港的好朋友也问过类似问题，我都没有认真考虑。我虽然生活环境比较开放，可我是个思想传统的女性，年已近四十，体弱多病，不谙外语，外国又无亲无友，出国是一条很不明智的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追求的目标，不是我这种人去凑热闹的。

回到家，把信随手放在桌子上，上床午休。下午起来床，想起这件事应该告诉妈妈和哥哥。

妈妈和哥哥到我卧室看完信，态度都比较保留。但是妈妈心中一直有块心病，她坚决反对我出家，又担心她那随时可能发病去世的身体，一旦百年后，谁来照顾她这可怜苦命的女儿？她犹

豫不肯定地说道：“是不是请他先来一趟南京看看再说？”她一眼就看穿了所谓出国实际上就是出嫁！

我明白了妈妈的意思。这对我太残酷了，爱儿去世不到一年，儿仇未报，我哪有心思去婚嫁！何况我在这方面已心如死灰，与我出家志愿背道而驰。

陡然间，一个念头突跳入脑际：儿子的案情已被那渎职的副处长搁进死胡同，江苏地区我找的关系也是“顶到天”，仍然推动不了，即便是告到中央恐怕也是“山高皇帝远”，谁会来关心我这弱女子的冤情？！《镜报》那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示，回顾这一生，走到中年这一步已是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我这个最原始的躯壳。我遗留在世间的唯一愿望就是为儿报仇，说不定出国改变身分是我为儿报仇的积极途径，为何不试一试？思想初定，下决心豁出去闯这条陌路，哪怕落得异国他乡一败涂地也在所不惜。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妈妈和哥哥，他们很难过。我劝慰他们，因为对方是一位经济条件不错的美籍华裔商人，国内年轻貌美的女子多得是，人家未必看得上我。

我按照信中写的电话号码给美国打了电话，林赛圃正准备启程回国办理他在大陆的投资项目，我们约好在南京见面。

六月下旬，他从上海来到南京，下榻南京饭店，随行的有他两个大陆的远房侄儿，高大魁梧，像保镖。因为他对南京不熟悉，顾虑安全问题，看来这个人是个谨慎的人。

我去南京饭店那一天，也带上了弟媳妇和侄儿女，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无论出门办事或游玩，总要亲友跟在身边。

我们见面了。我感到很意外，林赛圃身上没有一般商人的那种俗气，浓眉大眼高鼻梁，长方脸型，瘦削挺拔，第一眼给人的印象很好，一身笔挺的上等质料西装，人显得很稳重。

没有寒暄，我们直截了当谈了共同关心的问题。最令我宽慰

的是他愿意在儿子这件事上助我一臂之力。我决定了与他的关系。

因他纽约商务繁忙，还要去南方签署投资项目，在南京的日程不能住久，半个月我们完成了涉外婚姻的一切手续。

新婚第一夜，我惊吓得几乎失态，黑暗中，我发现他的侧面轮廓极像林彪。回想师傅和师伯的预言，白莲洞老和尚的卜卦，都与这桩婚姻应验。更令我觉得神奇的是年初一早晨我见到奇境后，依菩萨指点测出两首诗，地藏王给我的诗是“朦胧秋月映朱门，林外鸟声远寺僧。自有贵人来接引，何须巧语似流莺。”观世音菩萨给我的诗是“叫道，叫道，天将明了，何不伸首舒眉，反做蓬蒿到老。”我把诗送去给师傅看，我认为是菩萨指引我出家，师傅不如此看，并传来两名徒弟，其中一人是佛学院毕业的“职业和尚”，两名徒弟看诗也认为师傅说的对，“尘缘未了”和“异动之兆”都体现在诗中。诗中的“林”与丈夫的姓氏吻合，而丈夫竟又长得像林彪！白天再仔细地分析他那张脸，真的与林彪极为相似，我怎么在婚前一点没看出来？！

到了上海，上影厂几位朋友宴请我们，席间众人不断打量他，导演杨延晋心直口快，忍不住说道：“他很像林彪！”大家齐声附和。

我心中泛起一股难言的滋味，真的是命运安排？掐指算来，正合了姜教授八年前预言：丈夫是浙江人，应了“东南方向来人”；居住美国，应了“漂洋过海”；儿冤申不了，应了“形势迫得你要走”；为儿报仇心切，应了“四十岁非嫁人不可”。难道林赛圃真是我“本命夫”？他放着那么多急于出国的美貌年轻女子不要，就真的一眼看出我“是一块美玉”？种种现实吻合得太令人不可思议，不由我不相信。但素有的逆反心理，使我又有某种不甘心。

半年后我移民美国，时年整四十岁。我与林赛圃的婚姻，被

国外媒体大肆渲染，北美西欧地区的华文报刊杂志称这桩婚姻为“红色王妃和番西洋”、“中国王妃下嫁异国”、“张宁仍是林家人”等等。虽然这类标题很张人眼目，但这桩飞来的婚姻对我却具有很大意义。

婚后，我发现林赛圃是一位重视家庭生活、讲传统又开明的男人。我到纽约后，林家家族出动十多位代表去机场迎接我，各房及亲友轮流设宴欢迎我这个苦难的新婚妇，没有因政治歧见和不同的家庭背景而疏远我，他们的温情和理解让我感到一种发自人类的自然感情。

丈夫经商，是“富尔登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给予我很优裕的生活环境。共同生活使我了解到他也有一部心酸的家世：他的祖上、外祖都是商人，外祖是清朝时期青田第一个远涉重洋赴美经商的人。祖上广置田产，在浙江青田富甲一方。父兄辈在民族抗日危难之时，都曾为国共两党捐钱出力，亲族中不乏两党高官。父亲好施仁义，精通岐黄，常为乡民百姓义诊治病，被百姓称为“义绅”，被共产党尊为“开明绅士”。一九四九年，家族中分为两支，一支流到港台和北美西欧发展；留在国内的一支，后来受“左”的政治思潮冲击，惨遭整肃。

我常想，我这个“红五类”与他这个“黑五类”的结合，正应了天道循环“殊路同归”之理。我到美国定居，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事，许多事情在某个阶段不可逾越，而到了另一个阶段，那个“不可逾越”便变得很荒谬。我母亲是个正统打江山的老八路，婚后，我问她感想，她笑道：“放在以前，我拚了老命不会答应你，嫁个美国人，那还不背个‘美特’、‘里通外国’的嫌疑？一家子都别想活了。”历史是经过千千万万个荒谬才进化到现在，人为的力量再强大，自然发展的规律终究是“千条江河归大海”。

在美国的社交活动中，我真地结识了三位带“草”字头姓氏

的华人知名人士，在他们的组织系统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帮助推动下，在国内一部分有正义感的警官的持续努力下，果然在两年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杀害我儿的凶手“小棋子”和另一个帮凶落网伏法。

当主凶“小棋子”被枪决的消息传来时，我多年压抑郁结的痛苦随着眼泪倾泄而出，失控地仰天恸哭：“晨儿！晨儿！妈妈为你报仇成功啦！我可怜的晨儿啊！你听见了吗？”晴空响起阵阵闷雷，顷刻间落下大滴雨珠。我愕然，张着泪眼望向天空。顷刻雷过雨停，巧合，又是巧合？！可我真希望看见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晨儿。

多年以来，我顽强地坚持一个信念：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做恶人的下场，人不报天报，不论时间长短，一定逃不脱天理人道的惩罚。只要精神支柱不垮，一定会等到“柳暗花明”那一天。

我非常怀念晨儿，常感膝下无子女的孤寂和遗憾。曾有一异人告诉我，在凶手伏法后，我仍能与晨儿重续母子缘，认记是胎儿出生后，身上的左半边有黑痣。我将信将疑，曾感到很荒谬，一个要出家的人，怎会论及婚嫁，更遑论生孩子了。

现在不但凶手伏法，我又再为人妻，不禁生出期盼。听说纽约华侨常去的大乘寺山清水秀，灵秀之地一定有灵气。赛圃周末开车带我去拜佛。当晚只有我们一家人留住寺院，我虔诚地礼佛祈求。当夜雷电交加，下了一夜的雷暴雨。

我果然顺利怀孕产下一子，此儿漂亮玲珑。神奇的是，他身体的左半部分果真有一麒麟形的黑褐色胎痣，尾巴高翘，毛发喷张，昂首向天。中国民间传统上视麒麟为龙。儿子左腿内侧和左边耳垂上的黑痣，正与晨儿生前黑痣的位置一模一样，我拿照片比对，不信佛的丈夫也感到惊奇。新生儿的右半边身体上，一颗痣也没有。我的亲戚和一些关系密切的友人看了孩子的麒麟痣，

无不称奇。在“美东佛教协会”和“大乘寺”创办人应金玉堂夫人的家宴中，应夫人看了麒麟痣，甚觉奇异。她喜欢漂亮的男孩，搂着小儿爱不释怀。因她相貌有些像传统绘画中的观音，人们称她为“活观音”。她相信我的奇遇，因为她有过奇异的经历。儿子得到佛教界知名大居士们的喜爱，也是林家一百岁老祖母的掌上明珠。我感念佛祖恩赐，给儿子取中国名“林佛欣”。神奇的应验给我精神上带来莫大的安慰。

一九九二年秋，我母亲和继父来到美国探亲。母亲见到小佛欣的第一眼，就悲喜交集，因为佛欣太像晨儿。他们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庆幸我有了新的寄托和美满家庭。

母亲思想较保守，对美国的生活和社会环境有很深的戒心。到处走走看看，她的观感和体会改变很大。我刚来时也一样，后来体会到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优越性，积极因素越多，社会就越进步富有。但是，美国的高度文明所衍生的社会畸形现象，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让人感到美国的强大国家机器在这种畸形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

写到这里，已到结束部分。对人生的感慨太多，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小说。人类的感情世界太丰富，不论“喜怒哀乐”哪一种，都会给每个人一生注上不同色彩。

我对生活的感受，择其主要的写在书里，平白直述，一般人都会看得懂。再为人母后，我有一种重新“入世”的感觉，重新调适自己的角色，相夫教子，燃起对未来的活力，那是我的下半生。上半生在东方，下半生在西方，不论东或西，都是太阳出没的地方。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既活着，就要争取活得充实有意义。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世事皆随佛缘，以善心待人接物。身为佛门在家弟子，置身俗世，心存佛念。一个人的追求是好是坏，果报都始于心念。天使与恶魔同存心间，人若没有意志

和道德，那就与畜生没有区别。人人都可修身，人人都可作恶，看你愿做好人还是坏人。当你在作恶时，请你想想你也是上有父母，旁有兄弟姐妹，下有妻儿的血肉之躯，不论你的性别，不论你的地位贵贱，果报循环一定躲不过的。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既要求得此生过得丰富多彩，更要求得此生活得心安理得。